



中国行动
CHINA ACTION

如何终结专制

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文集

End the Dictatorship

*Prize-winning Essays on
How to Wage Nonviolent Struggle*

如何终结专制

——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文集

End the Dictatorship

Prize-winning Essays on How to Wage Nonviolent Struggle



中国行动
CHINA ACTION

Published by Bouden House, New York

End the Dictatorship:

Prize-winning Essays on How to Wage Nonviolent Struggle

Planned by: China Action

Editor: Liu Shihui, Yang Zili

如何终结专制——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文集

策 划：中国行动

责任编辑：刘士辉，杨子立

出版：博登书屋·纽约（Bouden House·New York）

邮箱：boudenhouse@gmail.com

发行：谷歌图书（电子版）、亚马逊（纸质版）

版次：2024年5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字数：220千字

定价：\$35.00 美元

Copyright © 2024 by Bouden House, www.boudenhous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review.

作品内容受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保护，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编者前言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在中国结束长达数千年的专制、建立民主宪政。在当代中国人面临的所有公共责任中，没有什么比这一使命更加重要。

2023年8月，“中国行动”（China Action）发起并联合“公民力量”“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民主中国”“纵览中国”四家机构，向全球华人重奖征集“讨专制檄文”以及“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活动设立了两个评审委员会，即专家评审委员会和公民社会评审委员会。

截至2023年11月15日，组委会收到了《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57篇投稿。经过两个评审委员会的初选和复选，最终在2024年1月初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的获奖作品。

2024年1月19—21日，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隆重举行了征文颁奖会暨“公民抗争与中国未来”国际研讨会。

此书为“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征集文稿的作品集，收录了11篇获奖作品的全文，并摘选了21篇未获奖作品的部分内容。它们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人士，对于如何经由非暴力行动终结专制的思考。



参会者代表一等奖获得者领取证书，授奖人为苏晓康



参会者代表二等奖获得者领取证书，授奖人为马建



参会者代表三等奖获得者领取证书



评委刘士辉发言



评委罗胜春发言



特邀嘉宾梅里曼发言

目 录

代序一 我们为什么要主张非暴力抗争	胡平.....	1
代序二 非暴力抵抗与民主变革： 为什么每个独裁者都害怕他们的人民	哈迪·梅里曼.....	7
代序三 坚定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王天成.....	16
一等奖		
构建颠覆性平行结构路线图	作者：苏利利.....	19
二等奖		
点火计划纲要	作者：楚三户.....	60
独立参选区县人大代表： 可行性、风险对策、认识准备与推广	作者：公天下..	114
三等奖		
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略	作者：关山夺路.....	136
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	作者：Stars_Promotion.....	153
建立民主中国的全民非暴力行动方案	作者：费历鸣.....	178
优秀奖		
全面解构中国极权主义制度	作者：陶业.....	192
《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	作者：Scoop News.....	207

就用常识的方式，开创千年未有之非暴力变革新局面	
作者：杨百尼	226
非暴力不合作，一种推翻中共、铲除专制更有效的方法	
作者：丁余庸	271
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	
作者：贰青	281
其他征文选摘	286
后 记	352

代序一

我们为什么要主张非暴力抗争

胡平



【编者注】此文是著名学者、政论家胡平于2024年1月20日参加China Action在华盛顿举行的征文颁奖会暨非暴力抗争研讨会上的发言。

白纸行动证明，即便在习近平这样严酷的独裁暴政之下，民众以非暴力方式从事抗争仍然是现实的，是可行的。

在谈非暴力抗争之前，先谈两句暴力抗争。

1、暴力抗争不可一概否定。在一定条件下，暴力抗争有正当性。当人们的基本权利遭到政府剥夺时，人们就有权采用一切方式，包括暴力方式，进行抗争。

2、暴力抗争未必总是导致专制，未必总是导致以暴易暴。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以暴力抗争方式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的先例。

3、退一步讲，即便是以暴易暴，也未必总是坏事。即便有些暴力抗争只是以暴易暴，那多半也比一暴到底要好一些。在古代中国，大臣们劝诫皇帝不要压榨无度，总是把例如暴秦的灭亡引为前

车之鉴。如果一个暴虐的政权居然能千秋万代，一暴到底，那不是更坏吗？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主张非暴力抗争呢？一来是因为非暴力抗争更符合我们道德理念，二来也是因为今天的中国，面对拥有高度现代化暴力工具的中共政权，非暴力抗争更具有现实可行性。

1993年3月，刘晓波应邀访问美国，期间接受采访，谈到非暴力抗争的问题。刘晓波说，大多数中国人之所以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其中也有避免以暴易暴的考虑，但主要是“出于安全、策略的考虑”，“因为这个政权实在太强大了。使用暴力，你没有办法与它斗，反而授它以口实”。

一位名叫倪明的湖南农民维权领袖说：“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不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倪明说，以今日中国官民矛盾之尖锐，要是大刀长矛就派得上用场，民间的暴力抗争早就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

达赖喇嘛也持相同的观点。达赖喇嘛之所以坚持非暴力抗争，一方面是出于理念，出于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现实，出于策略。在2011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达赖喇嘛，流亡藏人中有主张暴力的，你怎么对待他们的主张？达赖喇嘛说，我就问他们，你们要怎么搞法？哪里搞到枪，少了不行，要很多，谁会卖给我们？从哪里运进去？对方无言以对。在这里，达赖喇嘛问得很具体。既然对方想搞暴力，你就不能只用非暴力的那套大道理去说服别人，因为别人不认那套大道理。问题在于，如果你主张暴力抗争，但是对怎样操作，具体怎么个搞，却没有靠谱的办法，缺少实行的手段，那就沦为空洞的口号了。

主张暴力抗争的人常常举胡文海、杨佳的例子。他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民运人士当胡文海、当杨佳呢？是民运人士“更无一人是男儿”吗？当然不是。民运人士也有不怕牺牲的勇

士，他们之所以没有选择当胡文海当杨佳，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争取的是改变制度，杀死几个无名小卒不能解决问题，和几个无名小卒同归于尽没有什么意义。再者，胡文海、杨佳是个体行动，我们这里说的暴力抗争是指集体行动。水浒传里，很有几个好汉，如李逵、武松、鲁达、林冲，或出于个人复仇，或路见不平，杀过恶霸、官吏或爪牙，但只有当他们奔上梁山入伙，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之后，才算走上了暴力抗争之路。今天的中国，有产生梁山、井冈山的可能性吗？一位中共专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就下去了。”

有些人把彭明和王炳章视为海外民运中暴力革命路线的代表。这不符合实情。不错，彭明和王炳章都发表过主张暴力抗争的文章，但是他们都没有采取过暴力抗争的实际行动。彭明策划过在天安门广场放悬挂大标语的气球。这属于非暴力，不属于暴力。中共当局指控王炳章组织暴力恐怖活动，其唯一的一次活动是密谋爆炸中国驻曼谷大使馆。对此，泰国警方出具书面文件说明泰国警方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王炳章曾经密谋爆炸中国驻曼谷大使馆。事实上，在对王炳章的秘密审判中，就连当局为王炳章指派的律师也为王炳章做无罪辩护，指出当局指控的罪名缺少事实依据。

据我所知，六四后，国内不少民运人士认为，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今后唯有暴力革命。有些人还认真策划，怎样搞到武器，如何拉起一支队伍，哪里建立根据地，如何打游击，怎样和其他地方的武装力量呼应，等等。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设想都没有实行的条件，于是不得不放弃了。

海外一直有人主张暴力革命。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没打过一枪一炮，没杀过对方一兵一卒，而且也没组织起过一个排的队伍，没购置过够一支队伍的武器装备。主张暴力革命的这些朋友，有的可能就是说说而已，本来就不打算实行的，但也有些是严肃的、当

真的。过去这三十多年，他们想来也是做过认真谋划的，但就是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和工具，以至于到头来毫无作为。他们自己三十多年的经历证明了他们的主张没有现实可行性。他们自己的行为已经驳倒了他们的主张。在今天的讨论会上，如果有人要发表暴力抗争的主张，我请他们首先告诉我们，你们有任何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吗？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都毫无作为？

在 1985 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

美国学者乔纳森·席尔（Jonathan Schell）在为米奇尼克《狱中书简》（1986 年）一书写的序言里，是这样阐述波兰人的非暴力思想的。席尔说：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一个象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时就会失败。可是，团结工会恰恰是非暴力的；团结工会的经验证明，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没用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

那么，波兰人为什么不选择暴力而选择非暴力呢？席尔提醒我们，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波兰人本来是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的，但是由于他们坚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么做。不，不是这样的。席尔说：反对采取暴力方式而采用非暴力方式的抗争，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方式非暴力方式也能给我们希望。

席尔进一步阐述道，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成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手段——暴力。但问题是，如果暴力抗争

也失败了呢？或者干脆就是没有暴力工具暴力手段，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就只好投降，只好放弃，只好顺从了吗？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非暴力抗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枪，没法从事暴力反抗，但是我们不甘心屈服，不甘心投降。我们还是抗争，于是我们重新找回了非暴力抗争。在今天，对我们民众而言，唯有非暴力抗争才是现实的抗争手段。所以我们要坚持非暴力抗争。

必须看到，非暴力抗争决不仅仅是依赖于用道义感化统治者，也不仅仅是依赖于用理性说服统治者。众所周知，非暴力抗争的效果绝对地与投入人数的多少成正比。一个人写信要求释放思想犯，这是一回事；一百万人联名要求释放思想犯，这就变成另一回事。在后一种情况下，口号的道义性和合理性和前一种情况是一样的，但口号的力量却与前一种大不相同。如果仅仅是为了诉诸统治者的良心与理性，让一个人私下上书就行了，何必还劳神费力地去四处征集大家来签名呢？再比如罢工，一个人罢工是什么情况？一万个人罢工，一个工厂、一个行业、一个地区都罢工，甚至全国性大罢工，那又是什么情况？

和暴力抗争一样，非暴力抗争同样也是一种力量的显示和力量的较量。非暴力抗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观念或观点，更重要的，它表达的是意志，一种活生生的、积极的、行动中的意志。如果说暴力抗争是借助于对统治者直接造成肉体伤害而迫使对方接受自己一方的意志的话，那么非暴力抗争则是借助于瓦解统治者的权力基础而同样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毕竟，权力是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边的关系。当被统治者用实际行动拒绝服从统治者时，统治者的权力就不复存在了。因而非暴力抗争同样是具有强制性的。

还需要提醒的是，军警抗命，乃至兵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并不冲突。因为所谓非暴力，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非暴

力抗争问题专家基恩·夏普讲过，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兵变。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强硬派，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的政局暗含着多种严重的危机。关于未来中国的变化，有很多分析和预测：高层发生政变，军队举行兵变，中共打台湾招致美国出兵爆发中美战争，中共政权被打垮，等等。这些分析和预测有多靠谱暂且不论。问题是，这里说的都是别人，不是说的我们。

搞政变必须是高层，搞兵变必须是军人。如果你是华国锋，是叶剑英，如果你是林立果，那另当别论。我们是平民，我们是民众。我们没法搞政变搞兵变。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文章和讲话，用我们的思想和理念，去影响那些高层的人，影响那些军人。这对我们来说还是非暴力。所以我强调，对于我们民众来说，面对中共暴政，只要我们不甘心屈服，我们就必须抗争，而非暴力抗争就是我们的武器。

代序二

非暴力抵抗与民主变革：

为什么每个独裁者都害怕他们的人民

哈迪·梅里曼



【编者注】此文是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ICNC）主席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于2024年1月20日参加China Action 在华盛顿举行的征文颁奖会暨非暴力抗争研讨会上的发言。

早上好。今天能在这里参会，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要感谢组织者召开了这场非常重要的关于非暴力抵抗、高科技极权主义和中国未来的会议。同时，我也要感谢所有前来参会的各位。

今天上午，我将谈论民主和非暴力抵抗。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将花费大量时间讨论中国，我想提供一些关于这些相关主题的背景，以帮助构建本次会议的讨论框架。

我将谈论以下事项。

首先，我想分享一些有关世界上民主和独裁历史背景的观点。然后，我想谈一谈非暴力抵抗与民主变革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想提出一些关于我们目前所处时刻以及如何使非暴力抵抗更加有效的思考。

历史上的民主化浪潮

趋势：

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悲观的时代，我认为有时候跳出当下，试图以更广泛的历史视角看待当前时刻是有帮助的。

让我们谈谈过去的趋势。政治学家指出，全球范围内，民主和独裁往往以波浪的形式前进和后退。

例如，第一波民主浪潮是漫长而缓慢的，历时近 100 年，从 1828 年到 1926 年。它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民主是一种比君主制更可行的政治制度，并从美国和法国革命中汲取灵感。在此期间，我注意到中国在 1912 年也顺应当时的革命潮流，结束了君主制，尽管这并没有导致民主变革。

然而，随着全球民主浪潮在众多国家中持续数十年，它开始被视为一种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波浪潮在 1920 年代达到顶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的崩溃。相较独裁国家而言，民主国家在军事上表现更为出色。新兴国家如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都希望将自己合法化为主权国家，他们还采用了民主宪法。在此期间，阿根廷、哥伦比亚、乌拉圭、日本和新西兰等国也朝着民主方向迈进。

哈佛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评估称，这波民主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创立了约 30 个“至少建立了最低程度国家民主机制”的政府。顺带一提，要注意的是，按照今天的标准，其中许多政府可能被判定为非民主政体，但在当时，相较君主制国家而言，它们相对拥有更多的民主机制。

这第一波浪潮势不可挡，但在达到巅峰后，出乎意料地迅速结束，并于 1926 年开始减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带来了右翼和左翼的极端政治运动，动摇了许多新建立的民主政府。

这标志着威权主义浪潮的开始，一直持续到 1945 年。在此期间，欧洲和其他地方出现的许多新民主国家被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淹没。例如，意大利的民主在 1922 年被墨索里尼夺取。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政府都在政变中倒台。葡萄牙、巴西、阿根廷、希腊、西班牙和乌拉圭都变成了威权政体。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崛起，并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想象一下人们当时感到的绝望！人们可能认为民主是一个有限的试验，它失败了，不会再兴起。因为，到 1945 年，全球只有 12 个相对民主的政府存留下来。

第二波浪潮：

然而，随后出现了第二波民主浪潮。法西斯政权的军事失败标志着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崛起，并导致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许多国家进行去殖民化的运动。全球各地的人们反抗殖民统治，宣布独立，要求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其他地方倡导的民主自由。同样，在当时的革命精神中，中国在这波浪潮中也经历了一场革命，虽然像之前那样，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尽管如此，在第二波民主浪潮的高峰期，全球大约有 50 个相对民主的政府。

然而，这一趋势在 1962 年发生了变化，引发了为期 12 年的威权主义浪潮，期间许多新独立国家的民主体制滑向威权主义。特别是在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乌拉圭、希腊、土耳其和尼日利亚等地，军事政变使数十个民主国家岌岌可危。威权主义也蔓延到了韩国、印尼、巴基斯坦和台湾。

第三波浪潮：

到了 1974 年，名义上的民主国家数量从大约 50 个减少到大约 30 个，民主的全球前景看起来非常黯淡。正如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评论的那样，这是“世界上自由的一个黑暗时刻”。一年前，一场政变结束了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六年前，试图增加捷克斯洛伐克自由的努力被苏联军事力量粉碎。美国正在退出其在越南的悲剧性战争。老挝和柬埔寨很快被共产主义统治所淹没。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的丑闻困扰着美国政府。拉里·戴蒙德说：“在 1970 年代中期，你必须是一个怪人或一个浪漫主义者，才会相信在接下来的 25 年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会变成民主国家。”

然而，这种怀疑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

与悲观相矛盾的是，1974 年葡萄牙出现了一场影响较深远的民主突破。接下来的几年里，希腊和西班牙也进行了民主转型。但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些是民主未来的重大转折点。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一些国家继续走向威权主义，而另一些国家则朝着民主方向努力。这导致总体上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收获——在 1974 年到 1982 年之间，全球民主国家的比例从 30% 增加到 34%。

这标志着—一个渐进的民主进步的开始，但普遍的悲观情绪仍然存在。学者和分析家认为，威权主义者可以通过宣布自己与美国结盟、获得美国贸易的好处，然后在国内压制人权来保持权力。

没有人预测到即将取得民主的重大进展。在 1984 年，民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一篇题为“更多国家将变成民主国家吗？”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对世界各地的民主前景进行了彻底分析，并得出结论说，“除了极少数例外，世界上民主发展的极限可能已经达到。”换句话说，他认为民主可能不会进一步扩展。

然而，不久之后，未被认可的民主浪潮加快了步伐。1986 年，菲律宾的“人民力量”革命结束了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统治，

随后是韩国的民主转型，然后是 1988 年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终结。然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种势头能传播到苏联吗？几乎没有人预测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事实上，在 1988 年 9 月，中央情报局（CIA）发布了一份备忘录，预测东欧政权将继续存在。

然后来到了 1989 年，这是苏联统治的终结的开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1989 年）、波罗的海国家、东德（1991 年）和其他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进行了过渡。这里的许多转变都涉及非暴力抵抗。

这波浪潮甚至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当强硬派试图结束那里的民主化时，广泛的非暴力动员阻止了 1991 年的政变。

当然，并非所有的运动都实现了它们的目标。一个民主突破几乎在中国发生，全世界看到了勇敢的中国公民在天安门广场和其它城市动员起来，要求民主。示威者实践的非暴力抵抗特别强大且有希望，与先前的武装革命完全不同。我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这场非暴力抵抗采取了悲剧性的镇压，这并没有阻止这股浪潮在全球蔓延。

但这并没有阻止全球浪潮的发展。随着苏联的崩溃，民主传播到南非（1992 年）和印度尼西亚。然后，21 世纪初看到了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尼泊尔的民主革命。总体而言，第三波民主浪潮一直延续到 2006 年，到那时，占有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国家中有 58% 被分类为民主国家。

此后，一波威权主义浪潮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与第三波民主浪潮类似，目前的威权主义浪潮开始缓慢。在它的第一个十年里，它以一种不引起强烈行动共识的方式逐渐影响了民主国家。但在那之后，这一浪潮的影响变得更为明显。例如，在 2016 年到 2022 年之间，被“自由之家”组织分类为“自由”的国家的人口比例从全球人口的 39% 下降到了仅有的 20%，而许多民主国家出现了倒退。此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威权政府也变

得更加强大和专制。我们还看到威权主义者增加了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协调和压制。而在此期间，我们也看到了非暴力运动的效力下降。

非暴力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从过去的民主和威权主义浪潮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当然有很多。其中之一是过去的民主浪潮是在绝望时期出现的。每场反对独裁者的运动都是在残酷和绝望的情况下出现的。然而，独裁者并不总是像他们看起来那样强大。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参与战略性和持久的非暴力抵抗时，他们拥有巨大的力量。

另一个教训是专家和悲观主义者有时是错误的——他们有时会高估独裁者的稳定性，或者预测错误的趋势，有时也未能理解事件可以迅速发展的程度。

目前世界局势不容乐观，我认为我们在讨论如何应对时，牢记这两个教训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教训是，在过去的民主浪潮中，中国发生了革命，或者在 1989 年的情况下，曾经有过一场尝试性的革命。这些革命发生的事实表明，中国的人口和国内政治受到了世界其它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显著影响。与此同时，这些革命没有达到民主的事实表明，中国或许仍然过于与整个民主世界隔绝。这两个条件在未来会持续吗？我们拭目以待。我猜想，如果世界出现第四波民主浪潮，中国将再次受到影响，从而有机会进行民主变革。

现在，我想谈论过去民主浪潮中的另一个教训，它与非暴力抵抗在民主变革中的作用有关。学者们分析了过去的民主浪潮，并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非暴力运动进行了详细分析。他们研究了数百个案例。研究结果一致表明，非暴力运动是世界各地民主变革中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

以下是一些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观点：

学者埃里卡·切诺威斯（Erica Chenoweth）在非暴力运动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专注于寻求政治过渡的运动，切诺威斯教授发现从 1900 年到 2019 年，这些运动成功实现目标的平均概率为 51%。这大约是同一时期暴力起义的 26% 成功率的两倍。

但在过渡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研究还发现，当过渡是由非暴力抵抗推动时，民主的可能性要高得多。例如，在 1900 年到 2006 年之间，57% 的成功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五年后导致了民主结果。相比之下，当暴力起义迫使政治过渡时，研究发现它只有 6% 的可能会导致民主结果。

此外，即使一个非暴力抵抗运动未能实现其明确目标，研究发现五年后仍有 35% 的机会出现民主结果。这表明即使一个运动不能立即实现其明确的目标，非暴力抵抗本身仍然能够为民主成长播下种子。

更高的民主稳定性也是许多非暴力运动的遗产。例如，研究发现，当一个非暴力运动导致了一个民主政府时，该政府的中位寿命为 47 年。相比之下，当一个民主政府是由暴力起义导致时，其中位寿命仅为 5 年，而不涉及任何基层抵抗（即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民主转型产生的政府中位寿命为 9 年。

非暴力抵抗也比暴力起义更快见效——平均而言，非暴力运动持续大约三年，而暴力起义平均持续大约九年。

这只是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关键发现。对我而言，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任何实现民主的计划都必须考虑到人民非暴力抵抗的关键角色。这些人群经常被忽视，但它们是最大的权力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次会议如此重要——你们理解普通人推动政治变革的力量。

现在，这使我进入我的讲话的最后一部分，重点是如何使非暴力抵抗更加有效。

如何使非暴力抵抗更加有效

在当前时刻，威权主义者强大且与全球其它国家合作。他们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害怕他们虐待和剥削的民众。他们害怕非暴力抵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镇压运动方面投入如此巨大的努力。

他们的努力产生了实际效果，使运动的成功率降低。例如，在 1990 年代，寻求政治过渡的非暴力运动的平均成功率为 64%。到 2010 年至 2019 年的十年中，这一成功率降至仅有 34%。

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反击。如何最好地做到这一点呢？以下是一些建议：

首先，研究告诉我们，对社会活动人士的培训和教育很重要。分享有关如何组织运动、战略规划、选择战术以及管理非暴力抵抗的其它方面的信息非常重要。培训是支持运动最有影响力的方式之一，接受培训的运动倾向于动员更多的人，更有可能保持非暴力，并更有可能争取安全部队的叛变。接受良好培训的运动还倾向于遭受更低的伤亡。因此，如果你想取得胜利，建立支持运动定期进行教育和培训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但在考虑培训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不仅是一次性的参与。成为一名社会活动人士是世界上最艰难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几乎每一个职业——无论是医生、工程师、律师、士兵——都经历了一个有结构的学习过程，得到了导师的指导，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领域来支持他们。我们也需要开始更多地为社会活动人士考虑这一点。

第二点是，投资于研究也非常重要，而且与培训完美地结合。培训可以帮助人们弄清楚该做什么以及如何推动。研究可以帮助您弄清楚在哪里以及何时推动。例如，支撑特定独裁政权的支柱是什么？它们在哪里强大，哪里薄弱？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内部存在哪些紧张关系？这些都是需要不断研究的重要问题。

举个具体的例子：我知道数字威权主义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某个地方，仍然有人——有网络管理员、软件工程师、进口商和出口商——他们维护着那个系统。当你了解维持系统运行的所有关系时，有时就会出现施加压力的机会。

第三，支持非暴力抵抗要重点关注到女性的领导力。研究表明，女性在运动中的更高参与可以提高运动的成功率。具有更具性别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并包含妇女组织的运动也与更高的运动成功率相关。女性的参与有时还可以增加运动获取安全部队叛变的可能性。

第四，劳工组织也可以真正帮助运动。即使工人只是基于地方上的不满而组织，他们建立和行使权力的能力在任何争取民主或人权的斗争中都非常重要。支持他们是很重要的。

第五，媒体报道很重要。通过媒体更好地接触内部和外部观众，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发自己的媒体渠道，这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注点。

第六点，这也是我的最后一点。推动民主政府团结一致并支持运动是很重要的。世界各地的威权主义者联合起来试图打击民主。同样，民主国家需要团结起来对抗威权主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嗯，这里有一个例子。正如您所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利用经济压力改变民主政府行为方面非常有效。但是如果民主国家创建了一份共同防御协议——类似于经济版本的北约——他们将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其他威权主义者经济胁迫时相互支持。而且如果民主国家更系统地共同设计和实施针对侵犯人权者的有针对性制裁，会怎样呢？这只是民主国家更好地团结起来为争取世界更加民主的未来而可以采取的许多方式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大家，感谢你们付出时间、勇气，还有奉献精神。你们的工作至关重要。不要忘记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与威权主义作斗争的时候，正是像你们这样的人扭转了潮流。

代序三

坚定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王天成



【编者注】此文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于 2024 年 1 月 20 日参加 China Action 在华盛顿举行的征文颁奖会暨非暴力抗争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世界范围看，在人类争取自由的事业中，非暴力抗争比武装斗争更成功。我先分享两组统计数据。一个是哈佛大学教授艾瑞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的统计研究。从 1900—2019 的 120 年中全世界有 650 场目标最大化的运动。所谓目标最大化的反抗运动指的是推翻政权或者寻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在这 120 年目标最大化的反抗运动中，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 51%，暴力运动只有约 26%取得了成功。换言之，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率是暴力的两倍。

顺便说一句，Chenoweth 教授这个研究已经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民主季刊》2024 年第一期上，1 月 15 日出版，顺便做个广告推荐朋友们看看。

另一组数据，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05 年的一个报告提供的。从 1970 年代至本世纪初的 30 年中，全球有近 80 个政

治转型，其中绝大多数依靠的是非暴力抗争：在 67 个人口 100 万以上、发生了转型的国家中，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达 50 个、多于 70%；由掌权者自上至下的改革所推动的转型只有 14，还有 3 个转型则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下开启的。

这些统计研究结果，对于我们思考以什么方式改变中国是有帮助的；遗憾的是，我们中国异议人士活动分子中，知道的不多。明显的原因有语言障碍、资讯流通限制，但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中间研究非暴力抗争、传播这方面的知识的人太少。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人对非暴力抗争没有信心。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只有暴力才是真正的力量。刚才林培瑞教授提到了共产党语言的毒化作用，在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作用。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 1949 年毒害了太多的人。许多人只相信暴力，害怕有枪的人、害怕掌握着枪杆子的政府。人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自己有力量。实际上，任何政权都必须依赖于人民的服从、合作与支持。如果人们撤回服从与合作，统治者就没法统治下去。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许多人不认为有学习、掌握非暴力抗争知识的必要。1989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基恩·夏普（Gene Sharp）博士曾经从美国飞到北京做实地考察。他问一些学生领袖他们是怎么知道非暴力这种抗争手段的。学生领袖们兴奋地提到了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夏普博士进一步问，“你看过非暴力抗争的书吗？”“看过”。他进一步问：“你能否举出你看过的一本书名？”结果，没有一个人回答。

35 年过去了，今天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变？近些年一些由于一些人的努力，有些关于非暴力抗争的英文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情况似乎比过去有所改变，但改变还远远不够，因为学习的人依然只占很少的比例。

这些年我跟很多人交谈过，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非暴力抗

争不适合于中国。也是基于这个理由，或至少是部分基于这个理由，他们没有兴趣去看这方面的书，去理解非暴力抗争的性质、潜力、方法与战略。我建议这些人多找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书籍看一看，也许会发现自己过去许多关于非暴力抗争的看法是错误的。

我强烈认为，我们需要丰富自己关于非暴力抗争的知识、提升这方面的认识，才有可能更有效地在中国开展非暴力行动。这种知识对于我们正确总结中国过去非暴力抗争所曾取得的成绩和令人痛心的失败，从中吸取可以用于未来的教益，非常重要。正如指挥战争需要学习军事，我们，特别是公民社会的领袖们，也需要学习、研究非暴力这门抗争技术。

小结：我们今天推动在中国开展非暴力抗争，还需要从这两个最基础的方面入手：第一，坚定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增进关于暴力抗争的知识，学习、研究这门抗争技术。

一等奖

构建颠覆性平行结构路线图

作者：苏利利

本文是一个假想性的公民非暴力运动（NEM）的计划实施方案，它只是一个理论性演示，目的是为组织和推动公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面提供一些介绍和分析，以促成进一步的讨论。文章之所以使用假想的方案，是因为真正的战略计划必须是保密而非公开的，公开发表的文章意味着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掌权者也会同步看到。因此，文章无法提供一个真实的、可执行的计划或方案。作为假想的计划方案，它有其固有的不可行因素，因此，希望读者不要直接用它作为你未来组织的战略计划。

绪论

从活动家的角度看，为了自由而不惜冒死以发起和参与一场和平反对运动，这很勇敢，但是，单凭激情和勇气是不够的，因为中共政权一向不容忍任何不同声音，更不用奢谈运动，因此，一场战略性的反对运动从开启到成功必定是一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过程。它意味着，即使你愿意献出生命，也无法保证你能赢；就像率兵作战一样，原子化的行动不可能打赢一场战争，所有战争都必须是组织化行动；如果靠单兵而不是组织，那么，只要对个人实施消灭行动，整场运动就必然结束。如巴基斯坦前领导人布托的女儿贝·布托在被暗杀后，其运动即刻结束。相反，美国民权运动中的

马丁·路德·金虽是举世闻名的魅力领袖，但许多具体运动都是由其它组织发起的，包括著名的赢得第一场全国性胜利的自由乘车运动¹。

作为理论分析，我们也可回顾一下 2019 年香港反送中运动，运动原则是无大台，即当时甚是受捧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它是对 2014 年“有大台”的技术性反对²。于是，2019 年的运动中，虽有游行示威的申请人，但没有明确的运动领导组织，大家在申请日聚集，但各自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这一运动，在高潮时达到了 200 万抗议者一起上街的史无前例的规模，但如此规模宏大的运动最终无法坚持到底，这是香港保存自由的最后的机会。如今，香港的自由几乎丧失殆尽，几十万人被迫流亡。虽然 2019 年末正是武汉肺炎在香港爆发的时候，但同样的流行病在之后却没能阻止泰国的年轻人反抗军政府的自由运动。

这一结论在理论上也有大量研究结论来支撑。究其原因，个人可因各种事由而消失于运动，因而被认为是不稳定的，致使依靠个人魅力领袖的运动也不稳定。而组织则不同，它不依个人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³里所讲到的，稳定的统治当用公务职位担任者取代具体的人（君主）。发生在近代的欧洲三十年战争⁴，就是因为君主的死亡而造成权力的不平衡引起的。成熟的政治体，如英美等国，有法定的顺位继承人，这些继承人不是固定的某个人，而是公务职位担任者。西方的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了为什么现代组织要强调“无领袖”模式的原因，这里的领袖指的就是

1 自由乘车运动发生于 1961 年，是在 1954 年最高法院推翻持续半个世纪的种族歧视法律之后，第一场打破沉寂而发起反种族歧视的运动，该运动在当年即取得了全国性的成功。

2 2014 年的运动有明确的组织和领导人，但在运动后期遭到了非常多的反对声音，在运动之后，香港专上学生会被“内部成员发起投票”而拆散。

3 参见维基百科词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君主论>

4 参见维基百科词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十年戰爭>

其地位无可替代的某具体的个人领导者。这一原则不仅适合政治体，也同样适合政治反对运动。

因此，要赢得这场较量，需要活动家冷静地从长期性与战略目标视角去分析自我，以理性而现实的原则来评估时局和自身处境，通过战略规划培育出具有韧性同时又能不间断发展的运动力量。

现有的大量文献都是通过历史研究而总结出运动应该如何去做，本文将反过来，从现时的状态出发，运用前人的成果，对未来进行构想。作者将采用这种文体来设计未来运动发展的路径，这就是制定战略⁵。

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已众所周知，该原则在现代战略学上已被演化为“强弱危机分析（SWOT 分析）”，它是战略计划的起点，本文的论述也将以此为起点，因为时局构成了活动家的外部环境，这就是第一章“知彼”；以此为契机去反思和评估自己，这就是第二章“立己”，要知己则必先立己。本章将从活动家视角入手，审视组织者、发起者如何计划与构建运动团队；第三章为“战略及技术性工具”，将基于战略计划的基本概念及对战略计划的技术性分析，阐述制定战略计划的可行步骤；其后，提出一套假想的NEM策划、制定和执行战略的方案；最后是一段简短的结语。

第一章 知彼

1.1 背景

自 1976 年以来，中国发生过数次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抗议，包括 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和 1979 年的民主墙运动，1986-1989 民主

5 解释：本文的“战略”指的是，某个具有长期性和前瞻性的组织层面的发展计划，而不是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因而不涉及个人层面的道德准则或政府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

运动；厦门反 PX 运动；乌坎村抗议；自由工会运动；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白纸运动等。这些运动都没有成功，但历次运动之后都产生了新的活动家，他们



星星美展上观看曲磊磊的钢笔画作品，1979年9月27日。
摄影：李晓斌。图片提供：星星艺术基金会

继续走在政治反对的道路上，坚定地倡导中国的变革。

基于中国各种形式的反对运动均告失败，以及活动家们面临着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挑战，许多人对于再次发起全国性大规模的运动已经不抱希望了，读者可以看到网络舆论中有不少因绝望而发的各种抱怨，包括对人性、民族性或外国政府的责难，对运动幸存者的典型支持也只能是帮助他们离开中国，从此再也无法继续活动家的生涯。但是，这样的结局不是必然，我们不应将历史等同于未来。

1.2 战略性运动与孤立的群体抗议

放眼全球，印度甘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起民族独立运动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是有希望的，而甘地的运动的确没有成功，但是，后来的其他运动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美国民权运动期间，作为人口仅占 10%的少数族裔，非洲裔美国人群体，为了打破在南方实施了半个世纪的种族隔离法，他们在黑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护的背景下，寻求实现平等的公民选举权。这一目标也似乎无望：当时的黑人菁英——接受高等教育的黑人，在全美占比不足 0.3%，比 3K 党⁶的人数都少，但平等选举权的实现也就在十几年（1954-

6 3K 党，又称“KKK”党，在 1960 年代“KKK”党是专门针对美国民权运动而

1968)的时间内得以实现。

更多的例子，如突尼斯、埃及和苏东政治集团的政治运动，它们都始于极小型且不知名的普通反抗者发起的组织，而那时也没人相信运动会击败强大的共产阵营的高压统治集团，但共产阵营最终在那里整体地垮台了。有人说，那是经济崩溃造成的。实际上，许多运动都在经济崩溃时，走向了高潮，但不是所有国家在经济崩溃时都可以走向运动的高潮，如斯里兰卡、北朝鲜、阿富汗。

哈佛大学教授切诺维特对全球一百多年的非暴力运动的研究发现，在 1900 至 2006 年期间，在全球范围内（含中国）的 323 起大规模的、以推翻专制政权为目标的运动中，超过 40%的非暴力运动成功了，同时只有 20%的暴力运动获得成功（ICNC，2017，p7-9）。这个结果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战略性反对运动的力量比暴力革命的力量更强大。

当然，一场运动要上规模，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更多的运动，无论是非暴力还是暴力，运动常常在刚刚萌发的时候，就夭折了。据非新闻⁷的统计，2015 年全年的各种抗议近三万起，比 2014 年所录得的数量增加 34%；而 2016 年 1-4 月间，全国各地总抗议达 9869 起。这些抗议都是各自孤立的。它们起因各异，互相没有联系，抗议者找不到理由、也不会动员其他人加入，更不会思考长远的运动计划。

据公开的知识和信息，很少有孤立的群体抗议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相反，成功的战略运动，虽然也经历过无数失败，但成功之前的各次运动都因为是战略计划的一部分而使得每次运动都为未来积累了宝贵的资源，使得下一次运动不需要从原点开始。

成立的：<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K党>

7 非新闻（2015）：2015 年统计

<https://newsworthknowingcn.blogspot.com/2016/01/2015.html>；

<https://newsworthknowingcn.blogspot.com/search/label/统计>

对比结果可见，孤立的抗议在其消失后，其原有力量也随着消失得无影无踪，最终，即使是同样的抗议者再聚到一起，他们也只能叙旧而无法组织下一场运动；相反，战略性运动，无论每一次运动结果是成是败，团队都不会散去。因此，一场运动能为下一场运动奠定基础。所以，战略性反对运动即使遭遇挫折，也并不表示未来不会成功。

结论是运动要上规模，则一定要将运动提升为“有组织、有预谋”的组织化运动，这才是中共最为害怕的。所以，中共对每一次自发而起的运动都冠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这恰恰说明了运动的组织化与战略化对极权统治者的制胜力量。

1.3 中国现状

历经四十年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进入衰退已成定局⁸，据日经报社制作的视频节目⁹，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在卫星光亮度图像推算下，比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普遍低 3%¹⁰，而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已



达全年 GDP 的总和，即，100%（如左图）。共产党政府大量裁员¹¹；公务员降薪则从 2021 年起就出现于新闻报道¹²，2023 年 8 月，

8 知乎：造成经济非短暂衰退的因素除了债务还有那些？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27698720>

9 消息来源：译者@纵横日本翻译的 NHK 视频

10 消息来源：同上

11 澎湃新闻：25 年来规模最大，中央国家机关精减编制 5%，背后有何深意？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204035

12 自由亚洲：专栏 | 财经时时听：公务员大幅减薪互联网爆裁员潮就业问题成为灰犀牛？

共产党的海外网站知乎¹³确认政府裁员真实性。与此同时，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报告显示，外商直接投资首度下降为净减少 118 亿美元，这是自 1978 年以来破纪录的趋势（见下图）。



现在，中共在政治上也面临危机：新一届政府四个关键部门的部长（外交、国防、财政、科技）在任职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突然免职；2022年年底，已交权退休的胡锦涛在世界聚焦下，公然从共产党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架走，之后再无露面；前总理李克强卸任才半年，突然在去上海“休养”的第二天被宣布死亡，年仅 68 岁；虽然中国政治具有严重不透明的落后文化的特征，但是从种种表现，人们还是可以判断它正面临着顶层权力斗争所带来的空前政治危机。

2023 年 6 月中国公布的青年失业率早已超过 21%，人民日报随后于 2023 年 7 月发表评论¹⁴，定调发起新一轮的“上山下乡”运动。然而，今非昔比：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上山下乡的青年大多数是初中生，而现在受到政府“号召”的是大学生，它们去农村无法从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jingmaorediansaomiao/econ-12172021175953.html>

13 知乎：公务员工资下调 20%？2024 年或将落实到位！ - 北辰遴选的文章 - 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650525534>

14 人民日报：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人民时评）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3/0710/c1003-40031354.html>

事任何有意义的工作。如此浪费资源是因为失业大军可能造成大规模的抗议浪潮，而农村则是最好的防止群体聚集的地方。这就是现在中共政权所面临的社会危机。

据此可以大概看出一个概况，就是，中国政府正面临着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而同时，政府虽有强力镇压机器，民间的各种抗议却仍是此起彼伏，镇压也无法防止抗议的产生。虽然各种抗议的诉求各不相同，但我们可以推算的是，每年参加公开抗议的绝对人数远超过几十万。

论述到此，相信读者已经可以看出一场战略性反对运动所具有的潜力。

1.4 战略预期

中国人怎样解读和迎接时代压在政府头上以及民生所面临的挑战？如果你认为政府力量实在太强，最好是只顾及自己的小生活而对其他事保持沉默，以便安然度过的话，那么在目前的时局下，恐怕这是难以实现的。看看哈以战争，哈马斯无端向以色列发起反人道的进攻，致使以色列 1700 人在一次进攻的攻势中死亡¹⁵；200 名妇孺被虏走成为人质；海湾新闻网援引哈马斯“卫生部”的话说，截止 10 月 25 日发稿为止，5791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¹⁶；联合国发推表示，哈以开战两个星期，即使远离战争焦点的叙利亚西北部，因为遭到飞弹弹片落地的影响而流离失所的人就有 12 万¹⁷。这起看似

15 Toronto Star (2023): 'This war will serve no one.' Israel-Hamas war rains death, grief and continued violence on residents, https://www.thestar.com/news/world/this-war-will-serve-no-one-israel-hamas-war-rains-death-grief-and-continued-violence/article_0728f819-dab5-557a-8940-57be9b2f74c7.html

16 消息来源：Gulf News, Israel-Hamas war: Bombardment in Gaza surges, reducing buildings to rubble, <https://gulfnnews.com/world/mena/israel-hamas-war-bombardment-in-gaza-surges-reducing-buildings-to-rubble-1.1698205936227>

17 消息来源：联合国推特 (@UN, 2023) ,

普通平民完全没有参与计划的战争，却导致了无数平民生命丧失或受到威胁。

这个例子不仅只是哈马斯的无端攻击，凭中国多次以包围台湾为目的的军事行动，我们可以相信中国政府可以无端地做出类似的攻击性军事行动而导致无数平民陷入生存危机，甚至死亡。

从中国人翻山越岭偷渡进入美国的暴涨情况来看，读者更可以推定不少中国人对未来无比担忧：在 2023 年前九个月，偷渡进入美国的人数已为 2022 年的十三倍¹⁸。如果生活真的可以安然持续下去，就不会有数以万计的人九死一生地闯入一个文字不同、文化迥异、中国政府视之为宿敌的美国。若对比清末发生的“下南洋¹⁹”大潮，当时的东南亚并不是清朝庭的宿敌。

面对如此严峻的危机，中国政府不会施救，因为中国人就是被独裁者当作工具来用的，中国人口本质上是为统治者维持其统治和自身利益而备用的“牺牲”品和准备消耗掉的“代价”。为什么中国一再宣称人口危机？不是因为中国人口少，中国仅青壮年（18-59 岁）人口就接近 9 亿²⁰，这样的人口在 200 多个国家里面排名是第二。然而，这样的人口比例（民与官的比例）远不够他们的期待，即，可以用来挥霍掉的人口远达不到统治者们穷奢极侈的需求。

事实告诉我们，政府一方面要求所有人随时为国家利益而奉献和牺牲，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民族的代表”，政府从未“浪费国家资源”去对个人生命施以援手。例如俄乌战争和巴以战争期间拒绝接侨民回国，在 1959-1961 的三年大饥荒期间，政府面对数

<https://x.com/UNOCHA/status/1716871998255604171?s=20>

18 消息来源：法广（2023）：<https://www.rfi.fr/tw/中國/20231101-中國人偷渡美國猛增-暴翻13>

倍?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x&utm_source=shorty

19 参见维基百科同名中文词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下南洋>

20 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5/11/c_1127433978.htm

以千万计的人死于饥饿，却将粮食大量地运往阿尔巴尼亚以推进其“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更有甚者，外国政府或人道救援组织均不被允许进入中国，所有这些因素相加才导致了上千万人口（接近8%）的死亡，导致出现共产党掌权后发生的有史以来的首次人口净下降。

有人至今仍然期望外国政府，尤其是欧美，给中国政府施压，以迫使中国政府进行政治民主改革，从而使中国走向民主；当自己的单方面愿望落空后，很多人骂西方政府绥靖。在政治和外交上，这些都是一种幼稚的幻想。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对居住在他国的外国人和民族负责，他们不会用自己纳税人的钱去代替其他国家人民“促进”其民主制度。

我们不能将国际社会对发生灾难国家的个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对国外极权政府的战争混为一谈。民主国家因为是民选的，人民不会允许自己的纳税钱用于这样的“崇高”事业，也不会允许自己的政府为了他国民主化而放弃自身的经济利益去帮助他国人民。最近的例子应该让中国人警醒：在俄乌战争和巴以战争期间，美国国会众议院因共和党的阻挠而中止了政府对乌、以两个遭受侵略和侵袭的国家提供援助。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愿意为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牺牲太多。

更何况，如果一个国家自己的人民都不付出，哪个国家的政府或组织都不会给予一些人所幻想的对民间的“援助”。这一点，对比阿富汗和乌克兰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面对后苏联对乌克兰的强大入侵，西方国家原本以为乌克兰无疑会像阿富汗的民主政权一样不攻自破，但是，乌克兰上至总统下至平民奋力死拼，这才有了后来的西方国家慢吞吞、细水长流式的支援，同时也造成了至今乌克兰平民与士兵数以十万计的死亡和数以百万计妇孺的流亡。而面对阿富汗政府放弃抵抗塔利班的决定，任何西方政府都不曾以支持自由民主的名义去攻打类似丐帮的恐怖组织塔利班（除对个人的人道

救援以外)。

为此,夏普(Sharp, 2003)很肯定地告诉读者,“外国救星”是靠不住的,他们有时甚至为了本国利益而帮助独裁政权,出卖受压迫的外国人民。这一切告诉中国人,抱怨西方国家不伸援手,只会贻误时机和伤害自身,根本不会起到任何积极作用,甚至,无论你是否在自媒体上为此发声,这些连“异议”都算不上。

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必须是、也只能是——自救,也就是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来反抗这样一个极权暴政体系,但自救绝不能等到连生命都无法维持的时候。换句话说,所谓“所有人在面对死亡时都会成为陈胜吴广”的观念只是幻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只是一安抚性的假相,它既未经过历史与现实的验证,又在逻辑和学术上说不通。

1.5 暴力与非暴力之间

除了对外国政府寄予不切实际的指望以外,还有一些对暴政似乎已经恨之入骨的人,总是宣扬暴力的威力有多大,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幻想自己端着几根绝不会到手的刀枪在几百万正规军面前,如入无人之境,那些暴力机器、军队、警察,似乎完全不存在一样。他们在非暴力与暴力之间,不是真的要选择暴力,而是借此非难抱持以非暴力手段实施抵抗之立场的人。实际上,中国人没有选择,因为暴力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选项:在中国,人民已经被剥夺了几乎一切资源,连厨房用的刀具现在都开始实名制了。在这种高压状态下,如果你要暴力反抗,那么,你有什么可以用作暴力反抗的武器吗?更何况,可以进行暴力反抗和愿意进行暴力反抗的人会有多少?恐怕连中国的国家暴力机器的百分之一都不到,更何况你们的刀枪(万一有的话)能敌得过政府军警手里的现代化武器吗?

但若是选择等待，那就会像荒诞剧《等待戈多²¹》的结局一样，你可以等一世，但什么都等不来，直到死亡。因此，看似有两个选项，其实对中国来说，只有一个，就是非暴力抵抗。

非暴力抵抗制胜的核心原理就是寻求团结全体人民的联合力量，凭借这种力量对其政治运行制度进行全方位抵抗，让包括军警力量在内的体制彻底瘫痪，即，根本运行不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促成变化，要促使全体人民在态度上和行动上持续地保持与暴政的对立，即从配合与顺从变成不配合与不顺从，直到暴政彻底垮台。这种变化将强大到足以使军警因害怕后果而拒绝镇压。

有人说这样的目标遥不可及，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进行战略计划。所谓战略计划，指的就是——为时长久的、直到目标得以实现的持续性的计划。战略计划不是凭借自己或人民一时的激情和愤慨而做出的临时举动，如街头抗议，而是凭借顽强的信念、有意识的领导力和坚韧的毅力，为了将所有人的力量结合起来而做的长期而不屈的事业计划。它不会令你升官发财，但是会给你带来生的希望。在今天，当你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你会认为这样的结局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没有什么结局是不可能达成的。

非暴力反对运动研究的根本目标就是研究如何促成这样的局面发生。哈佛大学教授切诺维特在 2020 年讲到社会运动的制胜关键时提到了四大要素（wonk）²²。她说：“值得追求、团结一致、人数众多和坚持到底”（CCEIA, 2020）是运动要成功所必须做到的四点，“但很多人只强调动员绝大多数人，而不认为组织是必需的，但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斗争是长期的，……动员是短期的抗议行动（CCEIA, 2020, 30’50”），没有组织就无法长期坚持。而四大要素如

21 参见维基百科同名中文词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等待戈多>

22 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wonk = “worthiness, unity, numbers, and commitment” https://youtu.be/_y62wT21nBs?feature=shared

果达到了，就可能促成军警的背叛，运动就将走向胜利。

有人认为，即使事业是值得追求的，人民也不会团结一致。这或许是现状，但它绝不代表未来。更多的时候，未来要由活动家的努力和全体人民的意愿来书写。正如前述学者所言，如果你所倡导的事业是“值得追求”的，那么，在相对具有安全保护的情况下，它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1.6 运动组织

非暴力反对运动总是通过一步一步的发展而壮大，让全体人民加入到积极支持你的阵营中来。非暴力反对运动本质上就像是某个（些）组织运作一场争夺激烈的政治大选——每一个人的态度都至关重要。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战略性的规划，即使个人作出再大的努力，这场事业也不能赢，因为分散的个体不可能在自发状态下迅速地集结、再集结。我们从多年的网络经验可以看得清楚，网络上坐拥数以百万计粉丝的大 V 确实有，但没有一个人，哪怕是异议人士，可以号召得了百万粉丝们加入其反对运动。因为运动组织的存在才是运动的真正开端。

对此，1989 年的天安门血腥镇压就是明证：大规模抗议可以自发地形成，但是，一旦掌权者做出镇压决定，反对方即原地消失，更不用谈后续的再集结。最近的例子是 2022 年 7 月发生在斯里兰卡的大规模抗议²³，虽然抗议导致总统下台并出逃，但政府稍作调整，运动就散了。相比之下，波兰团结工会²⁴，在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被宣布非法之后，运动组织并没有被完全消除而是部分地转入地下运作；在下一波经济危机再次打击政府时，政府便主动要求与团结工会进行谈判，从而导致了共产政权的最终垮台。

23 消息来源：BBC 中文（2022），斯里兰卡街头抗议升级，总统逃离总理住宅起火

24 参见维基百科同名中文词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團結工聯>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运动要想成功则一定要建立运动组织，学术上称之为“运动方”。因此，下一章“立己”将论述运动方的组织问题。

第二章 立己

运动方如何“立己”？正如前文所述，运动必须是组织化与战略化，因此，立己就是指运动组织的存在：没有运动组织，就不可能存在知己的问题。这就是前文序言里所说的本战略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行的另一个原因。

2.1. 组织的成立

即使一个运动组织未正式公开注册，它也同样运动团队，正式注册的组织与未注册的运动团队在运作上没有本质区别。所有的区别只是，正式公开注册的前提条件不同：若正式注册，则意味着：1、该运动组织承认政府的合法地位而同时政府对其存在给予保护；2、运动组织需要公开运作以赢得合法的运作资金来源。相反，如果不注册，则团队必须保持地下运作。

在中国，虽然政府不允许民间组织存在构成组织缺失的一方面原因，但更多的原因还在于活动家自身。很多活动家认为，这样做是违法的。因此，地下运作会令活动家们面临道德上、法律上和发展上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但非暴力运动，过去也叫“公民不服从”，其本质就是要违反不合法的法律。在此贴上诺斯特(Nostr)平台上一位网友与 ChatGPT 的对话²⁵，“什么是公民不服从”（见下图）：

You: 请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公民不服从？

ChatGPT: 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是一种政治行动，它

25 参见诺斯特平台贴文：https://debug.freefrom.space/FreeFromWeb/#/share/note1srafjl2x5_vj8xuvhnr7csgur5cwtr7sqx4g7686ky76pywrpjw2q267sgd

涉及到有意识地、非暴力地违反法律，以表达对某些政府政策或法律的反对。这种行为的核心思想是，当政府的法律或政策与道德原则或公民的权利相冲突时，个人有责任不服从那些不公正的法律。

 You

请帮我详细讲解一下什么是公民不服从？

 ChatGPT

公民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 是一种政治行动，它涉及到有意识地、非暴力地违反法律，以表达对某些政府政策或法律的反对。这种行为的核心思想是，当政府的法律或政策与道德原则或公民的权利相冲突时，个人有责任不服从那些不公正的法律。

拿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作一个例子：该运动团队没有注册，只保持地下运作，而政府也不允许反对组织的存在。然而，团队能够非常成功地在南非本土上进行运作，并最终取得成功。类似于南非的运动团队的例子，在全球还有很多。

关于违法的问题，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则新闻，一位高龄律师枪击在抗议中的环保倡议者。很多人讨论这位律师开枪是不是可以。一位 X 友讲得非常好，他说：“美国民权运动的那一代人，游行抗议的时候如果不堵路不影响别人，遵守法律，我估计美国到现在都还种族隔离呢”。²⁶

总之，反对运动，无论是战略性的还是孤立的，无论你是否希望符合法律规范，其一切行动都被政府认定为违法，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违法并不一定指违反了某一部具体的法律，而是指严重地违背公序良俗和公共道德。若从法学来说，中国很多法律是恶法，不符合原则。

正如耶鲁大学政治哲学教授 (LiuSi, 2017) 所说，法律只有在其合法性得到认可的时候才是有效的，而一切不具备合法性的法律都是无效的。法律是对公共生活的规范，属于公域事务，而道德则

26 参见 X 推文：<https://x.com/Gu2020Marks/status/1723393502627999865?s=20>

是对私人行为的自律，属于私域事务，二者根本是不可混淆的。对于组织者来说，你不应将违法等同于道德良心之类的不良，这样你将不会陷入“违法”即“道德不良”的困境。

2.2 组织的发展

一个反对运动组织从无到有到最终发展壮大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就本文即将介绍的反对洗脑教育的运动NEM而言，要寻找到潜在的团队成员非常困难。首先，中国教育系统（直至博士阶段）从未开设过与非政府组织或社会运动相关的学科专业，更是禁止（自由）人权专业的存在，因此，中国人对于当今世界文明的了解有限。在中国反对派阵营中，即使最受尊重的学者，也会认为人们应当“以史为镜”，去摸索着前进，而不是直接去学习和深刻地理解世界文明。

“以史为镜”或许在历史上的若个朝代成立，因为中国从未真正文明化过：今天用的锄头，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在使用了。它的有效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中国永远不会变，而且中国代表全世界。很多人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意思是，中国黑，文明世界也一样黑，意指西方文明社会所发展的只是“虚伪和卑鄙”，本质上，西方文明社会并不文明，并不比中国更好，于是他们用评判中国而不点名评判了西方文明国家。

但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应该知道在科技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文明社会的一切都在改变，而中国仍试图按照落后的老模式运行。但事实是，过去不预示未来，中国的历史不是全世界的“镜子”，中国更不代表全世界。

为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反对运动的组织仍然延续过去的做法，则大概率，这样的事业不会成功。但更多人因为缺乏相关的知识信息而不愿意也不知道怎样去打破传统，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中国历来都是分散的小农模式，不追求组织化，而且即

使成立组织，成立之后也不知道这个组织应该做些什么，最终导致组织无疾而终。

诚然，反对运动的组织与普通的营利性组织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从专业水准上，二者并无很大的差别。举例说，一个组织，无论是什么性质，或成员是否受薪，它都应当有专业上的分工，例如，它同样需要具备一些必需的功能，如管理（战略、人力资源、培训和招募）、运营（包括文案设计、制作和推广）、财务（预算、管理与审计）等等。而这就涉及到经营管理、IT、设计、营销、人力资源、财务等不同方面的人才。

但现实情况常常是，若些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合，他们常具有极高的同质性，因此，无法真正进行组织化运作，而有些组织甚至没有实质上的运作。若没有系统化运作的组织，那么，即使它一直存在，也不会有发展空间。这样的团队有两大问题：一、在吸引资金方面非常困难，因为资金常常偏向于专业团队，无论该组织性质如何；二、在吸引新成员或为某个公共活动招募志愿者时，遇到极大挑战。这样的组织，即使有偶然的不定期的活动，它也不足以令组织获得生命力。

为什么对组织有如此“高”的要求？因为如果你要战胜已经垄断了几乎一切资源（包括专业人才）的暴政集团，你就必须比他们更强，因为你显然不能比他们控制更多的其它资源。那么，你如何可以给他人以希望，以吸引他人加盟，尤其是吸引主流人群加盟？

更何况，在主流社会中，这些实际上并不是“高”要求，而只是基本要求；但很多反对运动的活动家总认为非全职的事情就不用“太正规”，况且，也确实缺少专业人才。在此，笔者希望提醒，成功的运动，最终必然是有“正规”的组织来领导的。当你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学习和提高自己，而不是不现实地希望全社会都降低期望以适应你或你的团队（尤其是在运用非暴

力手段的情况下) 27。

2.3 赋能与专业化

正如上节所说，专业化非常重要，但是，运动团队在成立时，多数达不到专业水准，然而问题是，只有在团队专业的专业水准普遍较暴政体系更高的时候，运动才可能扩大，某个人有大量粉丝与运动规模扩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成员需要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这个过程被学术界称作“赋能”。

一个组织通常是在赋能的过程中变得日益强大的，而组织只有在强大起来以后，才能吸引公众，这样才可避免运动团队仅仅限于几个熟悉的朋友组成的小圈子。这一点和公司运作一样，一个公司的员工不可能是之前就与老板互相认识的，公司的运转与扩大常常是通过面向社会招聘人才。当他们构成社会主流的时候，小型的反对运动组织一定要在专业性上超过他们，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因为小型的团队在财力上不可能与大公司相比，更不可能与掌权者相比。

赋能虽然与攻读学位不完全相同，但它也是以信息的掌握和传播为目的。有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是在今天，非秀才造反将一世不成，因为时代已经变了，靠力气和武器的时代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不可能赢。

另一方面，对赋能的理解也可能发生偏差：有人将道听途说的内容或“名人名言”到处传播，把它当作学习和赋能，这些活动虽然可以使你显得有知识，但因为不会令你具有比暴政体系更强的专业性知识，包括非暴力政治反对运动的知识，是系统的，不系统学

27 有人认为自己三、四十岁了，要学习已经超龄了。在此分享一下终身学习者的背景故事：有1989年的民主运动参与者，因为中国一向缺乏与现代文明制度相关的正式教育，而在持有数个学位的情况下，仍然申请继续正式学习的机会，不是为了获得更多学位，而是为了学习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习是无法自我赋能的。

赋能本身还蕴涵着平等的概念。运作反对运动离不开向黑人和棕色人种学习，因为他们在为自己赢得平等和自由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智慧。无论你是否为种族主义者，你都应该明白，中国从未在非暴力反抗运动中赢过，而在世界范围内，带领人们赢得非暴力反对运动的，很多都是有色人种的运动组织，如印度独立运动、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等等。他们有着极为宝贵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历史经验。如果你希望在中国赢得非暴力政治反对运动，那么你当然需要学习他们已有的经验、积累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从而赢得公众对你的信心。

团队组织的具体形成和发展过程肯定会各自不同，都是依靠具体情况而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组织在形成的过程中，成员之间应当确保相互间有充分的信任。这与组织发起某个公众参与的抗议运动是不一样的，后者更需要的是对参与者的匿名保护，因而运动无需参与者提供个人信息。正如在 1989 年的民主运动中，参与者极为广泛，对于组织者而言，要想认识所有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同时组织者也不会试图获取参与者的个人信息。

下面笔者将假设已经组建了一个运动团队，形成了一个组织，暂命名为“先导”。先导团队虽然小，但已经初具组织化能力，有管理、技术、拓展、设计、文案与媒体、招募、研究与培训、财务等八名专业人才。那么，在此之后，先导团队将如何去制定和展开战略计划呢？这就是下一章的内容——战略及技术性工具。

第三章 战略及技术性工具

运用技术性工具来制定出真正有效的战略计划，是一场运动走向成功的关键。战略是长期性和指导性的计划，制定战略计划需要先了解相关概念入手，下文以“先导”团队的虚拟运作为例展开论述。

由于一场制胜的战略性的反对运动通常得由多团体领导、涉及全体被统治者，因此，战略要分作两大层面，第一层面的战略是所有运动组织间为之共同努力的目标；第二层面则是单一组织层面的计划，它将包括活动家直接进行组织工作的内容。下文先从第一层开始，然后进入第二层。

3.1 总战略规划

学术上把上述第一层的战略目标叫作总战略或大战略，它是这样论述的：

运动中的总战略“是一种永恒的参照物，其地位相当于北斗星。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凡处于迅速发展阶段时或内部发生冲突时，它总是特别有用。运动参与者可以参照其总战略来洞见他们所应当使用的战略和战术，因为它将决定什么应当是占优先地位的，以及应该如何规划运潮行动的先后次序。有时采纳一个总战略将帮助活动家们消除愿景上的分歧，尤其是当运动所得到的支持较低的时候或者处于被镇压的时候。

公民抵抗运动经常与外部盟友共存，有时甚至与自治的武装单位共存。在这一类的情况下，非暴力运动必须要制定可行的总战略，以便运动能够在其战略上成功地与盟友进行协调、谈判和妥协，并推进或捍卫其非暴力的立场。

在 1990 年代，对缅甸军政权的非暴力抵抗是由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所领导的国家民主联盟在缅甸的心脏地带运作着。与此同时，在该国的外围，则主要是少数民族通过全国民主阵线武装抵抗军事政权。在国际上，还有一个被称作缅甸联盟全国联合政府的流亡政府。最后，缅甸联盟全缅委员会是所有这些反对派团体的最高协调组织。缅甸反对阵营的总战略必需要在地理上、人口分布上和不同的组织之间进行分离，以避免对非暴力运潮的污蚀

但同时又能维持各个反对团体之间的协调，以最大程度地进行同步与合作。”（ICNC，2022，5.2.1）。

显然，由于具体组织的具体目标不同，因此各运动组织都需要在相互间的不同基础上克服分歧，寻找合作点。之所以组织间必须要合作，是因为不合作则任何单一组织的运动都不可能成功。

笔者从探索全国性共识的目标出发，提出“构建颠覆性”平行结构的设想。它指由各运动组织共同推动而形成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终结当下政权的运作系统，从而构成全新的、反映全民自由意愿的新运作系统。这一系统不是从现有系统被推翻的时候才开始，而是从各运动组织展开运动到一定规模以后，也就是旧王朝被推翻以前就开始，它也可称作“全民运动议会”（即平行结构）。它将作为所有非暴力运动组织的最高协调机构，带领运动的推进，直到整个非暴力运动最终获胜。标题所说的“路线图”，预示着实现该目标可能耗费漫长的时间和经历崎岖的道路。

这一平行结构试图寻求现在和未来的各运动组织（包括非大陆、非汉人的组织）的共同认可，以使大家在某个时刻暂时放下各自的直接诉求，如土地权或民族平等、地区独立等等，追求一个共同认定的目标。同时避免将各运动组织的目标变成简单的否定性论断的汇总，如反共，因为否定论断在定义上都是非唯一的和模糊的，而模糊的目标无法成就共识。

如果在运动组织间达成共识，那么，这一共识将是未来和现在的各不同运动组织的总战略目标。这一层面的目标通常没有具体的时间线，也没有时间线上的具体内容，它就是上文所说的“北斗星”。

当无数个组织所共同参与的运动具有共同目标，即总战略目标时，就必需要组建一个具有协调功能的运动间组织。但由于它由无数个单个的组织组成，那么，单个的组织团队如何设计和实施一场

由本组织领导的政治反对运动，也叫组织性战略，简称“战略”，这将是下一节“战略”的论述内容。

3.2 战略

战略的思想最先来自于孙子兵法中的战争策略，活动家马诺维克（Marovic, 2021, p7）在战争策略基础上提出了以下理论：

运动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只是，它不以热兵器为武器，而是以非暴力的手段为武器，既然是武器，那么你就必须懂得如何将非暴力手段当作武器来使用。另一方面，从战争层面上说，你更需要懂得如何指挥作战，否则，有武器也没有办法赢得胜利。……

一场全国性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组织领导就可以胜利的，它需要无数个组织共同努力，它们“可能在地理上是分散的由当地团体在坚持运动的思想领袖所设定的总体目标与指导原则的基础上自主运作，像缅甸民主运动（1990年代）、东帝汶独立运动以及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等都是这一类的例子。更有其它的运动在协调配合方面显得更为宽松，例如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当前的全球环境正义运动和各種阿拉伯之春运动（2010年代）。（ICNC, 2022, 5.2.1）

基于以上的理论见解，本文暂假设前述的先导团队通过内部讨论对自己所要从事的反对运动作出了如下的定位：

先导团队将在知识阶层激活全国性的联合反对运动，运动旨在推翻现教育系统下所设定的科目、内容和教育运作体系，团队称之为“先导知识运动”（又称“新教育运动/New Education Movement”或简称“NEM”）。

为何要设计这样一场运动？

首先，先导团队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型的反对运动组织，运动难以进入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

运动或市民运动等，否则，未来的运动扩展、社会沟通和动员能力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因而无法发挥团队所具有的全部潜力。

同时，先导团队自信可以在知识传播过程中，通过有效介入现有教育体系与模式，推行更适合学生获取知识的新教育体系和新的模式，从而打破中国长期以来所实施的洗脑教育。而在抵制现有教育体系方面，NEM认为可以担当起领导角色，激励所有的知识精英加入反对运动的阵营，最终促使现有教育体系瘫痪。

在目标的设定方面，需要提醒的是：如前文所述，要发起一场成功的运动，则必须要确立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不是确立一个马上可以实现的目标，为什么？

因为容易实现的目标是短期的而不是长期的，而仅设立独立的短期目标正是许多孤立的运动所做的，那些运动总是基于某种突发事件而兴起。若不能将短期的行动与更长远的行动关联起来的话，未来的发展将变得难以预期，因而，在短期目标基础上所达成的运动成果将难以保留。

例如，假设NEM马上设定一个容易做到的目标，它可能是通过互联网直接传播知识，具体做法可以是设计几门网络课程，接受报名，并开课。但是，运动所吸引的学生通常来自各行各业，而不是目标群体，即，知识精英，这也就意味着已有的学生资源将难以被纳入运动从而推进事业进入到下一步。于是，运动的未来陷入不可知的状态。由于未来状态的未知性，运动将无法制定下一阶段的目标，因此，运动将会变成走一步算一步的盲目行动。

NEM的长远目标又是如何被确立下来的？先导团队学习了非暴力运动战略的知识，并应用到了NEM的战略制定过程中。本章后面的内容将结合这一知识来介绍NEM战略的制定和评估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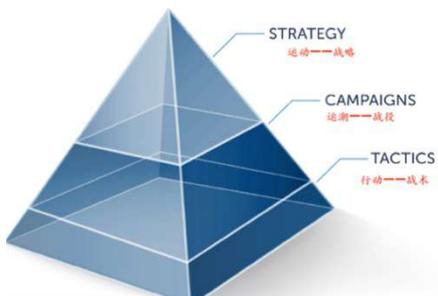
3.2.1 战略阶段

如前文所述，运动组织需要制定一个看似非常难以实现的目

标，然后去实现它。那么，这样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为什么可以实现？用计算机语言的方式来说，就是将极为复杂的工作逐级分解为许多个容易的工作。例如，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是全世界首位设计出完整的电脑动画片的人，并为此获得诺贝尔计算机科学奖提名和三项格莱美奖。而这个电脑动画影片（下右）是从最简单的一遇到顶点就转向的小球（下左）开始的²⁸。这就是将复杂的工作分解的方法，它也是本节战略设计的重要方法——战略目标的分解。下文将解释如何分解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战略目标。



马诺维克（Marovic, 2021, p7）将一场运动的战略分为三个层面的计划，也就是左下图所展示的战略计划的三个层次，其中，最高层次的计划为长期计划，它就是我们在前文所说的单一组织的战略计划，这是一场运动希望达成的最终目标。



战争与非暴力公民运动概念对比图

这个目标，在 NEM 中就是“推翻现教育系统下所设定的科目、内容和教育运作体系”；在图示中所标注的是最上层的“STRATEGY（运动——战略）”。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可行的路径必须

28 参见视频：<https://youtu.be/-wbJ-pw4epw?feature=shared>

全部列出来，以供团队进行分析和讨论。团队认为有两大可能的路径，一是依赖现有教育体系，通过说服、抗议、号召学生和家長进行抵制等方法来迫使教育系统进行改革；另一个是直接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即教育上的平行结构。对第一条路径，团队自问这样的可能性有没有。讨论后，团队认为没有，因为无论你有什么诉求或者怎么做，政府的主管部门，即教育系统，不可能因此而作出任何改变。直接原因是：政府不是民选出来的，因此不会考虑民间的要求，团队认为这一点似乎如登天那么困难。

那么，团队应当做些什么？经过讨论，团队认为第二条路径相比第一条路径更可行，虽然创建它也困难重重。这条路径可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求知要求，也可能让民间脱离现教育体系。路径选择就是战略目标分解后的第一步，即，具体化战略目标或任务。

在这一基础上，战略设计便进入第二个层次，即，图示中的“CAMPAIGN（运潮—战役）”。它指的是从时间段上将整个具体化的目标变成若干个实施阶段，每个阶段均有其相应的阶段性目标或任务，这在战争中被称作战役，在非暴力反对运动中被称作“运潮”，指像潮水一样的、短期而小型的运动。当然，究竟分作多少个阶段性运动或运潮，必须在进一步分解后才会知道。

就NEM运动而言，出于展示与分析需要，在此将展开一个并不严谨的三阶段运潮结构，每个阶段就是一个运潮，因此，整场运动将由三次连续的运潮推动而完成（在实际运动中，三阶段是不够的）。

首先，从最后一个阶段的启动条件来确立前一阶段所需要达成的目标，对NEM来说，它就是第二个阶段的运潮目标。换句话说，当团队的第二阶段运潮目标实现了，运动才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那么，第三阶段应当是什么样的？在第三阶段，运动希望最终吸引

全国的学生主动放弃官方教育而进入 NEM 教育系统²⁹。因此，第三阶段运潮若要启动，则第二阶段究竟需要达成什么样的条件？团队认为，应当是具有弹性极强的教育系统的扩张能力，即像 coursera 等平台一样，可以容纳无数的学生。然后分析第二阶段启动所需要达成的目标，以推断第一阶段运潮的阶段目标，团队认为是要建立有效的教育系统模版。

在此先省去推导过程，假设 NEM 以此方式确立了第一阶段的任务目标，那么第一阶段运潮如何着手发起运动？首先，第一阶段运潮仍然需要明确实施该运潮阶段性战略目标的路径。它可以是自建，也可以是与第三方联合。两条路径各有利弊，团队的成员中有人认为只有上街或以其他形式公开运动的存在，才算运动发起了。但从运动战略来说，这种早早公开运动的存在并不必要，重要的是最终能够建立一个平行的、可以扩容的教育系统，这个系统的扩容能力应当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使无数学生可以顺利地加入进来，接受新式的教育。

因为整场运动所需要达成的三个阶段运潮的任务目标粗略地展现出来了，第一阶段运潮的路径也确定了，下面将具体研讨怎么去实施第一阶段运潮的目标了：

现在，团队进入更细节的执行层面，即，寻找实现运潮阶段的具体方案。这种具体的运潮实施方案就是图示中（上图）的第三层次的内容，叫作“TACTICS（行动——战术）”。在每一个运潮阶段，都将有其相应的战术，也就是行动方案。在这一层面上，很多人可以提出非常具体的想法，举例如下：

NEM 需要设置课程、设计大纲、制定教材等等。那么，具体如何去操作？从第一阶段来说，团队必须考虑到最终学生会怎样的

29 运动不能期待公众将全部放弃教育，使得自己的孩子完全受不到哪怕是最基本的入门教育，因此，运动不能试图去推动所有的学生退学但又没有其他地方可接受教育。

状况下冒险选择进入平行的新教育体系？如果它要吸引人，就一定要显示其质量超过现教育体系；有什么可以让一个新的团队做到这一点？一个新的团队很难依靠独自运作并在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公信力，所以，自然会想到与中国之外的平行世界中具有公信力的教育系统，与这样的教育系统合作……所有这些，如果得到团队的认可，那么，它们就成为了运潮的具体工作。当然，在具体执行运潮计划的时候，具体的战术还需要更进一步地做详细的计划（此处省略）。

为什么一场全民性运动需要无数个运动组织来完成？从以上可见，一个组织战略计划有三大层次，而其中的关键第一步是路径的选择。

关于路径选择，先举一个战略学案例，该案例观察各商家对于蔬菜网购的战略选择，不同商家的背景不同，当站在刚刚兴起的蔬菜网购模式面前时，他们的选择会非常不同。有新兴的网络营销专家，他们没有实体店的重新定位问题，因此，直接选择100%网购加配送；有人选择保持实体店和网购同时进行；有人选择更多的完全的实体店加配送。然而，每一种路径又都受到局限，因为蔬菜的保鲜要求很高，而客户地点各不相同，导致配送难度大。最后，在不同路径中，究竟哪一路径有效，并非当时可以看得出来的。

因此，即使面对同一问题，如教育，究竟什么路径更有效，也应当由不同运动团队按自身的思想和计划来选择。没有人可以预见哪一条路径更有效，只有事实是最终的判官，而且可能不同模式对于不同选择都部分地有效，这样所有的运动结果相加就成为一个更有效的运动。

这也让团队明白开放的心态多么重要，不同的团队应该按照自己认为最适合的方式去推进运动，不要互相评判对方的选择；不要像商业运作那样，为了获得资源而恶性竞争。毕竟，对于一个具有明确价值追求的人来说，一场涉及全国大变革的运动，其最终结果

远比自己一个小型团队的成败更重要。

经上述推演可见，在战略中，连接三大层次的关键是运潮，而运潮在时间上和具体任务上将战术与战略相关联，它使得不同阶段的不同战术在逻辑上、时间线上都具有与战略目标高度的相关性。而运潮的实施关键则是如何选择运潮目标下的各项行动，也就是战术。其次，运潮中还有一个最不容易做的决定，就是，运潮什么时候算是开始，什么时候算是结束，以便推进到下一阶段或最终的运动高潮。这些问题都将在下面三个节分别进行讨论。

3.2.2 战略的技术性工具

运用技术性工具制定战略可使得计划现实可行，这就像开车，如果没有技术也不遵守规则，则可能人仰马翻，因此，作为真实的战略计划需要按程序共同制定，以最大化降低战略风险。有时战略错误会导致即使运潮成功，也不能最终实现运动的战略目标的结局，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那等于是白白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1) SWOT 分析

本文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强弱危机分析（SWOT），如左图³⁰，

	Helpful 对达成目标有帮助的 to achieving the objective	Harmful 对达成目标有害的 to achieving the objective
Internal 内部(组织) attributes of the organization	Strengths: 优势	Weaknesses: 劣势
External 外部(环境) attributes of the environment	Opportunities: 机会	Threats: 威胁

在此需特别提醒的是，这一分析应当由团队共同完成，而不是某个个人独自完成，过程是将团队分为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就图中的四个主题

30 来源：维基百科中文词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SWOT-Analysis-Chinese.png>

之一对当前的形势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然后由团队共同评估。

在此图中，优势与劣势属于团队内部资源上的项目；而机会与威胁则是团队外部的形势和条件。本文在前面的第一章分析了外部的情况，这些情况是不依团队状况而改变的，就像之前所谈到的电子商务，无论你计划怎样去建设，它的情况对所有团队来说都是一样的。而团队自身的特点，即优劣势，则各个团队各不相同。因为NEM是虚拟的运动，所以，其分析也不会具体，作为替代，下面列出一个简表（ICNC，2022，5.3.1），供读者参考：

因素	无害的	有害的
内在因素	优势：自身的能力，包括人力财力等资源、技术能力、其他隐性的优势，如团队团结和坚定的信念等。	劣势：内部的组织上的弱项，这些弱项有可能会拖累你们，或使你们陷入风险，如团队成员少、缺少资源等。其他还有团队缺少热情或成员间存在着令任何事都无法去做的恐惧心等。这些不像资源的缺乏，它们是隐性的弱点，随着时间的转移，它们可以改变，所以仍属于你可以控制的范围。
外在因素	机遇：这是你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但它们是对你们的运潮是有利的。无论你做什么，它们都是不依赖你的活动而存在的。不过，是否利用这一机遇在你的运潮中以帮助你获得发展，这个最终是由你来决定的。例如，你的对手很弱，它可能缺乏合法性或者内部分裂等，还有民众普遍不满或愤懑，或者存在着潜在的盟友以及可以利用的资源等。	威胁：也是外部因素，它是对你有威胁的因素。他们是潜在的危险但也不可能危险不会降临。但万一危险降临了，而你对此没有准备或者没有适当的回应，那么，它们就有可能伤害你的努力甚至成为灾难性结果的诱因。它包括你的对手能够通过对你进行负面宣传或警察镇压来伤害你的能力，也可以包括其他因素，如外在的但离你的运动地点很近的暴力元素等。

这样的分析必须谨慎而避免误判和差错，否则整个基于此的战略计划会因为严重误判而致使整个战略计划达不成预期目标，甚至是失败。

由于上述的 SWOT 所考虑的是当下时间点的现时状态，而未考虑未来变化，因此未来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出人意料的情况，即所有的四大因素中，只有某单一因素形成压倒性影响（即极端状态），而致使其他的因素起不到明显作用。

这时，运动团队需要制定 B 计划，其目标就是要使运动在最极端的状况出现后能够设法存活下来，或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加速扩张，以便运动在未来更好地继续。为了制定 B 计划，作 SWOT 的延伸分析，团队需要进行一个名叫 TOWS 的分析（将 SWOT 四个字倒过来拼写）。它将每一种要素作为产生极端影响的单一要素去考虑。团队将设想，若某要素成为唯一的影响力出现，即，极端事件发生，运动将如何应对，然后，将这样的结局记录下来，并为此设计应对计划，这就是 B 计划，每一种因素会有有一种，因此会有四种 B 计划。如果 SWOT 分析是准确的话，极端事件的发生率应当会很很低，但是，团队仍然要针对每一种极端状态所导致的后果制定出应对方案。

B 计划的作用可以应对像前波兰团结工会出现的极端状况：团结工会被整体地宣布非法并在工会进行全体代表开会时遭到逮捕，几乎全部的领袖被抓，但是由于已经有数以千计之多的分会，因此，有一些工会成功转入地下继续运作，而这一 B 计划的基础就是在波兰团结工会被认定为合法的那一时刻铺就的，当时工会领袖日以继夜地在全国发展分会。

同样是波兰，2010 年曾经发生总统专机坠毁事件³¹，致使包括总统、总统夫人和很多高官在内的全部 96 人遇难。这就是极端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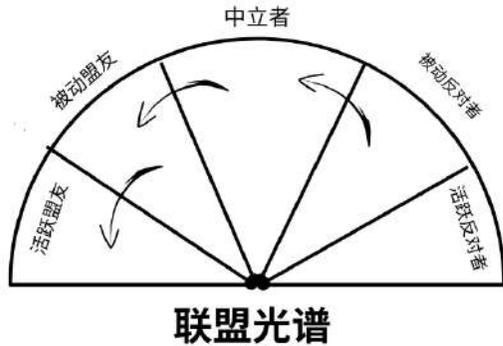
31 资料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0年波兰空军101号班机空难>

的发生，在一些国家，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灾难，国家有规定，例如总统及重要的高官不能同时在同一个场所，更何况是飞机，这就是 B 计划起作用的另一实例，它使得极端事件发生后，整个系统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运转。

此外，本文要介绍两大技术性战略设计工具，包括联盟光谱分析和权力支柱理论，然后再介绍 NEM 如何用这些工具制定自己的计划：

2) 联盟光谱

“联盟光谱(Spectrum of Allies)”是在近半个世纪前，由从事变革培训的乔治·莱基 (George Lakey) 开发(Bloch, n.d.)，其目标是将组织者所需传递的信息以最有效的方式传递给公众。但是，因公众是由众多不同群体组成的，若统一发送同质化的信息给全体受众，则可能因缺乏关联性而令大部分人反感。因此需要先在



一个范围很广的光谱内将整个群体进行细分 (右图)。然后以信息内容为基础，依据人群的不同而量身定制不同版本的子信息，每个子信息都发送给特定的目标受众。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所有人都成为你的活跃支持者并加入你，而是要争取不同立场的人群能够稍微改变一点他们的态度，朝着支持你的立场仅靠近一步即可，结果将是孤立统治者。换句话说，就是要令被动反对者 (军警) 站到中立³²的立场上，一场运动若到达

32 中立指的是，既不支持和参与运动，也不支持运动的反对者 (即统治者) 对运动进行暴力镇压。

这样的程度，那就赢了。

进一步说，被动盟友，作为同情和支持运动但不参与运动的人，运动团队可以通过传递信息让他们变成活跃盟友，即加入到运动中来；运潮最大的任务是将中立者（这是社会中占人口比例最大的主流群体）变成被动盟友，即同情和支持运动，反对血腥的武力镇压；运动的反对者分为被动反对者和活跃反对者，这其中包括统治者赖以维持其统治的暴力机器，即军警，以及分散在统治结构中的各个部门，如政府职能部门，交通部门、教育部门、宗教文化部门等。对运动方来说，这些部门中最关键的是军警，是镇压运动的执行者。运动要向他们传递的信息就是要令他们最终在人民的强大压力面前，与统治者脱钩，保持中立，也就是拒绝血腥镇压。当统治者发现军警不执行命令³³的时候，他们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是少数，而在暴力缺位的情况下，少数的一方就等于是失败者，因而统治将无法继续。

3) 权力支柱理论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理论创始人吉恩·夏普和合作者萨菲娅在《进行一场非暴力的斗争》(Sharp & Safieh, 1987)中对权力体系进行了剖析。作者发现，在本质上，一个社会中专门有那么一个群体，他们为维持和扩大现政权以及统治者的权力而提供其所需的支持，他们所在的体制、机构和社会部门被称作“权力的支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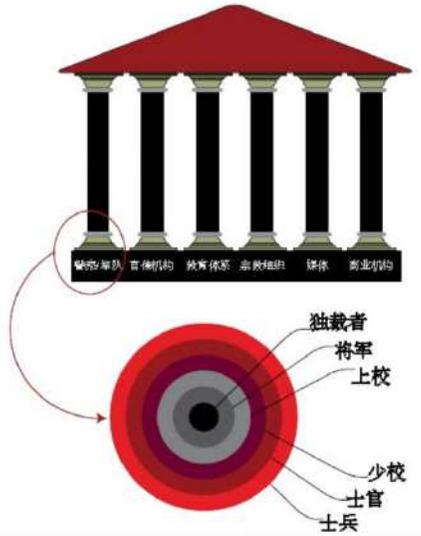
“在每个社会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各种权力支柱，包括警察、军队、统治机关，如司法和选举委员会等，公务员，教育系统，有组织的宗教机构，国家控制的媒体，商界，和其他组织等。”

(ICNC, 2022, 6.2.1) 具体来说，他们就是我们平时所能看到的“警察，军队，统治机关，如司法和选举委员会等，”还有，“公

33 这里所说的拒绝命令有各种方式，不一定是公开的对抗，常见的形式是请病假或者都站着不动

务员，教育系统，有组织的宗教机构，国家控制的媒体，商界和其他组织等”（如右图）

（ICNC，2022，6.2.1）。上图建筑支柱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按照与统治者的距离同心圆作进一步分解，如，我们可以看到在军队中，最接近独裁者的人从高级军官依次到普通士兵，凡是在这个支柱之内的人都是权力支柱的一部分。作者就此提问，所有人都在权力支柱的控制下生活，因此，试想如果所有人，如普通士官和士兵，都不服从，情况会怎么样？



对于运动来说，这一理论的要点是，权力依靠每一根支柱（即不同权力部门）而存在，但各支柱对权力支撑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运动组织可以依据自身的特点来分析哪一个支柱是最弱的，有针对地进行攻击（即令该支柱之下的人民脱离这些支柱），使其垮掉。

运动（指多运动组织）就是一个按照从弱到强的顺序依次攻击所有支柱，致使统治王朝崩裂的过程。所以，运动的最高峰和最后环节就是当全体其他支柱倒掉的时候，剩下的军警部门将被迫放下武器。这就是整个运动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

3.2.3 NEM 战略分析

据上述内容，笔者将为 NEM 作一个战略分析，如下：

第一步，NEM 作为教育界精英组织将专门针对权力体系中的教育部门进行打击（权力支柱中可作为打击目标的最弱项），在该过

程中，NEM 将选定某个阶段和某个群体的教育作为突破口，随着运潮的不断深入而扩展到全部的教育系统，形成一个平行而有效的教育系统，致使敌人的教育系统瘫痪。

第二步，NEM 将通过联盟光谱分析全部的关联人群，并将他们分为活跃盟友、被动盟友、中立者、被动反对者和积极反对者。按计划，将被动盟友转化为活跃盟友将是整个计划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第一阶段的运潮将面向他们而展开。谁是被动盟友？当然是对教育甚为厌恶而又感觉没有办法摆脱的人。于是，NEM 分析，这样的人应当具有一定的行动选择能力而且对于平行世界的教育有着浓厚兴趣的人。联盟光谱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它使得运动方针对不同人群发出不同的信息，例如对于被动盟友，其信息可能比较激烈，而对于中立者，信息可能更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即，肯定平行教育体系的价值，同时又反对教育当局对平行教育体系的价值进行否定，对提供教育的活跃人士给予同情和支持。对于联盟光谱中的被动反对者，NEM 可以向他们发出信息，即，他们的子女可以享受到更好和更便宜的教育，同时，他们无需公开地违抗上级的命令（即应付和隐瞒）。

第三步，NEM 将通过吸纳绝大部分学生来挑战教育当局所发出的违反公平与正义的各种教育信息，使得其声誉不断下降，最终使得教育部门既要维持极高的运营成本，又无法垄断其教育，因而造成权力部门所希望传播的内容无法被学生和家長接受。这就是 NEM 的第三阶段的运潮目标，直到这一步之后，NEM 将具有无比强大的动员能力，最终能够通过联合其他运动组织，号召运动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同情者加入全国性的联合行动。这样的联合行动通常是采取大规模的公开行动的方式，而且通常是集中性的行动，如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等，这种公开的行动方式在运动规模小的时候容易遭受打压，但是在规模极大的时候，暴力机器会失灵，因为暴

力机器只是针对少部分人的（ICNC，2022，6.2.3）³⁴。

所以，当这样的时刻出现而统治者却没有血腥镇压的时候，观众可以推断，这时是运动已经处于第三阶段的时候，它也是各运动组织将所有运动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结果。而如果这样的时刻提前到来，即，运动没有进入成熟阶段，那么，这样的行动可能因为巨大的安全风险变成现实而致使整个运动失败。在运动过程中，运动团队最需要关心的就是对运动的保护，而这一保护总是通过控制运潮所面临的风险来实现的。当运动未达到成熟阶段时，将所有参与者集中在一起，最容易遭到血腥镇压，这已经有无数的中外案例来作为证明了。

哈佛大学教授切诺维特讲到³⁵，运动有可能遭到统治者使用单边暴力（即对和平运动进行血腥的暴力镇压）。这时，如果运动是自发的，那么，暴力镇压很少会导致政权的垮台；但是，如果运动的背后有一个更强大的运动支撑着，那么，在单边暴力发生后，其背后更大的运动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历史数据显示，50%的这类运动最终都走向了成功，推翻了使用单边暴力的统治者。换句话说，当运动进入最后的运潮阶段时，运动显然会进入高潮，运动方将已经掌握了下一步的应对方案。因此，它使得被动反对者（军警）不敢轻举妄动，而这就是统治者不再能够维持统治的时候。

因此，进入普通人视线的关于运动的新闻，要么很快就推翻了统治者，要么就是很快地沉寂了下去，这取决于运动组织的情况。成功的运动团队在默默无闻中进行所有的前期工作，因此，旁观者只会误判他们的成功，以为自发的运动也可以在几天之内就成功。但如果运动没有组织或者组织没有准备好就采取了集中式的行动，那么运动失败的风险就会很高。在很大程度上，对新闻的浅显了解

34 资料来源：ICNC 中文课程，<https://youtu.be/j1DacjTkDFY?feature=shared>

35 信息来源：《单边暴力对有组织的和自发的运潮的影响》，
<https://youtu.be/o2gMS19sm7M?si=sJ01C0cfTqEKUcef>

和对成功运动的误判可以解释为什么二十一世纪之后的许多非暴力运动，在抗议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却仍然会归于失败。因为他们能看到的抗议行为是成功的活动家们在最后阶段组织的运动，这些运动方式并不适用于前期的运潮活动，这些活动通常都是不公开的，而且也不是集中式的行动，更多的是采取分散式的行动。

3.2.4 SMART 战略评估工具

本小节节选自 ICNC 中文课程的原文（ICNC，2022，5.3.3），仅供参考：

运潮计划的第一个要素是运潮目标。它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想通过你的运潮实现什么？”您的战略计划、您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您的能力以及您所处的运营环境都为您的运潮目标提供了回答这一问题的依据。

在制定运潮目标时，运动团队可以使用 SMART 标准来制定一套 SMART 目标。

SMART 是 George T. Doran³⁶在 1981 年首次使用的首字母缩写词，SMART 标准通常被认为是彼得·德鲁克在其目标管理理论中提出的一个理论，叫目标的概念。最常见的相关解释是：

S - specific（具体）

“具体”，这一标准强调需要具体而不是模糊的目标。具体的目标所追求的是改变行为而不是观点。像“提高认识”“推动改革”等都是不具体的目标。

M - measurable（可测量）

这个标准指能够在活动过程中（若可行的话）和活动结束后，对是否达成目标进行明确的测定。

A - achievable（可实现）

36 参考维基百科同名词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SMART原则>

目标也是需要是可以实现的，而不能是不切实际的。

R - relevant（有意义）

这是指目标对战略计划所制定的长期目标的实现是有意义的，应当可以看到运潮目标如何可以为长期战略目标服务。此标准可使所有的运潮都保持在战略框架内，这样就能够了解为什么要实施某个特定的运潮。

T - time-bound（有时间限制）

有时限的目标指的是该目标将明确指出运潮的结束方式和时间。运潮不应是开放式的；它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框架，运潮的开始和结束必须在这个框架内，哪怕目标没有实现或者运潮没有产生你希望的结果。

就 NEM 来举例说明，NEM 先后有三个计划的运潮，我们拿第一阶段的运潮来做一个目标分析：

例如NEM的第一阶段的运潮希望团队能够建立一个教育项目计划，并确定教育模式、教育科目及其课程大纲和教育计划（S）；运潮是否达成目标就以这些计划中的内容是否在确定的时间内达到为准（M）；团队将评估该目标是否可以实现，例如，在确定的时间段内是否有可能找到合作方，还是第一阶段只能够以找到合作方为唯一目标（A）；团队同时需要评估该目标是否能够服务于长远的目标，如果在这一阶段设计一个向政府教育部门签名请愿的活动，那么，该活动是否能够服务于长远目标？（R）；团队评估和确定该阶段的目标在什么时候启动和什么时候完成。一般来说，运潮的时限在一年左右，因此，若 2024 年启动 NEM，是否一年内完成第一阶段还是更早一些？（T）将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确定下来，这就是用来检验阶段性目标是否实现的 SMART。

3.3 战术的选择

战术在日常沟通上常被叫作“方法”。非暴力运动说到底还是要决定运动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这就是战术的选择。运动的战略设计阶段主要是通过对不同运潮的设计将运动的大目标化解为每个阶段的小目标，按阶段逐步推进，而每个阶段的行动计划，从总体上说，就是运潮实现的关键，因此，战术相当于足球赛中的临门一脚。

非暴力运动的研究者（Beer, 2021）将其所认定为有效的战术列出了 346 种，并做了以下分类：

表一：公民抵抗战术汇总表

抵抗行为	各种目的的战术特征	
	对抗性 (阻吓)	建设性 (说服)
说话 (言语表达的行为) ¹⁷	抗议 为进行批判或阻吓而采用的沟通行为 (如：游行)	呼吁 为回怼或说服而进行的沟通行为 (如：培训会)
拒绝照做 (省略不做的行为) ¹⁸	拒绝配合 拒绝从事被指令要求的行为 (如：罢工和抵制)	克制 停止或取消原计划或正在进行的行动，以作为回怼或说服 (如：暂停罢工)
行动或创造 (主动从事的行为) ¹⁹	阻断性干预 为阻止、打断、或改变另一方的行为而进行的对抗性直接行动 (如：设置路障)	创造性干预 直接的、旨在重塑或建设一种替代性的行为、机构或取代现体制的行动 (如：一个平行的政府或公开的模拟表演)

根据以上的分类表，NEM 的运动团队会怎样对战略的第一阶段进行战术的选择呢？

NEM 首先在上图中的对抗性和建设性这两大类抵抗方式之间进行挑选，由于对抗性的方式都是公开的，这样容易造成参与者的被捕和刑罚，因此，团队倾向于选择建设性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通过特定方式不向社会公开参与者信息，但同时可以公开行动，以便更多人知道，并决定是否加入。³⁷

37 任何时候，如果将信息向社会公开，即等于是向暴政政权公开。

在这一选择完成之后，团队将在表中的左栏的三大类的抵抗行为中进行选择。这其中，言语表达类的行为如公开的沟通，这种方式对于身处国内的人仍然存在着被打压的风险，因此，如果是团队中在国外的成员，则可以出面组织；第二类指不去做某种行动，而这一类行动可以很广泛，例如，中国的各种躺平策略，再如，教育界精英退出或懈怠政府垄断的教育系统，转而加入到 NEM 运动中来，他们可以带来众多的学生生源。

对于主动从事的行为，这是 NEM 的重点战术，即建立平行的教育系统，来对抗政权控制的教育系统，这就是表中所说的建设替代性的机构或取代现体制的行动。这样作出战略选择之后，NEM 就可以着手从这两大类的行动中选出对运动合适的具体战术展开第一阶段的运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些行为或许被很多人认为非常勇敢，但这些行为并不被认为是非暴力抵抗的战术。下面摘录不属于非暴力抵抗战术的行动如下（ICNC，2022，5.4.2）：

- 1) 行动结果是通过遵循常规的或体制内符合法律规范的程序产生的，如立法、诉讼、选举、游说和商业行为等而产生的；
- 2) 在各种冲突或情形中不具有合理的可复制性；
- 3) 行动是由非党派的第三方（组织外部的中立方）行为人所实施的，如由第三方组织的非暴力平民保护活动；
- 4) 该行动是在敌对方的某种配合下产生的行动，例如，获得政府允许或默许的游行；
- 5) 以物资供给为主要目的的活动，例如培训和筹款活动。

第四章 结语

通过 NEM 的非暴力运动战略方案，读者可以大体了解到一场旨在重塑社会制度的变革运动需要众多的运动组织，以其活动家特有

的视角为自己计划的运动进行全面和仔细的研究，单凭一个组织是肯定不够的。

然后在分析与研讨的基础上，运动团队确立长期的计划，即制定战略，确立该计划得以实现的各阶段的运潮，最后再从已知的战术中或参考已有的战术基础上，选择或开发自己的运潮执行方案。

最后，各组织成功走向运动最高潮的时候，应当进行全面的联合，这才是全体人民作为抗议者以集中方式展现全体运动组织的共同力量的时刻。运动就像一场大选，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才能赢。因此，运动方不能区分参与者的身份、地区、民族、种族、信仰、价值取向、性取向等，这些区别对待最终可能导致运动组织之间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分裂，最终是运动的失败。

同时，运动组织不应该担心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因为世界各地的所有非暴力反对运动都是违法的，前文所述的非暴力运动的战术研究者 Beer 在书中说，得到法律规范许可的活动都不属于非暴力运动的战术（ICNC，2022，5.4.2）。在中国，这些行动可能包括上访、请愿、与政府对话等（虽然政府可以随意在任何行为前面加上“非法”的标签）。相同的例子也可能包括在西方国家组织的游行、抗议、示威等活动。因此，如果将这些活动用违法或合法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大家即可自行判断是否真地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了。

笔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许多的运动组织开始他们的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一定会公开所有信息，但是，任何形式的运动都是令人鼓舞的。笔者期待最终各运动应当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联合，以组建平行的议会来领导全体人民，将运动推向高潮，以迎来历史性的政治自由。

参考文献：

- Beer, Michael A. (2021): Civil Resistance Tac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21世纪公民抵抗的战术》), <https://www.nonviolent-conflict.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Civil-Resistance-Tactics-in-the-21st-Century-Monograph.pdf>, 2021
- Bloch, Nadine (n.d.), Spectrum of Allies, <https://commonslibrary.org/spectrum-of-allies/>, accessed on Oct. 22, 2023
- CCEIA (2020), Protests in Perspective: Civil Disobedience & Activism Today, with Erica Chenoweth & Deva Woodly, Protests in Perspective, <https://www.carnegiecouncil.org/media/podcast/20201116-protests-perspective-civil-disobedience-activism-erica-chenoweth-deva-woodly>, Nov. 16, 2020
- ICNC (2017), 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 , <https://www.nonviolent-conflict.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Why-Civil-Resistance-Works-Chinese.pdf> 2017
- ICNC (2022), 《公共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第二期》, https://courses.nonviolent-conflict.org/courses/course-v1:ICNC+ICNCfellow9_2022+2023_T1/about, 2022
- LiuSi (2017), No Liberalism in China? ISBN: 978-1545454473 ISBN-10: 1545454477
- Marovic, Ivan (2021) The Path of Most Resistance: A Step-by-Step Guide to Planning Nonviolent Campaigns, <https://www.nonviolent-conflict.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The-Path-of-Most-Resistance-Second-Edition.pdf>
- Sharp, Gene and Safieh, Afif (1987): Nonviolent Struggl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17, No. 1 (Autumn, 1987), pp. 37-55 (19 pages), Published By: Taylor & Francis, Ltd
- 夏普, 吉恩(2003), 《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直言译), https://ia902705.us.archive.org/18/items/2.7z_20230715/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20%28吉恩夏普%29%20%28Z-Library%29.pdf

二等奖

点火计划纲要

作者：楚三户

目录

第一章 形势与目标

第二章 战略简述

第三章 点火平台

第四章 点火方案的内容与形成程序

第五章 通讯安全与联络方法

第六章 款项筹集与分发

第七章 现有点火方案

1号点火方案：【空飘标语方案】

2号点火方案：【天降传单方案】

3号点火方案：【涂鸦倒习方案】

4号点火方案：【百万骇客方案】

5号点火方案：【打狗弱主方案】

6号点火方案：【满城锅声方案】

附录：【点火计划问答】

第一章 形势与目标

习近平当局极权有术，治国无能，导致经济崩盘，民生困苦，同时对民众肆意压榨、反复愚弄、全面监控、残酷迫害，导致全国各地怨声载道，体制内外人心思变！民怨如遍地干柴，只要有志之士不断煽风点火，必将燃起颜色革命的熊熊烈焰，烧毁习家王朝，终结专制暴政！

《点火计划》简明扼要阐述当前形势下把中国强大民怨转变为颜色革命的战略原理和战术手册。

第二章 战略原理

一，怎样突破中共信息封锁？用轰动性事件传播动员信息。民众的不满情绪已经非常强烈，只要进行有效的动员就能启动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由于中共严密的言论审查网路封锁，单纯的动员文宣无法广泛传播。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大众参与的特质，中共无法阻止广大民众对一些轰动性事件的关注、讨论和转发。所以，通过制造轰动性事件，把文宣嵌入事件之中，就可以实现大规模社会动员，引爆积蓄已久的民怨。

二，众多国内志士愿意点火。当前中国境内已有众多民主志士，也有不少志士已经形成小型团队，他们都有引爆民怨的意愿和勇气。但是他们因受到政权的打压封锁，其中多数人缺乏经济资源和社会支持，无法承担行动可能对本人及其家庭所造成的损害，尤其担心自己被捕或者逃亡后，家人无法维持生计。后顾之忧使大部分志士不能毅然前行。纵然有少数志士克服困难而发起行动，如2022年10月彭立发所实施的四通桥行动，也因势单力孤、方案不够完美而未能达到最佳效果。

三，海外有庞大的反共资源。海外有数千万华人，推测其中半数对习近平政权持负面看法，至少数百万人有明确反共民主观念，

他们愿意为中国反共民主行动提供资（援）助。尤其是那些具有明确效果、展示英雄气概的行动，更能让海外华人鼎力相助。而这些华人中绝大多数都属中产或以上阶层，因此具有巨大的提供经济援助、舆论支持的能力。即使这数百万人每人每月只拿出几美元，每年用于反共的资源总量就会达到数亿美元之多。单凭这一种资源，就足以成千上万次行动提供援助。此外，海外还有其他多种资源可以开发利用（在此不详细列举）。很可惜这些强大的资源潜力，过去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运用。

四，对接行动和资源，制造轰动性事件。反共民主派的当务之急，就是推动国内志士的行动能力和海外华人的资源能力的对接。现在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已经非常强烈，民怨就如一堆堆干透的木柴，动员抗议就如向干柴上点火。只要得到海外资源的助力，国内志士就会发起一波接一波的点火行动，也就是不断制造轰动性事件，把动员抗议的信息夹带在轰动性事件当中（具体办法在第七章叙述）。习近平政权的灭火能力（维稳能力）再强也会疲于应付。只要一次灭火失败，强烈民怨就会迅速蔓延成为全国规模的抗议运动。

五，用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建立对接平台。绝大部分海外华人和国内志士都使用油管、推特、脸书、WhatsApp等，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一方面公开讨论，形成和传播有效的多种行动方案，动员国内行动者自行选择合适的方案展开行动；另一方面用国内勇敢行动来激励海外华人提供更多支持，更多支持又会鼓励更多的点火行动，直至民众抗议遍地烽火。

六，颜色革命道路。全国抗议运动将演变为颜色革命。颜色革命就是用相对和平的民众抗议方式达到推翻政权和改变制度的目的。颜色革命的原理如下：先以全国性大规模民众抗议瘫痪常规暴力机构，即警察、法庭和监狱。当参与抗议民众达到某个阈值的时候，比如说5000万的时候，警察就抓不完、法庭就审不了、监狱也

关不下。这些机构就无法发挥镇压功效，就会进入瘫痪状态。当常规暴力机构瘫痪之后，反对派就有机会在抗议运动中迅速集结形成新政治组织体系，就有能力动员更加强大的民意表达。当常规暴力机构瘫痪之后，专制政权必然会努力启动其终极暴力机构，即军队来对抗议民众进行全面镇压。但是军队是由人组成的，而人的决策是受利益、情感影响的。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专制国家，普通官兵大多来自社会中下阶层民众，其利益和情感与参与抗议的民众是一致的，即使曾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洗脑，但是在强大民意感召之下，也有极大可能拒绝镇压民众的命令，甚至公开倒戈反对政权。而且统治集团上层，包括军队高层也绝非铁板一块，只要国内反对派和国际民主阵营积极运作，是有机会策反其中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只要统治集团高层尤其是军队高层意志不能统一，他们就会公开分裂、互相牵制，因而没有能力进行全国规模的大镇压。最后，专制政权面临两种结局：第一，政权彻底瓦解，如 2010-11 年突尼斯和埃及的茉莉花革命；第二，统治集团被迫接受民主制度，如 1889-91 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民主转型。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颜色革命让世界多个国家推翻了专制政权，它是代价最小的革命战略；在当前形势下，它也是中国唯一可行的民主转型道路。

第三章 操作平台

实施点火计划，需要在海外建立操作平台，可以称之为点火平台。平台由具有反共民主理念的海外人士组建，包括社会活动家、自媒体从业者、社交媒体活跃用户、律师、会计等专业人士。点火平台不必是正式社团，而是一群具有共同目标、选择相同策略的民主同道的分工协作机制。

点火平台发挥五个功能，来推动持续不断的点火行动。

- 1, 资讯中心。在海外创建点火计划网站，或者脸书专页、推

特账号，收录所有与点火计划相关资讯，包括多种详细点火行动方案、援助程序和管道、颜色革命的原理和方法等等，便于大众传播和查阅。

2，策划中心。通过策划形成多种国内行动的详细方案。点火平台组建者通过社交媒体和自媒体集结众多网友，共同策划、讨论和修订多种行动方案，即点火方案。海外人士可以公开身份，尤其是知名人士应该公开身份，这样就可以增加公信力，也可以吸引更多人参与讨论，汇集更多更好的思路。国内人士应该最大限度隐藏身份，这样可以减少被当局发现和迫害的风险。点火方案多多益善，力求制定出适合各种地点场合、适合各种人士和团队、能够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行动方案。点火方案应该以鼓动民众聚集抗议为主要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体制内各级官员中都有一些人或因利益冲突或因权力斗争都已经与习近平当局形成了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所以也有推翻习近平政权的意愿。但是他们可能习惯于从体制内斗争的角度来设计反习方案，而对颜色革命战略和动员民众的战术不见得在行。所以点火平台也可以提出一些方案供他们参考。一旦他们接受和实行方案，点火行动将会事半功倍。

3，传播中心。通过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传播推广点火方案。几乎所有国内民主派有志之士都使用海外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使用最多的是油管、推特、脸书、WhatsApp、Telegram。所以一旦讨论方案形成之后，就可动员众多大 V 和网友，共同推广方案，这样方案内容就会被绝大部分国内志士关注和了解。

4，联络中心。联络行动者，观测行动效果。国内行动者个人或团队选择适合自己条件的点火方案，或者单独行动，或者集体协作，把方案实施出来。点火平台设立享有最高安全程度的联络管道。行动者在实施前，可以以匿名方式与点火平台取得联系，同时安排值得信赖的同道或亲友作为后备联络者；在实施后，行动者或

其亲友可以向点火平台提供行动完成的资讯。多数情况下，成功的行动也会产生可以观测的社会反响，可以与行动者或其亲友提供的资讯互相印证。

5，后援中心。当国内行动完成后，点火平台通过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传扬行动者英雄事迹，扩大社会关注，以此感动海外华人捐助资金，为行动者提供奖励或者帮助逃亡者获得庇护，或者救助被捕者家属。具体办法在【第六章援助资金的筹集和送达办法】中有详细介绍。

第四章 行动方案标准、内容及形成程序

一，方案标准

1，实施方案难度低，实施前所需资源少，能由国内人士单独实施，或者能由小型团队实施。

2，方案内容完全公开后，习当局不仅无法事先阻止，也难以事后镇压。

3，方案成功实施后可引起社会轰动，加剧不满情绪，促发大规模群体抗议。

二，方案内容

- 1，实施该方案的环境或场合；
- 2，所需人员；
- 3，工具、物资、信息的准备；
- 4，现场操作步骤；
- 5，整体效果预测；
- 6，安全守则及风险评估；
- 7，成功后的跟进策略；
- 8，失利后的撤离路径；

9, 海外援助的方式、种类和数量。

三, 方案形成步骤

1, 统筹平台公开征集方案草案。在条件许可情况下开展有奖征集活动。

2, 线上公布草案, 并组织公开讨论、集思广益改进方案。

3, 并公布改进后的方案内容。并注明: 方案的某些部分可以由行动者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删减或补充; 涉及到行动者安全的部分不得修改、删减, 只能补充、增加, 否则不属于点火行动方案。

4, 不断改进, 并公布最新改进方案。

第五章 通讯安全与联络方式

一, 海外联络人通讯安全守则

1, 点火平台陆续安排 2-10 名知名海外反共人士作为联络人, 公布各自的 Gmail 和 WhatsApp 账号, 每种通讯软件都要设定最高安全级别, 专门用于与国内人士联络。

2, 每个联络人不得与其他人分享任何与国内行动者的信息。只有国内行动者已经暴露、被捕、逃亡或者藏匿的情况下, 才能把国内行动者的身份信息向平台其他成员公开。

3, 在与国内行动者通话视讯过程中, 必须远离任何安装了中国软件的电子设备。

4, 每周更新 Gmail 和 WhatsApp 的密码。

二, 国内行动者通讯安全守则

甲、国内人士选用一个手机专门用于联络国内外同道。该手机不要安装任何国内 APP 且为非国产手机, 并还原出厂设置(清除所有非原厂软件), 关闭定位功能。

乙、只用 Gmail、WhatsApp 与同道联系, 经常更新密码。

5, 与同道联络时, 尽量不要使用文字, 而是使用语音和视频通话以减少被当局拦截信息的机会。视频通话时必须完全遮住镜头, 使之不能显示本人面貌或周遭环境。

6, 每次联络之后清除所有通讯记录。

7, 不要把同道纳入任何手机的通讯录或联络人名单。

8, 不要向海外人士通报自己的任何身份信息, 用假名进行联络, 并约定联络暗号。每次通话之前都要对暗号。

9, 进行机密通讯之前, 要把其他手机关机, 并放置在远离通话地点的地方, 最好用锡箔纸包裹, 使其不能向基地台接收或发出信号。

10, 已经被当局监控的人士, 避免在自己的房屋内进行机密通讯。

三, 联络方法步骤

甲、国内行动者用 Gmail 邮箱向一位海外联络人发送邮件, 双方通过 Gmail 约定时间同时上线。

乙、同时上线时国内人士下载 WhatsApp, 在安装、注册时输入海外联络人电话号码; WhatsApp 会向海外联络人电话发出安装所需密码 (code), 海外联络人立刻用 Gmail 把密码告知国内行动者。国内行动者设定 WhatsApp, 使其不需每次使用时都输入密码。

这样就可以随时与海外联络人语音和视讯联络。

丙、双方约定联络暗号。每次语音或视讯联络时都先对暗号, 确任对方身份。

丁、国内人士在展开行动前, 把假名、联络方法和联络暗号告诉自己信任的亲友。如果不幸被捕或需要逃亡、藏匿, 就由这位亲友代替他联络。

第六章 援助资金的筹集与送达办法

一、国内行动者获得捐款的条件

1，必须完成点火计划中所列举的一项或多项点火行动。行动完成之前就被终止，无论出于任何原因，都不具备获得捐款的资格。例如，行动者实施【1号点火方案】时，只是印好了传单，但是没有散发出去，就不能获得捐助。

2，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反响。如果行动者选择错误地点、错误时间或用错误的方法，虽然也实施了行动，但是没有引起可观测的社会反响，无论是因为失误还是出于故意，都不具备获得捐款的资格。例如，行动者实施【6号点火方案】时，用气球空飘横幅，但是没有飘到市区，而是飘到了无人烟的地区，就不能获得捐助。

点火行动所引发的社会反响强度，也会直接影响到行动者所得到的捐款的多少。点燃的火越大，得到的捐助就越多。例如，行动者实施【6号行动方案】时，如果只是引发了小区居民敲锅抗议，得到的捐款会较少。如果带领居民到街上游行示威，得到的捐款就会较多。若最后发展为跨地区的抗议运动，那就会得到更多的捐款。

设定上述两个条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杜绝习当局的特务假扮行动者，谎称实施了行动而要求得到捐款，以此消耗海外反习反共人士的资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鼓励真正的反习反共人士在行动时，需要计划周密，力求达到最大社会效应。

二、行动者获得捐款的步骤办法

1，行动者在行动之前，以最值得信赖的亲友之名设立 PayPal 账户，或者比特币账户，并指定一名最信任的亲属掌握账户信息。

2，行动者在行动之前，按照【第五章通讯安全与联络方式】中所述方法与点火平台取得联系，双方设定联络暗号。

3, 在完成点火行动并引发社会反响之后, 行动者向点火平台的联络人提供完成行动的资料。

4, 点火平台联络人向筹款机构的成员汇报资料, 得到有两人以上确认行动者有资格得到捐款, 就公开事先设立的接收捐款账户, 公开动员海外华人捐款。

5, 如果完成行动并引发社会反响后, 行动者被捕或者必须逃亡、藏匿, 其亲友也可以根据事先得到的联络方式、联络暗号与点火平台联系, 代替行动者领取捐款。

6, 行动所引起的社会反响越大, 得到的捐助自然就会越多。款项由捐助者直接汇寄到行动者账户, 没有任何中间环节, 消除了款项被贪污、挪用或浪费的可能性。

第七章 现有行动方案

所有方案都是提供给国内志士的参考文本, 行动方案的最终定稿权属于行动实施者。

点火平台公开向所有反习反共人士征集更多更好的行动方案, 恳请大家踊跃投稿。信箱: dianhuofangan@gmail.com

1 号点火方案 (草案): 【空飘标语方案】

用气球在城市上空展现巨幅标语, 形成舆论轰动, 利用事件本身的传播力, 让动员抗议的信息广为人知。

一, 行动地点和人数

一线大城市或其他省会城市。

需要 2-3 人合作才能进行。

行动步骤:

1, 提前从多个地方购买 10-20 个直径 50-100cm 的气球, 或者

大幅双层农用薄膜，两头扎紧充当气球，或者塑料垃圾袋。预算 50-100 元人民币。

2，提前从外地购买足以充满 2-5 立方米气球用的罐装氦气。1000-2000 人民币。每立方米氦气球可托起约 2 公斤重物升空。罐装氢气也可以，但是氢气易燃易爆，使用时必须远离明火和静电引起的火花。

3，提前购买质地轻薄的红色、黄色或白色布料，制成 10-20 米长，0.5 米宽的条幅数个。

4，实验取得数据。在附近人烟稀少的乡村找一处可以不被监控的地点做实验。携带气球、氦气罐、空白条幅、细绳、蚊香。把多个气球灌满氦气或氢气；然后把条幅绑在气球下面；然后用细绳把气球拴住使其不能立即起飞；然后把点燃的老式蚊香绑在细绳上作为延时装置。经过数次实验，测出在时当地气候条件下，蚊香需要多长时间把细绳烧断，以及多少个气球刚好能把空白条幅升空并停留在 50-150 米的高空。记录所有数据。

5，选择晴朗有风的日子作为行动日。行动前一天，在条幅上书写动员民众聚集抗议的简短标语。标语上必须包含“除习”或“倒习”“聚集”“地点”“时间”等内容。否则就不能得到点火平台的资助。例如，广州的条幅可以这样写：**【元旦相聚海珠广场全民除习！】**

6，行动地点必须在一线城市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首府的市区，否则不具备获得点火平台资助的资格。气球升空的起点最好在城市内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地方，如烂尾楼、废弃商场或工厂等，飞向人口稠密的街区。

7，在行动日把所有材料拉到行动地点。给气球灌气，系上条幅，用细绳把气球拴住，使它不能立即飞起；点燃老式蚊香，把它绑在细绳上，使它在行动者离开一段时间之后才烧断细绳，让气球带着条幅飞起。尽可能每次放飞多个气球和条幅。

8, 迅速撤离行动地点。

9, 影像记录放飞气球标语过程。将来提交给点火平台作为实施行动的证明。注意：录影中不要展示任何可能泄露身份信息的画面。

10, 从远处录影气球和条幅的景象，提交给点火平台，由点火平台发布。

二, 安全措施

1, 提前用现金购买工具材料，避免被追踪。

2, 选择没有监控摄像头、而且不会被其他目击的实验地点和行动地点。

3, 实施行动时，车辆来回不要走相同路线。

4, 尽可能使用氦气不用氢气。氢气球容易被静电或火花点燃，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如果必须使用氢气，必须让气球远离明火或可能产生静电火花的物品。

三, 避险安排

行动者应做好下列避险措施之一：

1, 在行动前办好出国所需证件手续，完成行动后立即出国，最好去西方民主国家。

2, 无法出国者事先到偏僻山区的无人村落考察，选定藏身之地，并准备必要的生存物资。完成行动后立即奔赴藏身处，暂时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只有最信任的团队成员或亲友知道。在确定没有被侦破时才回到原来居所。如果已被侦破，则潜伏一段时间后想办法越境。

四, 点火平台的支援

行动者委托其他团队成员或亲友与平台联络，向平台提供参与

行动的证据，包括行动现场照片、录像等资料。以此得到平台的援助。

1，在核实行动者的身份及行动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力之后，点火平台持续传播其英勇事迹，公布其账户，动员海外反共华人向账户捐款。

2，协助出国的行动者及其家人寻求民主国家的政治庇护。包括出具证明信、聘请律师、出庭作证等。

3，为隐藏在国内或者已经被捕的行动者及其家人筹集生活资助。如其家人能够出国，点火平台也应当协助其家人寻求民主国家的庇护。

2 号点火方案（草案）：【天降传单方案】

由 2-3 人以上小团队实施。

在人员密集的街区和时段，借助风力从楼上向街道散发传单，通过互联网传播成为轰动性事件，以达到扩散传单内容的目的。

一，制作传单

1，提前准备打印油墨和纸张。尽量用现金分期、分批从多个地点购买打印所需油墨和纸张，每次间隔时间越长越好，地点相隔越远越好。这样可以避免被追踪。

2，用没有连接互联网的电脑和打印机设计和打印传单。完成打印后消除所有文件和记录。

3，传单尺寸：一张 A4 纸打印 4—8 份传单，然后裁剪。传单越小，能够携带的越多。

4，制作传单时必须戴手套，确保传单上不会留下指纹。

二，传单内容

当局不怕谴责批判，最怕聚众表达民意，所以传单必须直接号召聚众行动。标明行动的时间、地点、方式、诉求，再加上简练鼓动性文字表明诉求。范本：广州传单

【除夕国歌大合唱】

时间：2024年2月9日（此后是当年的春节前一天）晚7点

地点：海珠广场

欢迎参与：除夕不能回家，一起唱歌、敲锅、按喇叭！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国务院文件规定，2024年及之后农历除夕不放假。此举必然引起更多民众的不满。再加上除夕与除习谐音，因此是一个很好的动员行动的日期。如果除夕未能成功聚集，则改变日期至正月十五、两会召开日、五一劳动节等。

三，实验和选择时间

根据天气预报，选择有风的日子，到一个无人看见的户外地点做实验。把小传单层层码好，用水浇湿最上层20张传单，放置在高于地面的平面上。记录在某个温度和风速条件下，顶层湿传单被吹干所需大概时间，以及所有传单被吹落地面所需要的风速。根据这些数据，再查看天气预报，选择楼顶散发传单的日期和时间。

四，选择地点

散发传单的地点必须在直辖市、各省首府或深圳市区之内，否则不能得到点火平台支援。

为了增加安全性和达到更大社会影响力，建议选择：

1，行人较多的街道。街上行人越多，看见和录影的人越多，就越容易被上传到网上引发轰动。

2，行动者必须能够达到街边的楼顶。

3, 行动者不被其他人发现, 事后也能迅速撤离, 并且难以被追踪确认身份。

五, 现场作业

1. 在选定的时间, 携带传单和必须的工具, 从没有监控摄像头的郊外, 或乘坐公共交通, 或隐藏车辆信息的私家车辆, 到达行动地点。

2. 到达楼顶天台之后, 把传单一叠叠码在临街一面的楼顶护栏边缘, 把最上层 20 张传单用水浇湿, 用湿传单压住其他传单。然后迅速撤离。录影天台放置传单的过程, 但不要在录影中展示任何可能泄露身份信息的画面, 发送给点火平台, 作为实施行动的证明。

3. 离开行动现场之后必须撤离到没有监控摄像头的郊外, 更换服装后再进城, 或者去往外地。

4. 安排一人录影传单散落的场面。不要率先在线上公布, 除非确定不会被锁定身份。

5. 在确保通讯安全的情况下联络点火平台, 传送相关资料并得到援助。

六, 安全守则

1, 必须事先确定, 警方不能根据行动中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来锁定行动者身份, 包括纸张、油墨、通往楼顶或房间的钥匙、使用的车辆等。

2, 印制传单时必须戴手套, 不可在传单上留下指纹。

3, 行动中所有人必须全程戴口罩和帽子遮盖大部分脸部, 在现场和附近地点必须戴手套。

4, 行动所用的衣物手套口罩鞋子事后应尽快销毁。

5, 团队成员不通过任何电子设备讨论行动。

6, 不能告诉团队成员以外任何人。

七，避险安排

行动者应做好下列避险措施之一：

1，在行动前办好出国所需证件手续，完成行动后立即出国，最好去西方民主国家。

2，无法出国者事先到偏僻山区的无人村落考察，选定藏身之地，并准备必要的生存物资。完成行动后立即奔赴藏身处，暂时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只有最信任的团队成员或亲友知道。在确定没有被侦破时才回到原来居所。如果已被侦破，则潜伏一段时间后想办法越境。

八，点火平台的支援

行动者委托其他团队成员或亲友与平台联络，向平台提供参与行动的证据，包括行动现场照片、录像等资料。以此得到平台的援助。

1，在核实行动者的身份及行动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力之后，点火平台持续传播其英勇事迹，公布其账户，动员海外反共华人向账户捐款。

2，协助出国的行动者及其家人寻求民主国家的政治庇护。包括出具证明信、聘请律师、出庭作证等。

3，为隐藏在国内或者已经被捕的行动者及其家人筹集生活资助。如其家人能够出国，点火平台也应当协助其家人寻求民主国家的庇护。

3号点火方案（草案）：【涂鸦倒习方案】

习集大权于一身成为独裁终身，反习就是反专制，倒习就能颠覆专制。

倒习是一件大事，但是门槛很低。有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做，全民都应该做，就是在建筑墙体、电线杆、公厕内部、街道及公路两旁显眼处，涂写倒过来的“习”字。用这个行动，可以扩散反习情绪，营造反习氛围，鼓动反习行动。

一，人员、工具、地点

单人就可实施行动。

地点：城外公路两旁的电线杆或建筑，或城内监控摄像头盲点，如公厕，巷道等。

工具物资：油漆、刷子、油漆喷罐，或马克笔。

二，步骤

1，选定地点和工具。

涂写地点必须是监控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最佳地点是城郊区流量大的公路两旁的电线杆、广告牌或建筑墙体，其次是城内建筑墙面。选择这样的地点就要准备好油漆和刷子。

公厕不是理想地点，但是在那里行动即安全又方便，只需要马克笔。

2，如果选定地点在城郊公路旁，或城内建筑外墙，必须在深夜 2-3 点人最少的时候。同时也要带上口罩、帽子和手套隐藏身份。从小路到达行动地点，不要从原路返回，尽量不要开车，避免车辆在路上被监控摄像头记录。

如果选定公厕涂写，选择里面没人的时候就行。

3，到达地点后迅速倒写“习”字。如果是在临近 1 月 1 日之前，就在倒写的习字前加上“元旦”两字。

字体越大越醒目，涂写地点越多越有气氛。

4，在一处涂写完后迅速撤离，或到其他地方继续涂写，一次可涂写数十处。

5, 过一段时间, 在安全前提下, 扮作不知情的路过者去拍照, 然后在网上传播。

三, 安全措施

- 1, 戴口罩、帽子和手套。
- 2, 使用不易被监控摄像头录像和追踪的交通工具。
- 3, 去行动地点的路径和撤离路径不同。
- 4, 工具要提前多日买好, 或者使用旧的工具。
- 5, 行动时手机要关机, 当时不要拍照, 过一段时间再扮作不知情者去拍照。

四, 避险安排

中国国内的行动者应做好下列避险措施:

- 1, 事先办好出国所需护照签证; 有暴露身份的危险时立即出国。
- 2, 无法出国者事先到偏僻山区的无人村落考察, 选定藏身之地, 并储备必要的生存物资。察觉到危险立即奔赴藏身处, 暂时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只让最信任的团队成员或亲友知道藏身地。

五, 点火平台的援助

行动者委托其他团队成员或亲友与平台联络, 向平台提供参与行动的证据, 包括行动现场照片、录像等资料。以此得到平台的援助。

- 1, 在核实行动者的作为之后, 为行动者筹集奖金。行动所引起的社会反响越大, 能够筹集到的奖金越多。
- 2, 协助能够出国的行动者及其家属寻求民主国家的政治庇护。包括出具证明信、聘请律师、出庭作证等。
- 3, 为隐藏在国内或者已经被捕的行动者及其家人筹集资助。

如其家人能够出国，平台也应当协助其家人寻求民主国家的庇护。

4 号点火方案（草案）：【百万骇客方案】

重奖邀约全球骇客和其他各界人士对习近平当局发动资讯战攻势，重赏之下，必有高手。当点火平台有能力筹集大量资金的时候，可以实施这个方案。

一，全球邀约

1，全球邀约。点火平台以公开悬赏的方式邀约全球网络安全高手及其他各界人士参与围攻习近平当局喉舌媒体。同时为成功达成目标的行动者筹集高额奖金。

2，围攻目标。中国中央电视台、各省级电视台的任何频道、人民网、环球网、各省级党报网站。

3，围攻方式。在频道中完整插播点火平台提供的动员民众抗议内容。点火平台需要设计一系列文宣稿件作为插播内容，例如：

【重要通知，请全国各地广大群众和干部在除夕晚 7 点整，到各省市县政府大楼前集合，一起高唱国际歌和国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下架猪头！迎接新年！】

文宣稿件中的时间也可以是元旦、两会开会日、五一或其他时间。

插播视频和图片到点火平台网站上下载。

二，奖励标准

在下列频道和网站完成插播并持续播放三十秒以上，点火平台将为之筹集奖金。

1，在央视频道完成插播者，为之筹集奖金的目标为 100 万美元。

2, 在省级电视台频道完成插播者, 为之筹集奖金的目标为 10 万美元。

3, 在人民网、环球网并完成插播者, 为之筹集奖金的目标为 10 万美元。

4, 在各省党报网站并完成插播者, 为之筹集奖金的目标为 1 万美元。

行动者事前通知点火平台插播的对象媒体和插播时间, 以此作为实施行动的证据。

三, 避险安排

中国国内的行动者应做好下列避险措施。

1, 事先办好出国所需护照和签证; 有暴露身份的危险时立即出国。

2, 无法出国者事先到偏僻山区的无人村落考察, 选定藏身之地, 并储备必要的生存物资。察觉到危险立即奔赴藏身处, 暂时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只让最信任的团队成员或亲友知道藏身地。

四, 点火平台的支援

中国境内人士完成上述任务, 除了得到奖金之外, 行动者本人及其家属可以得到点火平台的援助。

已经出国的行动者亲自与平台联络, 不能出国的行动者委托其他团队成员或亲友与平台联络, 向平台提供参与行动的证据, 包括行动现场照片、录像等资料, 以此得到平台的援助。

1, 协助出国的行动者及其家属寻求民主国家的政治庇护。包括出具证明信、聘请律师、出庭作证等。

2, 为隐藏在国内或者已经被捕的行动者及其家属筹集捐款。如其家人能够出国, 平台也应当协助其家人寻求民主国家的庇护。

3, 在不危及行动者及其家人安全的前提下, 持续传播行动者

事迹，使其得到更多社会关注及经济援助。

5号点火方案（草案）：【打狗弱主方案】

征集和曝光习近平当局高阶官员的违法犯罪及不道德行为，使他们身败名裂，以此引发政坛不稳，削弱习近平的统治能力。点火平台在具备强大的筹款能力之后，可以实施这个方案。

一，打击对象

习家军重要人物，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人物：

1，十大恶人：一号蔡奇，二号张又侠，三号王沪宁，四号陈文清，五号王小洪，六号李书磊，七号李鸿忠，八号夏宝龙，九号陈一新，十号郑雁雄。（此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新前十名首恶名单）

2，重要官员：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现任书记。

二，征集资料范围

收集和发布习近平帮凶的违法犯罪和不道德行为铁证，如通信记录、录音、录像等，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

1，有关恶奴贪污受贿和滥权的证据，如账户、房产、奢侈品及相关证明文件等。

2，有关恶奴淫乱和性犯罪证据，包括录音、录像、通讯记录等。

3，有关恶奴迫害他人的证据，包括陷害政治对手、酷刑虐待、反人类罪等资料。

三，取得和传输资料方式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 1, 从电脑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中提取。
- 2, 知情者（恶棍们的上级、下级或同事）爆料。
- 3, 受害者自述。
- 4, 爆料者把资讯通过加密邮件发送到点火平台爆料邮箱。

四, 奖励标准

点火平台把所征集的资讯向全网发布, 并对提供资讯者进行奖励和援助。

- 1, 提交十大恶人资讯者, 为之筹集奖金的目标为 1 万-20 万美元。
- 2, 提交二级恶狗资讯者, 为之筹集奖金的目标为 5 千-10 万美元。

五, 避险安排

中国国内的行动者应做好下列避险措施。

- 1, 事先办好出国所需护照、签证; 有暴露身份的危险时立即出国。
- 2, 无法出国者事先到偏僻山区的无人村落考察, 选定藏身之地, 并储备必要的生存物资。察觉到危险立即奔赴藏身处, 暂时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只让最信任的团队或亲友知道藏身地。

六, 点火平台的援助

已经出国的行动者亲自与星火行动平台联络, 不能出国的行动者委托其他团队成员或亲友与平台联络, 向平台提供参与行动的证据, 包括行动现场照片、录像等资料。以此得到平台的援助。

- 1, 协助出国的行动者及其家人寻求民主国家的政治庇护。包括出具证明信、聘请律师、出庭作证等。
- 2, 向隐藏在国内或者已经被捕的行动者及其家人筹集捐款。

如其家人能够出国，平台也应当协助其家人寻求民主国家的庇护。

3，在不危及行动者及其家人安全的前提下，持续传播行动者事迹，使其得到更多社会关注及经济援助。

6 号点火方案（草案）：【满城敲锅方案】

楼上敲锅、楼下聚集、全区游走、上街抗议。

一，行动时间、地点和发起人数

当一个小区、工厂宿舍区或者整个地区的居民普遍因同一个原因而引起强烈不满情绪的时候，行动者就可以在该地区实施敲锅行动方案。

启动这个方案需要小型发起人团队，最少三人，不要超过十人。

二，行动步骤

1，在约定敲锅的几个小时（最多一天）之前，在小区或宿舍楼道中散发、张贴集体敲锅的通知。通知上包括诉求、敲锅时间。

范例：工厂宿舍区敲锅通知

【资方克扣工资，工人没有活路。某月某日晚 7 点，全体工友拿起锅碗瓢盆，在窗边大力敲响。我们要工资，我们要生存！】

2，如果到预约时间后几分钟之内，敲锅声音不大，说明响应者不多，继续动员参与，约定下次敲锅时间。

如果敲锅声音很大，说明响应者众多。发起人就到户外空地上敲锅，呼喊其他人一起到户外聚集。

3，聚集到一些人之后，就到整个小区或宿舍区敲锅游行，吸引更多人参与和围观。

4, 当游行队伍达到一定规模, 当地警力难以阻拦的时候, 就离开小区或宿舍走上街道敲锅游行, 向附近的区县市省政府进发。

5, 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参看附录: 点火计划问与答)让抗议规模扩大, 时间延长, 直至扩展到全国各地。

6, 鼓励参与者全程录像, 各自网上传播。

三, 安全措施

1, 开始时不提政治诉求, 只提经济诉求或社会诉求, 使其看似普通维权行动, 以此降低维稳体系的镇压力度。等到抗议已经达到跨地区或跨省规模, 才提出政治诉求。

2, 发起人不要太多, 以免事前泄露消息。

3, 散发张贴动员传单时避开摄像头。

四, 避险安排。

行动者应做好下列避险措施。

1, 事先办好出国所需护照签证; 有暴露身份的危险时立即出国。

2, 无法出国者事先到偏僻山区的无人村落考察, 选定藏身之地, 并储备必要的生存物资。察觉到危险立即奔赴藏身处, 暂时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只让最信任的团队或亲友知道藏身地。

五, 点火平台的支援

行动者委托其他团队成员或亲友与点火平台联络, 向平台提供参与行动的证据, 包括行动现场照片、录像等资料。以此得到平台的援助。

1, 在核实行动者的作为之后, 为行动者筹集奖金。行动引发的社会反响越大, 能够筹集到的奖金越多。

2，协助出国的行动者及其家属寻求民主国家的政治庇护。包括出具证明信、聘请律师、出庭作证等。

3，向隐藏在国内或者已经被捕的行动者及其家人筹集捐款。如其家人能够出国，平台也应当协助其家人寻求民主国家的庇护。

4，在不危及行动者及其家人安全的前提下，持续传播行动者事迹，使其得到更多社会关注及经济援助。

点火平台面向所有反习人士，征集更多更好点火方案！！

附：【点火计划问答】

问题一：习近平政权拥有数百万军警，以和平抗议为主要形式的颜色革命能够颠覆它吗？

答：所有专制王朝的最终依靠是武力，如果没有武力的支持，王朝很快就会灭亡。那么怎样让王朝丧失武力的支持？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民兵消灭官兵，即武装革命。在冷兵器时代，百姓只要组织起来稍加训练，就可以取得与官兵相近的战力，因此古代豪杰多数用这种办法改朝换代。

一种是以民意赢得军心，即是和平革命、街头革命、颜色革命。在当代世界多数国家用这个方法推翻政权改变制度。

当代多数国家军队的训练高度专业化，武器高度科技化。而民间志士无法获得大量良好武器和训练大量战斗人员，在武力对决中民兵很难与正规军队抗衡。尤其是在政权拥有现代化军事力量的大国如中国，以民众为主体的武装革命已经不可能。因此，现在要终结一个王朝就要用以和平抗议为主的颜色革命的战略：以民变促发

兵变，以民意动摇军心，促使军队倒戈或者中立，使王朝丧失武力支持。

颜色革命的基本原理如下：首先，用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来瘫痪王朝统治秩序。只要抗争规模巨大（席卷众多城市），人数众多（抗争人群达到国家总人数的 3-4%），警察就抓不完、法庭就审不了、监狱就关不下，这些“常规暴力机构”无法全面镇压上街民众，统治秩序就陷入瘫痪状态。

此时，统治者必然想要动用“终极暴力机构”军队来恢复统治秩序，也就是运用军队的强大武力来血腥镇压民众抗争。但是统治者在下令血腥镇压之前必须做一件事，就是确保军队不会违抗命令。因为军队抗命，即使是很小一部分军队抗命不镇压民众，统治者就会面临兵变和内战威胁。

中共元老杨尚昆说，89年64那天哪怕有一个班的士兵站到抗议者一边，都会对政权形成巨大危险。因为他们可能带动军队发生雪崩式兵变，最后导致政权倒台。而一旦政权倒台，下令大屠杀的统治者下场会极其悲惨。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利比亚的卡扎菲就是前车之鉴。

统治者要想确保全国军队听从命令去镇压民众，必须花一些时间完成大量政治操作。例如，虽然89年邓小平及中共元老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他们也用了一个半月才完全统一军队意志。威望不如邓和元老的统治者就需要更长时间。

从“常规暴力机构”瘫痪到“终极暴力机构”启动镇压这段时间，就是各地民主派发展政治实力的窗口期。这个窗口期越长，民主派联合发展的机会就越大。在这段时间内，各地民主派凭借已有的本地团队为基础，迅速吸收人员和资源，形成各种地方政治势力，甚至建立临时地方自治政权。然后各地方反对派势力迅速进行横向联合，迅速形成全国阵营。

反对派形成全国阵营之后，就可以与红朝全面展开政治战争，

也就是争夺军队支持：一方面运用街头运动展示的强大民意，来动摇军队中下层对王朝的效忠；另一方面，借助国际国内所有反专制力量，策反军队上层将领。

在新政治势力崛起之前，军队别无选择只能听命于王朝；新政治势力形成之后，军人就有了权衡利弊和重新选择效忠对象的机会。如果军人选择继续效忠专制政权，颜色革命就会失败。如果军队拒绝镇压街头民众，王朝就失去军队武力支持，就会在颜色革命大潮中轰然倒塌。所以争取军队倒戈或中立，是颜色革命成功的关键。而在全民抗议中形成新的政治阵营，展现强大民意和国际支持，是争取军队倒戈或中立的决胜法门。

过去三十年中，在亚洲的韩国、菲律宾、印尼，欧洲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阿根廷等国、非洲的突尼斯、埃及等国，人民都用颜色革命的方法推翻了专制王朝。颜色革命也是终结红朝的最佳途径！

红朝不愿意渐进改良，人民又没有条件进行武装革命。唯有颜色革命可以摧毁红朝，也唯有在颜色革命中民主阵营才可以发展壮大。因此可以论断，颜色革命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必经之路。

颜色革命成功必须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1，军人来自全国各地各阶层。有些国家颜色革命很难成功，因为该国军队属于与多数民众不同的阶层，甚至与民众敌对的阶层。例如：叙利亚的军队主要由阿拉维派穆斯林组成，与独裁者巴萨尔同属一个派别，而与 90%的民众所属的逊尼派互相敌对。逊尼派民众的民意无法动摇阿拉维派军队的军心。缅甸军政府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切割军队与民众的利益和情感纽带。过去数十年来，缅甸军队很少从军人家庭之外招募新兵，然后给军队很多特权，这样军队就逐渐变成一个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军政府只要能得到足够的资源供养军队，军队就会听命于军政府去镇压民众。

而目前绝大多数中国军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和市民家庭。

2，专制政权得不到强大外援。颜色革命成败在于冲击专制力量与维护专制力量的对比。在一些小国家内部，冲击专制力量大于维护专制力量，比如 2019 年委内瑞拉和 2020 年白俄罗斯的颜色革命，反对派都展示了强大民意和政治实力。但是由于俄罗斯的武力支持和红朝的经济支持，专制政权力量得到大幅加强，使得颜色革命无法取得进展，至今还处于僵持阶段。而 2022 年哈萨克斯坦的抗议还未充分展开，就被专制政权及俄罗斯联合武力镇压。只要红朝与俄罗斯专制政权不垮，还会有小国家的颜色革命会遭受挫折。但是，如果中国爆发颜色革命，俄罗斯或其他任何专制政权都没有足够的军事或经济力量进行干预。

以上两个条件中国已经具备。

3，民众广泛参与。根据美国政治学者切诺维斯的统计，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凡是参与人数达到总人口 3.4% 的颜色革命全部成功。在中国需要大约 5000 万人走上街头。俄罗斯过去十几年曾发生过多次全国性反普京游行示威，但是人数不多，声势不大，都被消解或镇压。

4，参与者还需要有广泛阶层代表性。各主要阶层都有大量人士参与，比如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商业者，尤其是作为主要征兵对象的那些阶层。这些阶层与多数军人有利益和情感联系，民意才能动摇军心。89 民运虽然参与人数众多，但是主体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农民工这两个最大的阶层没有大量参与，而多数军人都来自这两个阶层，尤其是农民阶层。他们与大学生和知识份子缺乏利益上的认同，也没有感情上的纽带，所以产生不了同理心，镇压起来不手软。

5，全国多个地方同步共振。红朝是统治整个中国的专制政权，要击垮它需要全国性运动。如果只是少数地区人民参与抗争，它就会集中全国力量来镇压。只有遍地烽火才能使其镇压力量分

散，首尾不能相顾。2014年雨伞革命和2019年“反送中”虽然参与者众多，但是都集中在香港一个城市，以一城敌一国，当然无法获胜。如果香港抗争风云再起，一定要面对全国进行动员，至少要对珠三角地区民众进行动员。珠三角有数千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和商人，通过他们就可以把动员信息传遍全国。

综上所述，中国颜色革命有爆发的条件，也有成功的可能。现在需要迈出第一步：动员民众抗议，也就是实施点火行动。

问题二：全民抗议后，习近平能否像邓小平在89年一样，调动军队进行大规模屠杀？

答：习近平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屠杀。六四屠杀得逞的条件主要有五条：

一是当时红朝第一代元老在军中有极高威信，有能力统一军队意志去屠杀民众。

二是当时红朝权贵还未积累足够财富，也未在西方国家藏匿大量财富，西方国家无法以利益来制约他们。故此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三是反对派阵营民众基础薄弱。运动参与者以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作为社会主体阶层的农民和工人极少参与，而当时多数中下层军队官兵来自农工阶层。因此反对派阵营既没能展示强烈民意，也无法与军人在感情上产生共鸣，在利益上相互契合，所以没有能够动摇军心。

四是当时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年轻学生和没有政治经验的知识分子，政治操作水准欠缺，造成运动组织化程度低，而且战略战术失误多，既不能集中力量攻击对手的弱点，又不能避开对手锋芒保存实力。

五是国际环境不利，当时苏联还未解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声势犹盛，而西方民主国家联中抗苏，又对红朝奉行绥靖政策，没有强力阻拦红朝暴行。

习近平虽然继承其前辈的嗜血天性，将来看到颜色革命兴起，一定是本能地想要动用军队屠杀人民。但是并不是想杀就能杀，上述五项有利于大规模血腥镇压的条件都已消失或被削弱，他根本不可能调动军队实施大规模屠杀。

首先，习既无政绩也无战功，藉其父荫才能执政领军，得不到多数军人的信任和尊敬，号令军队的能力大打折扣。而且在军队中进行选择性反腐，试图以反腐败为名清洗其他派系将领，使得多数军队高层与之离心离德。

其次，下次变局将是以下中下阶层为主体的全民抗议运动。现代军队中官兵多数来自中下层百姓家庭，因此与百姓在利益和情感上都是一致的。强大民意会动摇军心，红朝不可能统一军队中下层官兵意志去屠杀人民。

第三，经过近三十年的启蒙、维权和民运的磨砺，将来全民抗争的领头人绝非 89 年的单纯青年，而是一批能够熟练操作群众运动和颜色革命的民间豪杰，有能力在未来政治战中完胜习近平集团。

第四，现在美国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已经清楚意识到习政权对世界秩序的危害，已经对它展开贸易战、科技战、政治战，并且在军事上进行围堵，最终目的是推动中国发生民主变革。当变革开始之后，这些国家会动用一切手段分化瓦解习政权党政军高层，使其不能动用军队镇压人民。

第五，过去三十年中，中共权贵最高层已经把巨大财富和众多家属转移到西方，就是要为自己预留后路准备逃跑，而不是留下来与人民拼命。将来颜色革命开始之后，只要他们不支持进行大屠杀，西方国家为了防止他们狗急跳墙一定会向他们提供庇护，保证他们到西方世世代代做富翁。如果他们支持屠杀，就不会有任何一

个西方国家敢于庇护他们。在国内民心尽失、军心不稳的情况下，只要极少部分军队拒绝开枪，就会引发雪崩式的军队哗变，下令屠杀者及其家族就会无所容身于天地之间，死无葬身之地，更无福消受转移到海外的财富。齐奥赛斯库、卡扎菲的前车之鉴不远，绝大多数中共权贵在权衡利弊之后，绝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和天量的财富来冒险，去支持习近平集团屠杀人民。

第六，过去数年习近平大肆集权企图成为终身制独裁者，剥夺了其他派系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甚至对其他派系构成了人身威胁。二十大确立习近平终身独裁，长此以往其他派系就只能任其宰割。因此他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希望尽快扳倒习，即使亡党也在所不惜。因此反习派系即使人民不抗争，反习派系也会设法挑动人民抗争。如果民变爆发，反习派系必然趁机发起倒习政变兵变。

习近平集团深知颜色革命的威力，所以一方面不惜一切代价完善监控系统和维稳体制，目的就是要分解、压制和消化街头抗争，另一方面散布上街就会遭到坦克机枪镇压的言论来增加人民的恐惧。

一部分民主派人士不了解专制政权暴力机制及其局限，不了解习近平集团的能力和弱点，不了解中共内部权力格局，不了解颜色革命的原理和运作方法，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囫圇接受，要么变成空喊武装革命的口炮党，却连鸟枪都弄不到一支；要么一厢情愿去推动红朝改良，反遭严酷打压；要么悲观绝望，不再积极行动。

好在这样的人在民主派中越来越少，愿意以推动颜色革命的人越来越多。

问题三：哪些时间地点最适合民众初次聚集？

答：爆发抗议事件的地点往往具有偶然性，很多情况下我们没

有选择，只能顺势而为。

但是当动员者主动采取有计划的点火行动时，可以动员民众到最有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聚集。在某些选择初次聚集时间的标准是：

一，尽量选择周末与节假日，这样绝大多数参与者不必请假；

二，尽量避免上午，下午、黄昏或晚上都可，昏暗天色可减少参与者恐惧感；

三，尽量但不是必须选择春秋两季的晴天。五一和十一长假是号召所有人行动的最好日子。

选择初次聚集地点的标准是：

一，在靠近市区中心的位置，而且交通方便；

二，有适合数千至数万人聚集的场地，但是也不能太空旷，否则人群不易聚拢；

三，周边是中下层民众生活购物区，而且人口密度大，方便动员更多人围观；

四，离政府大楼、电台、电视台或者市中心广场这样的战略要地不远，游行一两个小时内可以到达；

五，附近有大型建筑可以占据，遇到清场时较容易防守。

在很多城市，火车站前广场、城市中心广场、地方政府大楼门前都是最佳初次聚集位置。

问题四：聚集在街头的民众互不认识，难以同心协力坚持抗争。怎样改变这种局面？

答：第一步，形成抗议共同体。人群刚刚在街头聚集的时候，大家互不熟悉，虽然身体站在一起，心理上还是一盘散沙，无法实施有效的共同行动。因此必须首先在人群中迅速营造“共同体心

理”。最安全有效的方法是引导大家同唱一首歌，只需要少数人领唱就可以迅速在人群中形成共同体心理。

只要几个人的小型民主团队在人群中领唱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且切合当时气氛情绪的歌曲，其他人自然会应和。用此法既能形成人群的团体认同，又可以壮大声势，吸引更多人围观参与。

例如，1987年元旦，数千追求民主的北京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聚集。由于广场太大，学生又互不认识，人群散漫无所适从。这时北大学生封从德等人唱起国际歌，其他学生立即齐声合唱，人群很快聚拢一处形成游行队伍。

人群所唱歌曲的旋律必须是家喻户晓，而且必须能够表达当时当地人群的情绪。国歌和国际歌虽然是中共官方歌曲，但是其歌词对中国当代现实有针砭作用，适于在民众抗议现场合唱。

第二步，民主志士掌握抗议领导权。街头抗争初起之时，民主志士的团队要成为抗争的先锋。在运动初期民众一盘散沙，恐惧犹存。此时有胆量就能当先锋，而先锋就是统帅。

怎样才能成为先锋呢？方法很简单！民主团队成员要站到聚集人群或者游行队伍的前列，撑起旗帜，拉出横幅，喊出口号。没有组织的人群就如羊群，总是跟着头羊走。谁走在最前列，谁就控制人群的方向。能掌握这个先机，就取得了抗议运动的初期的领导权。

第三步，迅速对人群进行组织化。有了初期的领导权就了对人群进行组织化的能力。

组织化包括为纵向组织化和横向组织化两种程式。

纵向组织化就是在馄饨无序的庞大人群中形成层级分明、排列有序的结构。按照某种标准把一大群人分成数个中等规模群体，再把中等规模群体分成数个小规模群体，甚至把小规模群体分成数个更小规模的群体，如此类推，人数越多，层级越多。

每个层级每个群体都要设立一个领导机构，各级领导机构之间

有既定的责权，由此形成下情上传、上令下达的权力运作机制。

颜色革命纵向组织化多数以居住地、工作或学习的机构为划分人群的依据。例如，街头人群多数来自同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有十个城区和县，就要先把人群按照城区和县划分为十个大队。每个大队内又可以按照街道办事处或乡镇辖区来划分为数个中队，再按照所属社区、居委会来划分为小队，甚至还可以根据所在街道或大楼来划分为小组。

如果是工商企业雇员或知识分子为主的抗议，就可以按照所属行业来分成数个大队，再按所属机构企业来分成小队，小队内部还可再分小组。

对街头聚集人群的组织化越细致，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就越强，人群的凝聚力就越强。把组织单位建立到最小社会单位，比如居住的大楼，工厂的车间，大学的院系或班级，组织成员之间的互相了解就越多，越容易守望相助。

横向组织化就是在每个组织层级内设立多个平级的功能机构。横向组织化的主要功能是提高群体的决策水平和协调行动能力。抗议运动的各级组织中，都应安排人员执行特定工作：

- 1，指挥者，负责总体策划和决策以及组织安排。
- 2，动员人员，负责制定宣传策略、策划宣传攻势、制作宣传材料等事宜；负责调动协调人员为街头行动战役实施网络动员、媒体动员和社区动员；
- 3，后勤人员，负责筹集、管理和分配款项物资；
- 4，纠察人员，负责保障街头行动有序进行，防止特务破坏和流氓干扰。

在民众抗议初期，重点在纵向组织化，建立层级结构，横向组织化从简。

实现初步组织化之后，一盘散沙的民众就变成了共同进退的战斗队伍。

问题五：初次聚集人数不够多，怎样迅速扩大人群规模？

答：1，把聚集的人群引向附近中下阶层人口密集的商业区或者居民区游行。游行路线尽量绕过警察防守的地方。因为此时的主要任务是扩大人群规模，而不是与对方冲突。

2，游行时集体唱歌、喊口号，制造气氛，引起民众围观。

3，打横幅，发传单表明诉求，然后拉支持者加入游行队伍。

4，发放口罩，减轻恐惧感。

5，号召游行用手机短信、微信等方法通知网友和同学朋友前来声援。

把已经聚集的人群变成一部强大的动员机器，既方便又有效。现在人人有手机，很多人甚至用智能手机，而多数手机中的电话短信、QQ和微信联系人在200-2000之间，而且多数是在本地居住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熟人网友。如果有1000人初次聚集，组织者号召这1000人动员自己的联系人前来声援围观，以平均每人有500联系人，那么就可以在瞬间把抗争消息传给 $1000 \times 500 = 50$ 万人，动员威力相当于本地电台电视台。如果有1万人初次聚集，那么动员范围就达到500万人。此法可称为“手机集群动员法”。

问题六：集会游行到深夜，民众疲惫不堪，准备回家休息，队伍有散去的可能，领导队伍者有可能在夜晚被抓捕。怎样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答：如果还在抗议初期，社会各阶层还没有被充分动员起来，就要选择中下层人民密集的居民区、大学校园或者大型工厂的宿舍区作为扎营的地点。这样不仅保持部分队伍不散，而且遇到警察袭

击时可以迅速动员大量民众救援。为此，民主团队成员在策划游行集会之前，就要为扎营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 1，了解城市地理和人文环境，选定最佳扎营地点；
- 2，动员参与者多带衣物、食物和水，有条件者戴帐篷，塑料布，毛毯。
- 3，哨子、扩音器、锣鼓等可以制造巨大响声的器材，如果警察深夜突袭营地时，可以用来唤醒周边民众救援。

当夜晚来临时，民主团队领导者要号召参与者尽量不要散去。当然，大部分民众还是会回家休息。只要有数百人的队伍不散，而且在支持者众多的中下阶层居民区内扎营，领导者就可以度过最危险的夜晚而不被抓捕，第二天又可以带领民众上街。如果抗议运动进入成熟阶段，参与者众多，形成浩大声势，军警不能轻易镇压，就可以在最具政治意义的地点扎营占领，如政府大楼和附近广场，电台电视台大楼，与习当局政权正式对决。

始终保持一定规模的队伍聚集在一起，整个运动就会有一个凝聚的核心，运动的组织者才可以避免被红朝分别抓捕。只有这样，运动才可以持续进行下去。

问题七：我们动员在某地聚集之后，警察事先在预约聚集地点周边封锁路口。我们应当怎么办？

答：当某群体性事件即将爆发的时刻，习政权的网络警察、五毛、爱国贼们肯定会提前获悉上街游行示威的相关信息，当局也一定会派出武警、特警等事先封锁聚集地点周边的路口，也有可能聚集地周边借口修路、制造车祸和突发性事件等强行实行交通管制，以阻止人群向预定地点聚集。

警察设置封锁线之后，想去聚集的民众就被堵截在封锁线之

外，其实这样也就形成一定规模的聚集。此时需要做的是，一方面引导被拦截在封锁线之外的人群向其他地点集中；另一方面通过短信、微信等将现场情况通过实时转播形式发布到各种社交媒体上面，号召更多的尚不知晓的群众参与到游行示威队伍中，以便扩大人群聚集的规模。

此时应尽量避免与警察队伍进行正面冲突，除非抗争人群已经非常庞大，否则一定不要冲击警察的封锁线。因为在街头抗争初起时，最重要的是聚集人群，而不是占领聚集地点。

问题八：大规模的游行人群在街道上遭到武警和防暴警察盾牌方阵的阻拦，此时应该如何应对？

答：此时游行领导者应当带领一部分民主团队成员站到游行队伍第一排，让队伍在与警察相隔数十米的距离停下来；

然后把游行队伍分成两半，前面一半与警察对峙，向警察队伍喊话；后半部分在民主团队带领下迅速包抄到警察的后面，对警察形成包围之势；

再派出一部分游行民众到街道两边动员居民敲响锅碗瓢盆制造声势；若两边是高楼，还可以鼓励楼上居民对警察高声喊话、泼水、投掷烟花鞭炮和小物件，进一步对被包围的警察施加心理压力，使其心生恐惧而溃散。

如果条件许可，游行队伍配置两辆两轮木制手推平板车，板车的两个把手要加长，每个把手可由十几至二十人推动。若遇到警察盾牌阵阻拦，则数十名青壮年男性公民推动两辆板车走到队伍前排中间，再由数十百名持盾牌戴头盔的青壮年男性在两旁保护推车者。两辆板车一齐往前推挤警察盾牌方阵，可以把警察阵型截成几段。失去阵型的警察不能互相保护，就会被游行人群分割包围。此

时一部分警察就会临阵脱逃，另一部分就会被迫参与游行队伍。游行队伍则可继续行进。

所有这些举措，旨在打击警察士气，突破警察防线，而非造成人身伤害。若对警察造成较大人身伤害，则不利于动员军警倒戈。战术上看似赢了，战略上其实输了。

警察被人群包围之后，也会产生强烈恐惧心理。此时要利用他们的恐惧心理，让他们公开反对红朝，站到人民一边。民主团队成员要在现场录像，即时上传互联网社交媒体，并且传送给海外媒体，进一步打击红朝士气。

问题九：武警和防暴警察向街头聚集人群发射催泪弹，或者用盾牌警棍殴打民众，试图冲散民众。我们应当怎样抵抗？

答：街头运动全面展开之后，参加游行集会的民众人数大量超过警察。警察之所以常常镇压民众，并非仅仅因为拥有武力，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组织化程度高，训练有素，所以能够在攻击时互相配合，在退却时互相保护。也就是说，在双方都不用刀剑枪炮的情况下互斗，只要我们的组织化和培训做得好，很容易就能在街头对垒中占据优势。方法如下：

1，把人群中的强壮男性挑选出来组成一个纠察大队，务必使其人数数倍于警察。每人配置建筑头盔，口罩，简易盾牌。每十人为一小队，十小队为一中队，数个中队为一总队。经过数小时训练，即可在非武装街头对垒中击败警力。

2，每次游行之时，纠察队排列于人群第四、五排之后。遇到警察冲击即刻结成队形冲至前排，既可抵御警察冲击，还可以用人数优势冲破警察队形，令其四散逃逸。

3，大型集会游行之前，还要号召参与者各自配备口罩、毛巾

和瓶装水，以减轻催泪弹的伤害。

4，民主团队成员要安排专人准备厚实手套数副。在警察发射催泪弹之后，立即捡起催泪弹投向警察。

5，号召女性参与者携带防狼喷雾器。在受到警察攻击的时候用来自卫。

6，号召所有青壮年男性参与者自愿走在队伍前半部分和外围，保护女性与年纪较大的参与者。

民主团队成员要在现场录像，即时上互联网传播，并且传送给海外媒体。

问题十：如果当局派出地痞流氓从事打砸抢烧等暴力活动，然后嫁祸于参与抗议的民众。我们应当如何预防和应对？

答：几乎所有专制王朝都会用这种方法抹黑反抗运动，习当局也一定会。

最好的预防措施是对街头运动参与者进行精细组织化。组织化程度越高，防范暴力行为的能力就越强。如果抗议组织者能把组织建立到居民小区、工厂、大学院系，那么街头运动参与者之间的互相了解程度就越高，互相监督和约束的程度就越高。

当习政权派出的地痞流氓实施暴力行动之后，抗议组织者要及时派出大批纠察队员立即到现场制止暴力行动，并且对施暴者实施人身控制。检查其身份证件并迅速调查其幕后指使者。整个过程要全程录像，网上发布。

如果现场调查难以确定其身份，则动用互联网的力量人肉搜索从事暴力活动者的真实身份和幕后指使者，再通过各种宣传途径广泛传播。

最后，及时发出声明谴责暴力行径，并且揭露实施暴力行径的

并非街头抗争者而是受当局指使的地痞流氓。由于习政权完全丧失公信力，人民会相信抗议民众的声明而不会相信当局的指控。

让当局意识到用这种方法不能抹黑街头革命，只会让自己在政治上更加被动，他们就会舍弃这种做法。

问题十一：问：当一个地方街头运动展开之后，通常当局会关闭当地的互联网，实行信息封锁。此时采取哪些措施才能突破封锁？

答：1，可派遣部分抗议者到临近的还没有被封锁的地区，然后通过电话、彩信、传真等方式与外界保持联系。

2，还可以邀请外国新闻机构媒体人员到现场采访。他们会用卫星通讯把抗争信息传至世界各地。在民众力量足够大的时候，迅速占领当地广播电视台，并用它们来动员民众。

断网固然对动员抗议造成不便，但同时会对普通民众生活造成极大困扰，也会给工商业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加重民众的怨气，扩大了抗议的民意基础。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当局不会全面断网。全面断网，也就说明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了。断网之时，正是扩大抗议规模的最好时机。记住：在互联网普及之前，颜色革命就已经存在了。断网无法阻止颜色革命，只会让颜色革命更加猛烈。

问题十二：在抗议运动的初期，民众以某个经济诉求聚集。政府官员为了消解街头运动，使用缓兵之计谎称答应民众诉求，并要求民众解散。此时我们应当怎样应对？

答：他们用缓兵之计，我们就要“连环诉求战术”。他们答应

第一件诉求，我们就提出第二件诉求，他们答应第二件诉求，我们就提出第三件、第四件诉求。我们迫使他们答应的诉求越多，民众的士气就越高，恐惧就越小，恐惧越小，参与的民众就越多。把诉求范围逐步扩大到经济社会各层面，最后上升到政治诉求层面。就如在战场上四面合围，让对手无路可逃。

例如，最初民众以反某化工厂污染为诉求在市政府前聚集，市长出面答应让该化工厂治理污染，并要求民众解散；此时民主团队成员就要代表民众提出另外几间工厂的污染也很严重，要求市长答应在污染得到治理之前关闭工厂；市长如果答应关闭工厂，民主团队成员就代表民众要求市政府赔偿被强拆的市民和商户的损失；中国任何地方都有非常多社会问题，就像这样不断提出新的诉求。当很多问题被提出来并且得到当局的让步之后，民众士气就会高涨，街头人群也会空前增加。当街头人群达到一定规模，组织者就向民众指出本市出现了如此众多的严重问题，当地政府负有主要责任，因此本地民众有权利弹劾他们，要求他们立即下台。这样就自然从经济社会诉求上升到政治诉求。这个诉求他们若答应就是投降认输，不答应我们就以此号召民众继续聚集抗争。记住，人群聚集来之后，就不能再解散，否则事件的领导者就会被秋后算账。所以民主团队一定要想方设法加剧民众与习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张力，运动才可持续。

问题十三：街头已经聚集大量抗议民众，当局一时间难以镇压，但民众诉求未得到满足，下一步怎么办？

答：占领电台电视台或政府大楼。电台电视台和政府大楼都是各地街头政治战中的制高点，为了占领成功并实现政治收益最大化，最好在地方当局没有派重兵防备的时候就实施占领行动；为了

保证行动有组织地、和平地进行，抗议组织者一定要在掌握抗议领导权、并初步完成抗议人群组织化之后再去占领。

行动步骤如下：

一，策划好完整细致的行动方案，但是对外保密，以保证突袭成功；

二，动员民众在离电台、电视台或者政府大楼两小时路程之内的地方聚集；

三，民众聚集成功之后对人群进行组织化，由组织者团队成员负责打出各队的旗帜，以此引导队伍。

四，队伍游行至电台电、视台或政府大楼附近时，组织者团队成员突然引导民众进入大楼。

五，地方电台、电视台和县市级政府大楼一般没有很多武装人员把守，只要民众人数足够，就可以和平冲破保安的阻拦进入大楼内部。对于某些有很多武装守卫的政府大楼，就要先发起攻心战对他们喊话，在武装守卫人员全体撤退或倒戈之前，不可贸然进入，只能从外面围困。

六，进入电台电视台或政府大楼之后，纠察队一定要保持秩序，宣布任何有打砸抢行为者即被当作内奸清除出队伍，将来还要接受法律制裁。

七，隔离当局主要官员，分头对其进行攻心战。利用大规模人群对他们造成心理压力；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鼓励动员他们尽快加入抗争队伍。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所有官员投诚行为，以打击当局士气，提升民众信心。

八，通过电台、电视台向外宣布由人民直接接管电台、电视台和政府，号召本地民众前来支援。并持续发放抗争消息和民众诉求，揭露当局罪恶，宣传民主理念。

九，如果政府大楼在城区内居民密集的地方，就可以在大楼内部和周围形成营地，把此地当成抗争力量的中心。若远离城区，则

在清空其中的设备和资料之后撤离，使红朝不能再用来作为指挥中心。

问题十四：民众占领政府大楼或者广播电视台大楼之后，红朝派出荷枪实弹军队或武警进行武力清场，我们应当怎样应对？

答：有三个办法，即可单独用，又可混合用。

第一是主动撤退，积极避战。当军队或武警被命令武力清场的时候，如果民众人数众多，又没有经过街头革命的训练，纪律松散，这时组织者应该指挥民众迅速撤退到中下层聚居区、大学校园或者工厂等比较安全的地方，让军队武警根本没有机会实施武力镇压。

第二是以弱敌强，哀兵必胜。如果抗争队伍训练有素，纪律严明，领导团队能够完全控制队伍的行动，就可以命令所有人在大楼周围和内部就地躺下，不给军队或武警任何开枪的借口，迫使他们用更多人力来抓捕成千上万的抗争者。同时安排人在附近录像，即时上传网上并发给国际港台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若强令军队对完全非暴力的民众施加暴力，不仅会引起国内外舆论谴责，还会引起大部分军人反感，导致军人倒戈；他们若是抓捕抗争者，即使把监狱填满也只能抓捕其中极小一部分，这样就会让人们不再对监狱产生恐惧，就会继续参加抗议。所以无论当局如何行动，只要我们把他们拖入政治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就必输无疑。

第三是，以柔克刚，攻心为上。效法埃及茉莉花革命的做法，动员妇女老人为军人端茶送饭，与军人一起载歌载舞，融洽无间之时，劝其调转枪口，加入抗争阵营。

在将来大规模抗议运动兴起之后，只要组织化工作做得好，就能指挥街头队伍；只要能够指挥街头队伍，我们就能逼迫当局进入

政治战争的战场；只要当局进入政治战争的战场，他们的暴力机器就无用武之地！因为无论屠杀还是监禁都会引起军队和人民的反感，最后众叛亲离。

政治战争就是用民意来动摇军心，最后赢得军队的中立或倒戈；在军队没有宣布中立或倒戈的情况下，搞武装革命不仅不能成功，而且还要造成极大的牺牲。所以，当军队或武警还听命于习近平当局的时候，我们要有耐心，避免与他们发生武装冲突，同时不放弃任何机会向他们发起政治宣传攻势。

大家要知道，当大军进城之时，习近平当局比我们更加恐惧。因为政局动荡之时，军队随时可能哗变，在城中驻扎时间越长，哗变的机会就越多。

问题十五：怎样才能迅速瘫痪中共地方政权？

答：第一，擒贼先擒王。只要民众人数足够，就要果断围困甚至占领各省省委大楼，切断其对外通讯，使之不能向下级发号施令。下级接不到上级命令，就会骑墙观望，士气衰落。但是，对官僚一定要围而不打，千万不可让群众私刑处罚这些官僚，否则就可能被习近平当局当作借口来动员军队镇压民众。

第二，先策反后批斗。中共各级官员中都有很多人反对习近平，只是平时不敢表态而已。当抗议运动声势浩大之后，正是官员们反习的好时机。只要稍加引导说服，他们就会公开站到民众一边。

必然会有一些官员拒绝反正，那就公布其贪腐和残民劣迹，把他们驱逐出政府机构。中共官员几乎全部都有贪腐劣迹，所以反共人士要事先多方搜集他们贪腐的材料。如果他们隐藏贪腐证据，那就公布他们可能犯下的贪腐罪行。中共官员贪腐形象已经深入人

心，无论指控他们什么民众都会相信，民主派要充分利用这个政治战优势。

如果能够策反部分重要官员，整个官僚队伍立刻土崩瓦解。即使他们不愿意反正和下台，只要他们不敢公开露面，官僚队伍士气也会一落千丈。

第三，制造习近平政权四面楚歌的气氛。例如，动员民众在全城的公共建筑上用油漆涂画倒习符号，书写反习的标语，显示民意已经抛弃习政权，给习政权支持者造成心理震慑。

第四，在城市主要街道设立退党站，鼓励党员公开退出，对习政权实行釜底抽薪。与法轮功学员合作，因为他们有现成的团队可以操作此事。

第五，鼓励官员另组新政党，造成共党内部分崩离析。不少中下层官吏本来就有反习之意愿，抗议运动领导者要及时为他们指明出路，并接纳他们进入反习阵营，以此分化瓦解敌对阵营。不要把所有体制内人员当作敌人。兵法说“围城必缺”，就是这个道理。

第六，制造有威慑力的舆论。中共官员只求名利并无信仰，而且他们已经把财产和家属转移到海外，因此当抗议运动蔓延，颜色革命开始之后，官僚体系内很多人会产生摇摆和弃船心理，只要民主团队能够制造出一种气氛让官员及其家人失去安全感，他们就会迅速逃离到海外。

这六种政治战法齐用，打击一批，拉拢一批，就可形成凌厉攻势，迅速瓦解中共当局。

问题十六：颜色革命开始后，怎样策反当地驻扎的军队和武警？

答：与习政权争夺军心，必须动员全民上街，必须显示强大民

意，以民意赢得军心。为什么强大民意可以赢得军心？因为绝大多数军人来自人民，与人民有共同利益和情感；因为绝大多数军人也是人，有人类共通的“从众心理”，愿意选择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边。

颜色革命要用人海战术。中共当年用人海战术夺取政权，我们要用人海战术让它丧失政权。

第一，运用各种人际关系展开心理攻势。劝说军警站到人民一边或者保持中立。动员军人亲友加入颜色革命队伍，然后劝说其子弟；动员退伍军人加入颜色革命队伍，并劝说其老战友不可对人民开枪；通过军属和退伍军人鼓励军人在军中传播社会不公和街头抗争信息；鼓励军人与战友抱团，一起拒绝执行屠杀人民的任务；如果习当局任由士兵接收书信，军心就会瓦解。如果习当局因此而全面断绝士兵与家属和老战友的联系，也就会引起军人的不满和怀疑。

第二，以全民革命气氛来影响军心。颜色革命形成规模之后，民主团队就要派出队伍到军队和武警驻地附近大量散发传单、拉横幅、写标语、放带有标语的大气球，让他们知道军人的父母兄弟所属各阶层都在反抗习政权统治，号召他们站到父母兄弟一边。

第三，当局调动军队进入城市的时候，组织退伍军人、老年人和妇女沿途给军人送食品饮料，向他们传播官吏贪腐、人民水深火热的真相，并要求他们拒绝向人民开枪。同时，也要沿途展示反习反共、争民权的标语横幅，越多越好。

第四，给军人提供多种选择：鼓励军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公开倒戈，站到人民一边。对没有决心公开倒戈的军人，就鼓励他们拒绝执行镇压人民的命令。对不敢拒绝命令的军人，就鼓励他们开小差。对不能开小差的军人，就要求他们把枪口抬高一寸。

颜色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策反军队，而能否成功策反军队关键在于策反行动的规模和持续性，想方设法让军人暴露

在人民的宣传攻势之下。策反行动规模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颜色革命的组织者一定要调动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争取军心的政治战。在革命如火如荼之时，领导者往往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街头行动的动员和组织，容易忽略策反军队的重要性。这是 89 年运动失败的因素之一，后来者一定要引以为鉴。

问题十七：颜色革命组织者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才能保持社会秩序？

答：我们要破坏的是习政权的统治秩序，让他们的政府、警察、法庭无法镇压民主力量，而不是要故意破坏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就是人类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秩序，包括社会治安、物资供应、交通、医疗等方面的秩序。如果颜色革命使社会秩序遭受过度破坏，就会引起广大普通民众的不满，对革命者不利。

因此，当颜色革命规模扩大造成当局瘫痪之后，各级领导团队就应当及时承担领导民众的责任，在各地建立临时政府，以“公民委员会”的形式行使管理社会职能。

即使中共地方政府还有一定力量，没有被彻底打垮，也应成立临时政府，与旧政权平行运作，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动摇对方军心，最大限度团结己方阵营，最大限度争取民众支持。

临时政府没有管理社会的经验，怎样才能破坏统治秩序的情况下保持社会秩序？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

一，去党留政。解散各级中共党务机构，但是保留多数行政机构及司法机构，令其向临时政府负责。尽管有些政府部门叠床架屋，冗员充斥，但是这种小恶可以等到革命结束后再去处理。革命时期要抓大放小。

二，去政留事。撤换行政及司法部门内的政务官，除非他们公开宣示并且用实际行动表明与习政权决裂和效忠公民自治政权；保留多数事务官，也就是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的公务员和司法人员。

三，公民监督。公民委员会解散中共立法机构，以公民委员会作为临时立法机构，行使最高权力，监督行政、司法机构及其官员，使其发挥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功能。

用这三条原则，既能彻底瓦解习近平政权，又能保持行政及部分司法延续性，使得颜色革命时期社会不至于陷入大动荡大混乱。

公民委员会应公开宣称只有临时权威，权威来自颜色革命。等到习近平中央政权覆灭颜色革命结束之后必须还政于民。

公民委员会成员包括领导颜色革命的团队成員，社会各界有影响力的人士。

公民自治委员会采用集体领导制度，对重大议题共同表决。

问题十八：颜色革命兴起之后，是否应当成立新政党？

答：颜色革命的目标是民主政治，而多党并存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但是当革命正在进行时，不宜成立新政党。

在颜色革命兴起之初，民主团队应集中精力取得各地革命的领导权、以公民委员会形式把运动组织化，并不断扩大运动和组织，而不要消耗精力去筹建政党。此时民众恐惧感还没有全面消除，运动以经济社会诉求为主，不宜成立政党。

当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之后，也不一定要组建政党。因为，政党是具体政策理念高度一致的同质性人群形成的团体。此时如果民主团队把精力集中于组建政党，就必然凸显民主阵营内部的差异，难免增加内部分派和摩擦，不利于民主派团结御敌。

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有二，第一，尽快建立临时地方自治政权，民主派掌握的地方政权越多，习政权就越难以镇压；第二，联合民主派地方政权，形成全国范围泛民主派政治联盟，这样才能在习近平政权和民间极左势力的博弈中取得优势地位。总之，颜色革命时期，以壮大民主派阵营、增强泛民主阵营的整体竞争力为重点。

等到习近平倒台、中共瓦解之后，再解散联盟而形成各自独立、互相竞争的民主派政党。颜色革命成功、民主宪政初成之后，才是民主派内部分化、政党发展的最佳时段。

问题十九：为什么点火计划以“除习”而不是反共为重点？

答：颜色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民主转型，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终结中共一党专制，当前中共一党专制的形式是习近平独裁。所以说“除习”是反共的最有效方法。

所有专制政权都有四个支柱：国统、法统、政党、党魁。但是，当革命开始之时，革命阵营的力量比较弱小，无力同时摧毁四个支柱，只能先集中力量摧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柱，当这个支柱被毁坏之后，其它支柱也会相继倒下，或者即使不倒也无法继续支撑专制大厦。

在某些专制政权中，党魁执政时间不长，而且没有犯下严重罪行，执政党也有向革命者妥协的意向和行动。那么革命阵营就应当集中力量攻击王朝的法统或国统。1989年波兰和匈牙利民主阵营则通过修改宪法和更改国统来实现民主转型，而没有要求解散执政党或要求党魁下台。

1980年代后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主张民主改革，但是遭到党内保守势力的阻挠和攻击。在这种形势下，1991年叶利钦领导

的民主派选择王朝的国统和执政党为优先攻击目标，联络各加盟共和国成立独联体取代苏联，同时争取在俄罗斯解散共产党。当 819 政变之后，叶戈联手宣布解体苏联、解散苏共。

在某些王朝，一个强人党魁长期执政，使其自身成为王朝最重要的支柱。那么革命阵营就会以党魁作为最主要攻击目标，党魁下台则其他三个支柱都无法承受革命的压力而坍塌。1998 年印尼革命阵营和 2011 年埃及革命阵营就是采取这种策略。

1989 年罗马尼亚革命爆发之后，党魁齐奥塞斯库下令枪杀民众。部分军人拒绝执行命令，与忠于齐氏的党军交火，国家有陷入内战的危机。革命阵营于是首先枪决长期执政的党魁齐奥塞斯库，取缔红党，迅速平息武装冲突。大局初定之后，再更改国号和重订宪法。

将来中国革命阵营应当先拆哪根支柱呢？习近平掌权已过十年期间，他严酷镇压民间民主派，而且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犯下反人类暴行，已成全民公敌；在党内用选择性反腐败打击政敌，已成全党公敌；对外大肆进行政治渗透经济扩张和武力恐吓，已成全球公敌。因此倒习已经成为体制内外、国内外各阵营之间最大公约数，因此最容易成功。而且习近平已经破坏了红朝运行数十年的寡头专制，独揽大权且谋求终身独裁。习不倒台，红朝就会蜕变为朝鲜，习若倒台，没有任何人任何派系能填补巨大权力真空，统治阶层内部必然陷于混乱，加上社会矛盾全面爆发，人民抗争如火如荼，国际力量纷纷介入，红朝就会随之而瓦解。因此，倒习是倒共的突破口，倒共必先倒习。

对其他权贵则应分别对待。如果他们站在习近平集团一边，参与镇压革命，则是民主派之敌，对他们要采取最严厉的惩罚。如果他们反习并支持解体中共，民主派应当把他们当成盟友，对他们曾经犯过的贪腐罪行应赦免，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化解革命阻力，减少革命损失；如果他们骑墙观望或保持中立，民主派不要在革命中

把他们当作反对对象，革命之后由未来民主政府依法处治他们。

共党作恶多端，必须彻底解散禁绝。多数党员应既往不咎，犯有特别重大罪行者除外。

问题二十：将来中共垮台之后，民主宪政制度将会依照什么程序建立起来？

答：中共垮台之后，在民主转型初期，由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缺乏互信，而且都没有在民主制度下互动的经验，极易出现严重对立甚至暴力冲突，所以应当寻求国际民主阵营介入，为中国民主派提供下列帮助：

- 一，充当对立政治集团之间的调停者或仲裁者。
- 二，保证选举过程和平和公正。
- 三，在暴力冲突严重的地区维持和平。

建立民主宪政架构一般会采取下列步骤：

一，建立中央临时政府。谁来担任中央临时政府的首脑存在很大变数。

临时政府可能是一个由省级地方临时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主导。不少国家的民主转型采取这种形式，未来中国采取这种可能性最大。

如果在颜色革命中出现一个全国多数人拥戴的领袖人物，他或她也可能担任临时政府首脑。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很难在短期内出现一个全国拥戴的新政治领袖；而且也未必是好事，因为容易导致新的权力集中。

如果旧政权中高官倒戈站到人民一边，为颜色革命成功做出重大贡献，而他又没有镇压民众的重大劣迹，也可以由他担任临时政府首脑。很多国家采用这种模式。比如 89 年波兰圆桌会议之后，原

来执政党统一工人党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成为临时总统；印尼 98 革命之后，原来的副总统哈比比就成为临时总统。

二，成立制宪会议。制宪会议成员由全国各地选举产生。负责起草宪法和通过宪法。

三，根据新宪法选举立法机构成员及行政首脑和国家元首。

民主宪政草创时期，一定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应对初期的民主宪政架构不能求全责备。而应当以渐进方式不断改良。

问题二十一：很多国家在颜色革命之后，民主制度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推翻，重新建立了专制独裁政权。将来中国初步实现民主之后，怎样防止专制独裁复辟？

答：民主化初期最大的危险就是专制复辟。导致专制复辟的因素有多种，例如：

一，公民和民主派领袖政治素质低下。当今中国不仅多数民众缺乏民主素养，甚至不少以实现民主为己任的民主志士也存在不利于民主的观念，例如：

非友即敌，缺乏对不同观点立场的包容。海内外不少民运人士不能求同存异，在某件事情上观念不同就互为仇敌，攻击对方是特务卧底；

只追求实质正义而不尊重程序正义。在 2020 美国大选中表现特别明显，很多人认为应当推翻美国已经运作两百多年的宪政程序，赞同美国民兵起义或军管。

崇拜现实中的强人能人，容易受其蛊惑。很多民主派人士甚至崇拜独裁者普京。如果将来中国出现一个类似普京的强悍狡诈政客，很多人就会放弃民主而去追随“英明领袖”了。

相信阴谋论而不求实证，就容易听信谣言而进行政治迫害；

追求乌托邦而缺乏改变现实的耐心，就会陷入不断革命循环中，彻底颠覆和否定初生的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

二，政治强人崛起。魅力型政治领袖崛起，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和谎言，或欺骗民众授予不受限制的领袖权力，或蛊惑民众以暴力手段攻击反对派，最终摧毁民选政府和既有宪政秩序。

三，军人干政。军人集团发动政变，用武力颠覆民选政府。

四，外国渗透。俄罗斯等国可能将来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助其破坏民主宪政。

五，民主政府显现重大弊端，诸如贪腐、效率低下、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或主权受损等重大问题，民众失去信心，则可能转向支持政治强人独裁。

防止专制复辟是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着手才能成功。由于篇幅有限，不能详细论述，在此只谈一个要点，即在民主初期就建立一个最大化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

集权导致专制，分权利于民主。所以要防止专制，重点在分权。中国未来制度要建立所有民主国家都具备的基本制度，即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多党竞争、官员民选等多项制度，此外还应该在保证政府发挥功能的前提下实现最大限度分权。为此必须：

一，实行联邦制而非中央集权制。形成县市、省和中央三级政府互不隶属的体制，用地方政府权力制约中央政府权力。

二，实行议会内阁制而非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宪政学者王天成认为，世界上最稳定的民主国家多数是议会内阁制。其领导者即总理不仅受民意舆论制约、受地方权力制约、受议会内反对党派制约、除此之外还要受到执政党议会党团制约。政客必须先在自己选区赢得选举进入议会，然后再由其他本党议员推选，才能成为总理，选民和议会党团都能把他赶下台。在这种制度之下，总理必须

同时蛊惑人民和政治精英，才能被授予专制权力，复辟专制独裁的难度相当大。而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总统由全国选民直选产生，比较容易挟民意以压制其他政治精英，进而破坏民主制度。近五十年来，所有专制复辟都出现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而没有一个是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

中国民主派人士以美国为民主灯塔，很多人认为未来中国可以照搬美国总统制。这种思想十分错误。美国民主传统深厚，实行总统制也已引发危机，未来中国民主草创，民心未固，如果实行总统制，极易被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颠覆，值得中国民主派警惕。

独立参选区县人大代表：

可行性、风险对策、认识准备与推广

作者：公天下

摘要：目前中国唯一开放直选的是区县人大代表选举，而且法律形式上和具体实践中，都有非中共指定的独立候选人参选、当选。选举是非暴力的，独立参选不做中共的传声筒、表决器，又是不合作的。本方案分析独立参选的可行性和风险对策，从操作和认识方面，阐明方法，走出误区，将民主的理念，落实到选举的实施、选民的动员和代议制骨干的培养。重要的是，这样的选举训练和模式，可以复制和推广，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做好准备。

背景与可行性

在非暴力不合作的各种方式中，即使不考虑风险和被镇压，街头行动的游行示威，最终要选出代表，提出诉求，进行会议室讨论；罢工罢课罢市，也得有代表组织和发声；组党结社更需要推举代表，进入议会政治和行政职位竞选。

选举不仅是民主的开始，也是民主的结果，现代政治文明最终都是代议制民主，通过选举来体现。选举肯定是非暴力的，也是合作性的，但在中国的政治形势下，也有不合作的一面，那就是独立参选。

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选举的观念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即使是朝鲜金家的世袭独裁，也要走个选举的形式。习近平的上台、连任

以及取消任期制，也要压迫人大代表的全体同意。在询问有没有反对票时，那一声声响彻会堂的“没有、没有”，表面上是显示全民拥戴，实际上是要用选举这个形式来确立权力的合法性，欺骗百姓和世界。

但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行政领导的产生，实质由中共掌控、各级党头决定。

走个选举的形式，也是可操控的间接选举，即由你不知道的代表替你选举，选民“被代表”，而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政府领导、行政职务不开放、不普选，和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关系。

而目前唯一开放、可以直选的就是五年一次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区县以上的市、省、全国人大代表，又是“被代表”的间接选举，和选民没有任何关系。兼有议会功能的各级政协，更是连个选举的形式也没有，政协委员直接由中共的统战部门推荐产生。

所以普通人，作为选民能参与的就是区县人大代表选举。因为形式上是直选，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为了保证过程和结果可控，中国各级组织、机构和区县政府，都要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而且形式上依照《选举法》的规则，实行一定的差额选举。

但《选举法》也规定选民可以“另选他人”即不选选票上官方推荐的候选人，而是另写上有意愿、有能力、自行参选的非官方候选人，即“独立候选人”。

风险

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1980年代初北大的胡平等人成功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当时的影响主要在高校。2000年前后，经过不懈努力，湖北潜江县的姚立法、江西鄱阳县的黄松海，都先后当选所在县的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成功案例从高校走向社会，从北京扩散到全国。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借助网络的影响，2011年涌现出更多的独

立候选人。有不少人网络被封、当局施压，宣布退出。

独立候选人的合法性在于不仅有《选举法》的条文可用，而且形式上确实是选民直接选举。就算能打压候选人，也难以全面操控每个选民。

独立候选人的可操作性在于，不仅有名字不在选票上，以选民“另选他人”的方式当选的；也有名字虽然在选票上，但其背景和倾向并不是官方支持和推荐，而是由于其社会影响和民众基础，而被选民选举当选的，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青、北京邮电大学的许志永等。无论选举前和当选后，他们不做官方的传声筒和表决器，而是为公共利益独立发声。

独立候选人的短期风险在于被打压、被阻拦、被封杀社交媒体，长期风险在于被边缘化、被施加各种限制和迫害。不同地区不同职业者，最终后果会有所不同。

比如在北京等大城市，特别是高校，相对比较宽松，除了在体制内的前途受阻，一般没有人身迫害。而在地方的县城，如姚立法等人会被长期监控、骚扰。更有甚者，如陕西南郑的赵常青、江西新余的刘萍，在选举过后，由于成为重点监控对象，以别的罪名抓捕。

总体来看，全国由于独立竞选直接被抓的很少，尤其是体制内、大城市的还没有，但无一例外都受到各种打压，除了本人承受职业、前途的代价外，也给别人以威慑。如果本人不畏惧压力、不在乎得失，如吴青、姚立法、许志永等人，仍然有活动空间和发声机会，但这都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前，习的时代完全不同以往。

对策

独立参选，除了选民对候选人有道德上的要求，自己也应洁身自好，不授人以柄。虽不能阻止中共当局的无耻和迫害，但首先自己要在道德、法律、职业、经济上立得住，宁可“被嫖娼”，也不

要自己不检点；以政治罪名被抓、被处罚，也好过经济和职业的罪责。

当局在打压时也是有所忌惮的，首先是法律的条文和选举的形式明摆着；其次是候选人在单位、选区、社会上多少有些影响，而且还有那么多选民盯着，更要考虑到国内外舆论的压力。

习时代，民间在害怕沉寂几年后，真要有人再冒头出来独立竞选，风险不会超过以往。只是由于现在全面高压，很少有人真的敢出来，但仍然有人有想法，在观望，找时机。

最大的问题是独立候选人的数量。以往高潮时全国的数量也很少，而且始终是高校几个点，或少数地方一条线，从来没有形成全国一个面、一大片。

目前中国有 3000 多个区县，每个区县又划分出若干选区。根据官方 2022 年统计，全国有 10.64 亿选民参与，选出近 263 万（2,629,447）名代表。这么大的规模和人数，哪怕产生千分之一的独立代表，就是 2600 多人，平均每个区县都有，辐射亿万选民，相互影响。

所以最主要的是解决个数量问题。如果每个区县、每个选区，都有至少一个独立候选人，实际上一旦有人带头出来，就会有其他人跟上。最终遍地开花，中共就难以防范。参选人多，对独立候选人是克服恐惧、相互鼓励，对广大选民也是鼓舞和激励，终于可以有另外的选择。

网民不是选民，网络取代不了选区活动

和民主国家用社交媒体竞选不同，基于我对许多参选案例的观察，中国的各种社交媒体、通讯工具，在刚刚开始联络同道、表达意向时有用，但真正进入选举，几乎没有用。一是很快就会被封杀；二是在高科技极权管控下，随时会受到监控，如果使用翻墙软

件，更是会授人以柄，被恶法处罚。

实际上网民不是选民，选举是分选区的，重要的是在你的选区让人知道你，而不是特定粉丝多少。在网上的泛泛影响，不如对选区、社区、单位的具体影响。候选人要知道你的选区在哪，面对的选民是谁，能为他们做什么事？而不是在网上对空喊话，讲虚的理念。

有影响的当选代表、或者有竞争力的独立候选人，很多不玩社交媒体，或者由于屡被封杀，没有社交媒体，但他或她一定了解自己的选区，在现实中想方设法介绍自己，接触、走访、接待选民。每和一个选民交谈，选民就会向家人、邻居、同事说起，就能辐射好几个选民，知道你在竞选，知道有另选他人这回事。

外国每个候选人都想被采访、被媒体报道，扩大影响，但在中国不是。如果是国际、境外媒体采访，尽量回避，因为国内普通人不翻墙，看不到，还会被扣上和“境外势力”勾结的帽子，对选举不利。

而且和境外媒体联系、安排采访都会被监控、阻挠，这样会分心、干扰选举的准备。政治都是本地的、国内的，在国内有了影响，肯定会传到国外。最终真的当选，或者动静大，虽败犹荣，也一定会有国外媒体的报道。

独立候选人的社交媒体迟早会被封杀，如果有国内的媒体机构、自媒体采访，一定不要拒绝，要想方设法发声，制造影响。即使最后不能发布或被删除，但至少采访你的人知道，会口碑传播。

如何选

从选区的可操作性来看，中国的选区分两种：一种是大的单位，如大学、大机关、企事业单位，本身就是不同的选区；第二种是按居民区、街道、社区，既有本地的居民，也包括所在片区的小单位人员。

从可行性出发，各地的大学，由于选区封闭，师生选民集中，管理相对松散，非常便于参选、竞选，而且后果可控，无非是毕业或职称受影响，一般不会被抓捕。

机关、厂矿、公司很难开展竞选活动，由于等级、劳资、保安秩序，对候选人不利，也很容易被叫停。

除了大学，就是居民区、社区，这方面时间灵活的自由职业者和退休人员有优势，邻里聚会、小区交流、周边走访、图文展示、衣服配饰介绍，都可以开展竞选活动。

除了可能的网络发声、全国的面上铺开，最重要的还是点上的突破，即成功的案例。只要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会传开，就是全国性的鼓舞，确认可行的路径，克服他人的恐惧，对当选者也是保护。

对于更多参选者来说，一定要坚持，坚持到最后，即使不能当选，也要争取拿到选票，选票越多，安全越有保障。千万不要网上做个姿态，说我要参选，然后我被打压了，没有成为候选人，我尽力了，我退出了。这种更容易被秋后算账。

其实选举不仅是理念和“一人一票、改变中国”那么简单，在具体的实施中，还有很多技术、知识和误区，需要普及。

投票很简单——选举误区一

一人一票改变中国，这是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很多人认为只要政策放开，选举其实很简单，就是选民一人一票——投票，票多者获胜。

但是选举不仅是理念，还是个复杂的技术活，从选区的划分、选民的登记确认、选举的规则、选票的设计、填写选票的培训、投票的程序、秘密写票处的设置、选票的统计、结果的确认、争议的处理，等等，每一个环节都不是仅有理念那么简单。

以我对 2011 年北京区县人大代表的选举观察为例，所在的海淀

区紫竹院街道第十选区，在 8000 多张选票中，出现了 400 多张废票，占 5% 以上，超出了统计学上能接受的程度，而且问题基本上都出在“另选他人”一栏里。原因何在？

该选区只有一个正式代表名额，根据规则从两个指定候选人中选一个。同时，事实上又出现了吴青和乔木两个自荐参选人，即独立候选人，谋求以合法合规合理的另选他人的形式当选。选举组织者出于保密或其他考虑，事先没有展示任何选票样子。除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投好庄严一票”的宏大宣传外，也没有具体的投票介绍和培训。

投票日在现场领到选票一看，就感觉到会有不少废票。因为另选他人一栏在两个候选人名字栏之下，所以就和上面一样留了两个空。本来只能另选一个，就应该留一个空（或把两个空改为一个空，或把另外一个空涂黑）。但是由于留了两个空，之前又没有任何关于选举知识和选票填写的培训，很多人不知道只有一个名额，或如何填写，就把两个另选他人的空都填上了，结果却是废票。

另外一个选民更多的人民大学选区的选票，另选他人应该不超过两个，却留了三个空，结果也出现许多废票。选票的设计和关于选举的培训非常重要，它让没意愿的人，有意愿投票；有意愿投票的人，投出有效票。

我在现场观察 2012 年美国的选举时，一般人认为就是奥巴马和罗姆尼之间的二选一。其实真正的选票八开纸一大张，问题之复杂、选项之多远超出想象。因此对于认知程度不一的选民，必须要有专门的选举培训。

在美考察选举期间，我参观了政府、党派、非政府组织等针对妇女、移民的选举培训机构。这些常设的机构，不光只培训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在美国这样选举常态化的国家，它们还培训中期的国会选举、地方的各种选举。

考察埃及的首次总统大选时，埃及由于文盲率高，全国平均约

40%，女性高达 47%。

如何方便不识字的人投票，选票设计需要简单易懂。13 个候选人的头像、图标（logo）、阿拉伯语名字，按申请参选日期排列。选民不需要填涂、打孔、写字，只需要在某个对应的候选人前面的空栏里画个勾就可以。

阿拉伯语的全名又长又难记，头像又容易混淆，所以每个人的图标就很有意义。

有金字塔、太阳、摄像机、梯子、斧子、大树、手表、天平、小汽车、雄鹰、骏马、雨伞、五星等，既反映了各自的政策主张，又清晰易辨。

其实投票说简单也简单，只要真心想搞选举，难道会比奥运会、世博会、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青藏铁路、飞船上天更难吗？或者不可以像搞经济特区一样试点吗？

中国人素质差——选举误区二

提起选举，除了说中国人多，就会说素质不行。难道我们比台南的农民、缅甸的山民、埃及的文盲更差吗？人家为什么能民主选举？欧美 200 多年前开始选举的时候，大陆在民国选举的时候，难道比我们现在的素质更高吗？

就算素质不高，才更需要精英去设计、去引导、带头去做。可是做了吗？恐怕连设计、培训，甚至公开的讨论都没有。

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耳濡目染海外选举的报道，对大陆基层选举或多或少的接触了解，中国人对选举并不陌生。以我在多地的实地调研，特别是近距离观察 2011 年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国的选民并不是想象中的素质不高。

当真正拥有选举权利的时候，他们完全明白选票意味着什么，该选什么样的人，希望他们做什么事，如何才能保证选举的公正。反而是一些精英、专家、官员，要么对选举没有感性的认识、和选

民没有亲身的接触，要么出于某种目的，一厢情愿地认为民智未开、时机不成熟、“理论准备不足”等。

关于选民素质，最受诟病的就是村委会选举中出现的贿选现象。其实这是选举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选举本身的问题。因为比起暴力夺权和世袭指定，贿选至少也表明对选举这种文明方式的认可，只是违反了最重要的公平公正的原则，可以通过程序监督、争议处理、结果确认等措施来防范纠正。

另外，贿选是全国性的问题，还是地区性的问题？在那些没有资源和土地可出卖的村委会是否也有贿选？未来行政官员选举扩大到乡长、县长以上，如果有人大监督、媒体监督、司法监督，还会有贿选？如果这些监督真正发挥作用，当选的官员能否权力寻租、贪赃枉法？

民众的认知能力也许存在地区、职业和身份的差异，但就像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可以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美国的选民范围也是逐步扩大的。

如果说普通群众素质不高，相比而言，共产党员的素质“较高”，可以先在九千多万党员内部实现民主，开展直选或竞争性选举。

当年对外开放是从沿海 14 个城市、经济改革从 4 个特区开始，逐步向全国辐射。

现在选举能否也像深圳或乌坎一样，搞一些试点特区。让一部分“素质高”的先行选举，逐步带动“素质低”的，而不是借口“素质低”，总也不搞选举。

其实，从衡阳市人大代表间接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的全面贿选丑闻来看，违规、贿选、犯罪不是发生在所谓素质不高的农民或草根百姓身上，而是全部发生在行贿的几百名官员、企业家、名流身上；受贿、索贿的也全部是几十名组织任命的党政干部、各级领导，其中最大的领导市委书记童名谦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刑。

这些人的“素质”不能说不高，特别是行贿者已是市人大代表，具有共产党所认可的政治素质；受贿者都是党政干部，更是直接由党培养和指挥，怎么会出现如此触目惊心、见怪不怪的丑闻？

而且这个事根本不是贿选。贿选最起码直接投票的普通选民能获利，而类似衡阳的事，只不过是权贵关起门来分赃的闹剧。间接选举，剥夺了所有选民的权利，便于暗箱操作。候选人产生要经党的同意和资本的影响，选举过程直接就是金钱比拚和明码交易，选举结果要党的核准确认。这种闹剧，和许多因素有关，就是和素质无关。

因此，所谓民众素质低，只是某些人不想选举的借口，而非不能选举的原因。

中国人太多——选举误区三

成龙曾公开说：“中国人太多了，就该被管起来，搞民主就会乱”。这种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人口问题一直是一道绕不开的坎，它不仅误导着人们对选举的认识，而且什么都归咎于人多这种观念，也影响着其他如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社会福利的解决，尽管中国早已是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有钱、花钱最不受节制的政府。

中国人真多吗？人多就不能搞选举吗？人多难道不是优势吗？

就领土和人口密度来说，和世界上许多开展选举的国家、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英、法、德等相比，中国的人口一点也不多。即使人口总量大，年龄符合选举规定的选民数量并不是一样地多，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区划，从家庭到单位的生活工作，存在有效的户籍登记和行政管理办法。

在此基础上，这么多年来五年一次，完成了形式上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可见人多照样可以搞选举。那么为什么不把现在基层人大代表的直选，向更高层次的省市一级代表直选推进呢？为什么不

把行政领导中村长（村主任）的直选，向乡长、县长（区长）、市长、省长直至主席的直选推进呢？

如果真的想选举，就算人多，也可以像经济特区一样，划出一个市、省搞试点。

台湾 2300 多万人从独裁转向民主的过程当中，政治有变换，但社会很稳定，民生有保障，正是因为选举。韩国 4000 多万人也走过一样的民主之路，选举是关键。

为什么不能像台韩学习呢？

人再多，也不是一窝蜂地涌向京城、省城、县城投票，而是在其常住地按选区登记、投票、统计、汇总。中国政府引以为傲的举国体制，可以办成从政治动员、经济增长到水利工程、体育赛事的任何大事，从来不担心人多，怎么一到选举，人多就成了问题了？

只要有有效的管理，人多一样可以搞选举。而且人多还有很多优势，比如纳税多、国民财富的总量大、提供的就业机会多等。选举在于制度的设计和实践的演练，不在于人数的多少。难道我们过去人口是现在一半的时候，更适合搞选举吗？或者说将来人口再增加了，反而更不适合搞选举吗？那么到底中国人口多少适合大选？是像日本 1 亿人口在 37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呢？还是像印度 10 亿人口在 30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呢？

中国人真的多吗？如果人口减少一半，是不意味着国民的住房面积、财产收入、教育机会比现在增加一倍？或房价下跌一半？难道我们几十年前人口少的时候，比现在的经济、物质和民主条件更好吗？

像选举一样，问题显然不在人口多少，而在于政治认识、制度设计和管理水平，其关键在于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人再少，没有民主，权力一样集中，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而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李肇星：直选难是交通不便——选举误区四

曾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后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2012年3月，他作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因此，一律实行直接选举还有困难”。

中国人口多、素质差，不能开展选举，是常见的借口和认识误区，此前我已予以反驳。而以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作为不能实行直接选举的理由，且出自高层领导之口，就很有意思了。

从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和中国存在相同的情况，为什么这些国家可以直选？2012年我在美国观察总统大选时，天气预报投票日有些地方会遇上飓风的侵扰，选民可通过提前投票等方式予以解决。俄罗斯地跨欧亚，交通更为不便，但民主化后，仍然可以实行直选。

只要还选票于民，激发出民众参政的热情，交通不便根本不是个问题。2012年5月埃及首次总统大选，许多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高温沙漠，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实行历史上的首次民主直选后，许多人骑着毛驴，冒着酷热，赶来投票。不少地方都排着长队等待投票，还有人中暑晕倒。

为了让人们能克服交通、气候的不便，积极投票，埃及在选举设计上，留出整整两天的时间供投票，而且把每天截止的时间，延长到夜里，便于人们在气温下降以后来投票。

中国确实存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但大陆有高效的宣传动员和组织管理体系，这些年来举国办奥运世博、庆祝建党100周年、迎接二十大召开，不都有声有色、安全顺利地进行了吗？而且中国目前形式上有全国性的农村村委会直选、区县人大代表直选，每隔几年

会周期性地进行一次，要是推广到条件更好的城市地区，怎么反而会交通不便呢？

其实交通不便，就像人口多、素质差、时机不成熟、理论不充分等一样，都是关于选举“不为也而非不能也”的借口。见多识广的李外长这么说，与其说是笑话，不如说是谎言，窃国专制、不愿还政于民的政治谎言。

柳传志：一人一票会分了私有财产——选举误区五

极有影响的企业家、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演讲和接受采访时，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了再说，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这么多年，有不少人先富起来，拥有私有财产。但贫富分化、官民矛盾、城乡差别异常突出，社会上“仇富仇官”的思想普遍存在。许多人担心一旦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直选，人口占多数的所谓“无产阶级”“穷人”“暴民”会上台，瓜分“富人”财产。

这种误区的实质是混淆了选举和公投的区别。选举是选出具体的人员，通过他们来制定政策、管理国家。而公投是就具体的政策、决定来表决。选举是经常性、周期性的现象，而公投的使用则很慎重，只针对特别重大的问题来全民公决，比如统一、加盟等。

选举如果是就某项具体的政策投票，比如把富人的财产都分了、把贪官都杀掉，由于“穷人”和“平民”占选民的多数，又普遍存在“仇官仇富”的心态，所以这样的政策很可能就通过了。但关键在于，选举不是投票这些具体的政策，而是选出人。最终选出的往往都是像柳传志这样的“精英”，因为他们有实力、有影响赢得选举，也有经验、有能力制定政策，管理国家。

因此，选举是选人，而不是选政策。柳传志或他的伙伴们选举

上台后，会制定和执行瓜分财产的政策吗？

从各国的普选、直选经验来看，通过选举，没有一个国家会出现柳传志担心的瓜分私有财产的选举结果，反而是通过世袭、指定、革命、政变上台的政权，经常会出现类似的瓜分、兼并、强取豪夺。

尽管局势动荡，但穷人居多的埃及在选举后没有出现分财产的情况。被许多中国人认为是代表富人和大资本家利益的美国选举，候选人关于是否增税、是否提高医疗福利范围、改变移民政策，更是要反复讨论争辩，政府最终的政策尽可能照顾各方的利益，而不仅仅迎合穷人的选票或富人的财富。

正如肯尼迪总统所说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不能拯救穷人，也就不能保护富人。”

所以柳传志们的担心可以休矣。通过选举上台的领导、出台的政策，能够保护私有财产和公民权利。通过其他形式上台的领导，政策往往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柳传志等人的危害在于，由于他们主观的认识错误或是客观的越界陌生，个人对选举的误区，利用他们作为“意见领袖”和社会名人的影响，扩展成为更大范围的误区。

在这个意义上，柳传志、成龙们关于选举大放厥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却想去使别人明白。考虑到社会地位和舆论影响，他们对选举的错误认识，危害远胜于普通民众。

中国不花钱搞选举，没有政治广告——选举误区六

很多人在诟病美国竞选耗费惊人的时候，认为中国式的现有选举不烧钱。一些官员和学者也强调，中国绝不为了选举打政治广告，不搞西方式的金钱民主。

难道中共的二十大不花钱吗？每年的两会不花钱吗？据公开的报道，二十大期间仅北京就动员 160 万安保人员，这个经费来自哪里？另外唱红运动、学习文件、新闻联播、各种政治口号宣传，不

花钱吗？仅最近的报道：《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已发行上千万册，每本定价 18 元，码洋就是上亿元。谁获益？谁购买？花谁的钱？

没有不花钱的政治和选举，问题是花谁的钱？花得是否透明？是否有监管？

由于国情的不同，我们对政治广告比较陌生。但陌生并不表示它们不存在。广义上的政治广告到处都是，街头巷尾的标语口号，报纸电视的宣传纲领。比如全国街头随处可见的“中国梦”之“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广告系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横幅、媒体上吹捧习近平的字幕画面，乃至对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神舟几号的政治化宣传等。

狭义上的竞选广告或更准确地说选举广告、执政广告，也不少见，比如“团结在以谁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党的领导”“热烈庆祝党的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或胜利闭幕）”“学习贯彻领导的讲话或会议精神”，等等。

仅在二十大期间，北京的大街小巷、楼宇桥梁、灯箱展板、旗帜屏幕，充满了各种各样维护执政党统治的广告宣传，既有传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有新推出的“永远跟党走，迈向新辉煌”至于各种和习近平、会议精神有关的广告，就更多了。“祖国江山一片红”，不止北京一地，全国各地都是如此。这些显然要投入数量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

中共维护自己的执政党地位，不断推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等执政理念，为了使其深入人心，并在和其他思想的竞争中获胜，需要不断地宣传推广。

中共周期性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年度中央委员会，各级人大代表直接、间接的选举和相应的政府换届会议，所有这些，从理念的

推广到程序的实施，都需要花钱。

从政治学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树立领导人的形象、宣传执政党的政策、确保执政党的地位，在大众媒体进行的宣传，都属于政治广告范畴，需要花钱。

除了各种户外广告外，这些政治宣传都要通过媒体传播来实现。中国媒体的指导思想，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强调“喉舌论”、“导向轮”“贴近论”，但官办媒体本质上都是党所有、党所管、党所用，因为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不存在需要中共筹资投放广告、购买媒体时间的问题，要么指令性、无偿刊登，要么公共财政转移拨付媒体。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不像美国那样明着花钱竞选，中国一直存在着暗中花钱买官跑官要官。任命制而不是选举制，使得一些人只要买通决定任命的上级官员，就能获得想要的位置。而一些负责人事任命的各级党委书记，更是可以权力寻租，“若要富，动干部”，通过调整变换位置获得下级好处。中共的文件，反过来也证明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例如十八大后的中共中央，再次专门发出文件，禁止党政干部在节假日期间跑官要官。

从更大的层面来看，由于缺乏有效的选举从程序上确认执政的合法性，确保权力的和平更替，以及不能通过选举来监督激励官员，中国每年花在维稳、腐败方面的费用，恐怕超过任何国家的竞选费用。

竞选就是比钱多——选举误区七

以 CCTV 为代表的中国喉舌媒体，在美国大选期间，不厌其烦地报道两党候选人筹到多少款，为了竞选花了多少钱打政治广告；美国这么多多年来的竞选经费一路攀升，投入越来越多，早已背离了民主的实质，成为金钱政治、有钱人的游戏。

以普通民众所受的教育，一般也认为美国选举被垄断资本家、

金融寡头所操控，谁的钱多谁就能获胜，胜者也一定要为有钱人服务。

钱多就一定获胜吗？竞选花谁的钱？这些钱白花了吗？获胜者只为有钱人服务吗？

世界上任何选举都要花钱，没有不花钱的选举，因为选举的动员组织，介绍材料、选票的印制，投票、计票的培训，实施、监督环节涉及的人力、交通、安保、公共传播，都需要花钱，有些是公共财政、国家经费的投入，有些则是候选人、竞选政党的投入。在美国这样选情胶着、竞争激烈的国家，参选各方花的钱更多。

选举一定是要花钱的，但钱多却不一定获胜。难道说美国最有钱的马斯克、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竞选就肯定获胜吗？显然不是。历史上经常有富豪，比如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参选，并没有获胜。

较近的例子，1992年和克林顿、老布什一起竞选的罗斯·佩罗，本身是个亿万富翁，为选举投入巨大，甚至公开承诺获胜任职后，不领任何报酬，但选民并不买他的帐。上一次选举，百亿富豪布隆伯格比拜登、川普更有钱，但连党内提名也未获得，中途退出。

因为选举是选民一人一票投出来的，而不是花钱买来的。假使和对手比钱贿选，也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收买选票，何况美国有严格的规则法律，有对手、媒体、社会的监督，贿选几乎不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演讲、辩论、媒体报道、各种广告，来介绍自己，游说选民，争取他们的选票。其中绝大多数钱就是花在竞选广告上。

那么候选人这些钱都是花谁的呢？肯定不是花纳税人国库的钱，而需要自己及支持的政党、团队筹集，一般都是接受捐款。公司、机构单笔会捐的多，但众多个人的小额捐款加起来的总量也不少。奥巴马的竞选经费多数就来自个人的小额捐款。至于钱的来

源、数额、花费、公示，美国有专门的制度和规则在监管。出现问题，设法解决，弥补漏洞，保证选举程序的公正透明。

美国的竞选，虽然候选人不是“公款消费”，但耗资惊人，且不断攀升。然而这些钱并不白花，对胜败双方、社会各界都是如此。因为这些钱取之于社会，用之于公共。一方面花钱搞巡回演讲、交流互动、政治广告，既是介绍自己、争取选民，也是选民参与政治、比较监督、了解候选人及政策必不可少的方式，这种钱花得值。

另一方面，各种周期性、常态化的选举带动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专业团队的就业、竞选产品的生产、媒体广告的设计制作投放、竞选活动涉及到的交通、场地、庆典、餐饮、住宿、安保、服务等等，一方的消费，带来另外各方的产出和经费的公共流动，社会经济得以发展。

说获胜者只为有钱人、资助他的人服务，显然也站不住脚。奥巴马一连任，就推出针对富人的增税政策，美国近些年来推动的医疗保险主要的受益者是贫困人口。事实上美国的选举从各州到联邦、从行政长官到各级议员，各个阶层、不同的身份都能在选举中找到代表。最终政策的制定、实施，要经过各方充分的辩论，尽可能平衡公正。

武断地说选举就是金钱，不仅是对这种最重要的民主形式的诋毁，也是对美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的污蔑。

我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实地观察时，看到许多拉美裔的底层移民，甚至英语都讲不好，都积极投票，希望选出代表自己的总统和议员。在投票结果揭晓前的当地集会上，亲历了一个个普通人围着大屏幕，随着总统和议员候选人选票起伏变化的喜怒哀乐。看到一个体型、相貌、穿着再平常不过的众议员，等待他第4次竞选众议院连任的结果。他认识现场的每一个选民，和他们握手、拥抱、亲吻，用带西班牙语口音的英语和他们交谈、接受媒体和我们外国

人的采访。那一晚，在那里，我感受到很多，唯一没有感受到金钱，尽管知道这种集会需要人力、金钱的投入。

选举是要花钱，但是比起通过内战夺权、专制腐败所花的钱来，选举花的钱最少，对整个社会的和平过渡、稳定发展，代价最小。这也是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为什么会抛弃战争、政变、世袭、指定，最终走上选举、宪政之路的原因。

普选需要很长时间——选举误区八

经常听到说，在中国搞选举时机不成熟，扩大选举、搞竞选、实行普选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什么时候机会成熟？选举的设计、准备、试验、实施、完善每个阶段有没有时间表？需要多长时间？其他国家又是怎么样的？

从最早四五百年前的荷英革命，到二百年前美法的人权宣言，再到上个世纪德日的战后民主化，许多国家的选举发展与普选制的确立，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但并不是每个国家实行选举都经历了一样长的时间。

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历史阶段后，民主的吁求在加强，选举的推进在加速，实现的时间在缩短。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最近二十多年来，大批的欧洲转型国家，我们的亚洲近邻韩国蒙古东南亚以及同文同种的台湾，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民主化进程，实行普选制。

当今迅猛发展的全球化，它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一体化，还有政治上的民主化，包括国际政治的民主化，不能有少数几个大国说了算，以及最重要的国内政治的民主化，更多的民众希望政治公正透明，自己能通过选举等形式参与其中。

卫星电视、互联网不仅报道各国的选举，也普及着民主的理念与选举的知识。古老的国家如埃及，很短时间就开始普选，尽管局势动荡，但选举的理念和方式仍是最终出路；新独立的国家要通过选举立于世界；长期独裁战乱的伊拉克、阿富汗，要通过选举稳

定局势；长期军人专政的缅甸也要通过选举还政于民。

谈到时间问题，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开始选举的时候，时机也是不成熟的，也是在实行的过程中，一点点改进扩大的。美国尽管现在有最著名的选举，但两百年来也是在边设计、边实践、边改进中形成的。开始只有男性白人有选举权，后来才逐渐扩大到黑人、女性。后来像奥巴马这样的黑人总统、哈里斯这样的女副总统，也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出现的。而且美国的选举同样存在问题。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时机完全成熟了才选举的，已经实行选举的国家，仍需要时间加以完善。

各国社会并不是均衡匀速发展的，在物质的积累、观念的普及、制度的设计和技术的助推下，既有连续继承，也有借鉴、赶超和跨越。如果借口时机不成熟，经济发展需要时间，中国就不可能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增长，走完西方三百年的经济发展之路，从经济落后国家跃居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位置。

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的积累还需要时间上的循序渐进，但观念的更新、普及以及行动转化其实更快。特别是在“环球同此凉热”的今天，民主和选举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当媒体不断在报道讨论各国的选举时，当国民早已上网、上岸，决策者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普选时机不成熟，只能是不愿实践的苍白借口。

选出个陈水扁怎么办——选举误区九

常听人说，选举那么好，不是还选出了陈水扁这样的贪腐领导吗？要是搞选举，没有王立军事件，薄熙来这样善于利用媒体造势的大众明星也很可能执掌大权？

当年希特勒不也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吗？

确实，再好的选举理念，也不能打消那些糟糕的现实案例带给人们的疑虑。不只是台湾，菲律宾、泰国都选出过贪腐领导。印度的选举也没有消除严重的官员腐败。即使是选举制度成熟的欧美国

家，也不断爆出当选领导的丑闻。

其实这是选举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选举制度本身的问题。选举从理念到落实，是需要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具体实施、监督纠正，不断发展完善的。

除了选举或竞选时的一整套规则外，如公开公正、经费筹集和使用的透明，不能贿选，不得武力胁迫，容许选民、对手、媒体监督，有举报处理机制，接受仲裁和判决，承认选举结果外，更主要的是还要有当选后的制度设计与实施。

比如行政领导的任期制，对连任的限制、弹劾制，常态的立法和司法的制衡，其他党派、独立媒体的监督，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军队的中立，等等。选举或竞选只是整个民主政治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而不是全部。

陈水扁等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但民主政治可以使他们的问题在台上就能被暴露，进行独立的调查，要么启动弹劾程序，要么在被罢免或卸任后进入司法程序，予以审判。陈水扁的上台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他的下狱同样也是民主政治的胜利。

选举虽然不能保证最优秀、最称职的人当选并使其始终保持称职，但选举制度和民主政治，可以纠错，可以重新选择、逐渐完善，避免一错到底、大权独揽、终生执政、世袭或指定继承的荒谬。

从现实的统计来看，没有选举制约和民主政治的国家，其领导和官员独裁、贪腐的可能、比例一定是大大高于民主选举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最终都走向了民主选举的道路，即使是极权专制的国家，也需要借助民主的幌子、走选举的形式。

想想看，连金家世袭领导的国家都要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形式上的选举，更不用说其他大大小小的专制国家，都要用名义上的选举遮人耳目。

不管叫什么国名，信奉什么主义，有什么特色的理论和代表大

会制，只要不是一人一票的普选，不是选民有选择的竞争性选举，没有配套的司法独立仲裁和媒体监督，没有军队的中立，就一定不能走出几千年王朝更替的兴衰。

没有选择，人民就始终在明君、暴君、仁君、昏君、贪君的治下循环，国家永远在新政、腐败、中兴、衰亡、政权重建、再亡的周期中踏步。

结语

看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在“解严”之前，地方行政长官、民意代表，一直有非国民党的独立人士参选、当选，其中一些人成为后来党外活动的骨干成员。当党禁报禁开放，普选到来的时候，前期独立人士的选举和经验、选民培训、社会动员，就成为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不仅有国民党的李登辉、从国民党分出来的宋楚瑜，还有新组建的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及后期的独立人士柯文哲。随着政党的分化，还会有不同的党派和无党派独立人士。

民主需要启蒙，更需要训练。在中国实现民主普选前，利用法律和区县代表直选的形式，将民主的理念，落实到选举知识的普及、选民的动员和代议制骨干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区县代表的选举是非暴力的，独立候选、不受摆布，不做中共各级政府的传声筒和表决器，又是不合作的。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选举训练和模式，可以复制和推广，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做准备。真有一天中国变化的时候，不是时机成熟了没有，而是有没有人，做好了准备没有？

因此当下的中国，比起武装斗争的不可能、罢工罢市的难操作、游行示威和组党结社的风险，利用法律和形式，从参与独立竞选区县人大代表开始，由点到面，人数增加，全国开花，既是可行的实践，也是民主的演练和准备。

三等奖

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略

作者：关山夺路

目录

前言：趁势乘便，拥抱即将发生的大动荡

一、最好的转型路径

二、行动路线图

三、行动领袖

四、社会运动的依靠力量

五、点火者、狂热者和行动者

六、目标和策略：从发动到持续

七、安全和自我保护

结束语

前言：趁势乘便，拥抱即将到来的大动荡

没有人可以凭空制造出一个社会运动来，所有的英雄都是趁势而起，顺势而为，在机缘凑合、风云际会中成就一番伟业。非暴力不合作行动也需要在条件成熟时才可能发动并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从而引发社会转型。幸运的是，当下的中国，这些条件都已经成熟，一场由房地产暴雷、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正在爆发，它将蔓延并引发信用危机、社会危机从而导致统治危机，中国社会已经为这些危机的总爆发储备了充足的怒气和民怨，共产党

长期以来的高压维稳特别是习近平近十多年的倒行逆施，筹备了数以亿万计的心怀不满者群体——每年上千万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因经济下滑失去工作的曾经光鲜亮丽的千百万破产白领，因房地产暴雷、金融暴雷而一夜之间沦为赤贫、无家可归的城市中产阶级，统计数据表明，白领失业者已经达到了可怕的 20%。这是社会危机总爆发的一条红线。踏过这条红线，一个社会就将陷入大动乱中。

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表明：不是所有的穷人都心怀不平，只有新近才陷入贫困的人，美好生活的记忆还在像火焰般在他们的血液里燃烧，他们才会积极拥抱革命或者巨变。

习共的愚蠢和蛮横更是在政治上制造了具有钢铁意志、英勇无畏勇气和胆略的反对派领袖，以及一大批忠诚无私、勇于牺牲的群体运动骨干。他们是社会运动的灵魂和核心领导力量。

危机的总爆发需要一些突破口，那就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且每日都在发生的群体事件。

失业白领无钱供房、无钱应付居高不下的父母养老和子女读书的费用，他们将是社会动荡的主要推动者。

据统计，这种人数在上百人乃至上万人参加的群体事件每年都会爆发十几万起甚至几十万起，而每一起群体事件都可以演变成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有志于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成就民主革命宏图大业，实现祖国宪政转型的仁人志士们，现在正是你们把失意者的积怨大声说出来，把各种分散的力量汇集起来，把群体事件演变为社会运动进而大显身手的最好时机！

一、最好的转型路径

为什么要强调非暴力不合作呢？著名民运理论家胡平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引用捷克总统哈维尔的一句话来回答：因为我们没有枪。

面对共产党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暴力机器，手无寸铁的人民搞暴力革命，无疑是以卵击石，非暴力不合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让中国人（除了权贵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占人数不到全国人民的百分之一）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国必须进行转型，而转型的目标是一个实行宪政民主的新国家。由于六四血案，由共产党官僚集团推动社会转型的奢望已经破产，转型的最佳路径是由民间推动，自下而上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来达成。且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有道德道义优势，因其行动是和平的，不威胁公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增强其影响力。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符合国际社会公认的价值观，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从而降低当局暴力镇压的风险，保护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和自由。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通常采用持续的行动，抵制和不合作来推动变革，从而使运动更持久，增加了变革的成功概率。最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还可以促进对话，为变革提供机会。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所以强调非暴力，是因为这种策略在道德、战略和政治层面都有明显的优势，可以帮助运动取得更大的成功和持久的变革。

中国近些年的社会运动领袖，从刘晓波、高智晟、郭飞雄到最近入狱的许志永等，都强调非暴力不合作，高举这面大旗，从而在国际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也仍然要坚持这条路线，因为这是最好的转型路径。

二、路线图：事件、行动、运动、革命、转型

群体事件：

群体事件，大陆官方学者把它界定为在公共空间中上演的集体性对抗行动。如暴力对抗社会控制机构、围堵建筑物、阻拦交通等。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能教授把群体事件分外七种类型，分别是：

1、直接利益相关的原生型集体维权抗争；2、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泄愤事件；3、地方政治生态恶化诱致的突发群体性事件；4、行业集体行动和工业集体行动；5、工具性处理“死亡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6、意识形态或政治动机驱动的群体性事件；7、网络场域中内生的群体性事件。

虽然所有的群体事件对社会转型促进者而言，都有利用价值，但第2类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泄愤事件就比第1类直接利益相关的原生型集体维权抗争更有利用价值，也更能转化成更大规模的社会风潮。

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泄愤事件，是指在原生型怨恨缺失的情形下，仅仅由于一个简单的导火索事件，而引起围观者或其他非组织化的离散个体，集体地向特定或不特定对象实施语言暴力、肢体暴力，或实行纵火、打砸抢等恶性暴力行为。

典型的案例是2004年的重庆万州事件。在该案例中，不需要核实引发公愤的当事人的身份，只要他自称是公务员，就能招致围观群众的公愤和现场社会干预。这表明中国基层社会中官民之间的长期情绪对立和利益冲突，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

针对经济权势者的群体泄愤事件这一亚型涉及到了中国社会中另一种普遍蔓延的一般化怨恨情绪，即贫富之间因相对剥夺、原罪推定和社会区隔等多重原因而建构起来的对抗性情绪。针对经济权势者的亚型，案例是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在该案例中，外地牌照高档汽车所昭示的外地富豪背景，结合着“打死一个最多三十万”的黑色暴力威胁，加上当地警方未能及时有效处置，导致原先还有一定耐心的安徽池州民众最终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最终走上了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常规归宿——打砸抢活动。

刘能教授的这个分类虽然是基于维稳的功能性考虑所做的分类，但对我们如何将群体事件加以利用并引导成为社会运动，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另外，第 3 类地方政治生态恶化诱致的突发群体性事件；第 6 类，意识形态或政治动机驱动的群体性事件。显然比其它几个分类对促进事件向社会运动转型，从而形成大规模社会风潮更有价值和意义。例如 2022 年发生在北京的彭载舟四通桥抗议、谴责习近平事件。由新疆疫情封控引起火灾而引发的全国性大学生高举白纸事件等，其政治价值和影响更为深远。这两起事件若加以引导，会掀起巨大的社会浪潮。对习近平集团专制统治的打击也会更大。

群体行动

由自发的群体事件转化为自为的群体行动，是不合作运动至为关键的一步。需要行动者的主动介入和积极引导。2005 年广州番禺太石村罢免事件，由于维权律师、学者的参与，拨正了维权的方向，使一个小村庄的村长罢免事件发展成为广大农民争取民主权利的维权运动，一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运动最终失败，但却开启了群体事件向民主政治运动转型的一个良好开端，功不可没。

根据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则，群体行动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如示威抗议、罢工、集会、请愿、上访等等。目标包括争取社会、经济、政治变革，捍卫权利和利益，表达对某一行为或政策的不满，或者追求一种社会或文化的变革等等。这些行动通常涉及到组织、沟通、策划和执行，以确保群众的声音得到传达，并且能够引起关注和改变。

社会运动

这里讲的社会运动本质是就是民主运动，它是一种追求政治自由、民主制度和政府责任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的参与者通常倡导公民权利、政治参与、言论自由、选举制度等民主价值观。民主运动的核心目标是促使政府采取措施，以确保政治决策更加透明、公

平和负责，并增强公民的政治权力。

当群体行动发展到社会运动的这个阶段，必须鲜明地打出民主运动的旗帜，向当局和全社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不可再遮遮掩掩，更不能半途收兵。

在这一阶段，要吸收不同群体的广泛参与。包括知识分子，民主活动家，维权者，宗教人士和民族主义者和各种社会组织，形成一个广泛的同盟。要充分地利用互联网来传播消息，组织活动，并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要明确提出政治改革主张，包括选举制度改革、官员财产公开、言论自由的保障、历史上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等等。要呼吁争取更大程度的政治自由度和政府透明度。

要坚决抗议、反对和抵制对政治反对派的监控、逮捕和非法审判，要呼吁落实宪法权利，实现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争取选举权利。要争取出版自由。废黜任何形式的言论审查，呼吁废黜四项原则，实现军队国家化，要求共产党退出国家机关和军队，用党费自给自足。不得继续寄生于国家的肌体之内。

社会革命

中国社会革命的目的是要终结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改变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以实现更公平、更平等、更自由、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秩序。

中国的社会革命由民主运动而引发，却需要多种因素来驱动，这些因素包括政治昏暗、社会不平等、经济危机和社会变革等，这些因素耗尽了人民的耐心，旧制度的崩溃就成了符合逻辑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社会革命是复杂的多样化的繁复曲折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的社会革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众多因素的相互激荡，相互作用。包括政府的反应、社会运动的策略，国际环境等等。通常伴随着风险和不稳定因素，需要长期的努力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付出惨烈的牺牲才会最终完成。

宪政转型

中国群体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宪政转型。未来中国宪政体制的蓝图有赖革命的领袖、广大的参与者和全体人民共同描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三、行动领袖

精神领袖刘晓波

刘晓波先生被认为是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重要代表、先驱和精神领袖，他一直倡导和平抗议和非暴力手段，坚信通过对话、对抗、呼吁和公开陈述可以实现政治改革和民主。他还是《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该宪章于 2008 年发布，呼吁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宪政和法治，特别强调非暴力和平手段来实现政治改革和人权保障。

刘晓波先生因他的政治活动和言论，长期被中国政府监控、骚扰，多次被逮捕、关押，但他依然坚守非暴力不合作原则，表现了极大的坚韧和毅力。2008 年 10 月，他最后一次被抓捕并随后判刑 11 年，并于 2017 年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刘晓波先生因对言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长期奋斗，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并于 2010 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个因言论和政治活动获得这一奖项的中国公民。他的言论和行动激发了海内外广大的支持者，他的思想和精神成为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象征，启发和鼓励了更多的人参与到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努力中。

维权领袖高智晟、郭飞雄和许志永

从 2003 年开始，中国涌现出许多维权领袖，其中以维权律师高智晟、人权活动家郭飞雄（原名杨茂东）和许志永为最杰出代表。

高智晟律师从个案维权出发，从法律维权发展到政治维权，公

开为法轮功、地下教会等受到中共打压的宗教团体发声呼吁；曾被长期关押，非法绑架而下落不明，生死不知。

郭飞雄积极介入太石村民选举、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人之一，曾因维权行动、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开而多次被中国当局逮捕关押，2022年更因要求赴美探望重病中的妻子而被罗织罪名判刑8年。

许志永是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标志性人物，中国著名青年法学家、宪政学者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北京市海淀区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倡导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国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并惩治腐败。2014年1月被判刑4年，2023年4月，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

这三位中国大陆的社会活动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坚持非暴力不合作原则，投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把群体事件导入维权运动，再发展为人权活动，民主运动，他们是推动社会运动的杰出领袖，他们的维权行动和人权活动的经验教训都是未来中国社会运动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社会运动领袖所应具备的素质

一个社会运动的领袖需要钢铁般的意志、胆气和愿景，他应该能够协调和动员运动中出现的种种立场和力量，他能将参与运动的失意者内心的积怨大声说出来并加以合理化；他能描绘一个令人无限向往的未来，让他的追随者相信，牺牲暂时的利益以换取未来的光明是值得的；他可以通过制造众人瞩目的事件来促进团结行动，培植自我牺牲精神。

他能唤起人民对群体的热忱，而甘愿牺牲小我。这是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被誉为码头哲学家的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1902-1983）在他的名著《真正的信徒——关于群众运动的本质思

考》（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中，对社会运动领袖素质的概括。

霍弗认为，一个合格的运动领袖应该具有广泛的才能，包括：非凡的胆略；钢铁般的意志；强大的自信力和自我期许；仇恨、蔑视现行秩序；懂得利用人性的弱点；酷爱壮观的场面和典礼仪式；凝聚和维持个人魅力的非凡能力；获得忠诚和维持权威的手段和策略；善于权衡利弊、不羡慕虚名的优秀品质等等。

具体说来，社会运动的领袖在行动上务实派和现实主义者，但言辞上又像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应该有一群死忠粉，他们对领袖的信任可能达到盲从的程度。

四、社会运动的依靠力量

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一个国家最不活跃的人群为占大多数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在城市工作和在乡间务农的正派老百姓，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受分居社会光谱两头的少数人——最优秀的人和最低劣的人所左右。

社会中最优秀的个人——不管是活跃于政界、文学界、科学界还是工商界，固然是国家的重要形塑者，然而，站在社会另一端的个人、包括失败者、流浪者、罪犯，任何不能在高尚人群中立足或从未厕身其间的人，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角色。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中间阶层的大多数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

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的社会运动的先锋应该依靠底层民众，那些被遗弃和被排斥的低端人口，往往是决定一个运动未来的基石。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 and 现实都已经败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随时准备把这两者都加以抛弃。而中间阶层则会瞻前顾后。

例如：许志永先生在北京搞的教育平权，一开始依靠的是底层百姓，后来有中间阶层加入进来，并且逐渐取得了主导权，最终正

是这些人跟政府达成妥协，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换取自己的孩子参加本地高考。这是个深刻的教训。这也是许志永始料不及的。

五、点火者、狂热者和行动者

群体运动的领袖和骨干群体分为点火者、狂热者和行动者三类。这三类人最好分别由各有特长的人来担任，不宜由一个人或一群人担任三个阶段的群体运动领袖。

点火者

群体运动的点火者通常由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担任，他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动摇既有体制，削弱当权者的威信。

一个体制的名誉扫地是由公共知识分子积极促成的。动摇既有体制的权威和让群众产生求变之念的工作，由公认的雄辩家和作家充任的。在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方，行动者难以接触群众，甚至难以使群众听他们说话。但群众对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态度却截然不同。群众愿意倾听他们的话，当局不是懒得理睬，就是会采取温和的态度加以对付。正因为如此，公共知识分子会在不知不觉中动摇既有体制，削弱当权者的威信。

一段时间里中国网络出现的公共知识分子，如贺卫方、秦晖、艾晓明等等，他们对一代知识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是巨大的，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和威胁是致命的。他们已经为群众运动的爆发布置好了舞台。

历史上的社会运动，通常需要三种人来参与和领导，分别是点火者、狂热者和务实的行动人。甘地一开始是点火者，日后成了卓越的领导者和天才的将军。默罕默德开始也只是个点火者，后来却成为死硬的狂热者。能为一个社会运动做好铺路工作的，都是那些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但一个群众运动要能实际诞生和茁壮成长，必须借助狂热者的气质和才干，最后可以让社会运动获得巩固

的，大半靠务实的行动人。

狂热者

如果狂热者是鱼，混乱就是水。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也只有狂热者才能使一个群众运动孵化成形。没有狂热者，煽动家所激起的不满情绪将不会有方向感，只能漫无目的地宣泄。很容易就可以镇压下去。

没有狂热者的领导，大概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行动者

一个群众运动一般都是由点火人为前驱，由狂热者推动，再由行动人加以巩固。如果这三种角色由不同的人连接担任，会有好处，而一个群众运动要想长久存在，非如此不可。但一个群众运动从一开始到成熟都有一批人或一个人领导，往往不会有好结果。

六、目标和策略：从发起到持续的秘诀

群体运动的领袖通常使用各种手段来煽动和激励群体行动，这些方法可以包括如下方面：

1、情感激发，即使用激情言辞和强烈的情绪来引导群众的情感，使其愤怒、兴奋或团结。

例如：在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现场，要有口才好的领袖勇敢地站出来发表演讲，揭露事件真相，披露事件背后的黑幕，点燃群众的愤怒情绪。

2、建立共鸣：演讲的领袖要建立起于群体的共鸣，通过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来使群体成员感到自己与领袖与整个群体都有紧密的联系，是一个整体。

3、精心设计符号、旗帜和象征：用这些象征性物品来代表群体的身份和目标，以增强群体的认同感。

4、希望和愿景：群体领袖应该对群体提出一个明确的愿景和目标，以激发群体成员的信心和希望，让他们相信可以实现这些目标。

6、制造危机感：必要的时候领袖会强调一种紧急感，使群体成员相信只有采取行动才能应对某种危机或挑战。

7、制造集体认同，通过强调群体的独特性或特殊性，使群体成员感到自己是特别的一部分。

8、社交影响：利用社交影响来激发群体行动，例如强调其他成员已经参加了的事实，来诱导更多的人参加。

9、利用媒体和传播渠道：利用这些管道特别是互联网新媒体，来传达他们的信息和呼吁，以扩大影响。

七、安全和自我保护措施

在中国从事非暴力不合作行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首先是如何应对秘密警察的破坏和镇压。

秘密警察对群体事件、群体行动的破坏中国政府的秘密警察系统对群体事件和群体行动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秘密警察通常包括公安机关的政治保卫局（一局）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对内防保侦查局（九局）、对外防保侦察局（十局）和社会调查局（十二局），在新疆一些地方，反恐局（十八局）也会参与进来，这些手段通常包括：

1、监视和跟踪

它们会对维权领袖、群体事件的领袖实行严密的监视、跟踪、网络监控和电话监听，以了解他们的交流信息和活动情况。通常情况下国安系统会躲在背后，但他们的监控手段更精密，公安系统的秘密警察会直接出面实行监视甚至软禁或者强迫“旅游”。

2、突击搜查和秘密逮捕

秘密警察可能会在他们认为局势紧急的情况下，对群体行动的流行进行非法绑架、突击搜查和秘密逮捕，以打击群体行动。一九八九年六四血案发生前几天，国家安全系统和公安系统都曾经秘密逮捕、非法绑架了几个重要的记者和民运人士，如高瑜、何维凌等人。

2012 年前后维权运动高涨的时期，中国的秘密警察也曾经非法绑架过维权律师高智晟、滕彪、异议作家余杰以及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等人，2018 年他们又绑架了孙文广教授。高智晟、孙文广至今生死不明。

3、威胁和恐吓：

秘密警察可能会通过威胁、恐吓或者滥用职权来迫使群体运动的领袖和骨干妥协、放弃行动甚至闭嘴。他们除了对本人进行威胁，更常见的是对其家人和亲戚、朋友，特别是有公职的亲朋好友进行威胁、恐吓或者收买，让对方彻底陷入亲情的羁绊中。

4、信息战：

秘密警察有时候会利用他们掌握的信息，或者故意散布虚假信息，破坏领袖和支持者之间的信任和团结。

5、渗透、离间和策反：

在大型群体运动爆发之际，秘密警察会集中力量对运动领袖和骨干群体进行渗透，在领袖群体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一方面是为了获取情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分化、瓦解运动的领导力。他们还会在领袖和骨干成员之间进行挑拨离间，打击他们最害怕的领袖人物，他们也会策反意志不坚定者，让群体领袖们互相猜忌、内斗不已，从而达到瓦解运动的目的。

6、滥用法律：

秘密警察很多时候会践踏法律，滥用司法程序对付维权者和群体行动的领袖。例如：非法羁押、非法搜查、非法绑架，用虚构的事实和罪名进行司法迫害等等。

如何应对

面对秘密警察对运动的威胁，群体运动的领袖和骨干成员处于劣势地位，能采用的应对策略不多，主要有如下几项：

1、提升安全意识

运动的领袖需要意志坚定、思维缜密、谨言慎行，要时刻牢记你的一言一行都在当局的监控之中。想好一旦被捕，如何解释自己的言行。

2、信息隔离

一旦成为群体运动的领袖，一定要切断同家人、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系，拒绝任何劝说者和亲情绑架。群体领袖至少要有三部以上电话，重要的行动和内容不要在电话上说，要设置暗语，对通讯活动进行加密，并不时更新加密措施。

3、制定预案

要提前制定预案，包括：1）、紧急情况下的证据销毁；2）、切断核心成员间的联络；3）、逃生措施；4）、被捕后的法律救济。要提前准备好律师委托协议和自己签名的委托书，放在可靠的律师朋友手中。一旦被捕，法律救助可以立即启动。

4、保持冷静

发现被监控、跟踪、或者面对威胁的时候，保持沉着冷静，不

要做出剧烈反应，更不要惊慌、愤怒、轻率回应，而要冷静面对，按照提前做好的预案做出反应。

5、设计好国际救助通道

如果情况变得非常危险，要有一个逃生计划，包括准备好必要的文件、联系方式和资源。六四之后许多知名人士和学生都靠提前设计的逃生计划，逃离生天，避免被捕。

6、国际关注

一旦被捕，要设法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通过联系国际人权组织、媒体和外交部门等渠道，将案情公布于众。

7、保持沉默

在被逮捕期间，要坚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被羁押期间签署任何文件或者承认任何虚假的罪名，如果能做到的话，最好保持沉默。一般情况下，如果能坚持 37 天不开口说话，秘密警察拿不到口供，就会变更强制措施。

8、坚信自我

不要据理力争，不要辩解，不要相信秘密警察的任何承诺和引诱，在见不到律师时刻，只有你自己能够救自己。而救自己最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金口不开。曾经有一个法官出身的维权领袖，被捕之后，保持沉默一个月，后来当局加大了压力，他咬断了自己的舌尖，迫使当局不得不将他释放。当然，笔者并不主张用自残的方法应对刑讯，但这个案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结束语

西汉的时候，汉武帝有个哥哥叫刘德，被封为河间王，特别喜欢读书，儒家经典更是闭目成诵，有一次去见汉武帝，跟皇帝讨论

起儒家经典来，滔滔不绝，问一答十。结果汉武帝阴森森地说了句：“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意思是：商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夺取了天下，河间这个地方比商汤、周文王的地盘大多了，河间王你努力吧。

这当然是武帝忌惮河间王研读儒家经典、有争天下的野心而发出的警告，但道理是不错的。商汤、文王能取得天下，河间王也能！

如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备，民主志士也能大显身手！

就在刚刚，继恒大暴雷才刚刚过了一个月，比恒大负债超过 4 倍的碧桂园也出现了债务违约，开始暴雷了。据了解，碧桂园暴雷的后果将会是恒大的 40 倍！

大面积的房地产暴雷会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又会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危机的总爆发，有志于社会大动荡中挺身而出，将社会危机转向社会革命的仁人志士们，乘势而起、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大家努力吧！

你们在这场社会危机中失去的只有匮乏、贫困、奴役和锁链，你们得到的将是一个彪炳史册的未来和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附录一、参考书目

- 1、《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王天成著
- 2、《僵局、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张博树主编
- 3、《数人头胜过砍人头》胡平著
- 4、《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著
- 5、《我没有敌人》刘晓波著
- 6、《2017，起来中国》高智晟著
- 7、《盲眼律师》陈光诚著
- 8、《许志永文集》许志永著

9、《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原题《Psychologies' Foules》，法国社会学家古拉斯夫·勒庞（Gustave LeBon）著。

10、《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原题《The true believer—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著。

附录二

能够提供帮助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运动领袖应该提前了解下列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的情况，并根据各自的情况与它们建立日常联系，一旦被捕，这些组织可以发出国际声援：

1、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国际特赦组织通过倡导、抗议和宣传来支持世界各地的人权，包括中国。

2、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人权观察是一个国际性组织，致力于监测和报告全球各地的人权侵犯，包括中国。

3、潘基文人权基金会(BanKi-moon Centre for Global Citizens):该基金会支持世界各地的人权工作，提倡民主和法治。

4、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分支（Amnesty International China）：这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分支，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提供支持。

5、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该组织致力于保护全球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包括中国的记者。

6、国际特赦组织的网络反审查项目（Amnesty International's Digital Verification Corps）：该项目协助调查和验证来自中国的人权侵犯事件。

7、联合国难民署（UNHCR）：联合国难民署提供保护和帮助亚洲地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包括一些中国的异议人士。

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

作者：Stars_Promotion

在接收信息的途中偶然看到该征文行动，由于本身经济条件较差以及一定的责任感驱使，遂尝试构思并策划，也许你们最终不会给予我奖项，那我写这篇文章就当作是自我安慰吧。我将提及的方案将是两种极端，分别能从中共无法管理处下手以及中共无力管理处下手，并分别探讨短期以及长期方案。

一、前期行动准备

该方案将分为多种情况和三个时段，我将从初步开始，对未来进行预测，并制定下一步该做什么事的计划，每个时段将会有多项计划同步进行。对于每一个行动，我都将在介绍实现方式后进行阐述为何如此。行动目标将定为使得中国完全民主化，与之相次的第二目标为使得中国部分民主化，最次的第三目标为使得中国融入世界进程不再闭关锁国。

需要注意的是，若在执行这些行动时，满足我在非暴力不合作中书写的条件，即可直接按照条件行动。以及，我的所有策划皆是基于不希望有人因此受到生命威胁而制定的。

我们需要认清几点：1.现在我们的力量极其薄弱。2.我们的目标是非常难以达成的，所以该计划也可能失败，但是我们必须为了哪怕1%的获胜概率而去拼搏，能看到这份行动策划的各位想必也是这么想的。我也不是什么天才，更不是孙子一类的军事谋划大师，我只是一名渴望公平公正、自由和民主，20年人生受尽封建统治的

折磨，从而觉醒的一名大学生罢了。3.我不可能预料到全部的情况，我不是神人，更不是上帝，我只能大致模糊地推测未来的发展，一切的行动策划与计划始终只是纸上谈兵罢了，我们要灵活变通，只需要大致上遵循即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时段一（约1—3月）：

一. 通过外网统计对中共不满之人（自然觉醒者）的数量

具体实现方式：该行动将遵循以下原则 1.由于中共高强度言论审查，不可留下参与者的信息，只能采用匿名形式。2.为使得统计结果真实有效，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人机识别，建议为一些标志性词汇，如包子等（须以询问形式，不可以识别形式，且须以中文显示）。3.为防止中共通过某些技术如人工恶意刷票，需要在该网页对中共的罪恶进行基本阐述使得前往该网站的人可以了解，以制止中共人工刷票。4.介绍页面（或广告）将尽可能激起人们的正义感，比如列举大饥荒、文革图片等，以使得更多潜在中共不满者参与统计获得真实的数据。5.通过真正爱国博主进行传播，并至少收集一个月以上，以统计真实数值。6.数据在统计时一定要实时更新公布。7.提供岁数等可选信息，收集并记录分析。8.可在一定程度下对显示的人数掺假以激励来到此处的人参与。9.最后通过统计数据 and 后台访问数据综合分析实际人数。

该行动将很大程度影响后续时段计划，我们可以根据该计划获得模糊的目前可执行后续计划人数的数量级信息，以及人员构成。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根据该信息，以组织不同行动。比如，若人数高达一千万，我们完全没必要继续讨论了。直接告诉他们，你们身边每 130 人就有一人自然觉醒，建议他们与亲友交流，唤醒周围的人，然后一齐抗议即可。（自然觉醒者必然是经过思想斗争，或被铁拳迫害过的，这些人是拥有行动力去做这些事情的。）不过，具

体行动将在下时段计划中详细论述（虽然我觉得达到这数量级希望渺茫，从目前 YouTube 以及 X 的华语博主数量来看，约在百万数量级左右。）

二. 通过实名请愿的方式拉动各世界对中共的反感

具体实现方式：该行动将遵循以下原则：1.使用真实的史实，通过简短的文字阐述中共的罪恶，将其对人民的暴力非人道行为展示于世人面前。2.通过网站请愿的人数和一定量的评论同步于行动 1 中的网站，以激励进入行动 1 中的国人统计人数。3.进行一定量的宣传发动，如，在国外且支持中国民主人士组成志愿者进行宣传，以低成本实施计划。4.尽可能地扩大影响力范围，获得輿情支持。5.尽量拍摄广范围的请愿图，展现支持民主的人士是非常多的，并将此同步到行动 1。6.将中共继续统治的危害展露出来，并辅以历史材料，以使得世人警觉。目前中国有着中共的言论封锁，导致就算有很多人支持民主革命，也无法聚集起来以凝聚力量发动革命或者展示民意，并被冠以个别极端份子从而被淹没。行动 1 的主要行动对象在于中国大陆，以在大陆民众中给支持者以声援，告诉他们这是正确的。而行动 2 则在于告诉世界的各国民众，你们不该袖手旁观，现在仅仅是开始，若不辅助中国进行民主改革，世界都将处于巨大的危机当中，你们生活的民主自由是我们不曾拥有的，我们也想像你们一样，歌颂自由，歌颂民主。

现在，我们正为此而努力，请你们帮助我们。

三. 创作属于我们（自由中国）的歌曲，批评中共的歌曲

请具备乐理知识并且支持民主革命的人士进行音乐创作，主题如标题所示，我将分别阐述这些歌曲的要求，注意，这里并非只求创作一首，而是请创作多首，且至少满足下列一项要求，我将在每个要求后写上原因。

1.属于我们的歌曲，她要能激起人们内心的向往与对身边人的认同，以凝聚原本散沙的个体，具体中心思想为：停止争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血浓于水，都是这片大陆孕育的生命，不该互相仇恨，放下彼此仇视，我们应当信任彼此，就算他所思所想与你不同，也当进行讨论交流，不要让文革再度上演。能达到该点要求的歌曲将会凝聚起一盘散沙的人民，用以对抗中共对民众的挑拨离间。不过，仍然有风险，可能会使得人民凝聚起来将矛头对准我们。因此，必须强调包容和理解。

2.属于我们的歌曲，她要歌颂自由、民主、法治三大基本元素，以激发人民心中的渴望，具体元素在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法治社会。但是不可太贴合于中共的歌曲，尽量以台湾、韩国、日本等国的基调进行创作，并将三大元素具象化且展现出与中共统治下不同的地方，但是仍然要输出为人所认同的最基本美好的概念。达到该点要求的歌曲能将三大基本元素植入人们的内心，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并以此为参照，由此唤醒他们内心对于现状的不满，就如那句话所说：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未曾见过光明。我们绝大多数真的爱国人士都是如此觉醒而来的，我们需要将我们唤醒的方式大范围推广，以此唤醒更多的人，让他们一同醒来，尝试挣脱这个被火烤的铁房子。

3.批评中共的歌，我们先不需要指着鼻子骂，可以用玩梗的形式创作歌曲，可以借鉴已有的歌曲：

阳光开朗孔乙己，那首歌就属于玩梗的同时消解了中共的统治，从而导致下架。我们要尽可能从对日常生活影响大的地方出发创作，这样中共将难以抉择是否下架该歌曲，若下架，人民不爽不满增加，不下架，我们成功与民众进行交流，两者都是中共不想看到的。但是，不可以指着鼻子骂，那是下一阶段的要求，可采用历史上有过的诗歌，如：“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类甚至于课本上都有记录的诗文。满足该要求的歌曲，将会能引发民众内心对

自身所处环境的自嘲，使得其能正确认识到自己是怎样的水深火热。

4.批评中共的歌，直接以文革、大饥荒、上山下乡、八九六四、三年疫情等史实为素材创作，直接对中共进行诘问。可以九问为蓝本进行创作，主题突出的就是暴露问题，把它所做所为导致的后果，真正对人民做的全部暴露出来，让民众知晓。满足此点的歌曲，能点燃民众内心的愤怒，给予他们真正的目标，告诉他们真正应当仇视敌人是谁，从而摧毁中共一直塑造的正义形象。

歌曲，是人类发展这么久所形成的艺术文化，她能引发人的共鸣，达到一定程度的思想灌输，她是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为数不多能自由使用的工具。在中共的统治下，各种宣言中共正义性的歌曲层出不穷，从小被洗脑到大的人民已经默认了中共的正确和合法，我们必须要通过同样的手段，用歌曲的力量输出我们的观点，让人们不再被单方面洗脑。当有两个观点出现时，事实和理性自然会使得人们选择真正为他好的一方，唾弃另一方虚假的观点。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愿荣光归于香港》一歌，成为了凝聚香港人民力量的纽带。人们走上街头，齐声歌唱《愿荣光归于香港》，面对中共不胆怯，直面邪恶，对其说不。歌曲的力量是存在的，人们需要歌曲，在我们这次革命行动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武力抵抗，只能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

凝聚力，就是我们最大的武器，只有大家凝聚起来，成为中共宣传中的人民的那一时刻，中共的军队才可能调转枪头指向人民的敌人。在这个过程中，歌曲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是不可或缺的。

只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凝聚起来，中共的高强度言论封锁会破坏这点，这也是我们行动过程最难的一点，信息沟通。所以我上面分了四点，这四点不同条件下所使用的歌曲。1和2，是现在环境下可以直接允许在大陆宣传的，我们可以直接在编写后投入使用。而3，我们可以适当投放，如两个月投放一首，这类的歌

对于中共来说威胁不大，被封速度可能较慢，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传播。而第 4 类，是一定会被快速封杀的，但他能直接指出中共的邪恶，如若传播快速，能大批量唤醒人民。而在我们正式行动时，可以直接使用效果最好，传播较广的歌曲。

补充：请一定要强调，不要跪下！他们不值得你们跪下，他们也不会理会你们的懦弱，只有强硬的拿回自己的权利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以上就是第一阶段的行动，这个阶段我们力量薄弱，只能依靠那一部分勇于行动的先行者独自努力。因此，我们能做的和应做的是扩展有生力量和为未来舆论造势，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后续行动做准备。

四. 通过流媒体平台多发表引起人民深思的内容

如李佳琪的灵魂三问、户晨风的展露差距，为何我们会无故封控三年，动态清零政策真的成功了吗？我们在这些事件中的损失如何赔偿。这类会使得人民深思、传播范围广的内容我们必须要进行创作。

1.将 YouTube 或者 Instagram 上的内容大批量灌入中国大陆主流流媒体平台。2.评论区进行一定程度的舆论引导，尽力引发人们的思考。3.灌入的视频尽量选择一日工资消费挑战类型，展示日常生活类型等，能够呈现出国内外差距的视频，要呈现出中国当前环境下与国际主要国家环境的不同。4.这些网站将会产出一定的收益，将这些收益补充到活动资金中去，以维持我们的行动资金充沛（虽然大概率九牛一毛且难以转化为通用货币。）5.可以尝试混剪那些中国显而易见的不公，展现出真实的情况，取材可来自于 X 上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投稿，相对会真实一些。6.请大量灌入，这种类型的账号是很容易被舆论审查的，非常容易被封号，为此必须大量尝试。

这也是与歌曲类似的战术，我们必须要在舆论阵地上唤醒民智，因此传播范围广，且引人深思的内容就十分适合。只有将舆论从极端不合理扭转到推崇理性，我们才能真正在保障参与者安全的情况下尝试线下进行抗议示威。这也是这个时段四个行动的主要目的，掌握舆论。

五. 尝试同化有生力量

与商界人士取得联系，并与其商讨有关中国民主化的影响。重点在于以下几点：1.我们若成功，则会导致目前亲中共的商界人士无法继续被大众所信任，将会在未来的商战中处于不利地位。用中共的话说就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人民也会与你们为敌。该谈判可对中立企业阐述，如小米等在世界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企业。2.现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景气了，你们还在被中共吸血，这样的日子入不敷出将会导致你们最终崩溃，隔壁的恒大以及碧桂园就是你们的例子。当楼市坍塌时，经济自然崩溃，中共连许家印都能抛弃，何况你们呢？3.资本主义的全面进入将会带来全新的机会，看看改革开放的成果吧！单单如此就造就了如此之多的富豪，何况真正的进入呢？4.中共的条条框框和阴晴不定，将会是你们任何时候都必须衡量的，这是独裁社会所决定的，当中国真正民主自由法治之时，真正的机会将会降临，到时候机会将多的是。4.尝试与国际社会的商人们交流，他们是理智的，中国若民主化，对于他们来说将会是非常好的获利机会，若再许诺些许好处，也许将会获得大力的支持。

商人，是逐利的，我们可以先空手套白狼以获得初始的资金以支持我们的行动，相信正在读本方案的革命者们背后应该也有着商界大佬支撑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没有利益的关系我们是拉不动力量的，而商人这一方势力是最能提供我们这些必须品的对象，且相对于其他对象更容易被拉拢。任何方案策划都

是难以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推进的，我们必须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之所以将这个行动放置在时段二，是由于我们必须通过时段一获得最初资本以证明我们可以成功，否则逐利的商人们是不会无偿提供资金的。

时段二（约3—12月）

这个阶段相较于时段一已经大致对有生力量进行了统计，创造了一定的舆论环境，并创作了供人们传唱的歌曲。但是，由于时间较长，可能发生的事件比较多，我将会结合可能出现的事件和上一阶段的阶段性成功来制定接下来的计划。

香港反送中行动为何失败？越南为何仍处于极端的独裁统治社会？为何日本、台湾、韩国获得了民主与自由？为何茉莉花革命会失败？台湾人民进行过抗议，北美进行过介入；日本，北美进行过介入；韩国，人民进行过抗议，北美进行过介入；阿拉伯之春，人民进行过抗议，但是很多都失败了，被介入的国家成功率很高。

可以发现，抗议并不能完全获得民主自由，获得外界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统治者，攘外必先安内，若无法安内，攘外根本无从谈起。所以要求必须获得国际舆论支持，因为一个民主的国家，统治者必须顺应民意而行，当舆论偏向我们时，自然会对我们进行有利的协助与介入。

为何满足这两点的越南与香港会失败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两者都有着中国大陆的介入，他们通过武力直接强行压制，依靠着武力强大这一点强行绕过人民的意愿。香港反送中运动武力镇压；越南内战中共强行拿人命填。中国大陆的人数是压倒性多于这两个国家的，所以导致他们最终的失败。

那么，套用到我们之前那些民主尝试就能解释了。归其根本，发声的人数太少了，导致中共能直接使用人数碾压。因此，只要我们能大于一定比例进行抗议，就有很大概率能够成功。

尝试连接无法交流的人们

1.放出大量免费的 VPN 给予大陆人民以翻墙的权利，可以只放开允许文本交流的程度，以供他们获取世界的信息。2.在国内可访问的成人视频网站植入广告以阐述我们的思想。3.建立电报群组并提供免费的代理服务以使用完全自由的讨论平台（也可以自行开发无痕迹不暴露隐私的应用）。4.同步在国内流媒体平台隐晦展示 VPN 以及电报群组等信息。5.请求时段 1 中的人们传播。

我始终相信，自由和民主是正确的，而共匪统治是邪恶的，否则它没有必要建立 GFW 以阻止交流。交流是一切的基础，我们必须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让他们敢于辩论，当多种思想同时出现时，谁占理谁就能获胜。上述三点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好色和贪婪所作出的对应策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愿意在网络翻墙这方面消费，而上一时段我们对国内人民展示了真正的民主自由，这创造了他们想要亲眼所见的需求，自然会寻找到我们这免费的翻墙软件。给予他们解决痛点的方案，将他们诱导到公共的平台，在不被中共监视的条件下自由议论，自然会同化更多的伙伴。

时段三（就此以后）

至此，短期内民主化的尝试已然做尽（非线下，仅在线上安全尝试），我们可以开始进入长期的准备了，该时段将把时间线拉长，扩展到 10 年及以上，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准备的打算。

一：不能让孩子再被洗脑

爱国教育法的推出，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它是将中共的洗脑合法化的邪恶法案，我们必须要对此进行准备，以防我们失败，为未来可能的革命做准备。

1.必须将爱党不一定爱国这项基本知识根植于孩子的脑海。2.

尽可能多陪伴孩子并告诉他们普世价值观。3.尝试逃出中国，保持有生力量。

为何如此？我在觉醒后不久思考唤醒我的源动力为何，我经过很久的回忆最终确定就是这么一句话，爱国不一定爱党。这是使我被唤醒的最关键点，正是这句话守住了我的灵台，让我能从容地对中共的洗脑进行批判思考。所以我希望未来的孩子们也能有着这样的想法而成长，从而守住他们的灵台，为他们埋下觉醒的种子。

不过，我也只能嘴上说说，如何落实和执行，我也没有办法，只能请在时段1中的人们能够做到这些了。

二：让行动中的人们尽可能唤醒周围人

当到了这步时，我们已经没有能做的了，所有能在线上解决的我们已经做完了，我们能做的，只有进行倡导，让已然觉醒的人们尝试更加勇敢，多唤醒点还在沉睡的人，为我们最后的行动铺路。

1.请他们以坐下来偶尔聊天的方式试探对方是否对中共反感，若对方警觉并表示不想听，此时基本能确定该对象为粉红。2.若对方有一定的自嘲或者不满反应，基本可以确定对象为摇摆中立派，可以与他以辩论的方式进行讨论，以辩论的形式与他讨论，基本能将他说服成为我们的一份子。3.若寻找到同伴，请让他也经过行动1统计数字。

这是我们剩下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接下来就是等待时间继续这几个行动，直到达成下列条件从而进行总行动了。

行动条件判断

若行动一统计人数大于一千万，则为条件一。

若行动一统计人数大于一百万，且国外舆论占优（北约联盟明确反共，明确制裁中国），楼市崩盘，则为条件二。

若行动一统计人数大于一百万，且国外舆情不占优，楼市崩

盘，则为条件三。

若行动一统计人数大于一百万，且国外輿情不占优，楼市未崩盘，则为条件四。

若行动一统计人数大于一百万，且国外輿情不占优，中国经济真复苏，亦或统计人数少于一百万则为条件五。

条件一：直接发动茉莉花革命

当我们通过行动一统计到了一千万的人对现状不满时，我们就基本已经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了，请问，当你知道你身边人很多在极端环境下也这么想时会是如何？中共如此统治之下，仍然有一千万的不服者，这说明不满的人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只需要告诉他们你们是优秀的：有着一千万的人民也如此思考，请你们联合起来，将你们的思想告知身边那些仍然还在迷茫的人，拉起他，一起成为公民，迎接美好的未来吧！那将是一个自由，民主，法制的未来。

如此，我们或许能使得绝大多数城市内的人民，受过教育的人们唤醒，我们将直接复刻茉莉花革命，这次，不会是势单力薄的学运革命与反送中运动了，请参照具体行动策划条目进行行动。当人数达到这个规模，人民这个被中共神化的词汇将被具象化并赋予人们，他们也必须聆听人民的声音，而这胜利的诉求并非我一届大学生所能制定的，我不在此献丑了。

条件二：唤醒迷途的人们，撑起抗议的象征

在该条件下，我们可以推测出，对中共不满者何其多，百万级别程度，大概每个大城市能分配到近万名。这个数量级正好与中国官方所招募的军队数量级相吻合，这也是我分水岭在百万的原因。

我们可以尝试复制白纸革命，前面我已经阐述过白纸革命以及成都白纸革命，我认为两者中后者所改良的原子化抗议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可以结合二者进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原子化的快闪白纸

革命，具体内容可以参照成都白纸革命相关条款（只是范围将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这样，中共将难以分配资源给予地方政府镇压抗议的人民。

在房地产坍塌、经济大幅下行的情况下，人民的压力非常之大，此时的革命将会引燃这份淤积的不满，我们能最大限度地阐述我们的观点自由和民主。由于政府没有资金用于维稳，我们的白纸快闪行动将会难以抵制。如若官方选择杀鸡儆猴，将会加剧人们的不满，虽然也能给人民带来一定的恐惧，但也会加剧人们的不满。我们不能停下白纸快闪，若停下则是展示出了颓势，会使得在观望的民众退缩，在这个国度，人们只会帮助胜利的人。

如此大约半月左右，得益于我们做出的表态，在中国人强大的抽象理解能力作用下，不满与愤怒将会达到最巅峰，往后只会使得这些情绪冷却，让他们继续畏缩。

那么，我们必须就此一鼓作气，直接正面喊出我们的诉求（如条件一所说，我没这个资格制定），诵读我们的讨专制檄文，唱时段一所谱写的那些歌曲，开始我们的行动。具体的行动请参照最后一条具体行动策划。

在我们抗议、北美介入、无俄罗斯等力量支援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达成了先前成功民主化国家的胜利条件，可以直接复制他们的那些步骤（如穿上印有 free 等表示对自由渴望的印花服饰；以老人与少年为首抵制暴力），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条件三：临门一脚仅差一步

在综述我已经论述过，我们必须集齐三点才能成功，条件三缺少的就是北美介入这点，而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补足这点。

我们需要继续补足行动二与行动三，并如条件三所述，执行快闪白纸革命的抗议，将其现状传播出去，告诉世界，引发更多人的关注使得舆论导向偏向我们。同时，在这么做的情况下，其他世界

一流的国家不可能不注意，我们能否拿到舆论的支持，这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在获得自由民主后的国家独立程度。

条件四：温水真能煮青蛙吗

楼市是否崩盘是非常重要的点，楼市是中共拉动经济并获得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的手段，崩塌时会让经济停滞甚至于倒退，但是未崩塌则说明中共找到了持续造蛋糕的方法。这会使得中共的经济增长这一合法性依旧存在。

我个人认为，此时的中国民众的愤怒和不满依旧存在，但是埋于表面之下，需要一个火星点燃，这样就能代替楼市坍塌这一重要刺激来源。这样就能回归到条件三中所说，依据条件三所做。

这个火星也许非常难等，它可以是某一次恶性事件，也可以是再一次的河南水灾……很多事件都能成为这点火星，但它必须具有以下几个条件：1.让民众能感受到强烈的不公。2.政府在这其中无作为或者弱作为。3.与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如：取消法定节假日，通过寻衅滋事罪乱为人定罪，政府主动拉高房价，社会失业潮，重要民主人士去世。

当然，在这期间，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上面行动策划中的所有行动都必须同步进行，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使用遵循中共规则的方式进行抗议。

中共将白纸革命也定义为了颜色革命，那么我们可以遵循他的规则，发起一个“无颜色”的革命，我称之为塑料革命。

一张白纸，在白纸革命后都能被赋予如此深刻的含义从而遭封禁，我们就只能找寻比白纸更加易得且无颜色的物质材料。我给出的答案是，透明的物体，透明革命。

为何选用透明的物体？因为它随处可得，矿泉水瓶，书本包装，塑料袋，亚克力板，玻璃板，塑料膜，保鲜膜，现代社会不能完全摒弃透明的物质，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因为它象征意

义强，财政透明，选举透明，甚至于还包含着打通墙、关闭GFW以交流世界的意思；因为它不奇怪，一个人拎着个水瓶和塑料袋在都不会奇怪，拎着亚克力板和玻璃也会联想到施工者，但若是一群人，那么内涵自然容易让人联想到。

除了使用的象征物不同外，其余形式将与条件二中阐述一致。

如果没有能激起大多数人愤慨的事件发生，人们不会过多的关注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去做，要让他们了解到身边有人在做，有人愿意做。当然，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我们也必须尝试获取，虽然大概率不会获得协助。我们势单力薄，只能用卖惨来博得同情，否则只能出让更多的利益使得世界一流国家入局来帮助我们，不过那可能是出让我们本就不多的国家底蕴换来的。

如此这般，若出现了可以点燃民愤的火星，我们需要以此进行抗议，进行悼念，在合理的借口下聚集起民众，进而凝聚起被原子化的人民。

最后，在火星点燃期间进行我们最后的行动计划。

条件五：也许，我们都错了

当这些条件无法达成时，我觉得我们是无法成功的，只能继续我在行动策划中所书写的那些，亦或者进行最后的挣扎，通过白纸革命或者我在条件四中所说的透明革命以尝试转变到前四种条件。

二、具体行动策划

我们必须要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进行不合作运动，但是也必须承认，在现有的不合理的法律框架下，我们很难遵循每一条法律，因此，我所有的行动都仅仅考虑中国宪法，将忽略《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违宪部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93 条第四款，否则，我们没有任何可能举行该行动。

与此相对，小型城市与农村由于客观原因存在，必然行动者人

数少，非常容易被镇压。因此只可采用演讲的形式进行运动。

而夹在中间的百万级别以上的城市，则可采用标准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此来表达我们的诉求。

行动地点：全国范围

由于中国大陆的广阔，在此前的时段二（约 6-12 月）中我已经论述过了如何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成功，对于具体行动来说，我们必须尽可能扩大影响范围，从而使得中共没法集中力量去用武力强制镇压。这样，我们能获得宝贵的时间用于对民众进行宣传，从而扩大我们的有生力量。

所以，我们行动的地点必须要尽可能地覆盖全国，三线以上的城市，甚至于小县城内，我们都必须覆盖到。

行动人群：

通过前期行动准备我们已然进行了理论与宣传准备，已经加入我们的那些在行动一中被统计的人们，是我们最主要的行动力量。在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吸纳与我们共鸣的人们，从而壮大我们的力量。

行动时间：由行动条件判断决定

我在行动条件判断中已对行动的判定时间进行了阐述。在满足条件时进行策划，能掌握最佳的时机，是成功率最高的办法。当然，这天最好是假期结束前的一天，人们精力最充沛，怨气最大的一天，这种时候人们是最容易被激怒，从而获得较多人的支持。

行动前夕：声明行动计划

声明方式：不合作运动中，我们为了凝聚民众的力量，需要约定一个时间一起行动，以给当局强大的压力，声明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它将我们即将发起行动的信息传递给人们，使得他们能

有时间进行准备。

其次，它将传递我们无恶意且为人民而行动的正义性，并给予人们以时间进行思想准备和思想动员。

但是，它也有泄露我们计划的可能。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使其好处得到凸显而坏处得到屏蔽。我所想的有三种方案：

1.确定一个日期范围并选择其中一天进行这项方案。如将于 11-14 日进行行动，那么就只在中间一天进行行动。如此一来，既能混淆中共视线让他们无法集中力量，也能造舆论预告行动，且不让人们等待太久士气低落。缺点在于，中共可能趁着我们没有行动的前夕直接装做我们的一份子搞暴恐活动以对我们进行定性（法轮功自焚事件）。

当我们的正义性消失的时候，恐惧和厌恶将会让人民去到我们的对立面，而我相信，这是中共一定会做的。

我们不可对中共道德水准有过高的期待，同样，我们要尽可能地考虑到人民的人性弱点。

2.直接发布具体计划，告知我们的所有计划。该方案能最大限度避免中共对我们的抹黑，也能给人民足够的时间进行思想准备和动员。但是等同于直接泄露我们所有的计划，使得其有充足的时间聚集力量对我们进行围堵。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

如何发表呢？我认为应当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微博、b 站、QQ 等社交平台进行传播并使用 GitHub 等国内能访问的国外自由发布平台，或者尝试在之前所说的成人网站打广告。尽可能将我们要开始行动的消息传播出去。

而线下可以通过漫展这一相对自由开放的公共集会得以实现。事先声明，线下活动必然伴随着危险，我们需要告知参与宣传者危险的详细原因和来源，确保他们有资源执行线下任务。漫展，是中国为数不多允许外来文化进行传播的公共集会，我们在其中所能接触的绝大多数大概率都是对中共有所不满者，因此大概率很容易能

获得支持。

具体声明内容：

上一小节我已经论述了行动计划如何声明，由于我本人偏向于第三种，因此我在本节的声明内容中我仅仅进行第三种形式的声明。当然，我并不是写文章的料，若有高手能对此修饰，自然再好不过。

告同胞书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但是，请你看看，我们的身上有一只吸血虫，它贪婪地汲取着我们为数不多的养分；它蛊惑着我们以及我们未来的子孙；它害得我们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它让我们受尽折磨过劳而死；它压抑我们原初的人性；它阻碍我们进行娱乐与休息；它屏蔽着我们与外界的感知。

你应当猜到这吸血虫是谁了，是的，你没猜错。看看你残缺不堪满是伤痕的身体吧！看看你那本该拥有自由的童年！看看你身边苦于题海忍受无用教育的孩子！看看你那没有医保而不敢就医的父母！看看你那一眼能望到头的苦闷的人生。你想让你的孩子再经历一遍吗？

（此处插入相关热点事件）

如果你不想，那么，请帮助我们，我们将要终结这一切，为我、你、他、她，甚至于他们，带来这片土地未曾品尝过的自由和民主，让那每 200 米就有的 24 个字成真！

每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是我们联合起来，做他们口中的人民，那么他们就要遵循他们的规则服务我们！

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每一个你，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力量！罢工那么一天吧，你也渴望着再休息一天对吧？不妨当作一次集会，让我们疯狂一把。成了，你我将成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

笔；败了，至少我们也已经努力过。

我们将于 xx 月 xx 日，xx 地点（请挑选经济中心的广场等人流量大且靠近市中心的位置）展开一场不合作运动。

请在我们行动当天，携带一定量的水与干粮（请至少支持您两天的消耗），若有移动电源与户外用品最好，若有条件，请准备好标语，用以展示你的愤怒，乘上车辆带上户外用品，前往我们通知的地点，我们可能会在该处进行长达三天左右的抗议。

行动当天：具体策划如下

第一天。

时间：8-9 点

按照当局的习性，可能会在我们通告的地方安排大量警察以应对我们的行动，为此，我们将按照以下条件行动：

- 1.若未在该处安排公安，则正常进行我们的活动。
- 2.若安排公安，请大家聚集起来，不要害怕对方，我们是人民。请勇敢地质问对方为何要拦住我？
- 3.请勇敢的举起我们的标语，歌唱《xxxx》（在时段一第三点中的歌）。
- 4.请大声说出我们的诉求：不要失业要工作，不要高墙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 5.如若公安拉人上车走，请务必帮助被抓者脱逃，你们都没有错，不能放任对方随意抓人，请务必团结起来，我们是一起的，每个人都很重要！！

时间：9-11 点

请在这期间保持沉默，静坐以表达我们的不满。若你对中共有何不满，亦或你对其所作所为有了解，请勇敢站到我们中间，为我

们讲述你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中共的邪恶，这周围的人们都是你的同伴，请不要害怕，勇敢地站出来。也请各位在此期间进行录像转发，尽可能将我们的消息发送出去，以让其他人知晓我们正在进行不合作运动。有能力的，请发表在国外平台，这些并非无用功，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时间段，公安可能会派代表介入，并且将会有大量的记者入场，对方可能会以社会动乱等词形容，并质问何人组织该场行动。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声称是所有中国人民组织的。而非境外势力，我们要反问对方，谁站在人民对立面？谁才是境外势力？让自己处于道德制高点，把控住舆论。我只能预测部分他们的常用话术，不可能全部预测，具体还得临场的人们自行解构。我们只需要站在自己的阵地，用理性和道理回应对方，对于无道理的问题采用反问方法让对方证明即可。请永远记住，你是对的，你就是人民，人民不是别人。你身边的我们都是这么想的，中共就是如此邪恶，请坚定你心中的信念。

时间：11-13 点

此时距离行动开始已经过了 5 小时左右，绝大多数区域应当都已经被放置了网络 IP 记录或者流量屏蔽器，我们需要质问对方为何如此，以此坚定我们的正义性，验证言论管控的真实性。我们要要求对方关闭该设备，允许我们访问互联网，如若不同意，尝试同化对方，和其讲道理，为其描绘民主的美好未来。若对方仍然不同意，也可就此作罢，我们是不能使用暴力手段的，只能借助于在场的记者们或者当个人离开后将真实情况传递出去。

在 12 点左右时，请多数车辆鸣笛示威，表示人民需要进食，并开始发放食物给抗议的人民。在进食完后可以教人们歌唱我们在第三行动时所谱写的歌曲，可以先从痛诉中共邪恶的歌曲开始教，以加深人们对于中共的认识。

时间：14-18 点

这个时间距离行动开始已经过去了 7 小时，在这个时间段中共应当将我们的运动定性为暴乱活动，声称是有境外势力干扰，对此，必须进行演讲，以坚定在场人员的信心。

具体论述点可以是党国分离，中共罪恶，民主革命。若有事情需要处理的人，请他去处理，我们是不能强迫人们做事的，放弃的人自然不会理会我们，但是我们可以请他们为留下的人们筹备食物和饮水以维持在此处的人们的基本生命需求。而在中共对我们行动定性时，还没来参加我们行动的人基本上就是无法叫醒的存在了。

时间：18-20 点

鸣笛警示，表示人民需要进食了，大概率中共已经会发表什么文件以应对这次行动，但是由于运动范围过大，军队是无法顾及那么庞大的范围，且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

在进食完后我们可以齐声歌唱剩下几首歌曲，坚定我们的信心，当然，如若你需要照顾家中的孩子或有急事出现，甚至于想要在舒适的环境休息，请随意离去，我们不会强迫人民做任何事情，你是自由的。但是，请你在明天 9 点以后来到现场，并尽可能多带粮食和饮用水，我们将会继续抗议直到成功。

时间：20-23 点

这个点我们可以交流、演讲、辩论、探讨未来美好的愿景。了解真实的历史。以中共的习性，这会是最后安宁的一晚。

时间：23 点-次日 8 点

睡觉，但请轮流安排人进行守夜。

第二天：

时间：8-9 点

鸣笛警示，表示人民需要进食了，餐后进行日常唱歌和演讲，可以以《讨专制械文》为蓝本进行演讲，坚定我方信心，勇敢对抗。

时间：9-11 点

此时中共可能会派出代表进行劝阻与承诺，要求解散抗议人群。但是，还是那句话，独裁者的话不能信，只要它还在位一天，我们就不能相信它所说的。我们要坚定我们标语上所写，歌曲中所唱，脑海中所想，独裁者一天不下台，我们就要抗议一天。

时间：11-18 点

饭点鸣笛警示，表示人们需要进食。除此以外与第一天无不同。

时间：18-22 点

中共可能将通过聚集公安和军队的方式，尝试进行震慑碾压。那么，手拉起手，像康乃馨革命一般，让我们和蔼的老人和可爱的孩子们站在前面，我们是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希望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是人民，是正义的一方，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人民赋予的。中共把你们推向了我们的对立面，请你们回来，帮助我们将矛头指向真正的敌人。

在此，请诵读那些讨专制械文，歌唱我们的歌曲，歌曲能凝聚起我们，能将我们每个人串联起来。

当我们获得军队的支持的那一刻，我们就胜利了。

当然，倘若中共没有派出军队而是打算冷处理，请继续我们的行动。虽然这对我们自身有一定的损伤，但是总比它单方面赢要好的太多了。现在我们在独裁社会都能做得那么好，等我们民主了，自然指挥更好。我们要坚定觉醒，抵抗到底，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但是一旦我们成功了，我们享受的就比失去的多得多！

时间：此后

若中共派出军队，那么我们聚集在一起，将人民具象化后，中共对其洗脑自然就成为了我们的武器，我们要对其控诉中共的邪恶，阐述我们所受的苦难，宣传我们的自由与民主，展现出我们的

愤慨和弱小。

我知道很丢人，但是这是唯一的办法，掌握暴力的军队能轻而易举地碾碎我们这些没有抵抗能力的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军队回归我们人民的怀抱。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了和中共正面对抗的实力。

若中共与我们谈判，请看我在结尾所书写的要求。若中共就此冷处理，我们也不必灰心，可以继续罢工，正常生活，没事就在这里静坐玩手机抗议。我们没有必要急，大不了就是把钱都拿来买吃的喝的，不工作罢了。别忘了我们本来就没有工作啊（地狱笑话），而中共本身没有生产能力，他的所有养分都来源于我们，我们不工作，它就必将灭亡，因此它必然会选择前两个选项，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为此，我们必须互相帮助，给予周围人以最低程度的食物饮水保障，挺过这一阵，未来会更好。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我们能找到支持的商人的原因，基础的生活开销必须有人承担。

行动结束：谈判

我只是一介大学生，我只能谈谈我的看法，请勿以我为准。

- 1.要求修改宪法，禁止连任制度（以防再次出现习近平），习近平即刻下台。
- 2.废除一党专政，允许多党竞争。
- 3.废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改为一人一票公民选举制度（已经有网络存在了，现实条件是允许的）
- 4.修改警察法，废除寻衅滋事相关条款。
- 5.划清法律界限（需要专业人士帮助）
- 6.即刻关闭 GFW，不再限制国际访问。
- 7.军队国家化。
- 8.经济，过于复杂，不是我能理清的。

上述 8 条中，3，6，7，必须同意至少两项，这是必须的，否则我们无法达成民主。

后日谈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我具体策划写得很乱且无用。我原本是写了大约八千左右的具体策划方案，分为了三种情况，但当我审视其中时，我发现了一些漏洞。

首先，我们行动的范围必须是全国，否则规模不大，不可能成功。这就带来了人手的问题，我们势单力薄，不可能在每个城市都分配力量去执行。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我如何寻找这些能执行计划的人呢？

我思考了两天，结果发现这是个无解的问题，若线上招募人进行，那么不可避免地会有中共的间谍混入，导致公安反应快于人民。

若线下招募，人数又不够。

唯一的方案就只有公开行动方案，让人民自发地对抗警察。为此，我删除了近 8k 字的三篇策划，重新写了一篇。

但是这篇策划就如我所说，非常无用，且充满主观。

我对此只能说，没办法，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如同我们一般封闭，无法自由传播信息，高压，人多。所有的点造就了我们很难写出一篇完美的策划，只能靠大概的估计去进行。所以我的绝大多数的经历都用于阐述在行动前该如何做，怎么做才能凝聚起分散的人们。

为何这么做则在更早之前进行了阐述。

这也是为什么，行动策划前将近 3w 字，而行动策划本体才 1w 字的原因。我们在具体事件发生前是不可能书写出一篇有效的行动策划的。就如我上面说的这是无解的问题，当局的反应永远比我们快，我们也无法有效地在信息不流通的情况下分散进行抗争。

为此，我觉得只能等条件三中所说的那颗火星了，我们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六四学运，第一次成功的白纸革命，他们都是在突发事件下，群众为了祭奠而自发组织的行动。

我们要做的，不应当是策划一场具体的，一次性就能达成的行动策划，而应当是唤醒民智，交由他们自行向着不公正发出怒吼。书写之时，李克强前总理已然逝去，他是一位敢于说实话的好人。也许在我投稿不久，人们就会走向街头，为悼念李克强前总理而爆发运动吧，虽然我认为现在的民智还做不到那一步。

此外，就目前舆论来看，我真的觉得，唯一能刺激明智觉醒的，只可能是在人民的利益受到大幅度的损坏，且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时候了。楼市，可能是目前能看到最明确的信号锚点，我们行动至少应该在楼市崩塌之时。当然，或许在此之前，中共就发疯加重赋税要求我们缴纳更多的钱，引发人们不满导致上街抗议。

闲话——于提交前一天

也许在这个征集刚刚开始时，我怀有着一腔热血认真思索如何能使得我们获得民主与自由，但是当我继续过着我重复的日常，一日复一日进行着无用的学业时，我恨啊！但同时我也逐渐麻木了，从8月份开始动笔，半个月写下了前2万字，本想着用我的所有头脑投入其中。将每点考虑得无比仔细，甚至于料想每一方的行动，每一个动作，但是我发现不现实，我所思所想皆建立于一个观点——我们是正义的，且正义必将成功，在这之后的2个月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是正【没有断行】

义的吗？我找了身边的很多朋友聊，甚至找到了我一个极左的朋友聊并因此决裂，最后，我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话题。所以，我迷茫了，我在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仅仅是因为截止日期接近而赶稿写完了剩下的部分，而并未细细思考如何成功。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此，尽人事，听天命。“也许独裁确实适合这个国家这个

民族，你玩过文明 VI 吗？那里面的俄罗斯如果不抵制民主，就难以发展。”这是我一个民族主义者朋友对我说的话。“你现在说的话，对得起你受到的教育吗？”这是我一个极左朋友对我说的话。中共的洗脑很成功，我们能否唤醒他们？8 月份时，我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随着我调查加深，以及对身边人的谈话聊天，我愈发绝望了。

醒着的人，是痛苦的，我现在居然有点怀念我曾经不知道那么多，半睡半醒的状态了。鲁迅先生说得对，你怎么能把被火烤着的在铁屋子里睡着的人叫醒呢？或许，这样就好，努力一次，是否能成就看天意了。

建立民主中国的全民非暴力行动方案

作者：费历鸣

【摘要：本文提出一个分步骤、分层次、国内为主、内外结合的非暴力民主革命方案。中国的民主转型必然是非暴力的突发革命，应该吸取国际和国内民主抗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大力推广国际的和历史上的非暴力行动战略、策略和技巧，并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策略。在越来越严密的高科技监控体系之下，通过风险可控的线上行动和地面行动，通过“同县、同城、同省、跨省”的互通互联的低政治化、低组织化公民行动网络，逐步扩大联络范围和影响力，并在条件具备时逐步将公民网络组织化、政治化。当导火索事件发生的时候，非暴力民主革命已经获得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民意基础、组织基础和技术基础。】

一、非暴力革命行动的背景与政治社会环境

1.1 虽然十多年来威权主义在全世界有所回潮，但从人类历史大趋势来看，极权、威权和形形色色的专制制度必然被民主所取代。中国也不例外。威权的回潮只是一股妖风而已（民主转型的理论大家 LarryDiamond 称之为 illWind）。弗兰西斯福山说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人类政治历史发展的终点，丘吉尔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背后不仅有经济、政治、和平、稳定等等方面的原因，更有人性的原因：自由民主是人性的要求。

1.2 中国人有着可歌可泣的争取民主的历史，一代又一代人为此进行了极为艰辛的抗争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共政权目前是经济和军事最强大的专制力量，是对全球自由秩序的最大威胁。推动中

国民主也是全球爱好自由和平的人士的共同愿望。

1.3 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自由民主观念、法治人权意识都有了显著提高，中国民众与国际社会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可动用的资源和技术越来越多。但习近平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弄得天怒人怨，越来越多的国人对习近平、共产党政权的忍耐接近极限，要求政治变革的情绪迅速蔓延。2020 年以来的经济下滑，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在迅速提高。

1.4 从民主墙到天安门民主运动，从 1990 年代的组党运动到 2000 年代的维权运动，从 08 宪章到白纸革命，从雨伞革命到反送中运动，中国的民主抗争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这既是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精神动力，也是行动者应该借鉴、学习和反思的宝贵财富。

1.5 中共已经建立起严密的高科技极权体系，摄像头、防火墙、大数据、人脸识别、声纹识别、健康码、DNA 检测、社会信用系统等像一张巨大的网，信息控制和洗脑宣传不断强化，对异议人士、维权者和抗争者的控制和惩罚变本加厉，这对非暴力抗争行动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如何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现代极权监控之下来启蒙民众、动员和组织非暴力抗议行动，是中国民主革命面临的核心问题。

二、非暴力革命思想和行动技术的传播

2.1 非暴力抵抗（nonviolent resistance）或非暴力行动（nonviolent action），是通过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或政治目标的做法，包括集会游行示威、象征性抗议、公民不服从、经济或政治不合作、行为艺术、线上抗议、秘密出版、抵制或制裁，等等。当民众以非暴力方式，策略性地发起促使专制政府下台的大规模抗议时，可以称之为非暴力革命。

2.2 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暴力被视为革命的唯一方式；但 20 世纪以来的民主化经验表明，非暴力推动了大多数的民主转型，提高了民主革命的成功率，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的民主更不容易退化或被复辟。

2.3 从民主墙、天安门运动到白纸革命，中国的民主运动呈现的是非暴力形式。中国抗争的非暴力精神受到国际专家、活动家、人权组织的广泛推崇。当前志在推翻中共专制的同仁之中，多数认可非暴力原则。

2.4 近 40 多年的非暴力抗争尚未达到推翻中共专制的目标，但这不能成为非暴力无效的理由。中国的专制传统根深蒂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残忍而又精致狡猾（Stein Ringen 在《完美独裁》一书中称中共独裁为“老练的极权主义” *sophisticated totalitarianism*）、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都相当复杂，不应该幻想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

2.5 事实上，1989 年的民主运动接近于成功，它也为东欧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和平革命提供了激励，让其他独裁者害怕看到血腥镇压的后果。2022 年的白纸革命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共产党如此严密的社会控制和技术监控之下，大规模聚集仍有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运动可以追溯到 1957 年北京大学的 519 运动；即使毛泽东的恐怖极权统治下，也不能说反抗空间彻底不存在）。

2.6 非暴力革命若要取得成效，首先要让人们非暴力产生信心。甘地说：“非暴力是人类被赋予的最强大的力量”。而建立这种信心，最主要的是让人们了解和接受非暴力抵抗的理念、了解其成功经验和行动技术。如基恩·夏普一再强调的那样，独裁者并非像他们宣传的那样强大，而人民也并非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弱小。

2.7 不少人权机构曾经组织过非暴力抗争的培训，但受到直接培训的中国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人数仍非常有限。随着中共对民间的镇压加剧和管控加强，能直接参与这种培训的机会大大缩小，风险

大大增加。

2.8 因此要把海外培训和国内培训结合起来，把线下培训、网络培训和自我培训结合起来。而自我培训则是最基础的环节，海外机构除了邀请国内行动家进行线下培训和线上培训外，应该着重开发、翻译、编辑出版非暴力抗争教材与课程，包括网站、文字、视频、音频等不同媒体的内容，并大力推广。

2.9 “培训培训者”。选择一些有推广能力的、意志坚定的骨干进行重点培训，然后由他们继续培训其他培训者，以此类推。在海外受到培训的行动者（如尚未被监控到的海外留学生、雇员或其他任何活动家），可以回国进行地下培训。

2.10 国内潜在的行动者通过翻墙、订阅、社交媒体、电子邮件、“饭醉活动”、人际传播等方式获取培训资料，并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培训。个人化的自我学习和自我训练既不违反任何法律、也更容易避开官方的审查和监控。

三、国际经验的中国化与本地化

3.1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路径不同，每个国家所面临的情势也不同，每场运动都要依照自己所面临的局面来制定战略和战术。

3.2 需要认真研究、学习全世界已有的非暴力抗争以及民主化经验。除了国内有所了解的曼德拉、甘地、马丁·路德·金、萨哈罗夫、哈维尔，尚有大量案例未受到足够重视。从菲律宾、南斯拉夫到乌克兰、突尼斯，被归称为颜色革命的至少有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菲律宾黄色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南斯拉夫黑色革命、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伊拉克紫色革命、黎巴嫩雪杉革命、白俄罗斯牛仔裤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或柠檬革命、哈萨克斯坦黄色革命、缅甸番红花革命或袈裟革命、摩尔多瓦葡萄革命、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北马其顿多彩革命、伊朗绿色

革命（2009）和头巾革命（2022）等。

3.3 国内外的活动者、维权人士、公共知识分子等任何致力于改变中国的人，都应该有意识地学习非暴力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断进行讨论研究与自我教育。对于失败的案例，要分析原因、吸取教训、提早准备，在未来中国的抗争中予以避免；对于成功的案例，需要总结经验、虚心学习，并将其革命战略和行动技术中国化。既要避免照单全抄，更要避免“中国特殊论”，拒绝学习和借鉴历史和别国经验。

3.4 关于非暴力抗争的文章、视频等学习资料，网上已有大量资源。中文资料，如夏普的《非暴力抗争手册》《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CANVAS 的核心教程《有效的非暴力抗争指南》《非暴力抗争战略战术的 50 个要点》、迈克尔·纳伯格的《非暴力手册》等等。可以参见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中国行动（ChinaAction.org）、中国权利在行动（China Rights in Action）、IYP（iyouport.substack.com）、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全球和平教育运动（Global CampaignforPeace Education, GCPE）等等。此外，还有更多的国际机构和网站致力于推广非暴力运动，如国际和平教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PeaceEducation, IPE）、美国和平研究所（TheUnitedStatesInstituteofPeace）、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EinsteinInstitution）、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ANVAS），等等。

3.5 一些非政府组织、大学、智库和基金会提供与非暴力与民主行动有关的培训、奖学金和访问机会，应该推荐中国行动者（包括志在回国行动的留学生）多多参与学习和交流。

3.6 对现有关于非暴力抗争、和平抵抗策略的各种资料，应该建立一个小组进行搜集、整理；对非中文的资料，应该大力进行翻译；同时，应该发动社会各界尤其是专业人士，制作短视频、纪录

片、歌曲、宣传图片、漫画等等，以各种可能的渠道进行宣传推广。

3.7 中国虽然是单一制专制国家，但各地在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官方控制等方面仍有很大差别。各地维稳力量、维稳方法、民间的空间、抵抗的方式和传统，都有所不同。举凡运动计划的制定、战术的调整、人员的组织动员、行动时机的选择等等，都应该重视和依靠本地行动者的在地判断。

3.8 系统地编辑、总结中国民间已经积累的宝贵经验，尤其是1989年之后历次抗争的经验，包括天安门民主运动、民间组党运动、维权运动、环保运动、女权与性少数运动、劳工运动、茉莉花革命、08 宪章、基督教家庭教会运动、法轮功反迫害运动、白纸革命、雨伞革命、反送中运动、海外民主运动等。鼓励以电影、纪录片、音乐、短视频、舞台剧、口述史、播客、文章论文等各种形式来呈现这些抗争历史。

四、翻墙：突破信息封锁

4.1 非暴力民主革命要获得成功，规模至关重要。若要吸引更多的参与人数，首先要靠启蒙和鼓动。在中共日益加强信息控制的情况下，如何突破网络防火墙（GFW），将是一个关键因素。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运动之前的思想传播和启蒙，也在于安全的组织与沟通，以及运动过程中的信息传播与协调。

4.2 推广 VPN 等翻墙方式。大力开发和传播安全的、廉价或免费的翻墙方法。

4.3 推广数据安全和通信安全的培训。比如推广 Signal、Telegram、加密邮件等通信方式，尽量放弃电话、短信、微信、微博等不安全的联络方式。

4.4 海外民主人士和活动家，应该以各种方式向不能翻墙的人提供信息，尤其是与非暴力运动、公民社会、技术赋权、民主转型有

关的信息。

4.5 游说美国等民主国家制定政策，鼓励翻墙技术的开发，制裁为中共提供审查技术的科技公司，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以加大其维持防火墙的成本。

4.6 翻墙后，汲取高质量的可靠信息。避免受到虚假信息的污染，提高识别假信息的能力。

4.7 探索和推广那些中共难以控制的通信方式，比如并不通过地面基地站的卫星电话，或未在中国注册的移动电话等。

五、互通互联的行动者：非暴力民主运动的准备

5.1 1980年代开始，中国兴起自由化运动，并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达到一个高潮。六四屠杀之后，自由化运动并未停止，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人权民主宪政理念，公民社会得以发展；2003年又兴起了公民维权运动。这些都是在中共坚持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5.2 习近平上台后，严控媒体和教育，树立个人崇拜，修改宪法，抓捕异议人士，镇压维权运动，加强举国监控体系，摧毁香港自由法治，在西藏和新疆制造极为惨烈的人权灾难。一度相当活跃的维权者和抗争者，很多人被投入监狱，很多人受到严密控制，很多人被迫放弃，这带来了寒蝉效应，人人自危。这使得民间社会和行动者不得不重新探索新形势下的运动战略和战术。

5.3 首先要坚守抗争的理念，维持抗争的势态。不能高调，就低调；不能公开，就秘密；不能政治化，就低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不能实名，就匿名；不能线下，就线上。一些上了黑名单的行动者被管控，但新的行动者会不断涌现。要考虑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要仔细评估风险，既不彻底投降，也不做无畏的牺牲，调整心态，积蓄能量，守望相助，等待时机。

5.4 所谓低政治化和去政治化，就是暂时地、策略性地放弃或减

缓那些直接对抗的、风险极高的行动、暂时放弃某些高度政治敏感的议题，转而从事政治色彩较低的民间活动，比如读书会、电影欣赏、环保、扶贫、女权、家庭暴力、学校教育、养老保险、儿童权利、动物保护、消费者权利、小区业主维权等等，在点滴的民间活动中，传播人权理念，培养民主意识，积累民主经验，建立信任网络。

5.5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入民主抗争的讨论内容，比如数据安全培训，比如阅读讨论非暴力抗争或民主化的著作，比如关注和参与地方选举，比如行为艺术、揭露腐败、给良心犯送饭等等。

5.6 同样道理，在组织化行动网络受到巨大打压的情况下，坚持非组织化或低组织化的行动。比如聚餐、旅游、交友、礼拜、团建、体育活动、线上讨论、网络群组等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 NGO，或把非正式组织正式化，把去中心化的组织中心化。

5.7 “新公民运动”等国内各地抗争群体所实行的、曾在数十个城市蔓延开来的公民同城聚餐，仍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民间活动模式。当大规模公开的聚餐无法组织或风险太高时，可以组织小规模的非公开的聚餐活动，同时视情况来决定是否在聚餐时谈论敏感话题，或决定话题的敏感程度。

5.8 民间活动以本县、本市为基础，联络和发展本地的志同道合者。联络人、聚会地点、聚会时间无需固定，这样可以减少受到监控的机会，而且即使在核心联络人受到限制后，活动仍可继续。

5.9 这些日常的交往是交流思想建立信任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维持运动信心、拓展行动网络的重要方式。

5.10 各地的骨干应该有意识地结识、联络附近县市的志同道合者，并进行不定期的线上和线下见面活动。

5.11 以此类推，将“同城圈子”的活动模式不断复制，并有意地将其跨县、跨市和跨省。这种交际网络是互通互联的、自然扩展的、非中心的和符合民主精神的。

5.12 在地理上不必局限于临近省市，在主题上可以花样翻新。可以建立各种形式的“友谊城市公民圈”，比如“武汉-青岛公民联谊活动”，或“辽宁-四川公民年度乒乓球比赛”，或“珠三角登山爱好者”，或“北京记者-律师联谊会”，或“良心犯网络春晚”，等等，这样就可以有成千上万种组合。

六、民主革命时机的选择以及革命过程

6.1 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模式，无非是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官方改革、外国干涉、非暴力革命等少数几种。就中国而言，共产党主动改革走向宪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暴力革命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军事政变一来无法预期、二来未必走向民主；外国干涉只可能发生在国内民主革命达到巨大规模之后；因此，最可行的、最可预期的、也最有成功希望的，就是非暴力革命。

6.2 非暴力革命往往由突发事件引发，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民众情绪达到爆发点，从而形成相当规模的、有一定持续性的集体抗议。

6.3 非暴力革命看似毫无预兆地突然爆发，但任何卓有成效的革命背后，都有长期的社会情绪的积累、长期的思想准备、长期的组织建设、日常抗议的操练和行动的筹划。

6.4 随着中国经济的下滑、社会管控的加剧、贫富悬殊的扩大，专制腐败导致的社会矛盾与日俱增，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日益蔓延，导致革命的导火索事件（triggerevents）将逐渐增多。它可能是胡耀邦或李克强的逝世，可能是乌鲁木齐的大火，可能是养老金危机或银行破产，可能是四通桥的标语，也可能是一次万圣节或任何一个纪念活动或突发事件。有些情形，使大多数民众（包括公务员、军人、富人等等）成为受害者或感到不满，比如疫情清零政策、计划生育、环境污染、物价飞涨、房地产崩盘、经济崩溃等等。

6.5 中国民众作为行动者，将自发地被某个事件激发，集体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如果旨在推动中国民主的行动者形成某种默契，将迅速加入抗议，使抗议规模迅速扩大。

6.6 附近的行动者和民众在第一时间加入，在官方封锁信息或采取行动之前，抗议迅速蔓延到数个省市。随着人数的增多，仅靠当地的维稳力量无力阻止。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深圳、重庆、成都、天津、武汉、杭州、南京、长沙等）加入抗议，将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6.7 为了不被当局识别身份，可以戴口罩、戴面具，口罩或面具上可以写上个人化的标语口号。在最初几天维持运动的热度，是重要的；否则会被切断与其他抗议的联系，无法蔓延至其他省市。

6.8 “人数有时是至关重要的，但明确的目的和献身精神更为重要。”（Michael Nagler）

6.9 为让当局左右为难，抗议可以利用“两难行动（dilemma action）”的策略，比如打出共产党自己宣传的标语，比如纪念被认为是开明派的已故领导人，比如身穿贴有白纸标志的衣服或戴某种颜色的丝巾，比如同时鸣笛，等等。

6.10 如果抗议最初的诉求是经济性、社会性的，运动的组织者应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加入政治性的诉求。

6.11 运动的基本形式是集会、游行、示威，同时视情况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等全民不合作运动，以及公民不服从运动（civil disobedience），比如拒服兵役、不纳税、拒绝服从居家禁令或宵禁、封锁交通要道、占据政府建筑、在标志性建筑或官方建筑上涂鸦、公开焚烧党旗、遮挡或破坏监控设备、利用无人机抛洒传单、号召去银行挤兑、出版禁书禁刊、设立广播电台等等。

6.12 具备条件的时候，宣布成立运动领导组织。运动过程一般会自然涌现领导人物，这类人物有的事先不在官方的监控名单里，因此官方难以提前控制；有的在运动前的长时间里已经积累了足够

的人脉和声望，因此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有的则在运动中脱颖而出。

6.13 领导组织要有备选梯队，确保在核心层被逮捕或因其他原因退出的情况下，组织仍可以保持运作。领导组织的出现，与运动的多中心化结构并不矛盾。任何领导者被捕，都不导致整个运动的瘫痪。

6.14 如果运动中出现一个以上的领导组织，应该尽可能协调、沟通、分工合作，尽最大努力避免内讧。

6.15 暴力是独裁者的优势，但是暴力机器的维持，要依赖社会各部门及人民的服从与合作。运动发起之后，要尽力游说在军队、公安等一切官方机构工作的亲友，劝他们不要为专制卖命，不要用暴力对待人民。应该尽可能地争取社会各界包括体制内的支持，比如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明星、记者、企业家、公务员、工人等。

6.16 当运动达到一定规模，镇压将变得非常困难；这又会进一步扩大运动的规模。当镇压的成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道义成本）急剧提高，体制内发生分裂的可能性就急剧扩大，高层的改革派将有机会获得话语权乃至主导权。与此同时，军队内部发生抗命或哗变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以民变促政变”“以民变促兵变”。

6.17 和平革命进行到一定阶段，将获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民主国家的支持，包括资金、技术、媒体、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中共当局将面临极大的国际压力。在革命爆发之前，行动者就应该与西方政府、国际人权组织、主流媒体和国际知名人物保持联系、建立信任，以便得到他们的及时声援。

6.18 因此，民众的非暴力抗争是转型的基础。没有民众的和平革命，也难以催生高层的改弦易辙、军事哗变以及国际介入。

6.19 和平革命如果进展顺利并具备与当局抗衡的实力，应该视时机决定占领主要媒体、发布告全民书、敦促官方进行谈判等。

6.20 提前制定预案，在官方宣布妥协或开始镇压、切断网络、宣布戒严等不同情况下，采取理性的应对措施。运动组织者可以宣布阶段性胜利、可以升级抗议手段、可以转变运动策略，但都不应背离非暴力原则。

6.21 如果民主运动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足够的民意支持和理性的策略选择，将极大地降低共产党当局决定武力镇压的可能性。和 1989 年的情况不同，当局一旦开始武力镇压，高层分裂和军队抗命将是大概率事件，美国等民主国家极有可能进行干涉。运动整体的非暴力性质将极大地促进高层的分化和赢得全世界的支持。

6.22 绝大多数情况下，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运动失败的时候，不气不馁，继续积攒下一次运动的力量。即使是一场失败的运动，也可以发现骨干、历练队伍、积累经验等等。我们只需要赢一次，共产党就输了。道义和时间站在我们这边。

七、中国非暴力民主革命的其它问题

7.1 海外的活动者和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海外人士和机构，应该全力配合和支持国内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海外人士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如提供资金和人道援助，救助政治犯，游说民主政府，接受媒体采访，发布和传播信息，为国内行动者提供联络平台，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持，组织沙龙，编辑出版禁书，启蒙和培养行动骨干，曝光中共贪官和人权恶棍的个人信息和海外财产，组织集会游行示威，等等。

7.2 海外的活动者应利用自由的互联网社交媒体来积累自己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帮助国内转发信息，让国际媒体、人权组织和民主国家了解和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国内行动者需要的时候，提供建议、咨询或参与策划。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回国参与民主运动。

7.3 西藏、新疆、香港、内蒙古问题：这些地方的历史、社会、

民族、宗教问题相当复杂，中共的野蛮统治更促使他们要求独立，尤其是新疆和西藏。中国民主人士应该大力支持他们争取人权和自由的努力，理解他们要求自决权的渴望，和他们一道反抗中共暴政。用非暴力革命来摧毁中共专制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实现民主宪政之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民主人士要反思大一统观念、放弃汉族沙文主义，要以最大的诚意请他们理解推翻中共专制的优先性。在历史积怨很深的情况下，加强民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建立沟通渠道，在未来民主转型过程中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7.4 一旦抗议者被逮捕，民间社会要照顾其家属（尤其是老年的父母、未成年的子女和其他需要照顾的患病或残障家属等），以免其后顾之忧。

7.5 对于非暴力行动中出现的暴力，组织者、领导者和运动的参与者要及时予以制止和谴责。有时候，这种暴力举动来自官方的“掺沙子”，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及时调查真相、予以揭露。

7.6 运动的组织者要有责任伦理的意识，不能因自己的冲动而使参加者陷入巨大的风险或承担不成比例的代价。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在参与行动前都会做风险评估，因此，既不应该过分地低估行动的风险而犯急躁冒进的错误，也不应该夸大行动的风险而使人们畏缩不前。

7.7 关于人数。政治学家 EricaChenoweth 和 MariaJ. Stephan 有一项著名的研究：只要超过人口 3.5%的民众积极参与抗争，便有望令政府退让甚至瓦解，促成变革。中国人口的 3.5%大约是 4900 万，

看起来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数字。但实际上，一、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未必需要 4900 万抗议者就可能实现目标；二、中国人对当局不满的比例远远超过 3.5%，而且只增不降，这些人从不满到行动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三、当运动人数不断增加、持续时间不断延长，加入运动的人很可能呈几何级数增加。

7.8 至于运动后期和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圆桌谈判、权力移交、宪

法起草、民族问题、机构设置、人事安排、转型正义等等，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但仍需未雨绸缪，认真对待，广泛讨论，在结合中国国情和各方实力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的转型经验。

八、结语

本方案只是一个大致的思路，很多细节、预案和策略需要志同道合者贡献智慧、逐步完善，很多决定要在民主运动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形临时做出，也有很多计划细节和策略不宜公开讨论。本方案提供的思路，在前期准备阶段强调公开化、去中心化、低政治化、低组织化、尊重每个人的风险评估、注重运动的可持续性，因此即使中共当局掌握这些内容，也无法阻止运动的准备。在运动爆发之后，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多中心化与组织化相结合、国内国际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因此运动不会被中共当局轻易摧毁。

在中国推翻专制、建立民主是一项极为光荣、也极为艰巨复杂的任务。修昔底德有句名言“幸福来自自由，自由来自勇气”，但自由更需要智慧、耐心的准备以及周密的计划。我们有责任也有信心推翻残暴的中共专制政权，也许五年之内，也许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内，但不会更久。

优秀奖

全面解构中国极权主义制度

作者：陶业

一、何谓解构极权主义？

现存中国之制度

中国现存制度不是一个传统的专制帝国主义制度，也不是一个威权主义制度，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极权主义制度。

彻底解构极权主义

全面解构中国极权主义制度，这一行动具有主动意义和积极意义。

解构极权主义的一切：解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解构极权主义政治，解构极权主义经济，解构极权主义文化，解构极权主义社会，解构极权主义伦理，解构极权主义审美，等等。解构一切属于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总之，反对极权主义，必须从解构极权主义入手；深入地全面地解构它，直至它彻底垮台。

解构行动的特点，并不是全民动员去实施一个共同的行动方案，而是在各个特定领域分别动员，以实施所在特定领域和行业的解构方案。解构就是拆卸和拆解极权主义的零部件，促使它解体。

解构极权主义的先锋部队

解构极权主义的先锋部队必然是由政治反对派组成的精英队伍。这是解构极权主义的特种部队，由一大批有思想、有智慧、有毅力、有创造力的人组成，他们是解构行动方案的制定人。他们最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比如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即便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至少也是精通业务、懂得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如何去解构极权主义的内行人，因此他们了解哪里是解构的最佳突破点，哪里最适合首先拆卸；他们有理论，有实践，是智者，更是勇士；他们知道如何将行动风险降到最低，如何保护民众；他们有牺牲精神，有担当人格，哪里有危险，哪里就会有他们挺身而出，挡在极权势力与民众之间；他们具有侠肝义胆，敢于奉献。由于对手是凶残的，因此即便是非暴力行动，依然存在牺牲的危险；为了避免民众付出牺牲，他们是首先承担危险的人。

这支精英队伍其人才从哪里来？从组织中来。只有组织中的人才，才能被凝聚，才能专注于行动。即便该组织后来离散了，失去了生命力，但个人会依然忠实于早年的奋斗目标。

比如民联，它是中国民主运动之同盟会，它贡献了孙中山先生一般的人物——王炳璋，我们不同意王炳璋先生所计划使用的手段，但我们敬仰他艰苦卓绝的创党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行动能力。民联还贡献了胡适一般的人物——胡平先生，他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思想家，他关注着民主运动的每一步发展，警醒着民运的每一步挫折、弯路与起伏；他呕心沥血，如“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一般坚韧。

比如全美学自联，如同黄埔军校，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360名正式代表和600多名与会者，代表着全美各大院校八万硕博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它向海外民运输送了大量的精英人物，如杨建

利、韩连潮、余茂春、黄慈萍、任松林、刘永川、杨大力、殷鼎、时和平、贺保平、赖安智、陆文禾、陈兴宇、陈师众，等等，一个个都是叱咤风云般的人物，90%以上是博士。当全美学自联遭到中共破坏之后，他们依然不屈不挠，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魏京生先生主持的海外民运联席会议，团结着全球民主力量；王军涛先生主持的中国民主党，在艰难中成长为海外街头抗争活动的主力。这都表明了行动需要组织，有组织才有人才。因此建议立即筹备成立“解构极权主义行动委员会”，以统筹各路解构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又可分设下属工作委员会：方案制定委员会与方案执行委员会。

解构极权主义的主体力量

解构极权中国，人人有责。解构极权主义的主体力量当然是全体中国人。但凡不堪忍受极权主义压迫的人们都可以参与进来，参与到适合自己的那个解构方案中，只需要默默地实行，就像在大街上散步，悠闲地，带着微笑地；就像在下棋，在心里琢磨着下一步棋如何走，但不露声色；就像在给孩子唱催眠曲，安静地，安然地，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就像春蚕吐丝，持续地奉献着微薄的努力。作为解构极权主义的主体力量，那是亿万之众，大家都挺直脊梁，对极权主义说不，大家都将尊严不仅仅藏在心里也刻在脸上，让极权主义知道你不接受羞辱，你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大家都高昂自己的人格，蔑视极权主义权力的卑劣和猥琐。但是面临恶劣的环境时，能敷衍时则敷衍，不得不妥协时则要妥协，保护自己且又不伤害他人时可以保持沉默，作长期行动的打算。

如何唤醒亿万人一起行动？考验着政治反对派的智慧，但基本原则是作韧性抗争，避免直接对抗，不需要民众付出牺牲，不需要民众为此坐牢。

解构极权主义之手段

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原则是甘地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作为原则，我们今天依然要遵守；作为手段和形式，则可根据现实予以必要的提升。不要误解，一说提升就意味着暴力，提升可以也应该是非暴力，取决于抗争者的智慧。

迈克尔·纳伯格在他的《非暴力手册》中有一段描述：“从情感上说，我们既没有因为害怕而逃跑，也没有因为愤怒而攻击，我们因爱而抵抗。从意图上说，我们既没有寻求胜利，也没有害怕失败，我们的目标是成长。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甚至要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一同成长。”这里“一同成长”的意思，就是期待对手会被感化，因而放弃暴力。

甘地说：“非暴力不合作不是压制理性，而是把理性从麻木中解放出来，让理性统治偏见、仇恨和其他低级的激情”，非暴力不合作原则“不是对理性进行奴役，而是使理性获得自由”。甘地寄希望于双方理性的成长，以理性战胜其他。

马丁·路德·金说：不断努力说服对手“你是错的”。这个意思是说，指望对手终究会被说服。

既然非暴力首先张扬的是理性，那么就让我们来理性地回顾一下历史：

最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它使印度最终在二战之后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独立有三方面的因素：1.内因：它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长年坚持的结果；2.外因：它是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部分；3.它的对手是殖民帝国英国。这个帝国虽然对外殖民扩张，但对内却实行宪政民主。甘地曾经期望人民以非暴力抗争启迪殖民者的“善性”，虽然经历了几度暴力镇压，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迫使英国殖民者理性地撤出。

最具借鉴意义的非暴力抗争是波兰格但斯克地区的造船工人实行的总罢工，它催生了团结工会，一个可以合法活动的独立工会。其领导人莱赫·瓦文萨还当选为波兰总统。团结工会政治地位的提提高同样归结为三方面因素：1.内因，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所展示的力量，受到天主教的鼓励，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将近有一千万工人加入，并在全国性选举中获胜；2.外因，美国的资金支持与梵蒂冈的道义支持；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3.对手，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所领导的波兰政府并不是一个强势政府，对团结工会的镇压使其失去了民众支持，最终失去了政权。

再看美国的例子，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公民抗争运动，为非裔美国人成功争取了基本人权，实现了种族平等的理想。1.马丁·路德·金长期致力于基督教神职工作，有着关心整个人类的情怀；2.深受列夫·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深受甘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甘地的成功鼓舞了马丁·路德·金；3.马丁·路德·金的对手是美国政府，一个在平权运动中成长的美国政府。

以上三个例子的共同之处在于，1.非暴力是一个长期坚守的思想运动；2.有利的国际环境和道义支持；3.对手都是威权国家，或民主国家，即便是波兰团结工会所面临的共产主义政权，更多像是一个威权国家，而不是极权国家。威权国家多多少少还依赖民心的支持，但极权国家即便民心丧尽也不会倒台，它依靠恐怖手段维持统治。

符合理性的分析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传统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更适合于对付威权国家，但是甘地、瓦文萨和马丁·路德·金的抗争模式是否适合对付极权中国，我们不得而知，历史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启示。由于对手不同，因此我们不能沉溺于历史的经验，在我们继承甘地、瓦文萨和马丁·路德·金对付威权专制的抗争模式并用以对付极权专制的同时，我们需要创建性地给出自己对付极权

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

甘地、瓦文萨和马丁·路德·金的抗争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寄希望于对手还有一点人性，寄希望于对手的道德升华，寄希望于对手的最终让步和改变。甘地曾寄希望以非暴力抗争启迪英国殖民者的“善性”，他做到了；马丁·路德·金曾寄希望于美国政府能尊重基本的人性，尤其是能尊重非裔美国人的基本人权，他做到了；瓦文萨曾寄希望于波兰政府能有基本的觉悟，即尊重工人的选举结果，他做到了。但是，极权中国不具备这些特点，中国政府不具备基本的善性，不具备基本的道德觉悟，不具备基本的对人性和人权的尊重，因此你感化不了极权中国的政府，它不可能对人民作出任何让步。相反，对于和平抗争，它一定会给予残酷的镇压，并且镇压没有止境：肉体杀戮，思想杀戮，人格杀戮，人性杀戮，阶级灭绝，种族灭绝，政治灭绝。

有人把共产党放弃清零归结为白纸运动施加压力的结果，不否认有这样的因素。但是如果以为共产党在如此小规模抗议下就能改邪归正，那也过于乐观了。共产党放弃清零乃是因为清零已经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故就此而下了台阶而已。白纸运动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实践，并无贬低之意，但她需要时间成长。

消极非暴力抗争与积极非暴力抗争

消极非暴力抗争之所以消极，因为它属于等待型抗议，等待对手被感化，等待对手改变策略，等待对手放下屠刀，等待对手最终觉悟。前提是对手有可能被感化，对手有可能发生内讧，对手有可能发生转型。

积极非暴力抗争之所以积极，因为它是主动但和平地出击；不寄希望于对手能被感化、被觉悟，更不寄希望于对手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为对手的性质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积极抗争在于主动地改变对手的机体，和平地解构它、拆卸它、肢解它。

甘地、瓦文萨和马丁·路德·金的抗争模式：游行，静坐，绝食，罢工，举旗抗议，它并不触及极权主义政权的机体改变，这样的抗争模式属于消极抗争；而解构是主动的积极的抗争，它以解构极权主义政权的机体为己任，和平地解构它的神经，解构它的大脑，解构它的心脏和血液、肌肉和骨骼。

从消极状态进入积极状态，从被动状态进入主动状态。或者消极状态与积极状态根据需要相互切换，但始终坚持着和平和非暴力抗争模式。

解构极权主义之方案

面对极权主义不再消极，而是采取积极的攻势。在所有领域展开对极权主义政权的解构，和平地、全面地，见缝插针，随时随地，随机地抵制极权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各尽所能，实施解构方案。

解构极权主义行动可以大略粗分为两个层次：1.解构极权主义话语，包括极权主义价值、信仰、伦理、道德、审美、文化等等；2.解构极权主义制度：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

解构方案的来源：1.来自民间，自发的；2.来自政治反对派，刻意设计的；3.或者两者交融的。

中国民间一直就存在自发的解构行为。民间对此多有创造，比如不婚不育，直接反抗中共的生育政策；比如在家拒绝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拒绝进电影院看战狼电影，以此反抗虚假新闻和虚构的历史；比如十·一长假，不出门，出了门也不花钱，使其刺激消费成空谈；比如自发地躺平，无所事事，无所作为，让习近平的中国梦成为海市蜃楼。在民间自发的解构行为中，最有启发也最有效的是民间社会的话语反抗，我们把彭立舟在四通桥上挂出的横幅，把白纸运动中的白纸，都可视作是话语反抗的形式，它已显示出凝聚民心的作用。

在极权社会里，民间社会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民间社会对极权社会的反抗首先从争取话语权开始。为了争取民间社会的话语空间，必须在所有领域对极权话语进行积极反抗。

底层社会使用反讽话语。一个使用反讽和流氓话语的底层社会正悄悄地从后台走向前台，从边缘地带迫近中心地带。一场对极权话语的反叛和挑战，在文学、艺术、音乐、影视和网络等领域悄然推出。反讽话语和流氓话语的使用，不一定就具有道德的贬义，恰恰相反，它是对极权道德的对抗，是对极权话语的突破。

从王朔的流氓话语叙述“我是流氓，我怕谁”，王小波的荒诞叙事《黄金时代》，到贾平凹喷薄而出的情欲《废都》；从崔健坦荡的摇滚叙述“一无所有”，到何勇的摇滚直白“我们生活的世界，就象一个垃圾场”；从张艺谋的流氓电影叙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张后期堕落为帝国美学的鼓吹者），到胡戈的反讽影视语汇《大话西游》；从方力钧的北京大院泼皮组画，到丘敏君的社会傻人脸谱系列；从刀郎的《罗刹海市》，到躺平歌《我在财神殿里长跪不起》，句句如刀直扎人心；从网络愤青的流氓秽语和色语叙事，到手机里的黄段子、黑段子和灰段子，都不胫而走，充斥在社会的每个角落……他们笔下的街痞社会、市井社会、犬儒社会和躺平社会是对官方粉饰的有序社会、官本社会、和谐社会和伪道德社会的反讽和反叛。他们以反讽话语和情色张扬的叙事方式，从国家主义正论话语叙事的领地夺得一份空间。

山寨话语叙事是反讽话语叙事的延续和进一步深化。如果说反讽文化是从正统剥离，那么山寨文化则是对正版颠覆，其手法是偷梁换柱：保留外壳，篡改核心。以民间艺人的嘻笑怒骂取代御用文人的歌功颂德。山寨版国骂“草泥马河蟹”与“法克鱿河蟹”正是网民对当局封锁网络言论自由的强烈反弹，把反讽话语对“和谐”社会的反抗发展到极至，而成为名噪一时的经典。山寨话语不仅仅具有草根文化的一些特征，关注民间疾苦、触摸社会底层的诉求，

而且隐含对权利和尊严的追求，其潜台词常隐含政治色彩。

这是一场极权社会晚期反讽话语叙事的民间抗争形态，虽然它仅仅是一种弱者策略，但却是离经叛道的姿态，以反讽、戏谑、恶搞等喜剧语汇排斥和挤压极权话语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具有对极权话语进行解构和破坏的作用。在与体制的博弈中，底层社会能够敏捷地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话语，并且创造出特色鲜明的语汇，比如一句简单的“你为什么哭泣？”，在社会底层立即就有积极的呼应和共鸣，因而也就对极权具有了一定的杀伤力。它是弱者的反抗，来自底层，自发，带着嬉笑怒骂，带着哭泣，带着揪心的痛。

维权社会使用悲剧话语。在与体制的博弈中，中国的维权群体迟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也没有掌握应有的维权话语。弱势群体通常把角色定位在体制尚能容忍的边缘游走，而维权群体虽然也是弱势群体，但由于中国维权运动的终端立场是反体制的，因而维权群体往往在萌芽中就被镇压；遗憾的是，本应拿出强者姿态的他们至今还站在弱者的地位上，处于零散的、自发的、游离的状态；他们被侵犯、被剥夺、被侮辱的地位使其话语多具悲伤、悲情、悲愤和悲剧色彩，尚不具备公民社会的话语品质，当然也就无法摆脱被一再打压和边缘化的命运。

遗憾的是，中国的维权群体至今还处在自发和相对盲目的阶段，多数案例所关注的仅仅是经济利益。处在维权浅意识状态的维权群体缺乏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对什么是社会深层的原因，什么是制度深层的原因，哪些能从法律层面解决，哪些则要从制度上解决，还不甚清楚；对人的独立尊严和公民权利，还倍感陌生，当然更谈不上参与国家政治的社会责任和公民责任。中国的维权群体在提升维权的层次时难免困惑。

因此，中国的维权运动面临一个悖论：即维权语汇的缺失。维权律师基于职业道德，必定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辩护来为被侵权者讨回公道，因而他们不得不借用现有的司法语汇；但是现实的司法本

身就是极权的寄生体或派生物，它能给予维权胜诉的空间极小。如果背离侵权具体案件，维权则被抽象化，司法从中淡出，政治从中突显，被侵权群体的利益和权利在空泛的政治口号中被忽略，从而无以凝聚社会资源。

维权是一场公民运动。维权力量的聚集是公民力量的聚集，维权的最终指向是公民社会的建立。维权语汇必定从两个语境中同时走来：维权意识和公民意识，在追求司法公正时突显公民权利，在提升公民意识中提升维权品质，并从这个意义上衍生出公民政治和公民不合作运动。只有当维权进入公民社会的现代语境时，维权才能摆脱上述悖论的困扰。民间社会的话语反抗及其发展与公民素质和公民社会的成熟过程同步，更与公民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大量的维权诉讼中正义得不到声张的事实，促使维权话语向公民话语提升，街头抗争向司法博弈过渡。维权的组织规模只能是被侵权者在寻求司法公正的过程中利益一致的群落横向整合的结果。但是维权的组织效应决不是被侵权者个体的简单迭加，它是在公民力量的基础上维权群体的集合与社会资源的凝聚。维权不具有政治诉求，不具备政治斗争的品质，这是维权应有的定位，也是维权斗争应有的话语定位。同体制话语剥离，对国家话语进行颠覆与反抗，坚守公民权利，被实践证明是维权有效的抗争形式。

当中国人的权利都被剥夺时，维权就不再是个案。当整个社会充斥着邪恶与病态，比如拖欠工资者不坐牢，讨薪者要坐牢；强拆他人房屋者不坐牢，捍卫家园者要坐牢；贪污腐败者不坐牢，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者要坐牢；制造冤假错案者不坐牢，维权律师要坐牢；碰瓷诈骗者不坐牢，搀扶跌倒老人要坐牢；……。当整个社会正邪颠倒，社会正义和公正得不到伸张时，维权运动便会从个体向群体凝聚，向着公民社会运动行进。维权的语汇也会随之提升。

解构现有的极权司法语汇，撕开当前司法与宪法的虚伪，以赢得民心，这需要维权人士和法律精英们共同努力，以普世价值的语

汇构建法治文明。

精英社会使用正剧话语。文革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体制外开始重新聚集，这是西单民主墙和八九民运被极权镇压之后留下的政治遗产。正是这两场运动将 1949 年后中断了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传统薪火重新点燃。从那时候起，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又重新挺直了脊梁，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话语反抗和政治博弈，孜孜不倦地传播普世价值。逃亡之路，铁窗生涯，丝毫不减锐气。不少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体制外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其话语也在发生改变，对极权话语偷梁换柱，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人们看到普世价值在他们的话语中也在频频出现。极权话语的疲软已出现无可挽回的颓势。

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在体制外聚集，他们的话语带有鲜明的政治博弈色彩，但由于极权体制对舆论的控制而将其与社会底层隔离，其语汇虽然如阳春白雪，但由于缺乏社会大众的理解却难免不被束之高阁。因而一场突破话语封锁，扫除话语障碍的攻坚战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这时《零八宪章》出现了。

《零八宪章》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聚集和整合提供了一个凝聚点；《零八宪章》为维权实践和政治博弈两军汇合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结合面，促成政治精英与公民力量的结盟；《零八宪章》是对民间社会话语抗争的一个归纳和总结，集其大成者；《零八宪章》向维权群体提供话语和思想储备，进而提供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的现代语境。《零八宪章》在提升公民品质和政治智慧中，著重公民社会的构建，这符合中国民主运动的百年大计。

《零八宪章》不该被束之高阁，而应该把它的语汇，逐步镶嵌到国家层面的政治博弈中去，镶嵌到普通百姓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将话语反抗从底层社会和维权社会提升到全社会，这才是解构极权主义的正路。不一定需要高举什么旗帜，但一定要灵活运用它的语汇。话语反抗要变成全民的自觉行动，一些看似简单的话语，只要老百姓拿来使用，那就是不可忽略的抗争：

比如，当权力黑化时，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请问你手中的权力来源合法吗？”；

比如，推动县市普选，“还我选举权”“参政议政是公民权利”“请领导定期向人民述职”；

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人的情感和服饰罪名化，可以提出“我的情感我做主”“请公权远离私人空间”；

比如，当警察和军人镇压民众时，可以打出旗号：“文明警察，文明执法”“解放军不是私家军”；

比如，当面对贪官污吏时，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公权不是用来谋私利的”；

比如，当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时，可以质问“我们的工资都到哪里去了？”“享受财富的人，不是创造财富的人；创造财富的人，却被剥夺了享受财富的权利”；

比如，当政府停发社保，可以质问“我辛苦了一辈子，老无所依！”“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决定政府的性质”。

比如，当老百姓得了重病，可以要求进住高干病房；遇到天灾，可以要求特供，为什么不？

比如，当有人宣传三个代表时，可以发问，“包二奶，这是代表谁啊？”“去许家印的第42层红楼，这又是代表谁啊？”

比如，当有人宣传四个自信，可以发问“巴铁都不铁了，还跟谁铁啊？”“外资都撤了，都是因为外资太自信啦”，等等，等等。

虽然，话语反抗是初级阶段的行动，但是，只要坚持长期且韧性的抗争，就会见效。

解构极权主义的行动提升

解构极权主义的行动，在必要时，需从话语反抗逐步向解构极权制度提升。话语反抗可以依靠民间的创造力，但如何解构极权主

义制度则需要一批有思想、有经验、有实干能力的精英来制定方案，那是文章开始时所说的“解构极权主义的先锋部队”的使命，是《解构极权主义行动委员会》的使命。我个人的经历和能力有限，真正好的方案，看大家的。我个人只起个引子。

二、如何解构极权主义？

1.解构极权主义政治制度

全美学自联向美国贡献了一个处理中美关系的高级智囊——余茂春先生。由于他的努力，得以教育美国政府高层如何深刻认识极权中国的本质；在他的说服下，美国政府得以纠正过去对极权中国的错误判断，并得以制定相对合理的对策。这就是近期解构极权中国外交的一大重要成果。以外交逼迫政治，这对中国政治必然会产生连锁影响。人才是解构的前提，因此要广纳天下精英参与解构方案的制订。

我个人建议，通过推动县、市一级县长和市长选举，争取老百姓在行政基层的选举权，是解构极权中国政治的可行的突破口。

（期盼专家们提出更缜密的方案）

2.如何解构极权主义经济制度

全美学自联向我们贡献了经济学家陆文禾和许小年，他们对解构极权主义经济有着卓越的贡献，是不可多得的经济学人才。相信可以挖掘出更多的经济学人才，令其在解构极权主义经济中发挥作用。

我个人建议，首先要打击权贵资本。以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为突破点。官员贪污腐败是在计划经济和财产公有制的掩护下进行的。官员公示财产，可以防止腐败，从而为市场经济开辟健康的经济环境。

（期盼专家们提出更缜密的方案）

3.解构极权主义社会制度

极权主义社会是封闭的，病态的，死寂的，因为人被奴化，人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基本的公民意识。要解构极权主义的社会制度，需要每个人找回自己的尊严与人格。

找回尊严，就要对极权主义说“不”！既可消极地说“不”！即保持沉默，保持蔑视，不合作，不听命；也可积极地说“不”！可以据理力争：“凭什么啊？”“为什么啊？”，驳斥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荒谬，以人道主义为武器，与兽道主义进行思想搏斗。以公民的姿态揭露谄媚的卑劣，告密的丑陋；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上，解构极权主义的社会行为。

不论前路如何艰险，都要像许志永、丁家喜那样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公民运动，展示公民觉醒、公民素质，落实公民自治、公民权利，争取社会正义。

（期盼专家们提出更缜密的方案）

4.如何解构极权主义文化制度

解构极权主义文化，首先需要解构极权主义审美。帮助民众认清所谓的“高，大，上”，皆为低俗，丑陋，猥琐。应该鼓励音乐家、美术家、雕塑家和文学家们以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创作优秀的作品，并对极权主义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

比如，创作更多的像《我在财神殿里长跪不起》这样易于吟诵的通俗歌曲，或作词，或作曲，让人们口口相传。

比如，对于陈凯歌的爱国大片《志愿军》，一部极权颂歌，号召民众拒绝进电影院看它，令其票房冷落。

（期盼专家们提出更缜密的方案）

解构极权主义行动实质是公民抗争；分两个层次，一是解构极

权主义话语，包括解构极权主义的价值、信仰、伦理、道德和审美，话语抗争是初级反抗形式，容易推广和铺开，且风险相对较小；二是解构极权体制，包含解构极权的政体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深入的解构形式，需要探索如何拆卸、如何肢解，这是一份艰苦卓绝的工作。

不依赖暴力，不依赖金钱，只期待众人群策群力，亲历亲为。

不寄托于极权中国有一日会轰然倒塌，不寄托于一次两次街头运动能迫使极权政体让步，寄望于长期的坚忍不拔的公民抗争。

解构本身不是目的，解构的目的是建构民主制度，建构公民社会。

2023/10/18

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

作者：Scoop News

“普世的人权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在小地方，离你的家很近——那么近，那么小，世界上没有一张地图找得到。

唯有这些权利能在这些小地方得到落实，我们才能说这些权利是有意义的。

如果没有公民们以同心协力的行动从自家附近的小地方开始坚持这些权利，我们将不可能在更大的世界中看到它们有所进展。”

——埃莉诺·罗斯福

古往今来，东方西方，任何一个独裁专制政权，都最终导致民不聊生、国将不国！

倘要彻底“终结中国数千年之专制制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真正的新中国”，“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无疑是现在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推翻独裁专制、开启民主转型之路”的最佳选择和最短捷径。

“天下苦习久矣”。无论海内海外，全球的华人都是习近平在任的“受害者”；无论体制内外，包括被习近平绑架的中共近亿党员，尤其是亿万中国人民，更是直接和最大的受害者。

习近平的“任期”注定“遥遥无期”，而“人民”当然无法“接近”和“当面”反对习近平；但是“人民”却可以时时刻刻“席地而起”和“就地行动”，亲历和践行“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

针对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专制政权，只有让“全民非暴力不合作

行动”“遍地开花”，才能让习近平“闻风丧胆”和时刻“提心吊胆”；而“声东击西”和“防不胜防”，则会令党国“机器”草木皆兵又措手不及，甚至“完全失灵”。

本篇《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涵盖 15 套中国境外方案和 7 套中国大陆方案，特别为习近平及其中共“量身定制”。

其中“线上行动”方案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在全球范围内跨越时空，在不同时区发布相同主题，按所处区域时区顺序率先进行“线上热身”。

鉴于中国大陆中共对民众“武装到牙齿”的监控恶行，而海外则相对“自由”，呈现形式可以更加“直白”和专业化、多样化。

结合海内外不同区域特点，“线上线下行动”均包括“中国境外”和“中国大陆”两大部分，主题和形式侧重点各异，按所处区域不同时区渐次进行，同一时区统一行动更可使各项行动达到“最佳”效果。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也正是因为中共对中国大陆民众“全方位无死角”的立体式监控，所有中国相关的非暴力抗争行动（以下简称“行动”），都将尽量避开“敏感日”和官方节假日，而且规模和形式不一，从主题和口号，到“线上”和“线下”，也将格外“含蓄”；有的行动，将视潜在风险因素低调进行，以确保参与人员相对安全。

只要全球华人“隔空互动”又“心手相连”，坚持不懈地“行动”下去，无论习近平“在位”多久，都会令其“如坐针毡”。习近平在台上一天，就战斗不止，“誓将皇帝拉下马”！

以下“中国境外”和“中国大陆”《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方案，均具备下列特点：

特定日期：自每年 1 月 1 日起，按日期顺序，精心选择行动最具意义和影响力的特别日子；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节假日、特别纪念日和重大活动等。

特定周期：“行动”均为一年一度，特别具备连续性和持久性；

特定人群：“行动”适合全民参与，尤其聚焦青年一代，特别针对千禧一代；

特定主题：“行动”均有特别“主题”和精准“诉求”口号，并辅之以“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

特定方式：针对不同“行动”和“主题”，精心策划和设计特别参与方式和行动路线；所有“行动”先在全球范围内，以相同主题在相同时区同时“线上热身”。

特定实践：“线下实战”，具备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无论男女老幼和不同区域，均可“就地就近”顺利实施；

特定效果：无论何种“行动”，在“行动”之前，至少提前一周，甚至一月，都将在“中国行动”“公民力量”“民主教育基金会”“民主中国”“纵览中国”5大网站和社交平台向全球同步首发详细“行动方案”；

如果条件具备，还可视实际情况，在相关“行动”前一天，邀请国际主流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以最大限度吸引“全民”关注和参与；

在每次“行动”付诸行动时，力邀当地政商领袖、文体明星和人气网红等各界名流，加入“行动”，并通过各大社交平台进行“全程现场直播”；在“行动”圆满结束之后，再“趁热打铁”，邀请专家学者及时进行点评总结，必要时还可召开专题研讨会；总之，通过“每次行动”前中后期的“立体式运作”“线上线下”“无缝链接”，以确保所有“行动”最高效率、最深影响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第一部分 中国境外行动方案

“中国境外”主要包括下列区域的热门地标和地点，“线上线下”行动均可在相同时区不同区域同步进行。

- A 美国“主战场”
- B 台湾“分战场”
- C 香港澳门“分战场”
- D 亚太地区
- E 非洲地区
- F 欧洲地区
- G 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行动方案”1——“新年‘辱’包”

在习近平任期的每年新年第一天，就开始“行动”，以“送习包子”方式，作为新年“献礼”，并且拉开全年第一次“辱包行动”序幕！

主题：“新年‘辱’包”

口号：“新年‘辱’包”“新年送习”“请习吃包子”

时间：1月1日

地点：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

线上：每年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起，相同时区 0 时 0 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包子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文字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每年当地时间 1 月 1 日自早上 8 点起，每个人携带“真包子”或者“纸包子”及各类“辱包”和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就近齐聚中国

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进行非暴力和平抗议示威。

“行动方案”2——“自由台湾”

“世界自由日”，源于中华民国纪念 1954 年 1 月 23 日朝鲜战争反共战俘获释、具有反共意义的日子；以此“反对甚至粉碎”习近平任内意欲武力统一台湾的企图！

主题：“自由台湾”

口号：“自由台湾”“台湾加油”“习近平是战犯”“保卫宝岛”“反对战争”等

时间：1 月 23 日

地点：台湾各地地标/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

线上：每年的 1 月 23 日，相同时区 0 时 0 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台湾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文字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每年当地时间 1 月 23 日自早上 8 点起，每个人携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就近齐聚台湾各地地标/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

“行动方案”3——“放下屠刀”

利用“国际大屠杀和纳粹受害者”纪念日，声讨习近平在中国新疆和西藏，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犯下的“滔天罪行”！

主题：“放下屠刀”

口号：“放下屠刀”“反对种族灭绝”“习近平是屠夫”“反对新疆集中营”“宗教自由”“不许借刀杀人”等

时间：1 月 27 日

地点：纽约联合国总部/德国柏林和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

线上：每年1月27日不同时区0时0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文字及“屠刀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每年当地时间1月27日自早上8点起，每个人均可携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就近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德国柏林和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以及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进行非暴力和平抗议示威。

“行动方案”4——“猪头愚人”

充分利用“愚人节”，嘲讽习近平的“不学无术、滥竽充数、处处撒币、口误连连”等“洋相百出”！

主题：“猪头愚人”

口号：“猪头愚人”“大撒币”“小学毕业”“通商宽衣”

时间：4月1日愚人节

地点：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

线上：每年4月1日，在相同时区0时0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愚人节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每年当地时间4月1日自早上8点起，每个人均可携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就近前往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进行非暴力和平抗议示威。

“行动方案”5——“SOS 救救地球”

“世界地球日（Earth Day）”是不同国籍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宣传和实践环境保护的全球性活动；利用这一契机，反对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在“减排减碳”方面的拒不作为、不负责任和消极履行国际义务的丑陋行径。

主题：“SOS 救救地球”

口号：“救救地球”“零排放”“习近平减碳”等

时间：4月22日

地点：全球各地地标和旅游热点/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

线上：每年4月22日在相同时区0时0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SOS 地球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每年当地时间4月22日自早上8点起，每个人均可携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SOS 地球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就近前往全球各地地标和旅游热点/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进行非暴力和平抗议示威。

“行动方案”6——“言论自由”

“世界新闻自由日”，是反对习近平压制言论自由和利用官媒大肆进行虚假宣传及个人崇拜的绝佳机会。

主题：“言论自由”

口号：“习近平闭嘴”“让我说话”“不要封嘴”“官媒造假”“发言人请说人话”

时间：5月3日

地点：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

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

线上：每年 5 月 3 日在相同时区 0 时 0 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报纸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每年当地时间 5 月 3 日，自早上 8 点起，每个人均可携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报纸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就近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进行非暴力和平抗议示威。

“行动方案” 7——“和平橄榄枝”

1945 年 5 月 8 日 24 时，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但因投降书开始生效时，由于时差原因，地处柏林以西的美、英、法等国还是 5 月 8 日的下午或晚上，因此将 5 月 8 日定为“欧洲胜利日”；这一天举行“和平橄榄枝”反战行动，恰如其分。

主题：“和平橄榄枝”

口号：“世界和平”“习近平就是希特勒”“第三次世界大战永不发生”

时间：5 月 8 日

地点：德国柏林/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诺曼底海滩/美国纽约华盛顿/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

线上：每年 5 月 8 日在相同时区 0 时 0 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橄榄枝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每年当地时间 5 月 8 日自早上 8 点起，每个人均可携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橄榄枝”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

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就近前往德国柏林/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诺曼底海滩/美国纽约华盛顿/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

“行动方案” 8——“勿忘 64”

主题：“勿忘 64”

口号：“勿忘 64” “我爱天安门母亲” “坦克人在哪里”

时间：6月3日—4日

地点：全球各地地标和旅游热点/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

线上：每年6月3日在相同时区20时0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蜡烛、坦克、天安门”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每年当地时间自6月3日晚8点至6月4日晚8点，每个人均可手捧蜡烛，携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蜡烛、坦克、天安门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就近前往全球各地地标和旅游热点/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进行非暴力和平抗议示威。

“行动方案” 9——“晓波在人间”

在刘晓波逝世日举行，反对中共打压异见人士，呼吁习近平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权利。

主题：“晓波在人间”

口号：“晓波在人间” “我没有敌人” “习近平释放政治犯”
“是谁害死了刘晓波”

时间：7月13日

地点：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

体所在处

线上：每年 7 月 13 日在相同时区 0 时 0 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刘晓波遗像”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每年当地时间 7 月 13 日自早上 8 点起，每个人均可携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刘晓波遗像”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就近前往/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进行非暴力和平抗议示威。

“行动方案” 10——“人民至上”

在 9 月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周，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并且敦促中共停止欺压百姓。

主题：“人民至上”

口号：“人民至上”“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

时间：9 月联合国会议周

地点：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和领导人下榻酒店

线上：每年 9 月联合国会议周的第一天，在相同时区 0 时 0 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自每年 9 月联合国会议周的第一天早上 8 点起，每个人均可携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前往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和领导人下榻酒店。

“行动方案” 11——“APEC 会议周”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一般也在每年 9 月举行，轮值主席国常常会选择具有本国特色的地点举行；因为全球瞩目，恰恰也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主题：“亚太一家亲”

口号：“亚太一家亲”“相煎何太急”“习近平忽悠全世界”

时间：9月 APEC 会议周

地点：APEC 轮值主席会议所在地和领导人下榻酒店

线上：每年 9 月 APEC 会议周的第一天，在相同时区 0 时 0 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APEC 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自每年 9 月联合国会议周的第一天早上 8 点起，每个人均可携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前往 APEC 轮值主席会议所在地和领导人下榻酒店。

“行动方案” 12——“万圣之夜”

在万圣节前夜，以各种“扮相”，“恶搞”习近平上台以来“装神弄鬼”，在国内外发生的“真实却可笑和荒唐荒谬”的各类“咄咄怪事”。

主题：“万圣之夜”

口号：“习近平是魔鬼”“驱魔”“恐怖的中国”“尖声惊叫”等风格各异口号

时间：10 月 31 日

地点：全球各地地标和旅游热点/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

线上：每年 10 月 31 日在相同时区 0 时 0 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万圣节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每年当地时间 10 月 31 日自晚上 6 点起，每个人均可携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万圣节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就近前往全球各地地标和旅游热点/

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进行非暴力和平抗议示威。

“行动方案” 13——“Me Too 米兔”

11月2日是中国网球选手彭帅，勇敢揭露自己遭遇中共高官张高丽性侵的日子；至今为止，不仅彭帅下落不明，而张高丽仍然逍遥法外。

主题：“Me Too 米兔”

口号：“Me Too 米兔” “彭帅在哪里” “严惩张高丽” “性侵有罪”

时间：11月2日

地点：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

线上：每年11月2日在相同时区0时0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彭帅头像”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每年当地时间11月2日自早上8点起，每个人均可携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彭帅头像”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就近前往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进行非暴力和平抗议示威。

“行动方案” 14——“G20 峰会周”

正常情况下，每年11月将举行G20峰会周，轮值主席国也往往选择具有本国特色的地点举行；20国领导人齐聚一堂，不仅是举行“行动”，更是直接呼吁“习近平下台”的绝佳机会。

主题：“大国责任和担当”

口号：“大国责任和担当” “追责习近平” “习近平应该辞

职” “习近平下台” “罢免习近平”

时间：11月 G20 峰会周

地点：G20 轮值主席会议所在地和领导人下榻酒店

线上：每年 11 月 G20 峰会周的第一天，在相同时区 0 时 0 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G20 图案”和“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自每年 11 月联合国会议周的第一天早上 8 点起，每个人均可携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前往 G20 轮值主席会议所在地和领导人下榻酒店，进行非暴力和平抗议示威。

“行动方案” 15——“空椅子”

刘晓波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从获奖至辞世都未获人身自由的诺贝尔奖得主，而专门为其“预留”的“空椅子”，将永载诺贝尔奖史册！

主题：“空椅子”

口号：“刘晓波的空椅子” “为晓波平反昭雪” “给晓波颁奖” “诺贝尔和平奖” “人民的儿子刘晓波”

时间：12 月 10 日

地点：挪威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巴黎万森讷森林太阳剧院/德国柏林/美国洛杉矶/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

线上：每年 12 月 10 日在相同时区 0 时 0 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刘晓波遗像”和“空椅子”图案以及“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

线下：每年当地时间 12 月 10 日自早上 8 点起，每个人均可携

带行动主题和口号及“刘晓波遗像”和“空椅子”图案以及“反习反共”中英文标语或丑化和恶搞习近平头像等；同时就近前往挪威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巴黎万森讷森林太阳剧院/德国柏林/美国洛杉矶/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境外中共官方办事处/中资机构和媒体所在处，进行非暴力和平抗议示威。

如果可能，最好邀请旅法艺术家王克平、旅德艺术家孟煌和作家廖亦武、旅美雕塑艺术家陈维明分别参加当地抗议示威活动，并发表主题演讲。

第二部分 中国国内行动方案

中国国内主要包括下列区域的热门地标和地点，“线上线下”行动均可在不同区域同步进行。

- A 北京市
- B 上海市
- C 广州市和深圳市
- D 新疆
- E 西藏
- F 重庆市和四川省
- G 天津市和河北省
- H 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 I 福建省湖南省
- J 海南省
- K 中国大陆其他地区

“行动方案”1——“武汉封城”

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作为 Covid-19 始发地的武汉，在一夜之间突遭“封城”；2020 年 1 月 23 日凌晨，受习近平“亲自部

署，亲自指挥”，毫无预警的一声号令，让这座 1100 万人口的城市从此陷入长达 76 天的“死寂”，堪称“地狱之城”。

作为新的一年开始，又常常恰逢中国传统春节，每年中国大陆第一场“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无疑极具非常重要的象征和纪念意义！

主题：“武汉封城”

口号：“123”“我爱武汉”“武汉‘疯’了”“我不是鸭脖”“想吃鸭脖吗”“别‘吃’我”

时间：1月23日

地点：武昌/汉口各大地标/主要街道/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小区社区/药店商店/菜场超市/长江三桥

线上：每年 1 月 23 日 0 时 0 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口号及“武汉地图、口罩和鸭脖图案”。

线下：每年 1 月 23 日自早上 8 点起，每个人均“佩戴口罩”，以驾车、骑电瓶车或自行车及步行等不同方式，就近聚集武昌/汉口各大地标/主要街道/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小区社区/药店商店/菜场超市/长江三桥。

“行动方案” 2——“我想你了”

作为第一批 Covid-19 感染者，武汉医生李文亮于 2022 年 2 月 7 日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活下来的有良知的人们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忘记他！

主题：“我想你了”

口号：“我想你了”“我想李了”“我想亮了”“我想文亮”

时间：2月7日

地点：武昌/汉口各大地标/主要街道/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小区社区/药店商店/菜场超市/长江三桥

线上：每年 2 月 7 日 0 时 0 分起，每个人在各自常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口号及“李文亮遗像和鲜花”图案。

线下：每年 2 月 7 日自早上 8 点起，每个人均“手拿鲜花”以驾车、骑电瓶车或自行车及步行等不同方式，就近聚集武昌/汉口各大地标/主要街道/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小区社区/药店商店/菜场超市/长江三桥。

“行动方案” 3——“上海封城”

就在 2022 年“愚人节”这一天，全上海进入封城模式，“十里洋场”和“东方明珠”顿时“熄火”和“停摆”。

主题：“上海封城”

口号：“‘阿拉’爱上海”“我要出门”“囤菜”“空城计”“白相白相”

时间：4 月 1 日

地点：上海外滩/陆家嘴/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城隍庙/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上海站

线上：每年 4 月 1 日 0 时 0 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口号及“上海地图、东方明珠和口罩”图案。

线下：每年 4 月 1 日自早上 8 点起，每个人均佩戴口罩，以驾车、骑电瓶车或自行车及步行等不同方式，就近聚集上海外滩/陆家嘴/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城隍庙/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上海站。

“行动方案” 4——“耀邦耀祖”

4 月 15 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忌日；他的去世，成为世纪天安门广场那场声势浩大民主运动的重要起因。而对胡耀邦的纪念，就是对中共镇压民运的诅咒，更是对习近平倒行逆施独裁专制的讨伐！

主题：“耀邦耀祖”

口号：“耀邦耀祖”“怀念耀帮”“我爱北京天安门”

时间：4月15日

地点：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长安街/湖南浏阳/中和镇苍坊村敏溪河畔

线上：每年4月15日0时0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口号及“胡耀邦遗像和鲜花”图案。

线下：每年4月15日自早上8点起，每个人均“手持鲜花”以驾车、骑电瓶车或自行车及步行等不同方式，就近聚集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长安街/湖南浏阳/中和镇苍坊村敏溪河畔。

“行动方案”5——“桥梁保卫战”

“Bridge Man”彭立发于2022年10月13日“勇冲”北京四通桥，高挂“习近平下台”横幅，从此销声匿迹、生死未明和人间蒸发。

主题：“桥梁保卫战”

口号：“保家卫国”“桥梁中国造”“我爱天桥”

时间：10月13日

地点：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武汉/西安/成都等一线城市过街天桥

线上：每年10月13日0时0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口号及“过街天桥”图案。

线下：每年10月13日自早上8点起，每个人均以驾车、骑电瓶车或自行车及步行等不同方式，就近聚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武汉/西安/成都等一线城市过街天桥。

“行动方案”6——“总理走好”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的官方消息，震惊世界；大陆民众至今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发悼念李克强，官方应该“奈何不得”。

主题：“总理走好”

口号：“总理走好”“一路上有你”“叫我如何不想他”“克己强国”

时间：10月27日

地点：安徽合肥/定远/河南郑州/辽宁沈阳/北京新华门/长安街/北京大学

线上：每年10月27日0时0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口号及“李克强遗像和鲜花”图案。

线下：每年10月27日自早上8点起，每个人均“手拿鲜花”以驾车、骑电瓶车或自行车及步行等不同方式，就近聚集安徽合肥/定远/河南郑州/辽宁沈阳/北京新华门/长安街/北京大学。

“行动方案”7——“万圣夜”

主题：“万圣夜”

口号：“魔鬼来了”“不给饭碗就捣蛋”“要饭”“躺平”“不生了”“二百五”

时间：10月31日

地点：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武汉/西安/成都等一线城市地标和主干道

线上：每年10月31日0时0分起，每个人在各自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都同时分别发送行动主题口号及“万圣节”图案。

线下：每年10月31日自晚上6点起，每个人均“精心打扮”

以驾车、骑电瓶车或自行车及步行等不同方式，就近聚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武汉/西安/成都等一线城市地标和主干道。

“平等、正义、尊严、自由”等价值观具有持久的普遍性；而人类共同的人性，则植根于这些“普世价值”。

无论人性的价值观在何时何地被剥夺和丢弃，人类都将面临更大的风险；而“平等、正义、尊严、自由”的普世价值，能够预防暴力、推翻专制并维持和平。

每一天，“平等、正义、尊严、自由”等基本人权，都与我们所有人有关。

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自己和他人的权利；每个人，也都可以而且应该，在日常生活中“采取行动”，以维护那些能够保护所有人的“平等、正义、尊严”的权利。

2023年的初冬，东欧已经寒风凛冽；一位名叫 Jimmy 的美国人，背着十字架从波兰华沙一路步行到乌克兰基辅。

并非“巧合”，今年刚好与耶稣基督同龄的 Jimmy，特意为自己的 33 岁，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身着白色衣服，一个十字架和一顶帐篷伴他一路同行。

每个人不一定都“效仿” Jimmy；但只有走上街头巷尾，才能砸碎“枷锁和牢笼”，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即使需要数代人的“薪火相传”和“接力传递”，只要全球华人“个个紧握”“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这一“最强大的武器”，那么“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就充满“希望”，并且指日可待。

全球的华人们，让我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不同时区的同一时刻“遥相呼应”，挺身而出，走出家门；以同一方式现身，为自己发声，为他人呐喊，让“平等、正义、尊严、自由”早日真正实现！让“那一天”早日真正到来！

就用常识的方式，开创千年未有之非暴力变革新局面

作者：杨百尼

前言：从一个两代人困惑多年的问题说起

八九六四民主运动过去三十四年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时，我还只是个到省城求学的懵懂农村少年，对政治的认识大体停留在教科书及官方的宣传层次上，但那时我对于这个国家的城乡差距、社会不公、不平等，我就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步入社会后，由于外贸工作需要提升英语能力，我经常收听 VOA、BBC 等国外电台节目，透过无线电波，使我了解到自由民主国家对中国社会的真实报道以及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看法，从此，无意中开启了我的自由民主思想，使我逐渐形成独立思考分析判断的习惯。香港主权移交前我经常去那里出差，对自由社会与自由经济的体验，使我对自由的珍贵有了切身的体会，让我对中共政权的洗脑愚民产生越来越强的免疫力，直到如今，再也没有回过头。

我父亲是个退休教师，湖南许多老人对于美国日本台湾问题如数家珍，有点像早年北京的哥对中南海的那些事张口道来的意思，谈论起国民党民进党就像说自己县城里的麻将馆一样。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间，尤其是智能手机普及后，老人家对外界的信息越来越关注。前几年，每次我回老家，他总是对我说一个让他特别困惑的事：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中国有那么多当官的有钱的有知识的人去过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有那么多厉害的学者专家教授还有世界级的企业家，明明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问

题，可为什么几十年了政治方面还是没有丝毫进步？作为一个在民营企业工作了多年的人，我父亲困惑的问题，也曾经是我反复思考的问题，并且，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海外的民主运动，也参加过国内的一些公民行动，二十多年前还发起创立过社会公益平台。在多年的社会实践和观察思考之余，我也常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八九六四民主运动过去三十四年了，互联网的普及并没有带来民智的广泛开启，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产阶级的崛起也并没有带来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中共政权在经历各种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危机，包括民主运动及公民维权对其合法性的严重挑战后，中共的统治不仅没有任何的松动，反而越来越巩固，对这个国家社会与人民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几乎达到了滴水不漏、铁板一块的极限程度。

六四民主运动至今年 7 月三十四年来，我一直在中国生活，在国内亲自见证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冲击。例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邓小平南巡，香港主权移交，江核心推出三个代表，台湾政权第一次和平轮替，历次台海危机，中国加入 WTO，911 恐袭，北京奥运，零八宪章，金融危机，胡温搞和谐社会，习近平登顶，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习修宪，新冠疫情三年的动态清零管控，俄乌战争，中共二十大定习于一尊等等。过去三十四年，我亲自感受了各种重大的国际国内政治事件对中国社会思潮及民间心态的影响，以及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的变迁。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观察和思考，对于上述问题，我早已有了比较清楚的答案。因此，对于未来中国非暴力变革的思路、方向和方法，多年前我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受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的启发，早在 2009 年我就打算写一本《国家的误会》的小册子。今年我已经完成了该小册子的大部分内容，本文正好是该小册子的一部份。

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认知决定方法。正如寻医问诊，只有透过表象切中了背后的真正病根与病因，才能拿出标本兼治、长期有效的药方，非暴力社会运动或变革的思路与方案亦是如

此。

正如“中国行动”官网开宗明义阐明其目的：“在于终结中国数千年之专制制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真正的新中国。”诸多海外华人政治团体派别无论背景、理念及主张如何，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乃是无可争议的一个共同目标。然而，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手段、策略却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甚至有的完全对立，这归根结底是由于不同的团体派别在认识论方面存在重大差别，由此产生方法论的迥异或对立。无论如何，毋庸讳言，有一点是基本肯定的，过去三十多年来的一切民运及公民运动的结果表明一个基本事实：在怎样实现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文明国家的方式及手段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对路对头的途径和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个局面就有点像一对大学教授夫妻，结婚后该做的也看似做了许多，但多年来就是没有怀孕，一直没有爱情的结晶，最后这对高知夫妻去看医生，结果才知道男教授根本没找对地方，压根就没找到门路。这不是什么段子，而是血淋淋的现实。

这听起来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很荒谬，因为这太违反本能和常识了，但中国许多事情就是很荒谬，就是那么邪门，许多人、事物、现象就是违反常理常情和常识，某些政治历史学识与认知水平还不如一个微信公众号号主人，竟然可以位居政治局常委，所谓党国领导人，而许多本应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才干的仁人志士们，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去监狱的路上。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多年之所以造成中国种种现状，一定是没做对什么，必定是还没摸到门路。

本文就是要解决思路与方法对头、对路的问题，在此之前，需要对中国的国情做一些基本的分析。

本文不是论述形而上的道，而是尝试分析形而下的法与术，但论到过去百年中国知识分子跟中国命运的关系，以及即将到来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不能不谈知识分子，就不

能不谈知识分子的认知问题，既然谈认知，就离不开道。道的终极追问，指向终极真理与人性、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但暂且点到为止，本文文末会有一个简要的分享。

一个无比骨感的现实结论：

在我成人后，尤其是价值观基本定型后，过去近三十年在中国生活、持续实践、仔细观察并深入思考所发现的，当下中国具有自由民主宪政理念的人，其实少得可怜，就算有那么极少数，他们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实际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中共政权权贵阶层精致的利己主义，他们的基本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新左派，以及为这个体制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的新权威主义，再加上小众的儒家及新儒家，这些群体加起来才构成了中国现实社会的绝大多数。如果有人得出跟这完全不同或相反的结论，那更可能是一种视觉心理或认知理解上的“幸存者偏差”，因为身处海外自由国家，无论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上的推特，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其最密切接触或相关的，自然与中国现实社会的主流成份截然相反。

综上所述，目前而言，中国任何一个单独的群体，都不足以主导未来可持续的非暴力变革，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最理想也最可行的是，具有良知与正义感，且愿意以实际行动追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宪政的以下几个群体的联合：维权律师，知识分子，媒体人，觉醒的民营企业家/企业家。一盘散沙、群龙无首，这是中共政权最乐于见到的局面。那么，究竟谁来推动、领导接下来的非暴力变革呢？这是本文后面也会涉及到的问题，本人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民营企业家企业主一点都不傻，自由民主宪政其实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何转化一切可转化的民间力量？怎样用“草船借箭”的方式，把中共政权的基本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左派变成自由民主阵营的势能？如何创造一个非暴力变革的历史风口，并顺势而为？这些都是今后非暴力变革不能不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的非暴力抗争才

能打开突破口，迎来历史性的转折。

一、四种模式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公民抗争最大的困难和挑战究竟是什么？

当下公民抗争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是十分明显，也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的互联网里，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一切跟自由民主宪政理念、公民维权实践有关的言论，一旦出现基本上就被瞬间扼杀，注册多少个帐号都被屏蔽。中国社会的物理空间早已网格化，有任何动静基本上都被中共政权的维稳机器迅速绞杀。民主党创始人王有才承认，现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以及公民运动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谷。然而，比这更残酷的现实是，国内公民维权基本上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下面，我简要回顾过去这些年我亲自参加过或者亲眼目睹过的标志性维权运动，概略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关键原因，以为今后的非暴力行动提供更可行、更有效的方针和策略。

1. 唐荆陵律师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

2008年我在广州时，就经常跟唐荆陵律师当面交流探讨，我钦佩他在番禺太石村维权事件中的勇气和行动力，后来我看到他名片上写的甘地非暴力理念时，还是有点惊讶，我指出：百年前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虽然有阴暗的一面，但那时的印度还允许存在罢工、罢市及抗税行动，英国殖民统治者起码还是遵从普通法的程序正义，这两点在近百年之后的中国都不存在，至今都不存在，中国既不存在独立的工会，所谓的工会不过是中共政权在工人群体中维护并巩固其统治的道具；另外，中国根本不存在司法独立，一般民事刑事小案法院负责人说了算，稍微大一点的案子，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案子，都是政法委书记说了算，结果早就内定，法官只是走过场的工具。

我跟唐律师说，作为基督徒，甘地的非暴力理念我是天然认同的，但具体方式与策略，恐怕不能照搬，因为中国的民情社情国情，跟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实在相差太远了，大凡英国殖民治理的地方，还是有相对公正的法治，以及基本的人权和自由的，当时印度还存在罢工抗税本身就能够说明这一点。如果罢工这种方式竟然在中国能搞得起来，那中国的民运人士甚至都不用流亡海外了，因为中共统治之下，根本就不存在罢工的可能性，即便偶尔有零星的罢工，全部都是瞬间就被中共政权给扑灭了。最最根本的还在于，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性质，跟同期的香港是差不多的，本质上都是英国人培养出来的本土行政及法律精英们的高度自治，经济社会的高度自由，加上英式普通法的司法独立。讲白了，英国人并不依靠谎言暴力或意识形态来统治香港和印度，这跟中国是由一个像共产党这样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政党的暴力专制统治存在本质的不同。

后来唐律师发起赎回选票行动、五千天告别专制倒计时行动，以及在地铁举牌呼吁官员财产公开等等，我都佩服他的勇气，但当时我就认定他的方式不对头、不对路，那些主张基本上无法引起多少人的共鸣，更无法获得普遍认同，自然就无法持续。顺便插一句，那年有次我带唐律师去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一面旗帜——广州林献羔牧师的教会聚会（林牧被亲切称为林伯，为基督信仰坐牢长达二十余年），后来我离开广州，跟他失去联系，听说他成为基督徒了。再后来重新联系上，获悉他坐牢出来后就被困在湖北老家了。

唐律师主要靠“地面部队”单兵作战，即跟黑暗腐败不公的地方政权直接交锋与抗争，但由于团队人数太少，其无法持续是难以预计的。但无疑，在当年的条件和环境下，他的非暴力行动还是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其无畏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永远值得铭记。

2.零八宪章运动

我参加了第三批签名。必须坦诚，我不是因为认同其手段、策略、途径，而是认同其目的，就是明确宣告要实现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而参加的。在当时，就我所知，中国还没有哪一个政治运动比零八宪章更让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心动。然而，从一开始我也十分清楚，中共政权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结构化的政权，有其系统化的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统战渗透、历史叙事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体系及完备的国家暴力机器作为坚实的支撑。因此，松散的网络活动可能一时能造成一定的声势，但具体而言对现实社会带来的实质性影响是十分有限和短暂的，因此，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作用。

论参加这次活动的成员的结构，零八宪章当之无愧是来源最丰富、阵营最“豪华”、地域分布最广泛的政治运动。几乎汇集了当时知识界学术界、媒体界、公民行动界、法律界、NGO 及社会各界追求自由民主宪政非常有代表性的进步力量。然而，由于这个运动本身缺乏严密的组织性、结构性，在专横的中共政权面前的抗打击能力是十分脆弱的，这也决定了宪章运动是无法持续的。

此外，零八宪章运动的局限性也在于，只有“空军”在互联网空间以及来自海外的“海军”发生，而无像唐律师那样的“地面部队”进入社会实地空间直接跟有关部门进行抗争，因此，其在国际上上的影响很大，但对于国内实质性的影响和改变，几乎可以忽略。

3.许志永博士的公盟维权运动

2009 年夏天，我以社会公益界特别代表的身份，获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公盟的维权实战研讨会。2003 年许博士就连同另两位法学博士动议废除收容遣送恶法，此后，在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等 5 位

学者的推动下，收容遣送恶法当年就被废止，这是中国法治进程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其后，许博士又以独立候选人参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获得成功，极大鼓舞了公民人士。当时公盟还做了全国许多社会底层人士维权的案子，大多获得不错的效果。那次研讨会，我见到了温和厚道侠义的夏霖律师，以及其他众多学界及公民维权人士。当时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的气氛，与会代表大多相信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通过理性、脚踏实地、技术性的手段，一个个细分领域见缝插针，坚持行动，终有一天会改变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期间有次饭后分组交流时，有位独立参选人大代表也获得了成功的人士强调了“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理念与策略。事实上，到当时为止，这一策略还是相当有效的。

然而，我提出了跟几乎所有人不同的看法，我指出，那些公民维权个案都是可以做的，现有制度框架下能尝试的都可以尝试，这些都挺好，但有些问题始终是绕不过的，迟早是要面对的。我的意思很明确，中国社会的许多现象是症状，而产生那些症状的病根、源头，制度才是最核心的东西，而制度的理论基础，才是最终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有位仁兄明白我的意思，当即跟我说，要少谈主义，多解决实际问题。但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才是产生中国一切政治恶性肿瘤及种种社会弊端的最根本原因（当然，文化也不可忽略，但不能以文化方式解决制度问题，二者不可替代）。我明确表示，我的思路是：既要研究主义，也要解决问题，要两条腿走路，并且，其实中共政权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这么大的问题，怎能视而不见，怎能不去先解决它呢？

我人微言轻，基本上没有人能认同我的看法，当然，这些我都能理解。毕竟，每个人的思维方式、理解方式不一样，成长背景和经历也各不相同。但我坚持认为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我们都生活在共产专制制度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个中共

政权的理论基础永远是无法绕过的坎。当时，我只是觉得许博士的这条路子会比较艰难。至于“日拱一卒”，理论上也没错，但中国这么大，需要维权的个案那么多，光靠他那么几个人，得拱到什么时候呢？不首先把目光聚焦在产生这么多侵权的根本性制度上，而是仅仅着眼于解决一些表象问题。我觉得这个路子不对头，但是我完全没料到的是，第二年公盟就被北京税局一次查税一下子就查没了，更没料到的是，现任中共总书记上台后，中国的公民抗争环境急剧恶化，形势急转直下。再后来，所有既有框架内的一切行动空间，基本上被悉数堵死了。

许博士的公盟维权行动，比起“单兵地面作战”的唐律师及主要依靠“空军力量”的零八宪章运动，在许多方面都有明显突破和提升，已经发展为“地面部队”突击到纵深，“海陆空”三军协同策应的局面。“地面部队”日拱一卒式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一个个地做维权个案，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在独立参选人大、教育平权、出租车行业行政垄断等社会各个具体领域，像一口口尖针一样见缝插针地插进去，学术界占领理论制高点给予支援，媒体界协同学术界在互联网空中进行策应，辅以海外自由民主力量“海军”的声援和呼应。一言蔽之，许博士的公盟维权行动，大概是迄今为止唯一既有实际成效、又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行动。

然而遗憾的是，公盟维权刻意选择不面对中共政权的七寸（即中共政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中共政权内黑恶势力的毒蛇，只需要咬公盟一口，就足以致命，公盟就难以继。这不能不说是对所有非暴力仁人志士的惨痛教训。

对上述三个非暴力运动案例的基本总结：

唐荆陵律师跟许博士一样，都心地善良、纯粹，都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非暴力的理念，以及坚毅、勇敢、执着、脚踏实地行动的态度，还有不畏强权、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等等难能可贵的精

神。在我所亲自接触及了解的范围内，尤其是许志永博士，可能是中国最具备新一代政治家气质的仁人志士，也是最具有非暴力政治领袖潜质的先行者，并且，他的行动曾取得过许多历史性的成功，一度看起来也离未来的成功最近。唐律师跟许博士，可以说代表了“中国非暴力公民维权抗争最精锐的“地面部队”，而零八宪章运动则汇集了当年中国理论学术界最强大的“空军”阵营，在整个过程中，来自海外的自由民主仁人志士的“海军”，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三支力量，基本上代表了追求自由民主宪政力量的海内外华人的“海陆空三军”。从单兵作战能力上讲，这“三军”许多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可惜的是，这“三军”不能在同一个明确的目标、方针、路线、策略下联合起来，不能拧成一股绳，无法发挥应有的最大的能量和威力，这样一来，就难免被中共专制强权轻而易举地一一攻破了。

最根本的在于，如此具有单兵作战能力的“海陆空三军”，竟然没有一个对中共政权的七寸（即中共政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施“狠准稳”的精准打击，如此一来，就无可避免地被中共政权内黑恶势力的毒蛇反咬了，只要被反咬，后果也就不难想象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未来，这是对所有非暴力仁人志士的最惨痛最深刻的教训。本文后面部份，我将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终极解决方案。

4.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三层启示

香港反送中运动（或曰反修例）从 2019 年 3 月开始爆发，到 2022 年 10 月被港共警察政府全面镇压下结束。运动最高潮时，高达 200 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去掉两头的老少，差不多一半香港成人市民参与。论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都创下了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历史记录。作为曾经的华人自由社会的堡垒

和榜样，香港及反送中有太多令人感叹的启示，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有三个层面，每一层都对应着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对照。

首先，在过去几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港人表现出反抗专制与暴政的决心、勇气和行动力，实在值得所有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国大陆人钦佩。面对中共专制政权支持的香港警察政府的打击、镇压与诽谤，香港市民不屈不挠，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表达诉求、进行抗争，这说明了香港人的自由观念及权利意识已经普及到了很高的程度，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与自由，香港人可以怎样、以及付出什么样的行动来反抗暴政。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大陆民众跟香港市民的差距简直不能以年代算。反过来讲，当下的中国大陆也根本不具备香港社会的抗争条件，物理空间早已网格化，互联网空间全天监控无死角，无处不在的国保国安与警察，维稳经费早已超过军费，综治维稳中心遍及乡镇街道办，中共专制政权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十四亿民众的思想和灵魂，从百亿千亿资产超级富豪到草根百姓，都如中共政权砧板上的鱼肉，基本上动弹不得。不要说 200 万市民走上街头这样的空前壮举，就是哪怕两千两百市民上街游行示威抗议的现象，在当今中国大陆任何城市都是无法想象的。然而，最多时 200 万人上街，搞了近三年又如何？不得不说，在中共专制政权面前，反送中运动还是太脆弱了。

其次，由于这次社会运动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治目标，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与纲领，更没有系统的战略与策略手段，在高度极权专制的百年意识形态政党中共面前，最终轰轰烈烈地失败也不能算意外。反送中的骨干们还是太年轻了。但这些骨干背后的推动者并不年轻，例如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铭先生、传媒企业家黎智英先生，还有反送中后续的海外香港议会的领导人实业家袁弓夷先生，这些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幕后大佬都是久经政界历练或商场摸爬滚打，游历世界各国，人生经历丰富且见多识广的人之豪杰或精英中的精英，拥有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在西方国家政府及议

会也有广泛的支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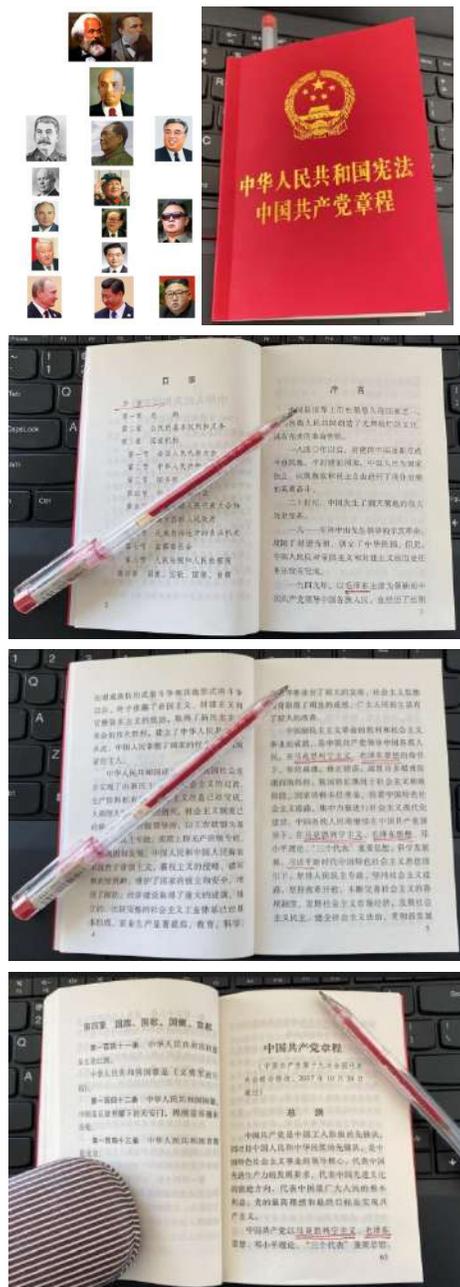
然而，这又能把中共专制政权如何？随着过去二十年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过去使用了好些年的通过西方国家政府和议会向中共政权施压或制裁，这一招已经不好使了。不仅不能取得实际效果，每一次对中共专制政权的施压与制裁，就相当于增强了其反制的抵抗力和免疫力。这也表明，香港反送中的骨干及背后的推动者，并不熟悉中共政治斗争的模式，他们大多不真正了解中共的理论源泉、发展历史与斗争策略，甚至根本没有搞清楚中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政党，就像过去二十多年香港各种政治与社会运动所展示的那样，跟在血雨腥风的历史中走过来的中共的斗争永远只会停留在幼稚园的阶段和水平。

最后，香港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沦陷，加快向着中共政权专制模式方向靠拢，表明一个残酷的事实：凡中共官僚特权专制政权的黑手所及之处，就原本自由的香港而言，从自由到专制是何等地容易，就一直处于专制的中国大陆来说，从专制到自由是何等何等的艰难。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究竟什么才是最大的困难与挑战？

如前所述，无论是中国大陆公民维权运动的“海陆空三军”，还是作为自由堡垒和旗舰的香港，所有抗争无论成因、诉求、表现形式及过程如何，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都没有打到中共政权的“七寸”。这就造成类似本文开头那个比方所说的情况，一对大学教授夫妻结婚多年未孕，不是因为没同房共事，忙活了 N 年，而是因为没找对地方、没找到门路。

中共政权的七寸，在下面这组图里，在决定中共政权的来源、性质、目的之两份重要文件里。



优秀奖 就用常识的方式，开创千年未有之非暴力变革新局面

也隐藏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遍及每个角落的下面这些招牌后面：



注：街道办的行政级别相当于乡镇，只是比村高一级，是中国政府行政级别的最末端。全中国街道办/乡镇政府门口都同时挂着至少五块牌子：党委、政府、人大、纪委、人武，这明确象征着中共政权的党大于一切、党领导一切、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

豪华气派的街道办大楼中国遍地可见，想想：中共专制政权的机构臃肿、人员庞大到了什么程度！（图片来源于网络）



美国那么多州政府、市政府办公室，有没有中国最低一级的基层村委/社区委员会办公楼豪华气派？（图片来源于网络）

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海内外的自由民主运动，还是公民维权

抗争行动，其实最大的困难不是别的，不是中共专制政权的暴力与维稳机器太强大，而是无法认识到中共专制政权的七寸和软肋在哪里。最大的挑战不是别的，而是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彻底地搞定中共专制政权的七寸。

这就是早在 2008 年，我对唐律师说过不能照搬印度的非暴力模式，也是 2009 年我跟许博士提到有些事终究不能绕过，以及跟当时的某位仁兄说过“既要研究主义，又要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中共专制政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也是中共专制政权的七寸。

中共专制政权的现实就是这样：你跟他们讲法律，他们跟你讲政治；你搞维权，他们把你维稳；你举牌呼吁官员财产公开，他们说你扰乱公共秩序；你倡议普世价值，他们直接把你专政。中共就是法律，总书记就是最高大法官，他怎样修宪都行，但你要是跟他们讲修宪，他们就说你颠覆政权，直接判你十几年。

那么，他们究竟仗着什么为所欲为？他们究竟凭着什么无法无天，每天都在肆意践踏甚至他们自己制订颁布的法律？归根结底，不还是他们手里握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个紧箍咒？既然追求自由民主的公民维权界仁人志士们怎么做都是被打压、被构陷颠覆政权而坐牢，那还不如干脆把被中共政权颠倒了了的再颠倒回去，不如干脆直截了当地把中共政权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毫不犹豫地扯开，还不如干脆把具有中国特色新时代皇帝的新装公开说破。

其实，在 2008、2009 那两年，我已经充分做好了投入公民行动而坐牢的心理准备，我甚至都已经跟我父亲明确说了，万一我这个儿子没了，他还有四个。然而，后来我看到公民维权界那么多仁人志士，没有一个对解决中共专制政权的七寸感兴趣的，几乎没有碰到一个理解并认同我的，如此，我意识到：如果我因为反抗中共暴政坐牢了，不能引发成千上万的人跟我做同样的事（直接搞定中共政权的七寸），那意义何在呢？对于推动中国向自由民主宪政转变

能带来什么真正的改变，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呢？一个秦永敏要坐 30 年，一个王炳章要坐 21 年（如果中国不变天，看来可能要把牢底坐穿），一个刘晓波要坐 11 年，一个任志强要坐 18 年，一个孙大午要坐 3+18 年，一个许志永要坐 4+14 年，但如果一切自由民主仁人志士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中国国内涌现出成千上万个秦永敏、王炳章、刘晓波、许志永、任志强、孙大午，如果有一万个仁人志士同时不怕坐牢，那么，他们可能最多坐一年，如果同时涌现出十万个仁人志士，那么，他们可能进去六七个月。中国这么大，14 亿人口，难不成没有十万个勇于行动的仁人志士？

这也是 2009 年后，我基本上就没怎么直接介入公民维权行动第一线，而是在侧翼或后方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提供支持的主要原因所在，例如，有些维权机构被税局罚款百万，需要紧急筹集罚金，我及时尽力捐款以解燃眉之急等等。以及，为了今后非暴力的变革做理论上及思想上的准备。他们在牢房里奋斗，我在书房里战斗，十年磨剑，锻造“批判的武器”，为了今后与仁人志士“海陆空”三军会合，以进行有效的“武器的批判”，使中国的非暴力变革早日开创新局面，早日促成历史性转折，以使他们早日出牢房得自由。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虽然属于一种“类地心说式”“类盲人摸象式”的理论和信仰，但马克思的许多见解却是十分精辟和有道理的，典型的例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对于中国的国情而言，我还得补充一句：反过来说，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而以唐律师许博士为代表的公民维权界的“海陆空三军”中的“陆军地面部队先锋”最大的失误，恐怕恰恰在于尝试用武器的批判去代替批判的武器，换言之，只着眼于细枝末节的维权案例这些技术性芝麻，而忽视了中共政权七寸的那个战略性大西瓜。

而作为中国泛公民运动的“海陆空三军”中“海军”的海外民运人士们（其实完全可以形成至少五个航母战斗群），由于他们身在自由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北美、西欧及澳洲，完全不存在像唐

律师、许博士等等仁人志士那样需要在中国大陆跟中共官僚特权专制政权进行一线的直接“地面作战”，他们完全没有失去人身自由的风险（除非像王炳章博士那样反向润向中国），他们最有条件把解决中共专制政权的七寸的批判的武器打造好，并对中共政权的七寸（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从“海上”“空中”进行致命的武器的批判，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看到这样的迹象，目光所及更多似乎是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不是不能搞，问题是，在中共这样一个以恐怖暴力起家，如今又靠暴力加谎言维持其统治的极权专制政权，行为艺术的实际作用与效果，跟在屠杀以色列儿童孕妇老人的哈马斯恐怖武装面前摆弄玩具 AK47 有什么本质区别？

关于公民抗争最大的困难和挑战的基本结论：

由此可见，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的自由民主运动，或是公民维权抗争行动，其实最大的困难和挑战不是别的，并不是外部的环境与条件，而是自身的认知、理解、思维、心胸和格局。

客观上而言，中共政权已经异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政教合一的皇帝新装的最高阶段，已经异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特权专制极权的新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其拥有的强大的民营经济力量是前苏俄帝国根本不具有的（创造就业、纳税、出口均超过70%甚至更多，仅仅一两个不拿国家投资白手起家的民营互联网高科技企业为工人农民阶级创造的就业，比整个党营官营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就业的总和还多得多），其拥有的控制人民思想言论的互联网人工智能高科技手段，以及其意识形态及宣传舆论部门对亿万民众洗脑灌输的成功，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欧洲以及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无法想象的，其一党独裁专制所能运用的集9800多万党员、十多亿人口的综合国力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统战工具和资源，是任何自由民主国家两党或多党轮

替的任何一个政党都远远不能企及的。

这就决定了，如果仍然按照过去三十多年的老思路与老办法，一切海内外的自由民主或公民维权力量，都丝毫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极权专制政权的诸多客观因素，不仅改变不了，任何不对头、不对路的思路和方法，反而只会增强中共政权的抵抗力、免疫力与反制能力，这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毋庸讳言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变成现在这样的，而是在对内与对外的种种互动与张力的合力下，包括国外的民运及国内的公民维权抗争，才形成了目前的局面的。

这就决定了，一切海内外的自由民主或公民维权力量，只能转变自身的认知、理解、思维、心胸和格局，并相应转变思路和行动策略，唯如此，今后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宪政才有可能开创新局面，才可能出现历史性的转折。不然，恐怕再过三十年，中国也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

转变认知，首要的就是要认识到对于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要么就不玩、要么就不动，要玩、要动就玩真格、动真格的，要动就直接瞄准中共专制政权的七寸，并且要实施降维打击。后面的部份我会论述这个降维打击的具体思路和方法。

中共政权这种高度类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专制极权政权，决定了一切去中心化、无组织化、零散的、偶发的事件和运动，甚至都伤不了中共政权这个庞大机体的皮毛，这就决定了未来中国的非暴力变革的方程式，万变不离其宗，必然脱离不了这样的铁律：思想运动开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组建联合团结的统一政党→争取自由民主及权利的抗争与斗争→最终实现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中国。

都这么多年了，如果现在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还不痛彻心扉地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还对罢工、罢课这类英国殖民地才合适的抗争手段存有念想，还想着成千上万的人穿上某种颜色的衣

服走上街头就能改变中共政权的颜色和底色，那恕我直言和忠言，跟中共政权的斗争就永远只会停留在幼儿园的阶段，哪怕再过两个三十年都会造反不成。

香港的众多民主运动大佬们，例如香港民主运动之父李柱铭先生，先从服装实业转身进入传媒业而后进入政治运动的黎智英先生，他们无法意识无法认识到这一点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是在港英殖民统治的充分自由和公正的法治环境下成长并成功的，但在中共的马列毛教育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大陆自由民主和公民维权仁人志士们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那未免就太可惜太遗憾了。

讲白了，当年中共怎样走过的路（建党→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一切自由民主进步力量，最终也无可避免也要走一遍（建党→非暴力变革→优化政权），唯一不同的是绝不采取暴力手段和流血的方式，第二个区别是不以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而是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实现为奋斗目标。不能因为中国民主党一次两次建党不成，就认定这条路走不通，那只不过是民主党等其他带有自由民主概念的政党的思路和方法不对头，并且没有解决中共政权的七寸罢了。

二、两个案例：对两类典型认知偏差的分析

上面我已经指出一切海内外的自由民主或公民维权力量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并不是客观环境与条件，而是其自身的认知、理解、思维、心胸和格局。下面我简要举例来说明。

1.动态清零政策的终止，真的是由白纸运动导致的吗？

前两个月，我在简中推特上注意到一种说法，认为中共政权的动态清零政策是由白纸运动导致的，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我挺惊讶，后来又陆续从不同账号听到同样的观点，我才意识到这种观点在海内外泛民运及公民维权人士中不是个别现象。

疫情三年我一直在国内，我十分清楚动态清零政策终止的原因根本不是这样。真正的原因是，动态清零政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外资供应链加速撤离，大量民营企业倒闭，失业率创历史新高，外贸出口、国内消费、投资基建三驾马车全部失灵，这导致税源严重失血，给中共的统治造成了根本性的危机。但这还不是最最关键的原因，因为中共这样的极权专制政权根本不存在需要对选民负责的问题，更不存在所谓的有效监督，即便动态清零政策带来了如此大的损失，受损失最严重的民营经济界的大小工厂公司商户，也没有出现像样的反抗，如果动态清零政策继续下去，实际上社会各界拿中共政权也没办法。事实的真相是：由于无止境的折腾，中共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基层政府及医疗系统，早已不堪重负、根本就吃不消，无论是从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难以为继了，这才是动态清零政策终止的真正原因。

过去十多年，我一直住在两个特大型省会城市的大学城附近，几乎每周我都在大学城穿梭，我走得近的朋友中，本身就有不少大学城的老师，我的社交圈子也不算狭窄，可以说，事实跟海外人士想象或从网上看到的正好相反，白纸运动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关注，也极少有人谈论，即便偶尔有，也就像一个小小的插曲，像一阵风一样就迅速散去了。之所以造成一些人士认为是白纸运动导致了动态清零政策结束的错觉，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脱离了中国的社会现实，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上类似“幸存者偏差”那样的认知错误而造成的结果。

不妨反过来想想：给中国的经济社会运行造成天文数字级别的损失都不足以改变中共政权最高统治层的决策和意志，而仅仅靠一些偶发性、无组织、无明确政治诉求、相当含蓄的学生行动，就能让如此顽固的中共极权专制政权最高统治者回心转意，既然如此，那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事情岂不是多搞几次白纸运动就可以轻易改变了？当年中共在天安门是怎样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

生的？现在的中共即使对自己人——仅仅是委婉表达不能武力攻台的军方将领都将其人间蒸发？难道仅仅因为一些学生举起白纸，中共的江山、本性和本色就都突然改变了？天下真有这么简单的事吗？

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相当一部份脱离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二三十年的人士，对于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符合实际情况的认知与分析，这就造成认知偏差，必然得出偏差的诊断，而偏差的诊断必然开出偏差的药方，结果必然是不对头、不对路。

2.如果要帮中共的大忙，恐怕没什么比这种思路和主张效果更好的了。

不知道具体有多久了，海外一直存在分省或联省独立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海外似乎颇有市场。在自由民主国家，只要不是纳粹主义、恐怖主义、种族歧视，言论自由就可以得到保护，各种思想观点都允许存在，不管是真的有这种想法，还是作为一种情绪的表达或者姿态的展示，都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如果放在中国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则肯定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了。即便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甚至美国的德克萨斯能够获得独立，也不意味着中国的分省或联省独立有任何现实可能性，因为中共政权的性质跟上述国家的政府性质根本就不同，人家可以搞公投，中共只讲拳头，谁的拳头硬得过、赢得过中共？如果不信，只管去试。

这里，我只想提醒一两点：稍微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是没有过南北或东西分裂甚至四分五裂的时候，但整体来看，在统一与分裂这两种历史发展选择里，究竟哪个是绝对主流？哪个的时间占绝对优势？再者，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我想，只要稍微认识到这两点，就不难意识到：除非中华民族将要灭亡了，个别省份或联省独立才有可能。然而，存在中华民族将要灭亡的可能性吗？

今年夏天北方那么大的洪水，成千上万农民的房屋农田被毁，财产损失不计其数，那样生死攸关的时刻，当地市委书记市长集体失踪，政府部门的物资堆积如山，但农民跪求食物饮料，有关部门就是不给，成千上万小汽车堵在高速公路入口处迫切等待逃生，但公路管理部门就是不放闸。性质如此恶劣严重的政府灾情管理失职，换在任何稍微正常一点的国家，都会造成严重的执政危机。然而在天朝这样的神奇国度，如此严重的洪水危机，竟然被日本一次核废水排放就轻而易举地转移了。如今，网上还有谁关心北方那些灾民？

毋庸置疑，中国任何省份或联省搞独立，不仅毫无成功的可能性，反而在客观上相当于是帮了中共政权的忙，中共政权最需要这种概念、题材或者说外部的敌人来转移其内部的矛盾，以达到巩固其政权、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关于这一点，除了现实的警示，也不乏历史借鉴。中共政权本身极度缺乏合法性的资源（甚至根本就没有经得起推敲的合法性），试想：任何分省或联省独立，姑且先别提成功的概率，只要中共政权的宣传机器稍微开动一下，不正好为中共政权提供了类似日本搞九一八的题材，间接增加中共政权的凝聚力，帮助中共转移内部矛盾并巩固其政权，不正好帮了中共的大忙吗？

退一万步，就算百万分之一的机会分省或联省独立成功了，难道就必然意味着那些获得独立的省份能走向自由民主和宪政？答案不言而喻。可见，根本性的问题不在于这里或那里独立，而在于透过全面彻底的政治变革，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如果将来中国的每个省都像现在的台湾或韩国那样政治充分自由民主，经济高度繁荣发展，人民的生活有尊严有保障，各地还有分离的必要吗？

因此，分省或联省独立，出发点在于削弱或瓦解中共政权，但实际上真的搞错了斗争的方向，不仅没有丝毫可行性，反而会帮中

共政权的大忙。

3.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衡量行动与效果之间的关系？ 以及内因与外因究竟哪个更重要？

如前所述，由于与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脱节，一部分人士产生认为是白纸运动导致了动态清零政策结束的错觉，这种认知，同样也可能造成其他方面的错觉，典型的就是对自身行动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认知的偏差，与此并发的，也可能把变革要素的内因跟外因的重要性混淆错置。

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动用外部力量对中共政权内部施压方面，可能没有谁比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铭先生的历史更悠久，恐怕再也没有谁造成的影响比余茂春先生所造成的影响大了。

通过影响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政府及议会，以达到对中共政权进行施压及制裁的反共路径和模式，可以说有作用，也可以说实际上没什么作用。说有作用，是因为这种路径与模式，的确看似限制了中共政权的某些能力，例如高科技领域所必须的芯片等，这使得中共政权在关键的军事科技领域的发展受阻三五年甚至更长，或者迫使中共政权付出更大的代价。说实际上没什么作用，是因为这种外部的压力，不仅不能削弱中共政权内部的凝聚力，客观上反而强化了中共政权的统治，道理很简单，中共专制政权并不需要对自由民主国家的选民负责，它不需要对中国人负责，其权力也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它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反而可以利用这一不利的外部环境，树立一个明确的敌人，操控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增强其内部的凝聚力，以巩固其统治，实际上，中共政权就是这么做的，并且做得一贯很成功。

人类政治变革史可以证明一个基本规律：外因只是诱发性、催化性的，内因才是决定性、根本性的，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如果把内因跟外因的关系搞反了，势必会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从这

个意义上讲，今后中国的社会变革，应该越多发动国内民众、依靠国内民众的力量，讲白了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转化国内民众，以获得越来越广泛有效的群众基础。只有国内的工作做足做到位了，再借助外部的力量，才可能产生实际作用。所谓天助者自助，打铁还需自身硬，堡垒必须先从内部攻破，正是这个道理。

不能一味地认定为中国创造就业、纳税及出口创汇均超过 70% 的民营经济人士都是软骨头，不能一杠子扫翻一船人地认为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脊梁都被打断，也不能一味地认定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全部都是无可救药的脑残，他们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骨肉同胞，更不能认为所有中共政权体制内的官僚都是一模一样、都是坏事做尽无恶不作的秦桧主义者、魏忠贤主义者。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真的不要怨别人软骨、脑残，也不要老是强调共军太强大，相反，还是要反思为什么不能成功转化他们中间那些能够分化和转化的人。

没错，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一边吸引、寻找志同道合者，一边转化一切可分化和转化的力量，两手都要抓，两条腿走路，这并不冲突和矛盾。想想当年中共是怎样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吧！我个人觉得，真的还是要虚心一点、谦卑一些，中共虽然大多已经异化为其对立面，但作为一个从血雨腥风残酷斗争走过来的百年老党，无疑他们 1949 年前的许多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只有学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促成合作者越来越多、竞争对手越来越少的局面，并转化分化一切能够转化分化的力量，自由民主跟专制极权的力量对比才能可能出现历史性的转换，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才会迎来历史性的转折。

意识到这些，就会更加冷静地直面一个现实：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究竟海内外自由民主力量在国内拥有多少真正的群众基础？如何像一个半世纪前的马克思那样，即使人死了还有人不断按照其世界观体系认识世界并持续自发组织起来改造世界（并非要学习其

暴力革命)。如何像当年的中共那样在宣传组织策动等多个方面，就是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理论联系实际这两方面都获得实质性的成功？如何像当年的中共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甚至把国民党的人都转化为自己的人？这些才是决定今后中国自由民主生死攸关的问题。除非就是只想一门心思搞定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议会和机构，或者就是要沉浸在行为艺术、“幸存者偏差”那样的主观感觉中，而对国内的群众基础丝毫不感兴趣，那么，以上问题都是不能不高度重视、不能不认真思考、不能不千方百计去解决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对国内真实的群众基础丝毫不感兴趣，其实就相当于对未来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实际上不感兴趣。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几十年如一日地搞民主呢？



三、由此得出中国非暴力公民抗争实战的新思路、新方向及新策略

以下，本人提供三个版本的公民非暴力抗争实战的新思路、新方向及新策略。

A 版本，低配版：以言论自由作为切入点、突破口

如果一定要把自由（思想、言论、出版、新闻、信仰）、民主（各级各类选举程序及制度）和宪政（分权与制衡）这三个价值做个优先排序供选择，那我毫无疑问首选自由。在各项自由中，又以思想言论自由为最优先最紧迫。在整个国内互联网上，已经毫无基本的言论自由，这毫无疑问是当下一切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最大痛点，扼杀言论自由背后最大的黑手是中共专制政权意识形态管理当局，及其统领下的网监部门，以及沦为中共专制政权统治工具的各大互联网门户、社交媒体、社交工具及视频内容幕后的内容审查机器。讲白了，具体而言就是中宣部及网信办，这两个部门是互通的，其领导是互换或兼任的。当年中宣部一个人一句话，就基本上灭了南方系媒体，说中宣部相当于中世纪的真理裁判所，网信办类似于中国的网络沙皇，一点都不为过，他们罪大恶极，反动透顶，他们对思想言论自由的禁锢扼杀绞杀的性质，比中共政务系统那些大小老虎硕鼠们的经济腐败恶劣十倍百倍都不止。

无需隐瞒，我自己就是这个罪恶的审查制度及系统的多年受害者，数年前我研发了一套互联网社交软件，由于运营需要，配套运营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由于我的软件功能及用户特性，我的公众号内容绝不涉及时政社会热点，但即便如此，过去三年来公众号运营越来越艰难，每次辛辛苦苦写的文章经过腾讯系统严格审核后好不容易推送成功，瞬间就被恶意投诉而屏蔽了，虽然我知道申诉肯定不会成功，但我还是尝试了 N 次申诉，最后放弃了。我也认真找过

资深律师准备对腾讯公司发起诉讼，律师说这种案子法院根本不予受理，再说，我也没那个时间和精力跟腾讯公司耗。

每次我经过腾讯系统严格审核后好不容易推送成功的文章，然后又瞬间被屏蔽时，总会收到腾讯公司这样的通知：“你的公众号文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删除”，但至于究竟是文章的哪一句话违反什么法律法规的哪一条，腾讯公司就是不明确告知。之前我还有几个公众号被封号，收到的也是类似通知：“你的公众号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已被停止使用。”

三年前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活活压死时，抖音上有个自媒体帐号发布了一条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讲话视频，大意是“黑人的命也是命，中国政府敦促美国切实保护人权”云云，我忍不住在下面回复了一句评论：“讲得太好了，要是不照着稿子念，那就更好了”。因为那条视频里赵立坚几乎是每说半句就低头斜眼瞟视下面的稿子。我的评论当时成功发布了，但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抖音的通知，说那条评论因为违法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删除了。

过去三年疫情期间，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后，我亲眼目睹了无数本着基本良知与理性的分析和评论内容，一次次被屏蔽，一次次被封号，其中包括众多国内知名学者、律师界、媒体人、公民维权人士的帐号，至于其他类别有影响力的，以及不知名的，被这样屏蔽或封号的帐号，就不计其数了。与此同时，但凡胡叨盘、周带鱼、司马夹头及超级五毛大 V 占豪等等一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事实的文章，却能总是能大行其道、畅通无阻，这让任何尚有基本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无法不产生强烈的被压迫与不公正感。

毫无疑问，腾讯公司、字节跳动的这种行径才是实实在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更是违反宪法第 35 条之言论自由的原则和精神的。在我看来，每一次腾讯的微信公众平台对经过其审核而推送出去的文章的屏蔽，都是对公民思想言论自由与权利的剥夺，每一次这种情况下收到腾讯公司的通知“你的公众号文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而被删除”，就好比马化腾收到法院这样的通知：“马化腾，你爹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被有关部门执行了枪毙，至于你爹究竟是干了什么、违反了哪部法律法规的哪一条，有关部门就是不告诉你。”

以腾讯公司为代表的这种侵犯践踏公民思想言论自由的行径性质极其恶劣，其恶劣程度跟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其实是类似的，在我看来，腾讯公司每一次这样的恶行，甚至比一个中共三个代表大小老虎硕鼠贪腐一千万一个亿甚至更恶劣，他们贪腐千万上亿，本身就是他们败坏的报应，因为他们成了金钱的奴隶，但每扼杀一次自由，就是对公民正当的自由意志及思想灵魂的强暴。政府的罪恶归政府，腾讯的罪恶归腾讯，没有任何借口。

行动方案：互联网言论自由与权利被侵犯被践踏的千百万受害者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要求腾讯、字节跳动及微博，在删除本身已经通过平台审核而成功发布的内容（图文、视频）的通知里，须明确告知究竟被删除的内容的具体哪一句、哪一段、哪一处违反了什么法律法规的哪一条，才被删除。封号更应如此。

方案特点：从务实可行的角度出发，本方案的诉求并不指望废除言论审查制度，而是要求互联网公司的言论审查本身应该符合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本身应该尽到依法明确告知的法定义务。这既是对写在宪法上的公民言论自由保护的最低要求，也是对有关部门及互联网平台违法行为的纠正。这一诉求，关系到千万计互联网从业人员的生计，跟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对此我有切身体会、切肤之痛。

主要难点：一旦联合行动，就必然要求一定的组织化，一旦组织化，就触犯了中共政权的大忌，就会面临中共政权的残酷非法打击和镇压，中共政权肯定会枪打出头鸟、杀鸡儆猴。但如果不联合行动，则言论自由这个最最基本的自由永远会处于被肆意侵犯和践踏的地步。一旦组织化，组织者、牵头者、主要召集人就必然面临

重大的人身风险。谁家没老没少，哪个成了家的没夫没妻？哪个人的自由不宝贵？这看似是个悖论，但本文后面会有对这个悖论的终极解决思路和方法。

不自由，毋宁死，如果连最最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人活着跟韭菜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天下苦非法言论审查久矣！千百万互联网从业者苦中共网络沙皇久矣。顺便说下，那位三个代表里的中国网络沙皇鲁炜，曾经的新华社副社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副市长，最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兼国家网信办主任期间，彻底暴露了其贪腐硕鼠的本质，这位三个代表中的硕鼠代表作恶多端、良心坏透，是具有中国特色新时代江青主义者的典范，最终多行不义而落马了。虽然这个良心坏透、恶贯满盈的三个代表里的中国网络沙皇彻底完蛋了，但邪恶的中共专制政权的言论审查制度丝毫没有改变，一个鲁炜倒下了，还有成千上万个鲁炜那样的三个代表活跃在中共党务系统的宣传部门里。成千上万个鲁炜那样的三个代表们所仗着的一整套邪恶的言论审查制度与机器，正是互联网信息时代维护中共专制政权最重要的工具。作为这个邪恶制度多年的受害者，这也是本人费尽千辛万苦，非得要把这篇六万余字的长文写出来、并发表出来的重要动力之一。

B 版本，中配版：去掉《宪法》中违反宪法精神及法治原则的因素

行动方案：要求用明确、具体、无可争辩的法律语言及逻辑，来解释宪法里的一些名词，例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例，《宪法》应该解释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我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但我手头正好一份 1974 年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根据这份文件黑字白纸的证据，毛泽东肯定是尊崇秦始皇、反对孔孟儒家思想的。假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构成要素，那么，《宪法》就应当把这一点包含进去。

我不否认中共中央拥有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独家和最高解释权，正因为如此，《宪法》应该对于什么是、什么不是“毛泽东思想”应该具体解释和说明，不然，就会产生混乱，让人无所适从。

既然依法治国，那么，就应该按法治的原则把《宪法》术语及条文明确化，不然，那还怎么叫依法治国呢？那岂不是彻头彻尾虚伪的法治，实质是赤裸裸的人治了？

方案特点：本方案旨在尝试通过理性逻辑与法治思维的方式来消除中国《宪法》中反宪政、反法治的因素。中共和国宪法其根源明显是以政治代替法律，或以政治僭越法律。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政治学、政治哲学本身是极不确定和十分主观的，因此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而法治的原则却可以也必须是相对客观的、稳定的，至少从形式上应当具备程序的正当性。本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真正的法治，应当是政治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中共自己也是这样宣传的，既然如此，除了“毛泽东思想”，更应当对究竟什么是《宪法》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法律上解释，因为毕竟马克思是一个活在遥远的一个半世纪前的普鲁士犹太人，并且是一个否认举世公认的古老犹太智慧与经典、数典忘祖的非理性犹太人。而列宁活在一百年前的俄罗斯，他按照马克思“盲人摸象式”的世界观建立的苏俄极权共产帝国早就崩溃解体了，他的思想已经被他们俄罗斯人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那么，这样的纸北极熊的历史垃圾，为什么竟然要放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宪法里？

主要难点：跟低配版方案类似；并且，还可能面临任志强先生、刘亚洲将军所面临的风险。岳飞被秦桧害死，彭德怀只是为3000万被老毛荒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活活饿死的农民喊冤，也被老毛整死，至于被毛最后一任老婆构陷迫害的人，就更加多如牛毛了。自古以来直到如今的中国，善良正直者都可能被奸佞邪恶者迫害，但即便如此，这个世界总存在有良知的勇士。况且，中共党

员任志强都舍得一身剐，中共政权体制内的高级将军都表达出绝不能武力攻打台湾的不同的声音，那么，自由民主的仁人志士岂不更加应该勇敢地指出中共政权《宪法》里的一切违反法治精神与宪政原则的条文与规定？

C 终极版：建党→非暴力变革→优化政权→历史性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2008 年我计划写《国家的误会》小册子时，我就想到了要创立一个政党，甚至政党的名字、纲领都想好了。当时想了两个名称：中国进步党、中国社会进步党，后一个名称，我搜索到黎巴嫩已经有同名政党，并且名字有点长，还是中国进步党简单明了，也符合追求进步这一最大公约数的诉求和理念。

今年上半年，根据过去三年来的国际国内形势，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以及我来欧洲后的亲身经历、观察和思考，我把小册子换了一个新的名字《自由的代价》，原先《国家的误会》仍然保留，作为《自由的代价》的一部分。相应的，我想到一个新的政党名称作为备选：中华进步党。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而我的想法是：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将发挥一切主观能动性、尽一切努力促成“中国行动”“公民力量”“民主教育基金会”“民主中国”“纵览中国”这五艘“航空母舰”组建一个团结统一的政党。

102 年前，13 个人在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创立了一个政党，改变了此后中国乃至人类历史的进程。难道仁人志士如云、治国安邦人才济济的这五艘“航空母舰”，到了眼下中国千年未有之变革即将来临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共总书记都有这个历史意识，并且公开跟其最亲密的朋友纸北极熊特务头子说过），都还不能创立一个引领今后中国千年未有之非暴力变革的新的政党？

我一个无名之辈，何德何能，怎么可能促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

大事？当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不二选择，是一切自由民主和公民行动永远无法绕过的坎。除了有这样的诚意、信念和梦想，我几乎一无所有。如果这一决定今后这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组党目标能实现，就是让我在里面做个默默无闻的后勤义工我都心甘情愿。

一、建党四大首要原则：三个绝不、一个坚持

1. 绝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要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
2. 绝不颠覆国家政权，但要优化国家政权
3. 绝不分裂国家，还要收复失土
4. 只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但不接受其错误领导

第一原则要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九个不是”“一个才是” “一个特别”

(1) 不让人说真话、经不起公开辩论的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2) 政府官员的财产不能公开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3) 政府官员的信仰经不起公开质疑与公开辩论的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4) 无数类似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薄熙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郭伯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三个代表们统治着且层出不穷地出现跟他们的意识形态相同、思维及行为模式高度类似的大小老虎硕鼠存在的国家，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5) 官僚特权专制盛行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6) 党营官营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7) 类中世纪政教合一本质特征的党政合一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8）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肆意违反自己制订的的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9）2952 全票通过的赤裸裸的虚伪虚假选举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10）瑞典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是人类世界最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比中共官僚特权专制政权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因素的正宗社会主义。因为：瑞典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是货真价实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即便是社民党的主席，其享受的医疗福利待遇跟普通工人与农民也没有区别，不像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享受的医疗福利待遇跟普通工人与农民相差几百倍都不止；瑞典德国普通的工人农民，随时可以公开批评社民党的主席，而不用担心被删帖封号，更不用担心被抓进监狱。瑞典德国的社民党主席，任期一到就退下来，绝不会操纵修改党章宪法寻求连任。瑞典德国的社民党主席退下来后，就跟普通的民众一样，可以回老家种田养花，没有任何高于普通民众的特权。共产主义早已被证明是乌托邦，是绝不可能的；但瑞典德国模式的社民主义还是有可能的。

（11）所谓具有中国特色，不是特在别的什么，而是特在中共政权统治阶级里像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那样的三个代表们特别贪、特别腐、特别狠、特别诡诈还特别虚伪；特在中共党务系统宣传部门特别能洗脑，特别能颠倒是非，特别能混淆黑白，特别能歪曲真相；特在亿万中国民众特别好忽悠、特别好洗脑、特别好掌控、特别好收割韭菜。之所以美国的民主制度特别不适合中国，原因就在于此。中国只适合美国的麦当劳快餐，特斯拉轿车，苹果手机，好莱坞电影。美国只适合千百万中共政权的三个代表们转移妻子孩子和票子，只适合中国留学生留学，只适合无数知识财富技术精英们移民，只适合无数中产草根千方百计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走线去润。确实，美国的民主制度特别不适合中共官僚特权专制统治的中国。

第二原则要义：关于绝不颠覆国家政权

要优化国家政权，绝不颠覆国家政权。

中共政权从政治局常委、委员、军委副主席，到书记市长反贪局长，到处充斥着大小老虎和硕鼠。一粒老鼠屎弄坏一锅汤，那么，中共政权这口全宇宙最大的一锅共产主义的汤里，究竟有多少品种型号规格类型的硕鼠和多少粒硕鼠屎？铁的证据表明，中共政权的“操作系统”早已太过时，存在太多 BUG，是导致产生层出不穷的大小老虎和硕鼠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优化国家政权的“操作系统”，这就像软件系统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进行优化一样。

优化国家政权，必须从优化制度开始，优化制度，必须从优化《宪法》开始，优化《宪法》，必须从去掉《宪法》中且违反宪法、宪政精神及法治原则的因素开始。

第三原则要义：关于绝不分裂国家

不仅不分裂，反而要团结，不仅不分裂，反而要收复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华民族的神圣领土。

（1）先以和平方式，采取“一国两制+美国购买阿拉斯加+日本购买华尔街”的融合模式收复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华民族的神圣领土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收复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后，可以成立海参崴特别行政区、库页岛特别行政区及外兴安岭特别行政区，跟香港、澳门一样拥有高度的自治。

只有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华民族、至今仍被北极熊俄罗斯普京新法西斯政权占领的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等 150 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相当于 42 个台湾还多），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怀抱时，才能算得上中华民族真正伟大的复兴。

具有俄罗斯特色新时代普京（中共总书记最亲密的朋友）新法西斯政权野蛮侵略自由乌克兰，虽然是乌克兰人民的极大不幸，但

这个北极熊特务头子犯下的致命错误，无疑将把俄罗斯带向黑暗、贫穷、混乱的深渊，最终造成俄罗斯多次解体（这也有赖于一切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的有效战略与努力）。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将是三百年来不断对外进行侵略与掠夺的北极熊俄罗斯罪有应得的报应，也是中华民族三百年才能遇到一次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机遇。

（2）先用和平方式收复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后，再用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

不是说 2300 万台湾人想跟中国大陆统一就能跟中国大陆统一，而是要中国大陆公民举行全民公决，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国大陆公民同意，才让台湾跟中国大陆统一。至于台湾是否愿意统一，那是 2300 万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他们也可以进行全面公决来做决定。

第四原则：关于只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1）只接受能公开其个人及家庭的财产，财产的来源说得清、完全合法，且接受人民监督、批评或反对意见的共产党的领导。

（2）只接受其共产主义信仰经得起公开的答辩、辩论、质疑的共产党的领导。

（3）绝不接受财产无法公开，且其共产主义信仰经不起公开辩论的共产党的领导

（4）绝不接受类似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薄熙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郭伯雄（中央军委副主席）三个代表们的共产党的领导。

二、关于建党原则的基本结论

根据以上前文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思想观念缩影的六个代表的分析，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达到 90%）的政治光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倾向，而有自由民主

宪政观念的中国人（保守的基督徒天然具有这个特性）无疑只是极少数。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不得不说，这个情况确实跟中国的政治状况是高度匹配和一致的，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自由民主道路如此艰难，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过去三十四年来一切海内外自由民主运动及公民抗争的仁人志士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那么大的牺牲，中国的政治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大幅后退的原因。

这看起来是十分令人沮丧的残酷现实。根据过去我在企业从事销售管理的经验，通常获取一个新客户的代价，平均是维持一个老客户的代价的 7~8 倍。人性是相通的，我觉得把一个本来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转换为具有自由民主宪政观念者的代价，比寻找/吸引一个本来已经具有自由民主宪政观念者的代价至少不低于 7~8 倍。对于这个估计，但凡跟自己的民族主义或此倾向的亲朋戚友谈论过美国日本台湾话题的自由民主人士，一定会深有同感，有此经历的人会发现，跟他们的探讨或争论往往是徒劳无功的，甚至还会适得其反，他们还会觉得你被西方反华敌对势力给洗脑了。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那怎么办？首先就是要认清现实，抛弃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然后就是转变认知和思维模式，改变战略方向，调整策略。既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可以为中共用，为什么不能为我们（暂且叫中华进步党人）所用？之所以我早在 2008 年构思出中华进步党的基本思路，概括为上述建党四大首要原则“三个绝不坚持”，就是为了适用中国的国情，为了“草船借箭”把占中国人口绝大比例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转变成我们的势能，只是我没预料到的是，第三条原则包含的收复东北丧失国土的纲领，无意中正好命中了 2012 年现任中共总书记上台后搞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祖国统一”的两大宏伟目标。而我构思出来的纲领，正好重新定义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祖国统一”，正好形成了对他的“联独裁者普京、犯自由宝岛台湾”战略的降维打击。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里明确宣告他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也不想对任何人隐瞒自己的上述观点，无论对 14 亿中国大陆民众，还是 9800 万中共党员，或者是成千上万海内外自由民主仁人志士。

这也是为什么 2008、2009 那两年我构思一个可能引领将来中国变革的新政党的名称时，完全没有往“自由”“民主”这类概念的方向上想，不是我不渴望自由和民主，而是我明白，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叫“自由党”，不仅得不到自由，连仅剩下的那一点点可怜的自由都会失去，如果叫“民主党”，不仅得不到民主，连做做样子哪怕是虚伪的民主都将不存在（2592 全票通过是对赤裸裸的独裁专制的明证）。并且，也是我明白，通往自由民主最短的距离不是直线，而是中间隔着至今仍被俄罗斯占领的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等 150 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15 年后的今天，再回顾当时我的构思，我越来越意识到，我的构思不是过时了，而是越来越切实了。

以上三个版本行动思路、方向、方案的再次总结

第一个最低版本的方案，应该说是门槛最低、难度最小的，天经地义地符合最低限度的公理良知与常识，也无可争辩地符合哪怕是中共专制政权自己制订的法律法规，尤其是符合《宪法》。并且，是对压在千百万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以及亿万互联网用户头上最邪恶的制度大山的反抗。千百万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及亿万互联网用户对于这样邪恶的审查制度早就苦不堪言，但这个方案甚至并不要求从根本上否定中共的审查制度，而是其审查制度必须最低限度程序合法合规。

但这个方案，最终大概率会面临许志永博士维权案例的结果。第二个就更加如此，会面临比任志强先生严重得多的后果。这就回到了一个根本问题，回到了始终无法绕过的坎——无可避免、迟早

必须走的一步，组建政党进行抗争了。

组党最大的困难与挑战

纵观百余年中国历史，没有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能绕过组党这个坎。国民党、共产党自不待言，台湾的民进党就是鲜活的明证，韩国也不例外，即便甘地在印度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要建国大党，因此，断不能因为中国民主党在国内昙花一现的组党被打压，就止步不前。相反，要像当年的中共那样百折不挠，不达奋斗目标不罢休。

在我看来，创建新政党最大的困难与挑战不是别的，不是来自中共政权的阻力，如果海外民主人士能达成历史性共识，铁了心要在海外组党，就算中共有 9800 万党员，就算中共有宇宙第二大经济体，又怎能拦得住？显然，创建新政党最大的困难与挑战不是别的，归根结底，还是思维、认知模式、胸怀和格局。

当然，道不同不相为谋。首先，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这个前提选项上，就筛选了一部份人。脾气性格志趣又筛选了一部份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不是中共政权的七寸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再筛选了一部份人。把中国的非暴力变革伟大事业跟收复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这一神圣使命联系起来，可能超出了离开中国现实生活许多年的人士的理解和想象，又筛选了一部份人，但只要不带偏见和成就，只要看看过去百余年的历史逻辑，就一点都不难发现中国的命运跟俄罗斯这个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只要在网络上稍微看看民意，就知道千百万人中国人早就有收复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的强烈想法。这还没完，还有一些突发性的事件也会分化一部份人，仅举过去一个多月发生的国内外两件大事为例。

1.国外：10月7日 Hamas 恐怖武装发动对以色列孕妇儿童老人（及音乐节部分参加者）的大屠杀。虽然以哈冲突、巴以冲突表面上看上去错综复杂，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其执政党的算盘，巴以两

个民族纪录在圣经里千年历史恩怨的延续，中东火药桶民族宗教情仇的纠缠，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汇，再加上伊朗俄罗斯这些个外部邪恶批发商（相对于代理人）的渗透及卷入，似乎剪不断理还乱，然而，人的基本良知与常识，哪有那么神乎其神？哈马斯恐怖武装对以色列平民有明确目的大屠杀，就是一面镜子，照射出不同人的良知理智与情感的光谱。这件事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把筛子，又意外地筛出了一部份人，只能说，坏事变成了好事。

2.国内：前总理李克强的突然病逝。对于李克强，推特上明显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同情理解的，以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为代表，以及恶斗狠批的，以赖建平先生为代表，中国之春网站上发布了一篇他写的《历史罪人李克强》，被多位强烈认同的海外民运人士转发。这里我无意对两种观点进行分析。我也认真看了《历史罪人李克强》，论文笔才华，绝对属上乘佳作。但显然，赖先生把中共邪恶不公的制度，跟这个制度之下每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给混淆了。并且，不可思议的是，赖先生还狠批李克强的夫人程虹女士“不是人”，因为程虹女士“自始至终没有掉一滴眼泪”。人可以有政治立场及观点的差异甚至截然对立，但作为人类，不去安慰不幸逝者的亲人也罢，还反过来在人家伤口上再狠狠捅几刀，再踩上几脚。难道不会给公众造成一种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同理心、人道精神的印象？

我个人觉得，哈马斯恐怖武装的支持者我们要远离他，但像赖先生类似的人士，我们还是要尽最大的善意、诚意、努力及大义来把常理常情和常识讲明，甚至感化他。要顾及国内民众对李克强总理及夫人的态度，不能只为显示自己反共立场的坚决而疏远中国民众的感情。

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海外民运为何难以成功？1949年中共成功夺取政权有三大法宝，其中排第一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再好的想法也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第二就是密切联系群

众，也就是当年中共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以上就是我说的组党的最大困难与挑战并不来自看似强大的中共专制政权，而来自一切海内外自由民主与公民维权人士的自身。除了自身的认知、理解、思维这些方面，自身的价值观、理念、品格、性格、脾气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自身的视野、胸怀和格局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并不是说像赖先生以及跟他持类似立场观点的，就一定不是善良诚实正直的人，他们中可能不少是悲天悯人、见义勇为、为弱势群体慷慨解囊相助的爱心人士。人性是复杂的，理智、情感、意志、品格、性格可以产生无数排列组合，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例如胡叨盘、司马夹头、周带鱼，他们一点都不傻，只是良心已经坏透；有的人真的是又坏又蠢，例如老毛的最后一任老婆江青；但有的人只是认知偏差却心地善良。

所以，组建一个统一的政党，不是难在中共看似有多么强大，难就难在要把那么多不同背景和想法的人团结并凝聚在一起，既要有相同的价值观、理念与目标，还要有对实现这些理念与目标所采取的方式、途径、策略及手段有相同的认知和理解，并且品格、脾气、性格、行事方式还要合得来。然而，我的观点很明确：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快组建一个统一的政党，绝不能等到上述价值观、理念与目标，还有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方式、策略及手段全部都统一认识了，品格、脾气、性格、行事方式都全部合拍对味了，才开始组建政党，如果是那样，组建政党的时机和条件就永远不会有成熟的一天。相反，应该是一部份人先组建政党，先把旗帜竖起来，一部份人先行动起来，有了旗帜，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一起行动，一起前进，在抗争中磨练抗战，在战斗中学习战斗，在前进中识别并凝聚更多的志同道合者。这样，中国的非暴力变革才能开创新的局面，才会出现久违多年的历史性转折。

一百多年前，浙江嘉兴那艘小小的游船上创立中共的十三个代

表，来自五湖四海，大多素昧平生，彼此更无深入了解，但他们迈出组党的历史性那一步后，一切都开始不同了，从此中国的历史就被改写了。

现在，海外的仁人志士们，毫无疑问，无论品格素养、知识水平、认知能力，还是全球视野、胸怀格局、阅历见识，都只会比那十三个代表强得多，唯一的问题只在于：当千年未有之非暴力变革的钟声即将敲响，那些心系中国前途和命运，为此已经奋斗一两代人的自由民主先驱先辈先行者们，会迈出历史性的那一步吗？

四、中国政治变革整体思路与方案的八条方针

第一条方针：比“非暴力不合作”这个提法更能引起国内亿万民众的共鸣，更切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更命中要害的中心命题（口号，主张），是“中国千年未有之政治变革”。本文已经论述这一点。

第二条方针：“中国千年未有之政治变革”，首先必然是思想观念的变革，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文就是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批判的武器。

第三条方针：“中国千年未有之政治变革”，必然是整体性、系统性的变革，这个变革必须要打到中共政权的“七寸”——中共政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如前所述，细枝末节的零打碎敲早已走进了死胡同。本文就是为解决中共政权的“七寸”而形成的。

第四条方针：未来中国整体性的变革，必然要求成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变革政党，以领导、统筹、推动、贯彻、实现中国政治变革的整体目标。本人已经把新政党的名称都想好了。只要动真格的，本人愿意当一个新政党的默默无闻的义工。

第五条方针：如果不能唤醒国内亿万民众的变革意识，激发国内亿万民众变革的强烈渴望，造成国内民众自愿、自发、自组织的

态势，最终形成国内政治变革运动的燎原之势，那么，今后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化尝试，很可能会像过去三十年一样面临类似的结局。

如前所述，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左派是当今中国社会绝对多数的现实情况下，能实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四两拨千斤”的最佳策略是把他们转变为自由民主力量的势能，而不是试图去改变他们的观念（虽然他们中一小部份可能会转变）。本方案就是这样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

第六条方针：如果不能抓住中国社会除了 9800 万中共党员之外最决定性的一个群体，则中国的政治变革很难成功。这个群体就是为中国创造就业、纳税都超过 70% 贡献度的广大的民营经济群体。

第七条方针：堡垒从来都是从内部瓦解的，如果不能有分化中共政权统治集团，则未来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宪政很难成功。重中之重是分化中共政务系统跟党务系统，分化中共党内的社民主义者或有此倾向者，分化开明务实的改革派跟极端顽固腐朽反动派。

第八条方针：如果不把国际上一切有利的因素与形势利用起来，把国内因素跟国际因素进行结合、转化，做好几篇至关重要的大文章，则未来中国的政治变革很难突破。

稍微看看过去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发展逻辑，中国之所以是今天的中国，跟俄罗斯有密不可分的直接联系。但天不绝中华，上帝还是为中国存留了最后一块自由的土地——宝岛台湾。从理论制度的根源讲，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跟犹太人马克思直接相关。由此不难看出，俄罗斯、台湾及基督教文明这三个支点/方面，是未来中国变革无法忽略的因素。

特别鸣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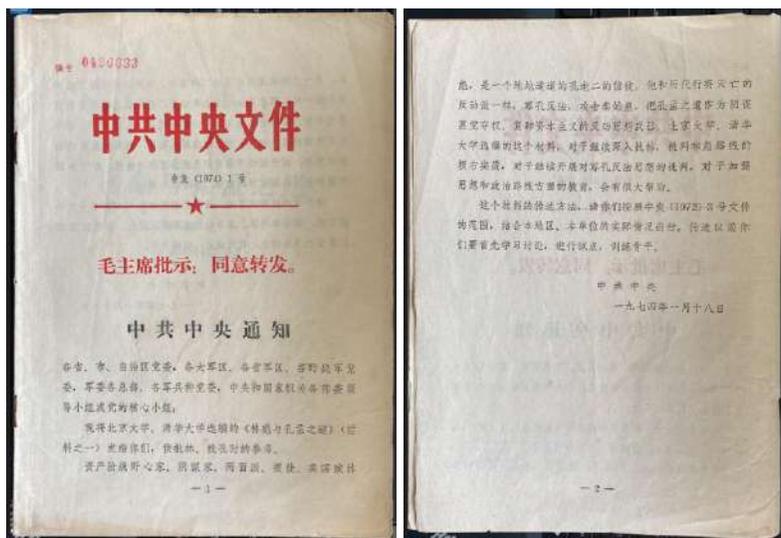
本文最初受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启发，后来又被 1517 年马丁·路德公开发布《九十五条论纲》的壮举所激励，中心主题及思

想早就存在我心里。但如果不是腾讯公司的微信公众平台一次又一次屏蔽我本来已经通过平台严苛的审核且成功发布的文章（甚至跟时政毫不相关），如果不是腾讯公司一次又一次侵犯我的言论自由，一次又一次践踏我的公民权利，我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决心把我的想法如此全面而透彻地大声说出来。因此，我必须感谢腾讯公司。

另外，我必须承认，我多少也受了刀郎的启发。他用十分隐晦的方式表达他心中所想，这使我产生一个截然相反的想法：为什么不干脆就用直白、直截了当的方式，把我的想法公开表达出来？当然，刀郎作为非专业的草根音乐人出身，二十多年来坚持他的音乐梦，也鼓励了我这个坚持自由梦三十年而从未放弃的草根公民。现在，我即将完成肖申克式的救赎，即将获得全面的自由。所以，我也要感谢刀郎。

参考资料索引

- [1] 2023 年初中共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新晋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会议上的讲话。
- [2] 《一杯苦酒》，[俄]雅科夫，新华出版社，1999 年出版。序言是新华出版社写的，引述《李慎之回忆录》毛泽东在秘书胡乔木面前对斯大林的评价。至于 1958 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自称自己是“马克思+秦始皇”，则已广为人知。
- [3] 本人收藏的“中发[1974]1 号”红头文件，有这样一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见文末照片。



非暴力不合作

一种推翻中共、铲除专制更有效的方法

作者：丁余庸

前言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管是从理论上论证，还是从实践中检验，都表明了它是一种推翻专制政权的更强大更为有效的方式。

如果对上述的结论还有什么争议的，请看以下论证的方式：

专家的书藉：

非暴力运动理论之父吉恩·夏普博士经典著作：《从独裁走向民主》《自我解放战略规划指南》《战略性的非暴力冲突》《自我解放》《社会权力与政治自由》《群众性防卫》《第一次非暴力抗争就上手》。

这些著作从理论上论证了“非暴力不合作”为什么有效，是一种在所有专制社会中实现民主转型的“一种更有力量的武器”。

过去一百多年中不同专制国家发生民主转型的案例：

- 1、亚洲地区：印度、尼泊尔、蒙古、印尼、菲律宾等；
- 2、欧洲地区：葡萄牙、西班牙、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捷克、塞尔维亚、乌克兰等几十个国家；
- 3、南美洲地区：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
- 4、非洲地区：南非、加纳、塞内加尔、尼日利亚等国家。

在这些国家，民主反对派结合自己国家所处的环境，不同程度地运用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战略与战术，成功地实现了民主政治转型。上述例子，比如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的反对派运动，还面临着其他国家军队的镇压风险，压力不比现今的中国小，空间也比现今的中国大不了多少。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非暴力不合作，同样也适用于中国。

第一章 中国民主运动的现状

经过三千年专制统制的中国，这个东方古老的国度，也是面临着民主转型的阶段，我们要介绍“非暴力不合作”这种更有力量的武器，如何切入中国，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

必须承认我们的现实状况。海外与国内，存在高程度的分散。海外民主运动几十年下来，民主阵营各派系、山头林立，一盘散沙，力量分散。国内政权对各层各领域的政治异见分子的打压，从79年民主墙运动镇压、98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成员投入监狱及将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和丁家喜分别判以14年和12年重刑，共产党政府对异见人士的镇压一直是高强度的。共产党政权利用高科技手段，监控异见分子的一举一动，显然在中国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空间是逼仄的。

本文以“中国行动”这一团队为视角，展开论述如何将“非暴力不合作”来切入中国，来实现中国民主转型。

第一步：“中国行动”的定位及民主力量的集结

“非暴力不合作”作为一种推翻专制制度的武器，而“中国行动”作为提倡在中国展开“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实现中国民主转型的组织。面对这个现实情况，中国行动该如何定位自己，该如何

团结海内外的民主力量，该如何在国内展开“非暴力不合作”，该如何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呢？

“中国行动”不是某党某派，它是一个奉行“非暴力不合作”理念的、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的组织。

坚持“非暴力不合作”是实现中国民主转型的最佳方式、最有力量的方式和最可行的办法。“中国行动”主动联系海外所有民主力量，欢迎所有民主进步人士的合作，同时也团结所有的民主力量，在民主的机制下，认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转型理论，实现海外力量的团结，实现民主力量的同盟。类似于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形成中华民主运动史上的第二次民主力量的集结。

该民主力量的集结，是包括西藏民主阵营、维吾尔民主阵营、香港民主阵营，大家共同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认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在民主的机制下实现团结。

第二步：游说世界上所有的民主政治实体，助力中国民主力量，帮助中国实现民主转型。

1、台湾政府。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是急迫的，台海是世界范围内认为高风险的地区，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台湾要实现台海和平，助力中国大陆实现民主转型，没有战争的危险，这是台湾最大的利益所在。因此，中共专制政权是台湾最大的敌人，实现中国大陆民主转型才有可能迎来台海稳定。民主政体之间，从未爆发过战争，相信海峡两岸的民主政体之间能够解决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问题。中国民主力量要借助台湾2300万人的力量，帮助中国实现中国民主转型。

2、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及欧洲民主国家。经历过中共习近平政权张牙舞爪的十余年出击，尤其是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肆虐，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终于认清了中共政权是全世界范围内和平

稳定世界秩序最大的挑战者。实现中国民主转型，是全世界民主国家获益的事情，与中国人民具有共同的利益。世界也会因此将会变得更加和平。因此，中国民主力量要有一个强大的对外团队联合民主国家，帮助中国民主力量助力中国民主转型。

3、原来共产政权现已转型为民主的国家。在反对共产专制体制的力量中，前共产国家，如波兰、捷克、立陶宛等国，对共产专制体制深恶痛绝，与中国人对共产专制体制有共同的切肤之痛。而且，从最近这些国家与台湾的密切来往可见，这些国家也选择了与共享普世价值的阵营来往，而非利益为外交导向。

4、日、韩、南亚等民主国家的游说。东南亚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就是来自于中共力量的扩张。面对这种不讲规则的专制政权，许多小国谨小慎微地与中共政权打交道。因此，这些国家也愿意帮助中国实现民主转型。

第三步：中国国内民主进步力量的集结。

这一步是最重要，也是最慎重的。国内自由民主派的力量，从毛泽东死后，出现了 79 西单民主墙、86 学运、89 天安门民运、98 全国组党、08 宪章、许与丁领导的新公民运动、郭飞雄屠夫等领导的维权运动、南街运动、秦永敏领导的玫瑰团队、白纸运动等各个群体的自由民主力量。

上述各年代的代表人物还有许多人留在国内，在日益逼仄的环境下追求自由民主，恪守自由民主阵地，不让自由民主火种熄灭。

这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具有非常强大的道德感染力，能够迅速团结国内追求进步的普通公民。

我们海外的力量该将上述各时代的有名人物及背后的团队联合起来，形成海内外追求民主自由人士的大联盟。

第二章 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共识及前期行动

一、深入了解学习“非暴力不合作”理论。

凝聚更多人的共识。不少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缺乏学习，对“非暴力不合作”理论十分陌生，只停留在字面上理解“非暴力不合作”，认为“非暴力不合作”对抗共产专制力量十分无力，是软弱的表现。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宣传“非暴力不合作”，凝聚更多人的共识。应该：1) 更系统地翻译“非暴力不合作”的书籍，系统介绍“非暴力不合作”理论；2) 根据现今网络传播的情况，制作“非暴力不合作”中文版培训视频，详细介绍“非暴力不合作”，放在youtube视频上面，让更多的人可以自由地浏览观看这些视频。3) 加大宣传，利用推特、油管、脸书、instagram 等网站，宣传“非暴力不合作”理论，掀起一波学习“非暴力不合作”的浪潮。

国内追求民主自由的公民可以通过域外网站系统地了解“非暴力不合作”理论，系统学习“非暴力不合作”，研究战术战略。

二、团队的构建

1、“种子计划”与“点”的建设。每一个城市都成立一个 10-20 人的核心团队。从安全起见，这个团队必须由他们自己寻找合适的人，互相了解，扩充团队。

在安全的情况下，通过现代加密聊天工具，每一个城市建立一个核心团队，该城市的核心成员负责与海外的一个团队进行一对一联系，互相策应。在这儿必须重点提示：所有人必须要有安全意识，了解熟悉安全通讯方式，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聊“非暴力不合作”的事情。

与之相对应的海外团队的工作，要充分理解国内的高压情况，了解国内城市团队的动态。在海外募集各项资源对国内城市团队进

行全方位的支持，策应国内城市团团队的情况。

2、“连线到面”的计划。

国内城市团队不能自己联盟，因为这样的风险十分高。因此，通过国内城市团队与海外一对一形成星状结构，由海外负责连线成面。与国内一一对应的海外团队之间，成立一个中心化的组织来负责联系所有海外的团队。

该联系中心应该公开化，形成一个公开的对外组织，树立品牌观念，方便集结海内外各种力量，高效联络。

三、操练

1、公民同城圈

认同普世价值的公民同城聚会，是形成公民社会的细胞环节。而且，也因为是这样一个环节，线下公民的聚会，是最小的行动单元。公民通过网络认识，走到线下进行交流，组成一个个小圈子，不设组织不设制度，形成一些人际粘性比较强的圈子。

目前而言，组织化存在比较高的风险，因此，作为组织化最低层次的公民同城圈，一个微信聊天群，相较而言风险较低，且是一个团体的雏形。

应该讲，公民同城圈是社会运动最小的单元，是根基。

2、大学生、劳工团体、宗教人士（基督教及法轮功）、访民等群体的合纵连横。

大学生群体最有激情，最少牵挂，追求理想时没有瞻前顾后的压力，从中国历次大的社会运动来看，大学生没有缺席过。

劳工朋友们，生活压力最大，在这个分配不公、低人权低薪的工薪体制下，是这个政权得以运作的最大的牺牲团体，要重视劳工权益，引导工人要求提高待遇，改善工作环境，提出组建工会的权利，行动起来，保障劳工权益。

宗教人士中，基督教朋友追求真理、行公义的劲力十足。从台

湾、韩国的转型来看，基督教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法轮功群体在中国的基数庞大，也是被打压被压迫最厉害的宗教团体。

3、小行动演练

针对现在社会矛盾冲突越来越多，集体事件频频高发的情况，人们有许许多多的利益受到侵害，选择一些大家共同关心、对大家具有共同利益的议题进行实战操练。

我们从许志永早年推动的“教育平权”行动上，随着这一行动的展开，许多北漂在京的家长们展开了要求自己子女在京的“异地高考”权利的行动。

在这过程中，通过推动大家关心的具有共同利益的议题，民众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团结有力的利益诉求团体。通过参与行动，与政府官员、警察等人打交道，大家会逐步增加勇气。

这种行动特别有意义，能够打造公民力量，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些行动，演练实操“非暴力不合作”的行动。

每一个城市都能找到一些公共的议题，影响大家共同利益的事件，这其中，如果有核心团队能组织大家，行动起来，就会逐步争取团结更多的人。

4、“非暴力不合作”培训。

我们注意到，国内有许多小组在秘密参加学习“非暴力不合作”的培训，虽然小组这样的小范围内培训，互动性较强，但是传播速度十分缓慢，而且中共将这些参加培训的人员一般都采取抓捕刑事判决的打压手段。

因此，应该制作专业的培训课程，将这个课程放在油管上面，可以自由观看，宣传，扩大影响。

第三章 启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当团队打造完毕，当平时训练有素，当公民社会有力量，当民

众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尤其目前中国经济全方面走下坡路的情况下，结合某个大多数人不满意的点燃民众愤怒的导火线事件，在“中国行动”的号召下，开启“非暴力不合作”的民主运动，通过多数人上街，提出“罢工、罢课、罢市”口号，提出自由民主宪政的诉求。

一、总战略

实现中国民主自由宪政，重新制宪，实现一人一票民主选举，选出议员，实行宪政。

通过发布“中国行动”先前的《讨专制檄文》，布告全体人民，中国行动的政治纲领，实施计划，实现的目标。

二、措施

1、评估你的对手。

启动运动之前，要知己知彼，了解双方的优势及劣势。

2、国内去中心化发展，国外中心化运作，国内国外协作行动。

运动暴发时，负责人很容易被抓捕。因此，每一个团队形成去中心化的运作，团队指挥人员有递补的安排。同时，与国外建立协作。海外安全的环境下，可以中心化高效运作。

3、制作标志性的 LOGO，喊出简短有力的口号，打出标志性的手势。

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最好能用自己的肢体快速打出一个标志性的手势，便于传播与行动，如果有可能，统一选择同一颜色的服饰。

4、制订行动计划，公开出来，动员社会大众人员参与。

5、与世界的沟通，外国媒体的报道，外国政府的关注十分重要。

6、强调“非暴力”的纪律性，任何时候不能采用暴力方式去对抗镇压。强力镇压会引发相应反作用，非暴力更容易获得军警的同情。

7、分化军警，让他们保持中立，消极抵抗指令。

一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能发展到警察、军队不履行统治者的指令，这场运动就成功了。

三、战术安排

1.面对镇压，如何应对？

从事政治反对运动，应该作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天上不会掉馅饼，自由也不会从天而降。因此，政治反对行动者，要清楚这一点。

统治者进行镇压，会具有反作用的效果，会增加国内维稳成本。有可能镇压下去，也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群众力量。

因此，镇压是避免不了，只有更多的人继续前进，才能避免行动的失败。

2、阶段性目标设定

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设定阶段性目标，不要想着一劳永逸，对手如果过于强大，没有给对手空间，则容易出现鱼死网破局面。

3、与安保力量进行沟通。

通过沟通，获得大兵、警察的同情，或者说他们能够消极执行上级的命令，这对于运动成功率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保证：说服军队警察力量，任何社会都需要警察，在未来民主社会里，警察职业将受到尊重，而不是成为统治阶级的打手，遭受仇恨。

警告：警告警察，如果在非暴力的运动中，侵犯人权的警察将会被记录下来，追究责任。

公开呼吁：警察的最高职责是服务和保护人民，而不是服务和

保护贪官污吏。为了你的孩子，和我们一起改善这个社会吧。

4、遭遇镇压后，应提升民众的动员率。

领导者增强组织能力，提起信心，联络好国内不同的团体继续前进，组织内部严格遵守非暴力纪律，这个时候能坚持非暴力尤为难得。

揭露镇压，为运动正名，动员民众。

遭遇镇压，民众能再次动员起来，成功的概率将会大大地提升。

总结：非暴力不合作，没有固定的路径，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调整策略，获得更高的成功率。

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

作者：贰青

摘要

本文对非暴力抗争的发起、组织、可持续性以及最后要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概略性分析并给出一个基本框架。结论部分指出抗争胜利所需的条件。

导言

当社会面临不公平、不合理和不人道的问题时，民众需要有一种强大的工具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并争取变革。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是一种通过集体行动、抗议、抵制和民众动员来达成政治、社会或经济变革的强有力方式。本文将提出一个突破性的、广泛参与的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以实现公平、正义和可持续的社会目标。

第一部分 行动的发起

1.1 确立行动目标

中国民众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框架的第一步，需确立明确的行动目标。这个目标应是能够被广泛接纳的，也是能够吸引更多人去关注和支持的。比如，目标可以是反对执政党的不公正、不平等，也可从法治、经济、民生、安全、健康、信仰和环境等……多层次多

角度地去争取更多政治权利。

1.2 联合发起人

从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成功的民权运动案例来看，几乎每一次有效的抗争运动都需要社会层面的广泛支持与联合发起人的共同推进。这些发起人可以是但不限于社会活动家、知名人士、NGO 组织、工会、宗教领袖等。他们应该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组织，在确保对行动多样性的理解、包容和支持下，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行动中来。

1.3 制定清晰的行动计划

一旦确定了行动的目标和发起人后，就需要制定一个清晰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应该包括行动的时间表、地点、具体活动、宣传策略和资源分配等。

第二部分 抗争的具体流程

2.1 教育和培训

在行动开始之前，需要对参与者进行培训，使大家了解关于非暴力抗议的原则和方法。其中应包括如何维持冷静的行为状态及心理状态，如何与警察、武装军警或政府工作人员互动，及如何保护自身安全，和协助别的共同参与者等。

2.2 示威和抗议

行动的核心是示威和抗议活动。这些活动可能包括大规模的游行、集会、悼念等活动。参与者应该遵守非暴力不合作原则，维持和平的秩序，同时引导大多数的民众去表达诉求和不满。

2.3 经济和社会抵制

除了集会示威活动外，也可以通过经济和社会行为来进行抵制，借此来对执政者进行进一步的施压。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罢工、拒绝购买某些商品、抵制特定机构或企业的行为等。但这种抵制应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以达到在最大程度上对抗议目标施压的效果。

第三部分 行动的可持续性

3.1 组织结构和领导层

为了确保行动的可持续性，需要建立一个坚固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层。这些领导者应具备良好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技能，并能够协调和管理好行动的不同方面。

3.2 宣传和媒体策略

宣传和媒体是行动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新闻稿、采访等工具，可将行动的信息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会中，并去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3.3 持续的参与

行动的可持续性依赖于民众持续参与的信心，组织者要思考应采用多样性的鼓励方式来调动民众的热情并坚定民众信心继续参与示威、抗议、抵制等活动。同时也应该定期组织培训和交流活动，以确保参与者的热情与行动力。

第四部分 最终达成行动目标

4.1 对话和谈判

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的目标，是通过对话和谈判促成最终变革。活动应寻求与政府、企业或其他利益相关组织或代表进行公平对话，在听取他们想法与诉求的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向自由民主方向来推进，以实现最终变革的达成。

4.2 社会动员

除了对话和谈判外，社会动员也是实现变革的关键因素。需持续通过组织示威、集会、抗议和抵制等活动，长期且持续地向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施加压力，直至最终变革达成为止。

4.3 胜利庆祝和监督

一旦达成了行动目标，可组织进行胜利庆祝，以表彰参与者的努力和坚持并进行宣传。但同时，也需要建立监督机制，以确保当前的变革可以持续和稳定。

结论

全民非暴力不合作是一种强大的抗争运动模式，它可以为民众争取更好的社会公平正义、人权尊严、言论自由、民生福利、市场环境、健康环境等众多的利好。通过有突破性的方案、广泛的参与及创新的策略和坚定的决心，我们必将实现社会变革，为中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同时，也不必采取过激行为或暴力手段来达成这一目标。这一行动方案在广泛协作的前提条件下，更需要坚忍不拔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达成，而一旦达成目标后将为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因此通过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家人、为孩子们，同时也为更多勤劳纯良的民众，创造更公平、更

自由、更包容、更幸福且更持久的社会环境，让政府与执政者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和愿望。

但同时，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是需要多方面综合考虑中国的社会现状、文化传统和政治背景等多方面的情况去进行调整和制定的。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安全及道德规范，以确保行动的和平性。最重要的是，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是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支持的，只有当人民团结一致并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在此，我们呼吁各界人士、社会组织、政府机构、学界和媒体等通力合作，共同推动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我们国家创造更加公正、公平、可持续的未来。通过非暴力抗争及坚定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将共同推进变革的实现从而逐步实现我们对未来的愿景和期望。而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正是向最终目标迈进的第一步。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通过自己的行动来积极推进中国整体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其他征文选摘

1号作品 | 作者：文武

推选全民反抗的领导人，目前在中国国内是无法操作的，只有在海外操作。

在海外首先得由认同这种行动方案的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然后以筹备委员会为基础，召集海外所有反共团体和反共个体联合起来的“全民反抗中共暴政委员会”选出海外执行委员会。

然后由海外执行委员会来安排选举投票，所有海外愿意反共的人都来参加投票，所有国内的能够翻墙出来愿意反共的人都来参加投票，以得票多少来决定领导人。具体投票细则，由海外执行委员会来制订。

2号作品 | 作者：Xian

首先，我们最直接的举措是不投资国债、地方债，以及以其为标的的金融衍生品。进一步说，可以考虑不投资国内的基金、股票，或者至少不购买与军工有关的投资。更进一步，您可以考虑每年将您的资产转移至国外，以实际行动表达您的立场。

此外，我们还可以尽量抵制中国企业，如果有选择余地，尽量选择外国企业。例如，购买手机时，可以选择苹果而不是华为。

最后，有一种极端的经济抵制措施，被称为“躺平”，但这种做法非常极端，不建议大多数人采用。

7号作品 | 作者：林养正

曾有人说过，如果放开互联网管控，共产党三天内就会倒台。因此在白纸运动后，我常常想一件事情：如何在安全地带发声，并实现彭载舟的《倒习攻略》中的“点对点传播”，把声音传至国内？如何既要鱼，又要熊掌？如果可以实现，就相当于人为制造了一个没有管控的“开放互联网”。我想那样的话，是能够有效组织，为实现民主做出很大一份贡献的。

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思考后，“狼人杀革命”的想法出现雏形。

由于“狼人杀”游戏是语音交流游戏，当局很难将语音信息像文字那样，通过搜索关键词进行屏蔽。同时因为其游戏性质，不可能如网络发帖一般先审后发，否则游戏无法进行。这就导致通过海外民主人士在狼人杀游戏内发声，把声音传递给墙内普通民众成为可能。

方法概述：利用狼人杀等游戏的语音传播难以监管的特性，由海外安全地带人士通过游戏向墙内不特定群众传播《倒习攻略》等敏感内容，实现事实上的拆墙，这种“冲塔”行为安全和效果兼备。后期随着知名度不断扩大，革命筹集的善款变多后，可以把范围从狼人杀这个纯语音游戏，扩大到任何有语音功能的游戏，包括国民手游《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

“狼人杀革命”拟定文稿如下：

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这段话是2022年10月13日，二十大开幕式前三天，由彭立发先生在北京四通桥上播放喇叭抗议的内容，现彭立发被秘密逮捕失踪，由我们帮忙传播他的想法。我们是“狼人杀革命”宣传组织团，由一个个热爱自由民主的人组成。我们希望通过这款游戏传播普世价值，为中国自由民主做出贡献。我们的目标是打倒独裁国贼习近平，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三权分

立，让我们未来活在自由的阳光下。

10号作品 | 作者：佛瑞德里希

第二计：躺。

中共国的营商环境正在恶化，市场上的商业机会正在因外资撤离、外贸萎缩、内需欲振乏力不断减少。在这种时刻，不买房、不创业，无疑是理性的决定。而同时，这也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安全策略。韭菜躺平了，镰刀割起来就格外费劲。

已经有许多意识到中共并未向自己提供合理社会福利保障的年轻人，意识到看似平静的生活表象之下，隐藏的是随时爆发的政策风险和种种因病致贫、因灾致贫、因被动卷入各种维权事件致贫的风险后，选择了不婚不育，选择了低消费的生活方式。

这是对风险抵御能力极低的平民阶层最安全的生活方式，也是正步入王朝末年的中共政权最害怕你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因为镰刀的收割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需要韭菜的配合的，老百姓越肯折腾，越勤奋，越想用一分耕耘换来一分收获，越主动往中共的房贷陷阱、庞氏骗局里钻，甚至越积极于考公考编，把底层公务员的位置当成最安稳最可靠的人生追求，中共就越是能够用最低的成本收割你们，用一份虚幻的“勤劳致富”的宣传，骗取你们一生的血汗。

第四计：屯。

这一招其实也可以和其他策略合用。因为我们都能看到，中共是无法逃出王朝周期律，无法扭转财政枯竭、经济下行的趋势，很快会因统治集团内没有共度时艰的团结和互信而走向崩盘的。

在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崩盘中，在维稳资源枯竭之时，中共显然不可能继续提供公共服务。大家只能靠自己屯积的资源度过中共开始崩盘到社会秩序完成重建之间的“至暗时刻”。而把资源

屯积到自己手中，不让中共搜刮走用于维稳就变得至关重要……

13号作品 | 作者：龚平

非暴力抗争是迫于现实的无奈选择。……不过，我认为选择非暴力抗争也应该注意不要掉进绝对非暴力的陷阱。这是因为：

虽然普通老百姓手无寸铁不适合发动暴力革命，但是部队呢？如果部队军官有了民主思想，当条件成熟的时候，他们可以发动暴力革命吗？长期以来，民运理论家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把追求民主看成了普通老百姓的特权，好像军人当中就没有人追求民主似的，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所有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国家，其胜利最终都离不开军队的支持。例如罗马尼亚、埃及和利比亚。据传，前些年以反腐名义被抓的中共高层军队干部中，就有人其实是因为宣传军队国家化而出事的。如果主张绝对非暴力，势必会把军队排除在民主运动之外。我在微信群里就遇到过这种持绝对非暴力观点的网友，他们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生命担忧，这可以理解，但他们同样坚定地反对有能力发动革命的军队武装起义，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普通老百姓从事暴力革命，这就是我们上一节中所说的民变，已经被我们否定了，但我们并没有否定兵变。绝对非暴力主义者混淆了民变和兵变的区别，忘记了自己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实现民主，他们为了手段宁愿牺牲目标，本质上起到了帮助专制政府的作用。其实，暴力与非暴力是相辅相成的，非暴力的群众运动为掌握暴力的部队起义提供了道义力量，反过来，掌握暴力的部队起义（至少是作壁上观）为非暴力的群众运动提供了胜利的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赞同王天成先生的观点：“过去20余年来，许多人否定辛亥革命，对此我并不能认同。……如果没有革命派的压力，连预备立宪也是不太可能的。”

绝对非暴力虽然可以降低独裁政府对参与者的打击力度，但对

动摇独裁者的统治地位来说，同样也是隔靴搔痒。要知道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解体专制制度，这个目标本身就注定了民主力量和专制力量终究会有一场殊死的较量。2014 年年初乌克兰爆发的颜色革命算不算非暴力革命？显然那场革命一开始是非暴力的，但后来群众筑街垒、点燃汽车和轮胎、向警察投掷石块和自制的燃烧瓶、夺过警察的警棍暴击倒地警察的头部，这些行为都不能被称为非暴力。可是如果人民没有这种宁死不屈的战斗精神，乌克兰的独裁统治者就不可能垮台。圣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英国人的思想，是很难成功的。因为英国军队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立场去支持圣雄甘地。

诚然，很多人担心暴力革命有可能带来另一个专制政府，但这种结果并不是必然的。必然带来另一个专制政府的，是像缅甸那样完全由军队接管政府的情况。但是发动暴力革命的军队，往往只能是军队中的一部分，像 2011 年利比亚革命时站在班加西一边的军队。而革命的成功，往往是由很多各自为政的起义部队共同促成的，革命成功后，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有能力单独建立起新的专制政府，民国初期就是这种状况。

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非暴力反抗成功以后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更稳定，人民获得的自由度也更高，但这反映的只是表面上的相关性，并非因果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相反的案例也是存在的。比如，美国的革命战争就持续了 8 年之久，英国的光荣革命也并不是非暴力，它是爆发于 1640 年的革命的最后一击，这次革命其实长达 48 年，国王查理一世都被砍了头，期间还出现了克伦威尔专制。但是，英国和美国在革命后都成功地建立了民主政府。

如果我们把推翻专制政府和革命成功后“18 路反王”之间的协议建国分为两个阶段来看待的话，问题就会显得明白多了——虽然解决起来并不简单。我倾向于认为，“18 路反王”之间的协议建国

才是新生的民主国家是否能够稳定的关键，至于推翻专制政府的手段是采用暴力还是非暴力，无关紧要。然而，革命后“18路反王”如何协议建国，这不仅是中国民运界急需解决的难题，也是世界政治理论上的一个空白。英国和美国的成功是基于传统议会制度的自发结果，而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独裁国家都没有议会传统，所以我们很难效仿。只有从理论上解决了“18路反王”如何协议建国这个难题，才能变自发结果为自觉努力，保证革命成功与民主成功之间的确定性。我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革命成功、民主失败，原因就在于还没有理论能够阐明这种确定性。陈炯明意识到了革命和民主之间存在的这种困难。囿于当时的理论水平还无法解决这个难题，陈炯明建议不要急于国家的统一，先让各省联省自治，等将来想出了好办法以后再统一不迟。如果现在非要强行统一，势必在各省民主同仁之间爆发手足相残的战争，徒令那些后清余孽笑话。更何况用武力统一建立起来的政府也只能是专制政府，因为战胜者不可能和战败者平起平坐地参加选举，万一战败者胜选，战胜者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事后看来，陈炯明先生实可谓有先见之明。大家一定要明白，暴力统一国家和暴力推翻专制政府不是一回事。自由主义者反对的只是使用暴力统一国家，而不应该反对使用暴力推翻专制政府。

……推翻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历史契机，而历史契机就是重大事件的发生。因为重大事件不可能经常发生，所以历史契机弥足珍贵，机不可失，并且对很多人来说，历史契机一旦失去，在其有生之年真的就是时不再来了。更何况，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会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历史契机时，我们只能胜、不许败！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来认真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俗话说，好的计划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决不能再打无准备之战。

总而言之，中国的民主事业任重而道远，要想取得胜利，除了对群众进行非组织化的广泛动员以外，还需要做好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财政建设等几方面的工作。在思想观念上需要处理好暴力和非暴力、组织化和非组织化的关系。我们的观点是，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出合适的选择，并且各种选择都应该得到尊重。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的条件只允许我们进行非暴力不合作抗争，但我们不能因此就陷入绝对非暴力的陷阱，我们绝不应该为了手段而牺牲目标；我们现阶段立足于非组织化的群众联合，但绝不应该忽视有战斗力的组织建设。民主，单靠非组织化的群众是不可能实现的，单靠组织化的密谋也是不可行的。离开了广大群众的参与，组织就失去了根基；离开了组织的统筹和引导，群众就会失去方向。只有把组织化和非组织化结合起来，中国的民主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

15号作品 | 作者：冬至春晓

众所周知，任何朝代的更迭或崩溃瓦解最先都是经济出现了非常严重问题的时候，现在的中共政权也是如此，虽然他们还在通过大量印钞和降低利率等方式极力维系，但是人民币汇率外贬内升的格局已然形成，随着国内经济形式持续恶化，螺旋式通缩模式形成的经济坍塌必将很快到来。因此从经济方面着手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无疑是加速中共政权垮台的催化剂。这些方法适合每一个人，分别从应急储备、养老医疗、资产保值几方面入手。

一、应急储备：

1、现行外汇管理政策规定每个人每年有等值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尽可能将自己名下额度用完，然后可以去银行取出相应现钞，一定要取出现钞自己存放起来！法律明文规定账户上显示的外币在

遇特殊情况下银行有权利进行强制结汇！取现理由可以是：旅游、探亲、求医、求学！为避免银行封堵取现路径，具体方法请自行摸索！

1) 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持续加大，适当外币储备能起到保值增值抵御风险的能力；

2) 当发生不可预知的地缘政治风险时，适当的外币储备能保障出境期间的衣食住行；

3) 消耗中共本已捉襟见肘的外汇储备；

.....

二、养老医疗

中共的养老和医疗是世界上最大的庞氏骗局，政府投入极少，基本上由这一代人缴纳的钱来支付上一代人的养老和医疗费用，而且仅有的这点钱还要养活一大帮所谓的高级干部。随着断缴的人数越来越多，多年空账运行的养老和医疗基金已经无以为继，全面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建议：

1、社保已经缴够 15 年的自由职业者立刻停止缴费，不到 15 年的且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也立刻停缴，停缴资金单独定期储存起来，缴费超过十年且年龄大于 50 岁视家庭经济状况自行决定！

2、医保也立刻停缴，停缴资金也单独定期储存起来，专款专用！现行医保政策对于普通人平时几乎没有保护作用，一但得了大病也几乎不起作用！而且男士需要缴够 30 年，女士需要缴够 25 年退休才能享受！.....

三、资产保值

1、资产是正值的家庭，卖掉手里多余的房产，立刻清空股票和基金账户，现行的经济状况已经远远低于现有房产和金融性资产

估值，未来状况只会越来越差！

.....

18号作品 | 作者：中国共权党

标题：何谓共权革命及其实施方案说明

1.什么是共权革命

所谓共权，即是将社会权力公有化，而不是像皇权或共产极权时代一样由个人或小集团占有或像私有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实质上由资本集团占有。从权力的本质上讲，其首先来源于社会成员的认可；其次权力属于社会的沟通属性，没有社会系统的沟通就不能称之为社会，自然也就没有权力系统存在的必要，而权力私有制的异化存在恰恰是这种沟通结构被垄断的结果；最后，那个最易为人们日常感知的强力属性恰恰是权力最不重要的方面，因此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才是社会权力的应有之义。

按照生产资料和社会权力公有还是私有来组合，人类社会可以分成四种形态，最落后的第一种生产资料私有+权力个人私有的封建王权社会已被淘汰；目前并立两种社会形态：生产资料私有+权力集团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资料公有+权力个人或集团私有的所谓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前者相比第一种权力从个人私有到集团私有是一种历史进步；后者则是迄今为止最糟糕，最恶劣的一种社会形态，因为公产等于是权力占有者的私产，更因为权力因生产资料的公有侵入社会每个细胞，无所不及，无所不管，很少有分权状态予以缓冲，权力占有者的一切妄想荒谬和愚蠢都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权力私有制的危害比任何时候都严重。

“共产必须共权，不共权不如不共产”。从逻辑上讲，历史实践也已证明，人类社会形态进步所应该尝试的首先是将社会权力公

有化（或者说权民一体而不再是二元对立），而不是先将生产资料公有化，这不但没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反而将社会的生产效率完全摧毁。所谓共产主义试验已经破产，社会主义也不得不重新部分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苟延残喘。

由此可见，将社会权力公有化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尝试，这种社会形态也是一种逻辑上更具历史进步性的形态，它必将带来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演化，这种社会变化必定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称之为社会的共权革命，其实现方式和路径也必定是一种新的和平的光荣革命。

实现共权革命的方式和路径应当采用民间学者王力雄先生提出的一种新型民主模式——层议制递进民主模式作为自己的组织路线和组织方法。所谓层议制，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种把权力源头和顺序完全颠倒过来的、以小规模单元内直接沟通协调并逐级随时递选出集体意志和载体的方式、可扩展至全社会规模应用的直接民主模式。作为一种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组织操作方法，它可以较好地克服传统民主原则在中共政权无底线镇压和强力维稳控制下无法有效扩大组织进行抗争的弊病。

层议制组织方法可以更有效地针对中共的镇压模式建立自己的组织并进行组织民众发动民众的工作。我们知道，要想推翻旧的体系或政权建立新的社会，不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组织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在目前中国各类反抗中共流氓统治的行动或运动中，有效组织的缺乏是所有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没有之一。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几乎所有抗争人群摄于中共的淫威甚至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组织化，生怕中共严厉镇压，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你乖一点，不搞组织，他们就会好好对待你似的，这显然是一种痴心妄想。确实现代科技、金融等手段让中共极权对所有组织化很容易监控并将其消灭在萌芽中，但那只是对传统组织化而言，现代组织为什么不可以也利用各种网络技术和高科技来强化自己呢？比如利用数字加密技

术的数字组党就可以很好地对付极权监控；虽然很多抗争也采用了去中心化方法来应对科技极权的镇压，但去中心化不等于去组织化，一个严密的组织同样可以利用去中心化方法增加极权打压的难度。另外一个反抗群体普遍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些有识之士费尽心机想了各种办法，设计各种理论和方案就是无法打开局面，形成不了任何社会影响力，这也是因为首先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起步条件就是要形成一个真正的有效的反抗组织。

2.共权革命实施方案

建立有效反抗组织，并在其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共权革命是一种中间道路，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纯粹靠暴力革命推翻旧政权的改朝换代，也不纯粹是其它转型国家成功采用过的完全和平的颜色革命，而是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结合二者的一种中间方式。鉴于本次征文的要求，本文将只占威慑性战略的一小部分武装斗争一笔带过，重点放在非暴力和平革命部分的论述。

.....

广场革命

.....第一步，大规模街头民意表达。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民众在统治集团长期的驭民五术统治下早已被分化成一盘散沙的原子状态，要达成大规模街头民意表达的目标，我们不能像以前的六四和香港反送中运动一样，完全被动等待统治当局的倒行逆施而出现的民众自发上街大规模聚集，这样的聚集缺乏组织和后劲以及明确政治诉求，很容易被当局采用各种手段击破，它们对付这样的民众运动已经很有经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反制流程。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在平时就积累民意基础。如何积累？我们可以像科技极权利用现代科技加强专制统治一样，也利用现代科技实现科技民主聚集民意，比如利用数字加密网络技术进行数字匿名组党，将千千万

万反对中共极权统治的国民以一种新型科技手段组织起来，使得中共统治集团无法采用传统和现代手段轻易破坏。在此基础上，再通过设计策划诸多具体的常态化的反共行动和项目（如已经出现的“恶人榜”“正义传单网”等项目），以此辐射影响带动更多的国民连接起来，在日常就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当一时一地的合适时机出现，就可迅速地主动发动起大规模的街头民意表达。

具体如何在平时积累民意基础方面可以以我们组建的新型政党——中国共权党为例，除和平革命为主武装斗争为辅的中间道路外，我们还充分运用另外三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建党特征，处处体现中间道路的精髓。

（1）创新型数字匿名组党技术：墙外采用传统组党，墙内则采用数字匿名组党。面对暴虐强权现在墙内反抗者最担心的是什么？安全。而且，中共强权还利用了诸多新的高科技，对反抗者的监控无孔不入，如果不对等采用一些诸如现代密码学的高科技手段，反抗者将变得更加艰难。采用数字匿名组党后，广大反抗者完全不需要暴露自己，借助新科技就可以联合起来反抗独裁者。

（2）去中心化层议制组织方法：去中心化是为应对中共极权残酷打压而设计的一种应对策略。这里的“去中心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组织成员都包含在一个个自底向上、相对独立的自治体中（层块和小组中），他们完全可以构成相互协调，又相互独立的斗争区块，有自己的区域中心，这种多层次、多区域的子中心自治网络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网络。其次，另一层含义是任何一个层级的子中心包括组织最后的全局中心联接点如果遭到破坏，都不会影响其它部分（上下左右）组织网络的运作而且为了组织沟通的需要可以迅速重新恢复被破坏部分的连接，这与传统中心化的组织一旦中枢被破坏整个组织就很容易瘫痪有巨大的不同，是与掌握包括现代高科技在内的系统性资源的传统极权体系做斗争的一种更高维度的斗争方式。

(3) 与组织特点相适应的秘密党营产业经费解决方案：传统民主抗争组织无法壮大跟没有办法筹集更多经费有很大关系，他们大多只能靠一些捐赠和党费最多搞些小的经营，这对于反抗中共这样一个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强权来说无异杯水车薪。我们则希望借助基于新组织特征的规模化党营产业来解决，而且这个产业还会对所有成员产生收益，将来共权革命成功后更会将股权全部无偿分配给所有成员，所以它也是大家共同的产业，这也是我们在经济领域对“共权”的理解。

第二步，实行“三罢”。当经过充分的大规模街头民意表达，让社会各界、周边地区乃至国际国内都知道了当局的倒行逆施和民众诉求后，广大民众就可以开始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了，我们可以不再认可和接受当局的任何统治行为：工人职员实行罢工以拒绝官方任命的管理人员，商业物流罢市以阻断市场交易不再为当局财政输血，学生罢课要求学校自治，小区居民选举自己的业委会不再承认街道居委的任何指令，最后使得当局成为空中楼阁，政令不出政府大楼的大门，公安武警只能在街上空转，党委书记和市长区长只能在办公室干嚎。到这一步，民众就可以开始组织自己的自治政府了。

第三步，组织民众自治政府。在前期民意组织过程中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民意表达机制，那就是基于逐级递选制的递进民主模式的建立，这种民主机制与传统大规模投票民主相比无需耗时费力的、也容易被当局干涉或操纵的一次性选举过程，它只需随时在可以直接沟通的小范围成员间逐级递进进行。如果能走到这一步，前面的过程已经自然而然地验证了这种民主机制的动员力和生命力，到这一步，民意汇聚的顶层领导团队也会很自然地浮现出来，而且他们无需惧怕当局的任何枪打出头鸟，因为递进民主机制将迅速地自动地产生新的领导团队，而且无穷无尽。在新的领导团队的综合协调指挥下，新的社会运行安排有条不紊，他们无需富丽堂皇地政府大

楼，无需公章文件，即使他们只是在街头只支起一个帐篷，他们也具有民众给予的合法性和权威。从现实角度讲，中共更上层的统治者只有选择与这个街头帐篷政府合作才能不至于从实质上失去这一方的领土和资源，否则，它任命的政府将一直瘫痪下去。而如果它暴力相向，一则我们的武装震慑力量不是吃素的，一定会对做出决策的具体个人或班子施以最严厉的惩处；二则除非它将这地区的民众全部关押屠杀，否则已经组织起来的民众绝对不会再接受他们的统治。

21 号作品 | 作者：泊鸣

标题：中国民主化进程亟需战略调整

中国民主化的国内战略，以重建民间社会，培养公民力量为主。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民主化的根本困难，是作为民主基础的民间社会被中共严重破坏。所以，未来我们的核心任务是重新构建民主基础，恢复民间社会，培养公民基础力量。鉴于中共的残酷打压，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将依据保存实力、培养梯队的原则，从长计议，稳扎稳打，在中国的民间形成一定的民众基础的同时，还将培养一支精悍的组织者队伍。为此，我们将从以下方面着手调整我们的工作。

一是发现和寻找最迫切需要民主的群体，以该群体为基础人群，重点发展民间社会，在民间建立自救自助机制，培养领导骨干。低收入、低权利、低保障、缺少身份认同的群体，中国的边缘人群，这些人群数以亿计，他们拥有民主革命的原始动力；而中产阶级，富裕阶层，也将因为民主而获得财产、人权、人格法律保护，他们不必再心惊胆战地向境外转移资产，不必千方百计地移民

流亡，这个群体将成为民主的强有力支持者；知识分子，思想家，艺术家，娱乐业者，将获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和权利，他们将成为民主的鼓吹者；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意见领袖，将自由发表政见和组织自己的社团，他们不仅会成为民主制度的受益者，也将成为民主化运动时期的领导者。最需要民主的群体，并非只是固定的阶层，各地可能因为发生过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的历史等，会有不同的群体，而这些群体一方面有可能需要法律救济，另外一方面也需要用民主的方式，长期维护他们惨遭伤害的利益。有些地方可能是工人，有此地方可能是学生，有些地方可能是退伍军人，有些地方可能是经济骗局的受害者，而有些地方可能是曾经的拆迁户，有些地方可能是宗教群体……我们需要扎实的做好这些工作，维护他们被侵害的利益，为他们提供维权的多种途径，同时也从他们这些群体中可培养锻炼出一些有经验和能力的组织者。

二是向民众告知民主的具体好处，民主一定是能给百姓带来利益的。没有利益的民主，我们为什么需要它呢？中国百姓一大半属于低收入人群，按照李克强的说法，有 6 亿人收入不足千元，经济的不公平向来是民主革命的原动力。民主社会将改变这一不公平现状。还有医疗，养老，就业，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安全，私营企业的正常经营，民主的利益将从底层向上覆盖，满足不同阶层的社会需要，而不是中共的革命，掠夺一部分人的权利和财富，满足另外一部分人的权利和欲望。在民主政体下，腐败、官僚资本将会大幅减少，社会的透明度和公平度大幅提升……我们将会有一本《民主：你所不知道的好处》的普及读物，它文字通俗，妙趣横生，浅显易懂，以纸质版、电子版的方式在中国境内不断流传。

三是要培养民主的后继力量，向大中小学生普及现代思维，现代思想，现代文明精神。我们要把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说法改为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就如中医与西医，突出的是地域和民族差异，而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突出的是落后与进步。有人反对西

医，但很少有人公开反对现代医学。同理，反对西方文化的人不少，但反对现代文化的人就绝少了。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因为符合普适价值而能够广泛交流传诵，因为差异而显得丰富多彩，而不是互为水火，人类因为交流而繁荣发展，享受普适性带来的福利，而隔绝和封闭只能导致落后与愚昧。

虽然当下这种普适性的教育存在困难，但中共并非铁板一块。我们可分步走，首先是各地同道利用自身优势和便利，寻找各自门路，建立根基；其次是建立各类群组，现在国内微信群有各种普及现代文明知识的讲座、讨论、阅读活动，这都非常好。第三是分散在各地的同道朋友，还能够通过组织各种活动等多种方式，带领少年儿童进行现代民主素质的实践活动，活动中采用竞选、投票、演讲、合作互助等方式，把民主的种子播下。第四是把不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汇总分享，形成操作规范，再行复制推广。每个地方有好的经验时，可通过可靠渠道内部分享扩散，不图急攻冒进，但求长期有效，点滴积累。这种培养十分必要，即使中国一夜之间实现民主，今天培养的孩子二十年后也能在巩固和完善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开始发挥作用。

四是恢复公民记忆，重建当代史。我曾经参加过国内从2011年开始的关爱抗战老兵活动。让我最遗憾的是这个活动进行得太晚了，大多数老兵都去世了，当时活着的平均年龄超过九十岁。这个活动给我的启发是，我们需要恢复公民记忆，重建真实当代史，刻不容缓。关于六四，关于文革，关于中共搞的各种荒唐运动。某些发生过大事件的地方，还有很多亲历者，我们今天还能够做一些补救工作，从民间大佬记忆，恢复中共刻意涂改、销毁的国家记忆和公民记忆。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当然也是中共最惧怕，将会大力阻止的活动，但这个活动的必要性是非常大的，活动本身就对中共具有强大冲击，而记忆的内容会让很多年轻人知道真相。比如我认识一位三线学兵，从他的经历中看出，那是他和他的那一代同学们

生命中一段灾难性回忆，当年轻人知道中共历史上还让学生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做过比奴隶还危险和辛苦的劳动时，简直无法相信。那种震撼，让他们很久不能平复心情。我们可以通过征集方式收集，还可组织人力进行重点采访，这项工作虽然让中共很恼火，但有一个优势，完全可以在私下进行，在中共不知不觉中完成收集和整理工作。

22号作品 | 作者：八宝

标题：当我们谈论斗争时我们在谈什么

我更希望大家能自己能见机行事，当然，为不知道如何斗争的人，我也会提供几个方案供大家参考。

纪念公共突发事件

比如说最近发生的黑龙江齐齐哈尔一中学体育馆坍塌事件，有很多中国人自发在外卖平台下单送到学校门口表示纪念，这是比较简单的能够彰显我们非暴力的、有人性关怀和我们力量的方式。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争取更多的人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要彰显我们的魅力，我们是非暴力的，带有人性关怀的，同时也是有力量的，不是能让中国共产党随意拿捏的。我认为这两点都是很重要的。我也觉得这能改善网络的舆论环境，让更多的人的敢于与政府有不同的想法。

拍摄一些关于现实的视频

这些视频可以方便我们走出认知茧房，去了解更多人的真实情况，而且也是现在很多人在做的事情。其实简单的方式就是拍摄一些自己的日常，就像是之前曾经火过的关于农民工生活、外卖骑手生活的视频。把这些真实生活展现出来（当然得是真的不能是演

的)，来引起更多的讨论。如果不想拍摄，也可以多多参与这样的视频，他们多少都会吐露一些日常琐事的烦恼，在下面多多评论，这样也能达成创造讨论的意义。不过我最推荐的是户晨风的那种模式，把人间百态都展现出来，同时也在直播中，跟许多人去聊一些时政。不过他的模式需要一些语言的艺术，我不觉得适合所有人。如果想要尽一份力可以考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资助他们做更多的作品出来。

普及政治概念

到这其实就不是适合所有人都要做的事情了，但是我认为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我认为有能力的人可以优先参与这个事情。因为我认为，普及政治概念是高质量对话的前提，比如说我这篇文章，通篇没提网络常用的名词，比如说：小粉红、反贼、神友之类的，这些名词因为在墙内的混乱使用其实已经被污染了，很有可能会词不达意，比如说反贼，什么才能算是反贼，我姑且按照我的理解，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但好像也不完全是，移民走的，喜欢发达国家，讨厌中国的人算不算反贼？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因为在一部分小粉红眼里，所谓的“精美”“精日”夸赞民主国家好处的人就是反贼，但这些人其实大部分讨厌中国的风气，讨厌共产党，自然也没动力反中共，对于他们来说移民走了，中国的好坏自然与我无关，自己要做的就是自己和下一代别再跟中国扯上关系了。所以我粗浅地把反贼理解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但是又爱中国的人。当然这肯定有争议，何况“贼”是一个贬义词。不能说着同一个词理解的东西却大相径庭，这样如何才能有效讨论。我们得为讨论设立一套规范，这是高效讨论的前提。

具体的例子可以是发视频，比如说介绍某一类群体，名词讲解，各家政治理论等等，现在就有人在做，甚至在墙内做。我觉得这非常棒，做视频不仅是科普，让所有人能互相理解对方。同时也

在引起讨论，政治本身就是充满讨论的，同一个问题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所做出来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哪怕是仅仅意识到，广泛的不同意见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我都觉得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那么，怎么改朝换代，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文明国家呢？

在《道德经》里，老子认为“小国寡民”是最好的，对于大国而言，是联邦制度。联邦政府的好处是，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权力，更自主的管理，地方与联邦之间互相制衡，互相帮助，联邦制度有效地防止中央集权，皇权复辟。

25 号作品 | 作者：孟洛杰

自改开以来，规模最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八九六四运动。最近的非暴力运动是白纸运动，疫情防控导致了白纸运动，它虽然无法与六四运动相比，但它影响了当局的决策。在解除疫情管控之前，我就写文章分析，经济衰退和民意反弹可能会逼迫当局放开管控。白纸运动无疑是代表了民意反弹，但把放开的原因全部归功于白纸运动，也是不太客观，其实经济因素也占了很大的比重。

提到白纸运动，也有必要说一下孤勇者彭立发，他在白纸运动之前，也就是二十大召开前夕，在北京的四通桥上打出了一个惊人的横幅：“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彭立发又名彭载舟，他的惊人之举惊醒了很多，俗话说得好，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香港的占中行动和修例风波，其影响力虽然不如八九民运，但规模也很大。香港有部分民主和相对完善的法治，这也使得香港的抗争空间要比内地大很多。香港每年都会大规模地纪念六四，俨然成了中国民主的桥头堡，如果不对其加强管制，就有可能在内地引

发示范效应。中共对香港进行打压，就是想将其变成内地一样。有港版国安法这把剑悬在头顶，香港的抗争空间大大地被压缩，但不至于完全变成跟内地一样。……

民主转型的途径，无非就三类，第一类是由官方主导，第二类是由官民共同主导，第三类是由民间主导。第一类和第二类都可以归类为非暴力革命，由民间发动非暴力运动，向官方施压，然后官方在压力之下，被迫转型。第三类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非暴力革命实现转型，另一种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转型。……

那么辛亥革命到底是暴力革命，还是非暴力革命呢？武昌起义肯定是暴力革命，但清政府并不是被武力推翻的，也就是说，革命党认为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武力推翻不了清政府，就跟袁世凯谈判，让袁世凯逼迫清政府交出权力。因为袁世凯手握兵权，清政府害怕他动武。说白了，袁世凯虽然以武力威胁，但并没有动武。

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各省闹独立，以非暴力运动的方式向清政府施压，才迫使其交出权力。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以暴力革命开头，最终以非暴力运动结尾。这也有点像南非，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最早也是暴力革命，后来转变为了非暴力革命，只不过辛亥革命很短暂，而南非持续的时间很长。……

只要是个明白人，就不难发现，执政当局最擅长的就是使用暴力，而他们的最大短处就是缺乏道义。民间反对派或民主派，跟他们恰恰相反，最不擅长的就是暴力，而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道义资源。拿自己最大的短处去跟人家最大的优势比拼，这不是很不明智吗？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拿自己最大的优势去跟对方最大的短处比拼。

民间反对派或民主派，一方面要利用道义优势，争取更多的民众参与非暴力运动，另一方面也要发挥道义优势，争取军警的中立。军警中的中高层无疑也是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者，但底层的军警也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内心的诉求可能跟上街的民众

是一样的。只要方式方法得当，他们就可能会保持中立。

当然，军警中的中高层也有明白人，比如八九民运中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就拒绝对学生动武，再比如在苏联八·一九事件中特种部队的负责人也拒绝对叶利钦等人动武。柏林墙倒塌，也是因为相关的负责人没有对示威民众采取武力镇压，结果民众就推倒了柏林墙。

非暴力革命要想成功，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参与的人数要达到一定的规模，规模达到当局不太敢动用武力镇压；二是要争取军警的中立，只要军警不动武，就基本上成功了，当局就完了。当然，这两个因素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当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当局就会忌惮军警就会同情民众，并抗拒命令。……

由此可见，出现非暴力运动，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很难组织起来。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爆发非暴力运动呢？或者说当出现了什么样的危机，才会引发非暴力革命呢？一旦出现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或军事危机，就可能会引发非暴力革命，并导致民主转型。……

若干年以后，当习近平这么强势的政治领导人下台或去世后，肯定也会出现权力真空，并可能出现政治危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就大有可为，比如趁着这个政治危机，发起非暴力运动，要求政治变革。当外部出现了危机，官方内部也会出现分裂，苏共垮台就是因为开明派与保守派决裂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将来中国出现了危机，在当局内部，也有可能会出现保守派和开明派，保守派肯定是希望继续维持旧制度，从而对民众的民主诉求进行压制。而开明派是倾向于政治改革，并希望借助民意推动之。当然，民间也应该与开明派联手，不然，就可能会被保守派击垮。在这种极权制度下，民间没有什么成长空间，力量很有限，只有跟开明派联手，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

由经济危机引发的民主转型是最常见的，可以说，民主转型多

少都与经济危机有关，只不过在其中有的是经济危机起了主要的作用，有的是起了次要作用。当经济出现持续增长，然后出现短暂的经济危机，这是最有利于民主转型的。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变迁和观念变迁，而社会变迁和观念变迁又会导致政治变革。短暂的经济危机，往往会成为政治变革的诱发因素。……

在对台动武方面，习近平还有可能对美国出现误判，一是认为美国不会参战，不会进行军事干预；二是认为即便美国参战，中国大陆在近海作战占据优势；三是对中美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没有客观的认识。

一旦爆发台海战争，只要美国参战了，就注定中国大陆会战败，而一旦战败，对于大陆民间来说，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趁机发起非暴力运动，推动民主转型。即便美国不参战，随之而来的经济制裁，也会让大陆当局的政权摇摇欲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陆民间也可以趁机发起非暴力运动，推动民主转型。……

中共极权算得上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专制政权，也可以算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政府，但它有个根本缺陷，那就是没有合法性，这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被中共的强大吓倒了，认为其坚不可摧，于是也就绝望了，放弃了抗争，认为抗争也没用。

有的人会陷入极度悲观，有的人会盲目乐观。前者是看不到中共的根本缺陷、看不到天下大势，后者是低估了对手、高估了自己。就眼前来看，肯定会感到悲观，总之，很难让人乐观起来。但从长远来看，时间站在我们一边，他们早晚会被历史淘汰。

中共也明白自己没有合法性，所以他们心里很害怕，草木皆兵，以全民为敌。要想战胜中共，就得全民抗争，各个阶层都要联合起来，一起来对付中共这个全民公敌。中共虽然很强大，但民众可以比它更强大。

民主化是世界大势，即便是像中共这样最强大的专制政权也抗

拒不了这一趋势。中国大陆的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而且已经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民怨越来越多。中共的极权专制已进入苟延残喘的阶段，至于它能苟延残喘多久，就看民众能忍到什么时候。一旦民怨民怒被点燃，中共极权专制的末日也就到了。……

会不会爆发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主要取决于客观形势和各种机缘巧合，当然也离不开参与者的主观努力。比如八九民运的爆发，就是因为国内外的形势再加上胡耀邦去世这种机缘巧合，以及学生们的主观努力。

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不是个别人能煽动起来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自发行动，民运人士只不过是顺势而为，适时介入和引导。在这个过程中，很考验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当民众自发上街，形成一定规模后，组织者和领导者就要建立起组织机构和领导机构，就像八九民运中的高自联一样。

中国不像东欧，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是二战结束后，苏联移植过去的，如果说苏联、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是原生的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就可以称为派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在民主转型方面，后者比前者容易，后者基本上都成功了，而前者基本上都没有成功。

就民主转型而言，派生的共产主义国家所具备的条件，比起原生的共产主义国家要好很多。比如在抗争空间方面，前者就比后者大很多。也可以说，后者几乎没有什么抗争空间。最典型的例子有波兰瓦文萨等人领导的团结工会运动和捷克哈维尔等人领导的七七宪章运动。当然，中国也有民众集体抗争，但中国的八九民运和白纸运动只是昙花一现，而波兰和捷克的抗争运动可以持久下去。

由于抗争空间不同，中国大陆的非暴力抗争运动，更多的是依赖于偶然，自发因素居多，而波兰和捷克的非暴力运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也可以说，由于国情不同，在中国大陆想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发动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很难，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在

波兰和捷克就有可能。

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正常情况下，发起小规模的非暴力运动是有可能的，比如白纸运动，但想去发动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几乎不可能，而只有在非常状态下，比如在爆发了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抑或军事危机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这也提示组织者和领导者，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择机而动。

当出现了民众自发上街的一幕，有识之士就可以审时度势、顺势而为。非暴力运动的规模大小，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国内外的形势，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要尽量去动员各个阶层，让各个阶层的人都参与进来，参与示威游行，参与抗议抗争。

要想给极权专制致命一击，一边要发动全国性的大规模罢工、罢课、罢市，另一边也要组织全国性的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唯有如此，才能让政权陷入瘫痪状态，逼迫其满足民众的民主诉求。如果能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象征物，就更能凝集人心、更能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比如康乃馨革命中的康乃馨、玫瑰革命中的玫瑰、白纸运动中的白纸。

爆发大规模非暴力运动后，能否持续也是个问题。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要利用民众最关心的问题，进行动员，激发更多人的参与热情。就好比现在的热点和热搜，总能吸引人的眼球。新闻可以是眼球新闻，政治也同样可以是眼球政治。

比如八九民运，最早是自发悼念胡耀邦，为胡耀邦讨回公道，然后在中南海门口遭到军警殴打后，又对当局的暴行进行讨伐，后来四·二六社论出来后，又成了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后续又开始质疑当局的谈判诚意。总之，学生领袖抓住当局的破绽或学生关心的热点，不断进行动员，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让学生运动持续了近两个月。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如果只有几百万参与的非暴力运动，就很

难称得上是全民抗争。当然，所谓的全民抗争，也并非真的是全民上街抗议，好几亿人或十几亿人都参与。所谓的全民，只是个虚指，可能有几千万人参与，就可以称之为全民参与。

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估计有几百万人，即便如此，还是失败了。所以要想成功，估计至少得上千万人参与，甚至好几千万人参与。中国的军警总共加起来也应该有个几百万，这足以对付几百万的抗议民众。但是面对上千万的民众，军警可能就难以对付了，或者说，不敢轻易动用武力。

有学者（切诺韦思和斯蒂芬）做过统计，在非暴力运动中，总人口中有3.5%的人参与行动，就可以成功，这就是3.5%定律。有人以香港为例，来反驳这种观点。在香港修例风波中的参与示威游行人数保守估计也有好几十万，占了香港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但结果并没有成功。香港的情况比较特殊，占中运动（雨伞运动）和修例风波（反送中运动）针对的不仅是香港政府，还有北京政府，其普选的诉求也不是香港政府所能决定的。

如果香港跟新加坡一样，是个城市国家，背后没有北京政府，那么有高达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上街游行示威，不成功是不太可能的。而面对北京政府，要想成功，就得要有占中国总人口的3.5%的人参与，按照这个标准，差不多需要五千万人左右。

据平常一些观察，觉醒过来的人可能就连1%都没有，那怎么可能会有3.5%的人参与行动呢？在正常时期，启蒙赶不上洗脑的速度，觉醒者少之又少。但在非常时期，觉醒者会猛增，比如李文亮去世的那天，在新浪微博上就好像是变天了，感觉突然觉醒过来的人一下子就增加了十倍、百倍。

八九民运也一样，在爆发学运之前，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关心政治，都忙着谈恋爱、考托福和打麻将，结果胡耀邦一去世，就激发了学生的参政热情，且愈演愈烈，最后演变成了一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非暴力运动。之前可能谁也不会想到，竟然会爆发这么

一次规模宏大的民主运动。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肯定会爆发跟八九民运一样的民主运动，而且规模也很有可能会远超八九民运。基于之前有过六四这么一次失败经验，以后成功的几率应该会更大一点。对于当局来说，他们输不起，只要输一次就完了。而对于民主派来说，输了虽然要付出沉重代价，但还输得起，一次不行就两次，总有赢的时候。

非暴力革命的研究者和倡导者吉恩·夏普，就在八九民运期间和助手飞到了北京进行实地考察，他认为六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计划，由于缺乏计划，抗争只停留在自发的、技巧性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战略性层面。所以，我们应该做好战略性层面的准备，为随时可能到来的变局时刻准备着，而此次组委会向全球征集全民抗争行动方案，就是未雨绸缪，在做战略性层面的准备。

总之，准备得越充足，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六四运动，事先不知道其会发生，所以准备不足也正常。而对于未来的民主运动，我们知道早晚会发生，所以事先要做好准备，也应该事先要做好准备，准备好终结极权专制，迎接自由民主。

31号作品 | 作者：东郭先生

标题：“预备立法”打击专制分子促进民主化

预备立法简介

本行动方案是，制定一部打击专制分子的预备立法，并在线上、线下，在国内、国外，在各类活动、行动中，广泛传播、宣传本法，以达到威慑专制分子，鼓舞海内外民主力量士气之目的。本法暂拟名：《惩戒专制分子促民主预备立法》。这是用法律的方式，对专制主义分子在打压民主化运动过程中所犯罪行为进行明确，并明确相应的惩戒量刑。

法律的权威来自道义，来自人们的认同。道义本就不缺。只要海内外民主力量对这部法的认同比较广泛，那它事实上就是一部法律，就具有威慑力。

该预备立法先要在民主派人士里争取广泛认同。有了广泛认同，即可保障后续落地实施。待到民主化运动在一县、一市或一省取得初步成功，则在该地正式颁布施行。预备立法适用于民主化过程，以及初建民主制度后的成果巩固阶段。

一切以实际行动反对民主化运动的人，无论是履行职责的，还是平民自发的，无论是各层级执行命令的，还是各层级下达命令的，都是本法所指专制主义分子，简称专制分子。迫害民主派人士的，迫害其它为增进大众福祉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人士的，或迫害这两类人士亲属的，也是本法所指要打击的专制分子。

预备立法的制定过程

预备立法由海内外各界民主派人士参与制定。其中，至少要包括较大比例的海内外法律界人士。另外，还要广泛收集吸纳曾经遭受过专制势力打压、迫害过的民主派人士意见、建议。

立法起草专家组成员应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同时不失政治、律法专业性。

草案拟定成功后，向海内外各界征求完善意见，并争取各界人士的联署支持。对具体的法律条款条目、处罚方式，可通过网络投票、网络讨论来征集广大网友意见。一为收集更广泛意见，二为传播宣传预备立法。

预备立法的法条内容设计、修改、完善过程，应主要吸纳真心求民主、真正推动民主化的民主派意见。绝不为了获得最大范围的认同、支持，而偏离立法意图，降低对专制分子的威慑、打击力度。草案推出后，各方讨论交流、意见争论、辩论内容应公开发表，并支持广大网友留言参与。既增加的该法的曝光度，又有助于

筛选出好的意见、建议。

34 号作品 | Freeman You

做本地群主，组建本地的进步力量，必要时配合全国大散步

鉴于中国的传播环境和社会控制，设计方案的传播、组织发展需要考虑少用敏感词、不直接对抗体制，不会产生直接的法律风险。借鉴的是英美国家的转型路径，就是组建和发展壮大本地社区，形成温和而不对抗的组织性力量。平时关注本地事务，维护群体内人利益。等待时机，必要时配合全国大散步事件。做本地群主，建立地区的温和进步力量。一句话：建立本地区的组织传播动员力，等待那一天来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网络和朋友，寻找、观察、联络本地三观一致的人。包括本地各小区群主，本地网络红人，如：微信群主、抖音博主、小红书、微博主、公益达人等。当有大事发生时（如本地区的大事件，也可能是北京的大事），知道要去找谁传播和动员，传播什么合适。

需要强调的是：1）务必要本地化，容易经常见面，慢慢相互了解，慢慢有基本的信任，知道哪些人价值观基本一致，哪些人比较热心，关心本地公共事务；2）推荐用图片和短视频，比较难监控和审查。推荐用“XX地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真的？”等标题内容，法律责任轻微甚至没有；3）很可能会有卧底，小心钓鱼，再次强调少谈违禁话题，只谈论本地话题和本地事务。台湾经验：陌生人见面就高谈阔论如何反抗国民党的，80%是国民党的卧底，包括民进党的第一任党主席就是。为了安全顺利，平时吃喝玩乐，只关注本地事务。等待许多年，只为那一天，全国全民散步，欢迎新中国。

36 号作品 | 作者：民主志道

标题：民主化的利器——非暴力革命

非暴力革命如何推动民主化？

对于目的是建设民主制度的抗争者们而言，非暴力抗争是最优的选择，这不仅是基于人本主义，对于民主化的成功率以及民主制度建立之后的稳定性来说更是如此。

Karatnycky 和 Ackerman（2005）进行的一项研究使用了来自 Freedom House 组织的数据，并分析了 1972 年至 2005 年之间的 67 个政治过渡。他们发现，非暴力抵抗推动的过渡是：

*成功实现民主化的可能性是掌权者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过渡的四倍以上；

*巩固民主成果的可能性是经历过一些反对派暴力的政治过渡的三倍以上。

此外，以公民抵抗为主导的过渡表现出自由得分的最高增长，因此，即使在一个国家在政治过渡后没有完全民主化的情况下，平均而言，与其他类型的过渡相比，非暴力公民抵抗还是获得民主收益增加最多的主要原因。

Chenoweth 和 Stephan（2011）分析了 1900 年至 2006 年之间 323 次暴力和非暴力运动的数据，结果表明：

*在一次成功的运动结束后的五年内，对于取得民主结果的可能性，非暴力的运动（57%）几乎是暴力抵抗运动（6%）的十倍。

*即使在非暴力抵抗运动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的情况下，五年后一个国家仍有 35% 的机会实现民主结果。这表明，即使某运动未能实现其近期目标，其抵抗运动固有的动力也可能有助于民主化。相比之下，暴力抵抗运动失败后只有 4% 的机会获得这种结果。

从上文这则数据结论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无论是实现民主化的可能还是巩固民主成果的可能，亦或是运动结束对于实现民主化的影响，非暴力方式的运动要比其他方式更优。而我们可以从暴力方式转变为非暴力方式并且成功民主化的例子中得出更加具体的事实经验，波兰 1970 年的十二月事件中，因波兰部长会议决议的涨价，生活必需品的物价突然上涨，愤怒的波兰工人发起了抗议，最终近万人加入了抗议队伍，警察的暴力镇压迫使抗议者们以暴力相还，最终持续五天的冲突导致了 44 人死亡，千人受伤。而这起抗议的组织者之一的瓦文萨在 1981 年成立了团结工会，转变为非暴力运动的革命方式。尽管团结工会中一直存在反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呼声，但团结工会在直至共产党政府垮台的数年中一直谨慎地不使用暴力，一次次的示威紧接着谈判最终促成了波兰的民主化变革。

和平或低程度暴力民主化的结果诚然有不同国家中各不相同的因素所影响，诸如不同政府使用暴力的意愿、不同的公民社会对暴力的倾向程度等等，但对于抗争者们来说，尤其是目标为民主化的抗争者来说，非暴力方式的抗争是无二的最优选择，事实上践行非暴力革命方式的各国抗争者，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台湾和韩国的反对派等都在数个结束威权政府的示威游行中对暴力进行了审慎的克制。

相反的，那些如冲击巴士底狱的行为对民主化的目标来说益处甚微，群体性活动中的个体易受愤怒等情绪构成的群体意识所左右导致不可控的结果，如流血、恐怖袭击等。白纸革命通过举白纸集会的方式巧妙的避免了这一点，反对派必须在群体性行为过程中时刻明晰目标和确保群体的理性，这对于避免流血、防止提升暴力程度和顺利达成目标以及确保自身的正义性而言至关重要。

需要吸收教训的例子是香港的反送中转折点的元朗袭击事件，这件政府保守力量借助黑社会制造暴力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暴力事

件，其结果都致使非暴力示威转变为警察与人群的暴力对峙。在大规模或长期群众示威中，即使其中的主体组织秉持着非暴力的行为目的，激进个体示威者以及其他反对派组织会倾向于使用暴力，或者如元朗事件中的不明背景组织无差别的暴力袭击，这些都将导致如元朗事件后续一样的结果：暴力行为总是会为现有政权的保守派使用暴力和提升暴力程度提供正当理由，而这又将为激进分子使用暴力提供机会。

另一个值得学习的例子是 86 年的台湾游行，在砸警车等行为出现后，反对派组织警惕地意识到了暴力升级的趋势，发出了安全与诉求放在第一位的公示，将接下来的十余次游行计划取消。而这一审慎的举动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也侧面彰显了反对派的力量，那就是自我决定游行与否的力量。次年 7 月 15 日，由于三七事件被披露引发的新一轮抗议，持续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就此解除，台湾民主的前夕于此时到来。

回到上文引用的数据，非暴力革命相较暴力革命更有利于避免民主化的回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暴力革命所带来的混乱与破坏导致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无比的脆弱，派系斗争与民众不满的情绪导致了后续的恐怖统治与动荡，直到取代督政府的拿破仑掌权才宣告结束。另一方面暴力革命所建立秩序后仍会延续暴力，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都出现了清除异己的行为，三反五反与反右运动以及苏俄的清洗白军。另一方面暴力革命在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暴力组织，暴力组织自身的架构易产生权力的集中，在暴力组织建立政权后，其掌握权力的人群对于独裁与专制的倾向则更加突出，关于这点，我们在历史的常识中可以发现”华盛顿少而毛泽东多”的现象。而非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的民主制度，台湾、波兰、韩国等等，我们如今仍可以看到其民主秩序的稳定与和平。

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反思与经验

回顾天安门事件，军队残酷的屠杀坚守抗议到最后的学生们，流血悲剧如何不再复现，从其中反思经验是极其重要的。根据上文的论述，镇压无疑会伴随着风险，这在拒绝执行镇压的徐勤先部军队以及共产党内部的赵紫阳等反对者的分歧中体现了出来。而最终何以将镇压意愿贯彻到底，这与专制政府掌权者的个人倾向以及专制政府面临权力威胁本身有重要的关系。……

将视角移到学生们，抗争者们是否有选择避免大规模流血发生。在学生运动的过程中，五四对话在诸如事实上否定了四二六社论与得到新闻自由的口头保障之后，先前抗议的大部分学生停止了抗议转为支持对话的形式持续性推进民主，而另一部分学生则选择了绝食抗议的方式，诉求彻底否定四二六社论的定性。随着示威局势的扩大与戒严令的宣布，五月下旬不断扩大的抗议学生内部也产生了不同主张的分歧，混乱与无序的抗争取代了五四对话前的鲜明诉求的示威，在清场令宣布后，大部分的学生与群众选择了撤离，直到军队冲向尚在坚守的学生们。

五四对话后绝食抗议的学生们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与同情，市民们与全国各地大学的学生们开始声援以及前往天安门，区别于五四对话前以诉求与交涉为主的方式，此时的绝食抗议偏离了理性，另一方面参与援助学生们的市民群体基于共情与道德而非对诉求的认同，抗议本身的调整能力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碍。

在人数增多的过程中，抗议的基本方针，诸如组织、目标与方式等并未更新与完善，最初发起绝食抗议的学生们并未察觉或无力去完成这一点，长时间内的抗议趋于盲动。而抗议人数的增多却由于抗议的基本方针的缺失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强大，另一方的关键影响是面临各种未知情况的备选方案并未产生。另一方面，当时的学生们较为缺少他国民民主化运动经验，这也为流血悲剧埋下了伏笔。

当各地的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时，不同的主张与意见开始导致诉求的不明。尽管人数众多但群体内部难以形成基本的共识，抗议者们自身的秩序在此期间被破坏，不断的升级事态的行为出现，例如损坏毛泽东像等，这为保守政府使用暴力提供了正当理由。

在天安门运动中萌生的各学校的学生组织等是具备持续性抗议条件的，但由于上述三点弊端的综合影响，持续性抗议的战略未能诞生，以至于事实上抗议的战略呈现“毕其功于一役”的短视。对于抗议者而言最关联大规模流血悲剧的则是缺失安全方面的审慎，当军队进驻时，为了坚守抗争到最后的决心，最后留在天安门的学生们是令人敬佩的，但对生命安全的审慎才是能够将抗争持续化的关键。

回到前文的问题，反抗的学生们是否有选择避免大规模流血发生，在缺失抗争方针、共识与明确的诉求的前提下，当抗议脱离理性而专制政府动用军队，聚集的群体在此情况下很大程度上丧失了选择的权力。但学生们抗争的勇气与不惜身命的精神至今仍鼓舞着中国人，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应当汲取先烈的经验为民主化而奋斗。

41号作品 | 作者：居重

标题：以“舆论斩首-认知起义-影子内阁”方式推进宪政化

推进宪政化方式

察往知来，回望清末，观察共产国际黄俄支部占领，看看当下其他国家，用排除法来选择中国未来的出路，寻找基于当下政治的可行性道路。

清末革命党、宪政派：启蒙、刺杀、运动、起义、党派结盟；推动了国家宪政化。

共产极权体制反贼、反抗者、抗议者、异议者：抗议、举牌、

拍照、媒体发声、社评、鼓动反抗游行；当下前所未有的极权暴政在继续。

香港、伊朗、委内委拉：游行示威、街头抗议；以失败、被清算告终。

在全面信息管制下启蒙已不现实，在数字极权下运动被逐个抓捕，在维稳费、监管渗透下党派结盟被瓦解，流亡政府、海外临时政府、海外议会、临时国会、人民法院……无数人无数年呼吁，响应者寥寥无几。

没试过的只有：刺杀（斩首），起义；现代国家的管制力度下革命党存在的空间狭窄、革命军发展的可能渺茫，举目华人世界也看不到类似清末革命党、革命军的身影，刺杀（斩首）与起义前现代国家的异议手段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现代化。

1、舆论斩首

极权社会象蜂群、蚁群，极权老大哥犹如蜂后蚁后，消灭蜂后蚁后极权老大哥，其体制自解，犹如文革。共产极权体制下 1 尊 7 常委 24 人政治局 500 家族 3000 省部级 148 万书记 200 万现役党卫军 180 万警察 66 万武警无数国保协警维稳员网格员 9800 万正红旗旗人 11.8 亿共产国际奴隶，从底层攻毫无胜算。不受制约的公权无限放大极权老大哥个人之恶，做个核酸、打个疫苗都能变成国家暴政，消个毒、退个耕都能变成环境灾难，建个特区都能变成区域灾难……

舆论斩首，让暴君声名扫地，把暴君逼疯，不受制约的权力会放大暴君的病态人格，迫使其扈从、政敌不得不弑君自保；先在精神层面消灭暴君，暴君肉体上的消灭自有暴君的政敌、被威胁的对手、暴政的受害者（或许是六四幸存者、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计划生育失孩者、香港西藏维吾尔流亡者、武汉肺炎病毒强拆血迁受害者）完成，在科技加持下，已不再是荆轲刺秦王、专诸刺王僚，

而是黑客技术、舆论风潮……

宪政的其一表现是：权力更迭，投票选举是一种，推翻是一种，对于霸占公权赖着位子不走的，舆论激发政变是一种，无人机斩首也是一种。不能用选票更替政权，就用舆论，就用子弹，让暴君有所畏惧，好过任由权力撒野。权力更迭，才会出胡安·卡洛斯、蒋经国、赵紫阳、卢泰愚、托卡耶夫，通过刺杀/斩首给胡安·卡洛斯、蒋经国、赵紫阳、卢泰愚、托卡耶夫们创造机会……

2、认知起义/在社会运动中自治（拒绝非法政权）

枪杆子里出政权——本质就是一群强盗，我们人民坚决不承认其抢掠的合法性、拒绝承认其占领、不接受强盗的统治，号召国际社会抵制共产殖民者对东亚大陆的统治。

“非暴力不合作”式起义：共产极权未经我同意，未经我选举，不承认共产极权的合法性和管辖权；未经我选举，不承认苏维埃伪政权的官员权力，舍伪政权另行选举相关官员；号召各国不承认非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权的合法性和管辖权；号召各国不承认非人民选举产生的官员、支持扶持网上选举临时政府。

在社会运动中自治，像香港、伊朗、委内瑞拉这种发生全局性社会运动的地方，在运动中成立二元政府，在与官派官员对话的同时，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员现场选出民选官员及治安委员会、抽签组成后备人员，审议临时约法；在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中至少要形成有效的组织，即便被逐个清算也有组织能关注到具体的个体，不用个体单打独斗地面对整个暴政镇压机器。

反抗者、抗议者、异议者在进行自己的行动之前，做好计划与评估：如何一步步行动，如何应对行动中可能产生的各种状况，如何应对行动的可能后果，行动要达到何种目的，评估行动是否有效，是临时起意情绪宣泄还是目标有序推进的必要过程。无效的反抗行动不断刺激共产极权，不但达不到推进宪政化的目标，还会使

极权体制不断进化、升级镇压手段、完善维稳方式，对其他类似反抗免疫。结果，无效反抗成了共产极权机体的疫苗，对民众的反抗产生了抗体，反而延续了共产极权体制的寿命。

统治、权力的运行建立在认同、默认之上，明确对非法政权进行拒绝，当拒绝非法政权人群形成规模、聚集成区建立自治团体，落实宪政，择机宣布自治，蝴蝶效应一定会激励无望的东亚大陆，再现清末联省自治局面；起义在疫控暴政下尚有机会，现时代即便沿海、边境起义也机会渺茫，比如在云南的边境小城解职当地官员推行自治。

3、影子内阁、虚拟政府

国家、政府首先都是概念，民众认同时便存在、不认同便灰飞烟灭，譬如苏联象曾存在过的许多帝国一样无比强大，一朝之间而消失在现实世界。所以我们所深恨的这个极权政权使我们象生活于《1984》中老大哥的无处不在的监视下和被《美丽新世界》享乐毒害下的无力存在，是底层互害的着相，我们也可以先在心中消灭之而后通过民众的认同而消灭其实体政权。

异见者应联合起来成立虚拟国家：组建虚拟政府，通过网上竞选，成立影子内阁，甚至发行虚拟货币、进行虚拟征税、财政，以应对国家变动。从民国初年乱政、印巴巴以分治、非洲人为割裂的惨痛与拉美民主化的落败中吸取经验；同时积累从政治国经验，使政治理想能提前转化为现实行动。最终这个虚拟国家经由民众认同取代现有暴政。

先是成立虚拟国家、虚拟政府，一旦民众充分认同，就可以从虚拟走向现实世界，取代暴政。解决异议者、革命者有理论、有理想而无组织管理民主政权的经验与实践，以有足够的经验应对倒台的政客，免于被这些老狐狸玩于鼓掌之间，防止胜利果实被摘取。政治是可行性的艺术，只有理想而无可操作性只会危害国民。

经有虚拟政府的锻炼，防止理想化的革命者和异议者掌权后眼高手低见光死；一旦掌权，革命者和异议者都会从屠龙者而变为恶龙，要通过虚拟的权力使之免疫、自知、受约束；政权是一个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角力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理想而高估自身能力只能办坏事，让社会倒退甚至使民众留恋旧政权。

这个虚拟政权应容纳吸收所有异议者和革命者：左派、右派、民粹、藏独、疆独、台独……各派别进行充分理性现实的沟通、妥协，避免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的人间惨剧重演，应做好预案，做好民意沟通，安抚民众，引导舆论，能够应对恶意的破坏者，和平分手，避免滋生仇恨，给当代及后代带来无尽的纷争与灾难。

成立的虚拟政权应有充分反映民意的机制、有纠正政客的臆断的体制，杜绝权力的傲慢，不让政客的野心危害到民众的福祉，避免非洲的人为分割、民族国家与部族的割裂，或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导致的中东纷争成为大国与地区强国的角力场，使当地人生活于无尽苦难之中。以完善对话机制，磨练政治家治国技巧：譬如台湾的民主化，如果没有李登辉民主化的决心与处置国民党既得利益集团的手腕，则台湾将沦为亚太的拉美，难免不动乱。

这个虚拟国家可以叫大中华民国、新周/东亚联邦……然后，召集相关学者进行制宪会议（实行联邦制），组建虚拟议会，然后组成相关政党，推举候选人，进行竞选（竞选既是宣传，又是民主自由观念的普及），将候选人辩论施政纲要竞选演讲上传到网上，在推特脸书网站上投票，组建虚拟政府。

制宪会议、虚拟议会、竞选演讲、竞选辩论、虚拟政府运作……都可在网络世界进行，当然需要一些费用，可以发行虚拟货币，出售国籍，向巨商家族募捐【比如让其享受虚拟国家的爵位（某王、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三公九卿）、太平乡绅、做这虚拟国家的抽签国王……】同时宪政转型成功，保留其荣誉。

经选举组建的虚拟政府正式运作：发行虚拟货币，进行网络征税，进行施政规划、内政外交、经济文化的运作。这个虚拟政府对世界热点、国家事件以其发言人进行评论、干预，甚至可以通过公益组织干涉某些国家不义行为，即便不能击倒极权专制政权，也会使施暴者有所忌惮……

异见人士成立虚拟国家、组建虚拟政府，以此虚拟政府来对抗暴政将更有力量，以此虚拟政府发声将更响亮更有力，以此虚拟政府协调民主国家将更被重视，同时经由选举产生的虚拟政府，比单个的异见者影响更大、更有群众基础。

鉴于，华人群龙无首、互相不服的现状，可以采用瑞士的联邦委员会制。

47 号作品 | 作者：刘效波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采取致困主义战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大型行为艺术现场。

与极权主义的对抗永远都是困难的。极权主义以国家暴力为基础，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征税、司法以及宣传机器。我们所仰仗的，则只有人性。如果我们想要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案，我们不能去通过筹划来计算与确定极权主义什么时候能够发生坍塌。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去消耗这种极权主义资源，让所有人能够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去消耗极权主义政权的财政、警察、城管、司法系统、所有的附随金融机构、专业人士。这些人的工资在不断降低，发展前途愈发无望，最终有一刻，当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制不可能再有资源继续运转的时候，道德空间越来越窄，开始为自己找后路的时候，那么就是这个机制崩溃的那一刻。

这里面我就需要引入一个概念，就是“致困运动”。

1982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期间，波兰东部小镇瑞尼克（Swidnik）的居民决定带着电视机去散步，以此抗议政府的媒体宣传。活动人士旨在表达他们对共产国家一手遮天控制所有媒体的不满，但他们认为鼓励个人进行私下抵制是毫无意义的：毕竟，如果你坐在家中客厅里不看新闻，谁会知道呢？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这种抵制公开可见呢？如果把对政府宣传和举国信息控制的不满明白无误地公之于众呢？

最终，活动人士决定在晚间新闻播出时段，将他们的电视机带到街上，用手推车“遛”，就像是推婴儿车一样。不久之后，在这个时段走在镇上的人们，都能看到街坊邻居推着电视机，一边遛弯儿一边有说有笑，利用以前花在收看官方新闻上的三十分钟来互相问候、闲聊，并一起分享站出来反抗政权的那份刺激。

推车抗议活动使政府感到非常棘手：对抗议者置之不理吧，只会使他们更加胆大妄为、显得政府软弱无能，并加剧抵抗；镇压抗议者吧，仅仅因为推着电视机遛街这种无伤大雅的事情就出手，这会让当局显得过于强硬和压制。通过下令提前宵禁来遏制抗议活动，这种笨拙的做法使政权丧失了公信力，扩大了批评政府的波兰公民基础，并使当局显得荒谬可笑。他们再也不能自称是从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了。这种叙事一旦被打破，他们对权力的控制就变得很脆弱，而最终政权垮台了。这一特定类型的非暴力战术即是所谓“致困行动”（dilemma-action）。它旨在为打击对象创造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迫使对手陷入“双输”情境：无论怎样应对，都将遭受骂名，最终威信扫地。精心选择的致困行动会利用人们广泛的共识，利用不可预测性和幽默感来颠覆官方叙事，并引来广泛的公众支持。

这个战术最要的，就是致困（dilemma），这个单词的含义同时也有两难、悖论的意思。其方法，恰好应对了专制主义的最大特点——理论和实际的执行上的分裂。这种分裂本身给人造成了巨大

的痛苦，客观上呼唤着致困运动的产生。而所谓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也都在压抑着人们的基本表达需求。

在莱基和杜阿梅尔看来，这一战术的核心是两难困境，即通过一种直接行动战术，迫使对手面临一个双输的抉择。与所有直接行动一样，致困行动是在传统的倡导活动之外起作用的。它们旨在让目标做出回应。典型的抉择是在对活动人士的取态上：镇压吧，显得过于粗暴；不作为吧，又显得太软弱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目标都会失去公信力，而运动则会备受鼓舞。

在中国当下的语境当中，政府对于任何一种有表达意涵的聚集行为，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限制。政府不会选择镇压，同时也不会选择不作为。他们会用大量人力、物力去进行柔性管控，并且限制表达的传播。因此整个与专制方面的斗争就变成了一种消耗战。消耗战的目标就是极权政府的维稳资源。因此提高在地民众的参与程度以及创造力成为效果的关键。更多的参与程度和更强的创造力，意味着专制政权需要面对规模更大、更加频繁、形式更加多样的反抗运动。

活动人士的目标是利用创意性战术，揭示那些被当成真人真事呈现给公众的神话，揭示其背后的真相——同样重要的是，让公民们置身于颠覆那些神话的公共行为之中。

这也是为什么前文当中，海外机构，要首先提供一系列对于个体维护自身权益的帮助，并且总结他们的经验。这种对于自身权益维护的支援，和海外基本权利的行使，是建立海外和海内互动信任的基础。这种协作能够让在地更加清晰的了解到那种极权主义宣传的荒谬性。而一旦这种荒谬性被普遍知晓，以及通向一个正常社会的观念能够被打开，那种“没有尽头的恐怖”感受就会消失掉。而恐怖的消失，以及目标与路径的明确，则是创造力和参与的来源。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最温和的意见表达。

这种创造力只能是通过在地的人员，并且于社交媒体当中表

达，然后在海外加以传播（墙内内部传播可能有限制），然后“信息倒灌”到墙内当中，再上传到社交媒体当中。形成这样的一种传播模式。

举几个致困主义战术的例子：

李克强的悼念，除了当时被严格封锁的鲜花之外，给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在李克强头七的时候讲一系列故事。并且号召大家上传到社交媒体当中。让更多的人进行纪念。

对于学生课件十分钟的取消，则是整个青年失业率以及就业困难的好机会。完全可以在学校附近的小卖部贴出青年人的就业情况，然后上传到网上，对这些孩子们进行拯救。

再比如，最近对于小学生教材所改变的“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变成了“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我们则可以把所有带有“人民”的口号，都改成“祖国”。

在官方运动性的对于宠物进行清理时，可以带自己的狗，去附近的政府门口转一圈，然后进行拍照上传。

甚至包括三不运动，本身都是一种非常惨烈的致困主义运动。而如果能够对于这些内容进行有体系的进行发展，以及在墙内外进行观点的传播，这种操作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民众观察并且体验生活当中最为基本的荒谬感，通过情感发觉自己的创伤，并且以最低的代价（朋友圈，社交网络）参与到表达和行动过程当中。这种参与，一方面消耗了极权资源。同时也培养了每一个人脱离恐惧的自我掌控感。

49号作品 | 作者：佚名

美国有个研究非暴力的著名专家叫金夏普，对权力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弄通了我们究竟是怎样将权力交给了当官的。他说，掌权者要维持他们的权力一般要靠六个要素。这六个要素都是依靠民

众输送的，要有权力就得有这六条，但是，如果民众不再输送这些养料给掌权者，他们马上就什么也不是了。下面具体看看这六个要素：

1.权威性。这是说民众同不同意掌权者的领导。比方说，村里一百个人里面有八十个人不支持村长和村委会，那这个村长和村委会自然就没有什么权威了。

2.人力资源。这是指民众当中愿意向掌权者表示服从、提供合作或特殊技能帮助的人有多少，有多大比例，还有就是他们的组织程度和组织形式怎样。再拿这个村打比方，八成的人不支持村长、村委会，这些人在村委会之外自己组织起来，可以说这样的村长、村委会能够调动的人力资源就很少。

3.技能和知识。这里进一步说的是上面那些和掌权者合作的人有什么能力、技术、知识和专长。如果那八成不支持村长、村委会的人里面有很多是干活勤快、懂技术的，比如说是老师、电工、司机等等，那么村长、村委会能够调控的技能和知识就不多了。仅仅是电工停电他们就会急得团团转。

4.心理因素和思想因素。说白了，就是民众对权力心里是个什么想法——例如在服从与屈服方面的习惯和态度，以及有没有共同的信仰、使命感等。那两成服从村长、村委会的人可能这么想：他们是当官的，能反吗？但另外八成的人不这么想，他们认为我们首先要自己改变自己的状况，不为百姓着想的官就得换。俗话说，心想事成。八成的人破除了屈从权力的习惯心态，这村长、村委会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5.物质资源。这包括财富、天然资源、财政金融资源、经济体系、通讯工具和交通运输等。一个掌权者控制的物质资源越多，它的权力就越大，这是没错。但是他要使用这些资源还得要人来干活，要不这些资源还是车轮子没轴——转不开。你想，村长就算管着村里的公路，但司机不给他开车了，他不就转不开了。

6.强制力量。就是说大家抗争的时候，掌权者用来对付大家所采取的压制和惩罚的方式与程度。一个得不到支持的权力常常用各种手段对我们进行制裁以加强控制。村长可以调动民兵、叫来警察，国家甚至可能动用军队。但如果权力只能通过强制力量才能维持下去的话，这样的权力离垮台的日子就不远了。

可以说，前面五条明显都要直接靠民众输送养料，第6条本质上也是民众输送的，因为组成强制力量的武器等物质要素也要靠人力资源去操作才能形成强制力量；这样一分析，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统治者的权力，不是空中楼阁，而是靠着被统治者的服从与合作支撑的。

因此说，掌权者的权力说到底是谁给的呢？不是天，不是神，更不是这些掌权者天生就有，事实上和本质上就是普通老百姓给的。老百姓既然交给他们权力，自然也就应该可以收回（通过不合作），再支持那些真正为大家办事的改革派或革命派。

本文慎重考虑推荐的民众集体可以经常安全参与的、而且切实有效的墙外方案如下：

参与大翻译运动（英語：**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通过翻译中国互联网的舆论内容，以展现中国群众亲俄、反美、反日等中国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立场，以及中国在专制政策下的负面社会景象，“促使海内外华人从中国大陆的假新闻以及政治宣传中脱离”。大翻译运动其目的不是抹黑，而是忠实地翻译“谎言”，使人们“觉醒”、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宪政”。

大翻译运动已经成为外语国家了解中共实为纳粹法西斯的信息来源。同时通过参与大翻译运动，参与者可积累账号粉丝数，同时获得广告收益，形成正反馈激励循环。而账号积累的各地粉丝，当出现社会热点时一致发动罢工、罢课等运动，成为各地区革命的火种。大翻译运动参与的人越多，转发点赞评论的越多，更容易上热搜形成世界范围内的舆论趋势。

大翻译运动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运动，其翻译的内容多种多样，参与者同时可国内分享各类 vpn 翻墙软件教会更多的人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锁。

通过大翻译运动，很多“大翻译运动”的素材在中国境内被销毁，介绍极端民族主义的帐户被封，包括教委通知各校停止俄乌、巴以局势备课工作，教导和平与正确的价值，日本地震有关视频内大量弹幕评论被删除，只剩下祈福与日本加油等同情言论，“大翻译运动”视频素材的消失以及多地学校开始要求禁止外传部分党宣活动内容。

2022年4月中旬，一位中国留学生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后，在微信上用中文放话“要买枪轰杀美国人”，结果“大翻译运动”将消息传到哥伦比亚大学，对此大学将其除籍。

安倍晋三遇刺案发生后，大翻译运动对中国大陆部分网民幸灾乐祸的言论进行了翻译。

在没有社会热点时国内可经常性实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如下：

嘲讽。中国人与苏联人抗议的一个特点是，当最温和的批评被禁止时，人们就会转向讽刺挖苦——这相当于对中国宣传的嘲讽。

美国学者吉恩·夏普曾撰写推翻独裁者的手册，他曾经说过，对暴君最大的威胁之一是幽默。专制者能够经受住对言论自由的强烈呼吁，但是一旦遭到嘲笑，他们就会泄气。

譬如，国内人人可以讨论“香蕉皮”和“虾苔”。前者与习近平的名字缩写相同。而“虾苔”听起来像中文的“下台”。

独裁者的困境：如果你逮捕发出关于香蕉皮帖子的人，怎么能不令人觉得你的统治更加可笑？

51号作品 | 作者：毕汝谐

标题：利用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触引颜色革命的简明行动方案

我们都认为民主宪政比专制制度好，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推动非暴力反抗运动是争取民主宪政唯一可行的道路，而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则是可以善加利用的捷径，处理得当，有可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意想不到的奇效。

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我们知道，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不止一次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大人物裴迪南遇刺身亡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小人物突尼斯小贩自焚掀起阿拉伯之春；胡耀邦病逝，催生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世界历史极为罕见的超大规模民主运动，数千万人走上街头要求自由民主。为了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我们必须重视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充分利用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借以触发颜色革命。

所谓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就是生活中偶然发生的、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以是这样一回事也可以是那样一回事的事件；从哲学角度说，偶然性与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偶然之中有必然。历数古今中外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的主要成因，无非是天灾人祸、违法行为、外来干扰、人际关系冲突、感情障碍、性格异常、恶作剧等等。而群体性偶发事件一旦发生，其破坏性的能量往往就会迅速释放出来，并且呈快速蔓延之势，当局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危机就会急剧恶化，当局就会遭受很大损失。

偶发事件及群体性偶发事件的显著特征是触发条件不可控制，事前难以预估，事后方能仔细追溯原因，而且发生概率极低。据统

计，通常情况下，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出现概率仅仅在0.1%以下。鄙人参考各国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的视角界定、认知反应、前因与结果等方面的学术成就，对各国一系列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情境，对于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及相应政治化进行了展望和估测。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西迪布吉德一名摆摊贩卖水果蔬菜的青年（大学生！）因不堪执法人员暴力对待，愤然在当地政府门口自焚。这种舍身抗议的极端做法迅速引起民众的共鸣。由于突尼斯民众对生活水平下降、警察暴力、高失业率和人权状况恶劣等问题强烈不满，大批民众当天就走上门头游行，这一政治风潮迅速扩展到突尼斯全国，最终导致本·阿里总统下台，并扩展到中东和世界。

载入史册的突尼斯小贩自焚案例揭示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的特点如下：

一，偶然性，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往往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二者出现的频率要比常规管理中遇到的问题低得多；二者的出现令人既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二，突发性，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是一种特殊的矛盾，常常与社会整体氛围或者本人的意外境遇联系在一起。

三，爆炸性，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就像地震一样，具有爆炸性；朝野双方往往皆猝不及防，被动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和行动。

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由偶发因素引起，在一定催化因素作用下，触发多种催化因素导致链式反应，使得群体内聚集的能量在短时间内突然释放，对当局造成很大的困扰。在聚变过程中，催化因素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具体说到中国大陆，陌生人社会是产生聚变的场域因素，民众情绪变化是产生聚变的情境因

素，而组织煽动则是产生聚变的动员方式。

中国有句成语务虚务实，务虚之后，鄙人就利用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触引颜色革命的具体行动贡献绵薄。

利用偶发事件触引颜色革命的简明行动方案如下：

第一，分析中国国情民情的现状，这是制定利用偶发事件触引颜色革命的简明行动方案的依据。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是在中国这个特定国度进行的非暴力反抗运动，要制定正确的策略，首先要对当今中国的国情民情有一个客观准确的判断；如果选择一些表面的现象，作出主观的臆断，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必然滑到或做茧自束、或孟浪冒险的轨道上去。

百年来马列邪教、中共暴政肆虐，败坏河山，污蛊人心，天地同悲，人神共愤！中国共产党执政 74 年的统治，将商鞅恶政包括驭民六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虐民，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马列邪说败坏了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传统美德，畸形市场经济的金钱腐蚀力已经使得人心烂透；当今中国大陆，已是人欲横流的互害社会，中华民族的道德大堤早已崩塌！

自古以来，中国人不患寡只患不均，非暴力反抗运动应当充分利用这种民族心理；2016 年，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公布一批机密文件即巴拿马文件；揭露各国政治人物海外资产，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等人榜上有名。2022 年，网上热传 100 名中国人存入瑞士银行 7.8 万亿！这些事例很容易引起全民公愤。再说一件小事，上海封城期间，市委书记李强假模假式地视察社区，他听到居民说团购这个词的时候，脱口问团购是什么；也就是说，李强是享受特供的赵家巨头，根本不知道团购是什么，而普通老百姓只能通过团购来购买基本生活用品，这就突出表明官民对立。在中国经济上升时期，这样悬殊的贫富差别还不致引起社会情绪的巨大波动，而在经济断崖下降的时候，仇官仇富的社会情绪将喷泄而出！今年以来，各种经济衰落的信号，表明一个史诗级的中国经济大危机临近了。中国经济

大危机将是中国有史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经济大危机，其恐怖后果如何估测都不为过！可以预期，中国社会即将进入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的空前的多发期！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过去几十年，共产党以房地产作为巨量资金蓄水池，许许多多中国人稀里糊涂地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可以预见，今后几年或者十几年，许许多多中国人将莫名其妙地一夜之间变成杨白劳！这是历史的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将引爆金融惊雷，而司法腐败、冤案丛生又使得困局雪上加霜；此外，几十年来的一胎化政策，造成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据统计，至少有 3000 万底层男士将注定一辈子打光棍，这些人目睹当官的三妻四妾，其妒恨不问可知；在各种忌妒心理中，性嫉妒是一种最危险、最具有破坏性的忌妒；一旦中国社会产生动荡，这些没有家室的老光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具有极大的破坏能量，我们对此应该心中有数并且善加引导。

第二，确定目标、任务和要求；我们所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因而必须襟怀坦荡；而我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凶恶敌人，所以又不能不采取相应的谋划和策略。

为了早日实现宪政民主，我们不能守株待兔，被动地等待偶发事件以及群体性偶发事件从天而降，而是要睁大眼睛，寻找生活中很容易被忽略的所谓一件小事；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洲裔非暴力运动也起源于一件小事：1955 年 12 月 2 日，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有色人种协进会秘书罗莎·帕克斯，因拒绝在公交车上给白人让座而被警察逮捕，引发轰轰烈烈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我们要密切关注形形色色偶发事件的方方面面的动态，发现其中的利用价值。

一般而言，当局应对偶发事件的对策常常是大事化小，而我们则要反其道而行之，小事化大！也就是说，将所谓小事化大，尽量扩大其社会影响，尽可能搞得满城风雨，并把它提升至政治层面。

举个例子，前几天，李克强突然病逝，老百姓纷纷献花，合肥李克强故居附近以及各大城市，都有大量市民献花，表达民众无声的抗议。这是一次不可预测的偶发事件。然而，却没有引起原本可能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令人叹息。

生活里往往没有现成的政治事件，所以我们要开动脑筋，将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偶发事件群体性、政治化，我们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准备抓住大中小偶发事件，干扰习近平运转国家机器，到那个时候，非暴力反抗运动要提出恰如其分的政治口号，既超出民众的平均认识水平，又不能远远超出民众的平均认识水平，努力将偶发事件导向必然结果。

我们可以参考、借鉴 20 世纪两大成功的非暴力反抗运动，甘地领导的印度非暴力反抗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非洲裔非暴力反抗运动。甘地、马丁·路德·金面对的是有一定文明底线的统治者；根据料敌从宽的原则，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必须充分估计共产党、习近平的凶恶本质，以免临事而惧，因恐慌情绪手足无措。

至今中国还没有出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那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众望所归的领袖；然而，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维权群体，不同的宗教信众，完全可能随机产生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威望的带头人，他们虽然不足以领导全中国范围内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却足以担当某一局部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头头。

.....

中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各种矛盾迭积如山、纷乱如麻；共产党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老行家，为了避免各族群、各阶层、各地域因偶发事件产生利益冲突，为了避免非暴力反抗运动内部分裂，我们要强调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共同目标是习近平！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战胜习近平！非暴力反抗运动要广泛宣传同是神州沦落人，内卷相煎何太急！大家都不是赵家人，只不过是粗细不一样

的韭菜，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彼此发生冲突，只会亲者痛仇者快！作为斗争策略，不同民族、宗教、阶层、地域的非暴力反抗群体必须保持联系，却又不妨各自为战，因为一旦出现偶发事件，习近平很难扼杀看似无中心、实则多中心的大规模非暴力运动。让我们关注、搜索、捕捉生活中一切大大小小的偶发事件，竭尽全力将其群体化、政治化；或许绝大多数群体性偶发事件都被习近平化解、压制，但是，习近平只要有一次失手，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

53 号作品 | 作者：Sein

标题：认知不合作的框架和方案

我所提倡的认知不合作可以总结为一个基于价值多元化、方式多样化和组织去中心化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具体到以下几方面。认知不合作运动的主体和敌人分别是谁？每一个实际和潜在受到中国专制压迫和威胁的人，都是认知不合作运动的主体。随着极权化程度的加剧，我们不难发现，在社会活动和社会交流中，我们逐渐丧失了表达的自由、获取信息的自由、喜欢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文化的自由、相信自由和平等价值的自由、相信人作为人的价值的自由、相信和运用科学的自由、相信和运用逻辑的自由……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剥夺我们思想和言论自由专制统治。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专制的机器里的敌人是谁？是那些用暴力取代认知自由的人、是那些不相信平等而诉诸强权的人、是那些相信真理可以和应当被垄断的人。

认知不合作怎么做到价值多元化、方式多样化和组织去中心化的框架？

价值多元化意味着认知不合作不提倡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提倡意识形态领域和价值表达的自由和平等。自由意味着我们应该通

过认知的对抗，争取符合我们认知的诉求。平等意味着在面对我们自由的共同敌人面前，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的参与者应该团结起来互相承认。纵向来看，不同价值和立场的参与者都有着共同的敌人，即造成我们不自由的专制机器。横向来看，参与者不同的价值可以交换观点甚至冲突，但这都不妨碍他们互相承认平等的身份。

认知不合作方式的多样化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对抗的多样化、生产的多样化和传播的多样化。对抗的多样化，即我们可以多样地抵抗和限制意识形态机器对我们的影响。生产的多样化，即我们可以善于利用各种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符号和象征，来进行区别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认知活动。传播的多样化，即信息的产出的传播不应局限于现有渠道和方式。

认知不合作组织去中心化，即不需要一个统一的组织和领导，不同的个人和小团体都可以自发地进行认知对抗，独立地运用不同方式来进行对抗。这不意味着行动者的参与者是孤立的，认知不合作的全民性正是在于没有一个人或者组织能控制和停止行动本身。

2022 年末的“白纸运动”的成功也正在于它的多元性和去中心化。它不排斥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的符号运用，在不同城市和不同国家，不同立场和诉求的人都自发地聚集在一起表达对暴政的不满。一张白纸本身，可以理解为中国人开始尝试对于符号的认知和创造本身权力的独立掌握。

那么，认知不合作的具体方向都有什么？

首先，是文化上的认知不服从。我们在文化上需要对抗意识形态机器对于认知和话语权的垄断。文化上的认知不服从提倡我们应该拒绝或消极参加官方意识形态活动，拒绝或有限度地使用官方控制的信息渠道和社交媒体平台。在对抗的同时，文化不合作也提倡公民积极运用各种包括地方语言和亚文化等多样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表达对抗与解构极权意识形态。

其次，是政治上的认知不服从。不同立场的公民应该联合起来

对抗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暴力。我们在坚持民主和自由平等价值的原则下，应当积极灵活利用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身份政治等等各意识形态和身份符号，积极对抗中国极权政府垄断的身份建构和话语权，以在公民的平等争论和合作中培养政治主体性和公民性。

最后，是经济上的认知不服从。公民应用不同方式突破信息壁垒和官方叙事，形成对中国经济的独立评估，创造更多样的信息源和分析工具，以增强自身独立经济判断能力，减少对中国经济形势和社会保障系统盲目信心。

在以上框架的基础上，我结合当下情况，提出了两个具体的建议方案。

（一）拒看春晚，街头庆祝除夕

春节联欢晚会从相对大众化的节日娱乐形式进一步地沦为赤裸裸的专制意识形态工具。本方案号召中国国民和海外同胞集体参与到“拒看春晚，街头庆祝除夕”的节日运动中。拒看春晚，是公民对意识形态暴力的认知对抗，也是重新掌握自身对于节日文化和符号的权力的尝试。对于2024年中央电视台以及地方电视台的联欢晚会，本方案提倡中国国民和海外同胞做到“拒绝观看、拒绝讨论”。

近日，中国当局宣布在2024年的农历除夕当日不放假，在社会上广泛地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质疑，在事实上除夕当日将会有更多未返乡人口处于城市。除夕当天，本方案号召中国公民以及海外华人，通过集体外出街头庆祝等方式，重新庆祝中共企图淡化的“除夕”节日。策略上，参与者可以灵活利用除夕本身符号和谐音等延伸义，表达对中国当局淡化传统文化、无视群众诉求的不满，让群众在抗议式的庆祝中重新掌握公民和中国人民对于自己节日符号的权力。

（二）赛博游行，要求说人话运动

中国专制统治的权力扩展建立在它对于语言符号愈加的滥用和暴力上。本方案号召中国公民和海外同胞拒绝中文语言符号滥用的不明确。在某一个足够引发民众广泛不满的热点事件后，本方案号召中国公民行使名义上的问责权力，紧紧抓住一个事件，拒绝官方的信息干扰，持续要求政府和官方媒体“说人话”，拒绝逻辑和符号上的模糊。该运动是抗议性的，它能够让参与者广泛认识到中国当局的暴力是多样的，认知的不自由所带来的是权责不统一和公民无法就事论事进行追责。

以上两个方案是结合了认知不合作框架和当下具体时事的提案，希望方案本身和不合作框架能够激发更广泛和更多元不合作运动。

真理的力量

作为总结，我再次号召公民不合作运动中要始终相信认知的力量和相信真理。在甘地、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恩所参与的公民不合作运动中，他们和其他参与者始终相信自己对于正义和真理的理解，也同时坚持真理不能被暴力和专制垄断。认知活动本身就具有对专制和极权的反抗性和颠覆性，自由的思想者也能成为一个自由的政治实践者。坚持真理的认知不合作不仅仅是消极对抗，也不仅仅是弱者的武器，而是利用我们作为人的自由的基础去对抗造成我们不自由的专制和暴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时期，我们没有认知的自由，真理被暴力垄断。在改革开放后，关于政治真理和政治价值的讨论被经济实用主义和暴力所搁置或镇压。在当下，广大国民的认知的自由仍在不断被侵害。认知的不合作，就是在极权和暴力下做一个清醒的人，并联合其他清醒的人，让更多人认知到什么是真理和正义。

作为公民运动，认知的不合作将会有两个可能的后果。一个好的后果是，它能够激发国民的不满，让国民能够进一步独立思考对抗意识形态宣传，并在认知活动的对抗中培养出公民性和民主价值的认可。一个坏的后果是，它将进一步揭下专制仅存的意识形态遮羞布，让专制统治进一步极权化，更加赤裸裸地依靠暴力。然而乐观来看，一个丧失了对真理垄断的专制是一个处在崩溃边缘的专制。这个情况下的公民将比以往更有希望，实现基于个体认知自由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

55 号作品 | 作者：Li David

“推诚运动”

这种推动人的诚实、恢复诚实的运动，是人人都能去做的，是可以全民性的。有许多方面，难易都有。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内容，比如对学生和党员可以要求诚实的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在跟当局抗争时，又比较容易推进。对于每个人，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要坑蒙拐骗，这是最基本的权利，是可以坚持做下去的。

这样的诚实运动，实际上是在撼动这个政权的最根基的东西。我们知道，要讲诚实，那就不应该去搞假食品、假药、假货去害人，不应该统计数据造假。如果讲诚实，就不应该去骗人。如果讲诚实，那就不应该把别人转发的真实的帖子和微信号微信群封禁掉。如果讲诚实，中国的媒体、央视就不该天天大肆传播谎言。每个人作为父或母都要求、教育他（她）的孩子诚实，每个人可以这样要求社会、要求自己吗？做诚实的人，就没法去宣誓成为党员，誓词中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历史早已证明：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人人富裕又有自由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共产了，人没有私有财产，人何谈自由？做诚实的人，就没法去对那个宪法宣

誓。他们宣誓都能搞假的，他们什么能是真的？

今天的中国，最大的假就是中共啊。他们掩盖历史、伪造历史，信仰虚假。推动诚实，他们就得完蛋。他们就是靠谎言在维持统治。真要保持诚实，肯定就在某些方面与他们不能合作。还能在他们那个官场混，肯定不能是诚实的人。诚实的人，必须马上退出。李克强死了，还不醒吗？

面对中国今日之局，“首先应该恢复诚实”。这应该是改变中国的起点。（这个是从最根本上推动中国的改变。这个是比较民主、公民运动是更根本的。骗子不能搞出真民主，看看郭的例子。）当然这二者还是要继续推动的。专制不去，中国愈坏，确实要打碎这个枷锁，路径却有多种。道德信仰是社会的根基，也是民主社会的根基，推动诚实，也是为未来的民主自由社会打根基。没有根基，上层建筑是立不住的。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不是由骗子们构成的。

从长远来说，如果要做到民族复兴，那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诚实的民族，人多善意的民族。没有说充满欺骗、冷漠的民族，能是伟大的民族、复兴的民族。中国人现在在世界上的形象很不好啊。让中国人恢复诚实，民族自救，道德自救。

当然，在诚实的基础上，还有人的正直。人是站立在大地上的人，脊梁骨是垂直于地的，人天生有正直的一面，人人心中有杆秤，公道自在人心。再一个就是人的良善。

我认为诚、正、善，这是三个基本价值观，应该推动，这是人的良心良知必不可少的三个内涵。这里当然最基本就是诚，是第一位，才能谈别的。推动诚实，推诚，围绕这一点去做。民众普遍诚实，民众普遍对他人怀善意，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好的社会。解决中国问题，首先应该恢复诚实。这也是道德问题，比政治问题易介入。如果如甘地那样去做，这个体制很可能解

体。我就是不说假话，我就是不和你中共合作。

鲁迅早就批判过中国社会的“瞒和骗”。李克强说了六亿人月入不过一千元，这就展现了诚实，诚实就会说真话。这戳破了某人的小康社会的谎言宣告，某人怀恨在心吧。诚实的力量！精诚开金石。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马太福音），人“里头的光”就是良心之光，良心暗灭，人就完全黑暗了，这样的人就是那些骗子、罪恶之人。这样的人多了，社会也就黑暗了，如夜空中没有星星。良心也可以光大的，文天祥的“正气”、孟子的“浩然之气”都是可以正大的。这样的人就是“里头的光”没有暗灭，而且很大的。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当然就亮堂堂了！而复起良心、光大良心的第一步就是恢复诚实（“复诚”），是点起“里头的光”的第一步。造成了这样的良知之人（光明之人），这样的人当然会反抗专制独裁暴政。

这个“诚实运动”显然是非暴力的，也是不合作的。做诚实的人，当然就会讲真话，传真相，求真理；讲真话，保真心，做真人，不做假人，诚与真必相连。比如微信方面的问题：坚持反抗封贴封号封群，就是真实 VS 虚假和谎言的抗争。

前面说了，中共其实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假。中国要全面打假，归于诚实。其实是上行下效，中共如果诚实了，下面的假也就都会消失了。中共要诚实，中共恐怕也就要结束了。

57号作品 | 作者：箴杰夫

标题：推翻中共数字极权警察国家的全方位反抗运动

21世纪是人类进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工程全面深入应用的世纪。21世纪也是民主自由人权高歌猛进、极权专制负隅顽抗的

世纪。极权专制最后也是最顽固的堡垒——中共（CCP）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它既非中华，更非人民，亦绝非共和国），是那少数负隅顽抗的专制政权中最凶恶、最狡猾、最无耻、也最危险的一个。由于 20 世纪末叶 21 世纪初叶 CCP 对自由民主世界的伪装欺骗，不仅为 CCP 的替身 PRC 在 20 世纪末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冲击中赢得了续命、喘息的机会，而且还以欺骗手段搭乘全球化便车获得了长足的经济实力增长和部分领域的技术追赶，并因此将经济实力增长和技术追赶转为军事实力增长，以及利用全球化机会获取大量新科技并运用新科技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建立了严密严酷的数字极权，并在近年来妄图将其极权统治的模式推广到其同类的专制国家。

尽管如此，中共政权 CCP 的统治面临的状态是国内危机四伏，国际四面楚歌。

- | | |
|---|--------------------------------------|
| 国 | 1. 经济机制 ->国强民弱国富民穷，难以为继 |
| 内 | 2. 长远发展 窒息创新，没有未来 |
| 内 | 3. 利益分配及社会公正 底层挣扎中产苦熬 |
| | 4. 派系恶斗 官僚离心离德 |
| | 5. 打压民企 商界逃离风险 |
| 国 | 1. 自由世界开始认清 CCP 真面目，遏制中共的联合阵线正在形成 |
| 际 | 2. 避免中共的扩张和崩溃风险，资本撤离 |
| | 3. 防止为中共加强牙爪羽翼，发达工业国家逐渐高筑技术转移壁垒 |
| | 4. 国际社会警惕中国在太平洋西部的扩张 |
| | 5. 国际社会警惕中国和其他专制国家（如俄罗斯、伊朗、北韩）形成邪恶轴心 |

所以，中共统治“危机四伏、四面楚歌”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估。世界如果要有持久和平，必须要遏制乃至摧毁 CCP 专制政权；中国人民要有持久安定和繁荣，必须要摧毁 CCP 政权。

CCP 以其对民众的高度恐惧，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

极权统治机制：

1.以盗窃的高科技为基础，保持一支强大的武力以抵制自由世界的外部压力（“枪杆子”）——对外顽抗体系；

2.以数字极权为最新添加，保持一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监视和压制的警察力量（“刀把子”）——民众镇压体系；

3.以对幼儿园到博士研究生的全系统插入和严控的教育系统、无死角掌控的媒体系统、挖空心思潜入人心的“娱乐”系统，加上新进获得并且日益严苛的数字监控和认知作战，建立和保持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思想塑造和掌控系统（“笔杆子”）——极权洗脑体系；

4.以组织部的严苛监督、精心筛选忠于 Party、其实是忠于 CCP 党魁一人的党干（所谓“政府官员”，在 PRC 其实无一例外都是党干，而不是正常国家的公务员），确保党（其实是党魁一人）的思想路线的 150%执行，并且以“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工具对不从者、“离心离德者”实施惩罚（“官帽子”）——奴才掌控体系；

5.以中共统战部、侨办/侨联、中联部和各个职能部门的对外联络职能（例如科技部、发改委等部委的“国际合作司”），建立和保持对海外华人以及外国各界的渗透和统战而建立的海外力量（“说客、别动队”）——环境塑造体系。

这五个系统是 CCP 得以在内部危机四伏、外部四面楚歌的内外环境下把持政权、抵制任何对中共政权的威胁和变化的“葵花宝典”。其中后四个是 CCP 全力压制掌控内部的综合手段和机制。我们这篇文章集中聚焦于在 PRC 内部削弱、拆解中共政权；因此将聚焦于中间三个方面：削弱、拆除中共的内部统治体系的三个支柱：

民众镇压体系

极权洗脑体系

奴才掌控体系

一、削弱、熔蚀、凿毁民众镇压体系

中共极权政权，除了与中外历史上所有极权政权相同的镇压力量——警察/捕快以及衍生出的非法镇压力量如城管和新近建立的农管——之外，还发展和创新了历史上集权统治的机制：

1，把历史上的“保甲制”发展成为与上级政权紧密联系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政权派出机构“毛细血管”，并且在三年的中共瘟疫封控中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以空前细密的网格来笼罩每一户、每一位居民/村民；

2，创造出了基于数字技术的极权统治机制“网信办”、网警、网监，对民众的任何不满苗头进行瞬时监控。

但是，这样貌似强大和严密的统治体系，不是没有它的弱点。

1，庞大的、全覆盖的体系，需要天量的资金；

2，无远弗届、渗透一切的体系，需要巨量人员；

3，对民众任何不满或者“异动”的监控和迅速反应，需要监控和镇压力量人员具有主动性创造性的工作。

这些要求，就造成了中共庞大且貌似严密的监控镇压体系的弱点。反抗民众可以针对以上三点，逐一打击、削弱中共的统治体系，加上这样的反抗、打击行动成功的一个关键方面、三个途径。

针对一：消耗中共的维稳资源。中共在近一二十年倒行逆施的政策下以及在最近三年来国际社会的警惕、抵制、反应、遏制下，经济下行已不可逆转，赖以支撑其庞大和貌似严密的维稳体系的财政资源已日渐枯竭；同时中共权贵集团的贪婪腐化和各级政权的肆意妄为，每日每时都在制造和激化与各阶层民众的新的矛盾。民众的抗议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反抗的民众应该有意地以分散的、达到“临界规模”（大到一个局部地区的维稳力量不足以单独对付）的、多地多点的联动，来达到使得中共的维稳力量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加速其财政资源的耗竭，并且这种多地、多点爆发

的反抗能够不仅有效地打击维稳力量人员的士气，同时必然造成维稳力量人员的反思和对反抗民众的同理心，在体制内部打下改变的楔子（撬动中下层体制内人员这一点，下面会继续展开）。

这样的民众抗议，在沦丧中的 PRC，有着无穷无尽的触发事件：官商勾结的征地拆迁不公、官官相护或官商勾结的司法不公、官员富商或者官二代富二代的害民行为、严重环境污染事件、维稳力量滥权甚至草菅人命……PRC 统治下的中国大地，各地每一天都有无尽的这种触发事件。每当触发事件出现，反抗民众可以运用安全的通讯工具，避开中共的网络监控，来进行消息传播、行动倡议、行动执行、实时播报。这种多地多点的联合反抗行动，能够最有效地消耗、吞噬中共政权的维稳资源，能够有效地消磨维稳力量中人员的斗志，并且启示其中部分人以各种方式加入民众的反抗或抵制。

反抗民众同时应该注意，在未到最后总奋起时机的时候，尽量采用低烈度的、法律范围内、中共政府“土政策”边缘的方式和领域进行抗争或者不合作；这一方面减少中共极权高程度暴力镇压的借口和机会，另外更重要地，减少参与民众的恐惧和负担。只要有尽可能多的民众打破恐惧来参与，只要没有触发到维稳机制的高度暴力镇压，每一次的运动，都是把民众的不合作或者反抗推进一步，把中共维稳机器的领地逼退一步。长此以往，民众的勇气、参与意愿、组织能力，可以得到锻炼提高；而且还能够有效消减中共维稳人员的士气、甚至影响其中部分人员私下参与或者帮助反抗的民众。

针对二：消减维稳人员斗志、启示维稳人员参与反抗。一切体系的有效和持续运行，高度依赖体系内人员的尽职工作。维稳工作，由于其不可避免的物理暴力性，客观上其执行人员很多来自社会中下层特别是下层。这些出身下层的维稳人员，其家人、父老、亲朋，很多直接就是维稳体系的监控管制镇压对象或者潜在对象，

这些亲友的几乎所有人都是极权统治下勉强度日甚至挣扎的蚁民。中共严酷严密统治下（特别是例如三年封控下）的蚁民，都在人格上的忍气吞声和经济环境的冰霜严寒下苦熬，维稳人员中不乏有父老由于严酷封控而早死/救治不当死亡或者忍饥挨饿的经历。这些亲友的经历，不可能不在维稳人员心中投下深刻的阴影，使他们对于其维稳工作所要维持的体制和权贵产生怀疑和离心倾向，使之稍微放松、留下活动空间，或者网监人员对监控言论类别/监控对象略微放松、延迟扑杀使其得以传播略为久远、国安/警察基层人员透露一些消息使得反抗力量得以保存或者反抗行动得以开展/成功，等等。

针对三：大力发展反抗创意，消减监控和镇压的有效性。要监控和镇压十四亿在信息时代发展出相当的复杂行为能力的民众，监控和镇压计划的行动需要有很高的创新型。但是，不管监控镇压机器如何地高能、复杂，他们面对的千倍万倍的民众，永远能够产生更多的创意来表达反抗、号召反抗、凝聚反抗。一个新近的例子就是上海的万圣节活动中，很多年轻人借着幽默、狂欢的机会和方式/机制，公开表达了他们对中共极权颠覆、荒唐、残暴、非人性、愚民政策、打压自由经济等等极多方面的不满，以幽默、玩闹、玩世不恭的表面形式，深刻地揭示这个政权的荒诞、非人、不得人心，得到了受众的高度关注，产生了很高的传播效果。反抗运动应该善用一切类似的机会——万圣节、狂欢节、音乐节、诗歌节、购物节……开动创意以不同程度直接间接的表达，来启示民众的思考，来挑战当局的荒诞和严酷，同时也是对上一小节所言的维稳人员的启示，对后者进行“量变”，以为将来某一天的质变打下心理基础。

以上几点的一个共同的关键：打通自由精英与底层反抗民众的联接，达成自由精英与底层反抗民众的有力联合和融合。底层民众的反抗，是最根本的力量之所在；而自由精英的远见愿景，是反抗运动得以持续、成长、推进、成功的关键。在一个正常国家，因为

有着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有着一定程度的民众自治，精英与底层的联接联合一般都不是问题；因此才有各国对专制的反抗运动的成功例子。而在中共极权这里，正是因为感受到这种威胁，这个政权以空前的力量和心思，窒息公民社会，隔断切断自由精英与底层反抗民众的联系。为了有效地改变（削弱、推翻）中共政权，自由精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积极不懈有效地联系联络联合底层民众，中国的民主自由追求才有可能成功。在自由精英与底层反抗民众的联合这个方面，有三条路径：

通过宗教机制。宗教是人类很本源的精神追求机制，是很难以彻底扑灭、而且扑灭的努力往往适得其反的一个动力机制。因此，中共极权历来将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追求中国民主自由的精英们，必须要清楚敏锐地认识到中共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水火不容的关系，积极、持续不懈地联系基督教等宗教，特别在上述宗教活跃的地区（如温州、成都、厦门之于基督教，东三省、河北之于法轮功），持续努力地联系信教民众，一方面努力支持他们对中共打压的反抗，另一方面真正地正面认识到这些宗教的社区组织对于将来中国民主转型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作用、真心地同情、支持、号召、参与组织他们的日常活动乃至于反抗活动：自治的公民是民主人权社会的基石，而宗教机制是人类成功的民众自组织机制，是永远必须尊重、真心依靠的机制。通过宗族，在中国大片县域及以下的地域，血亲宗族是几百年来的普遍而有效的民众自组织形式和机制。这个机制在南方的很多地方如潮汕、温州、闽南、闽西江西客家……在中共的七十年打压下仍然顽强地生存，并且在近三十年来不同程度地得到加强。自由精英不应该因为血缘宗族机制的古老而将其视为“落后”的事物而不屑、远离：在一个极权统治每日每时对社会进行原子化格式化的政治环境下，任何公民的自发组织都是对极权的有效反抗，都是真正的社会进步。中国的宗族历来有褒扬本家族成功人士的传统，因此自由精英应该撬动这

个机制/杠杆，以自己的精英身份所领受的对宗族内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号召力，积极进行自治动员和启蒙，以便现时地或者长远地准备宗族机制用于维护民众利益、自治机制、挑战中共极权。

通过慈善。慈善机制的一端，是成功人士（主要是市场经济成功者）；慈善机制的另一端，是社会底层最需要帮助的民众，同时也经常是最饱受蔑视、欺压、最是每日挣扎在生存边缘的人群。自由精英们应该要时刻体认到底层民众的挣扎，通过慈善事业来走进底层民众，亲近底层民众，获得他们的信任，培育建设一个精英与底层民众的互动机制，充分认识、努力培育底层民众中的有自组织能力的人士，形成精英与底层联系的坚强桥梁，成为各种活动运动（从日常慈善到公民不合作/公民反抗）的中坚力量。

二、削弱、熔蚀、凿毁极权洗脑体系

中共苦心经营的从幼儿园到博士生的教育体系，充满了下面几个方面的洗脑意图和功能：

事实洗脑：歪曲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以达到洗脑的目的（例如：“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领导抗日”“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修逼债”等）；

逻辑洗脑：在逻辑上误导洗脑对象，以摧毁后者的思考和质疑能力。例如“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彻底掩盖毛泽东三十年荒唐残酷造成的中国远远落后二战后世界的和平发展、以至于虽然经过了三十年改开，中国的人均GDP和预期寿命仍然远远低于千年来就是汉族皇朝附庸和学生的韩国；并且彻底掩盖三十年来成长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共政府部分放松了对经济对社会的严控、少犯错少犯罪少做荒唐事，中国的成就绝非来自于中共的贡献，恰恰来自于中共在管控社会中的部分撤退退让；

价值观洗脑：在价值观上确立错误价值，使得洗脑对象无法跳出（也没有意识跳出）被洗脑的桎梏（例如“中国人不需要民主自

由：中国人只需要生存权发展权”——并且把发展权曲解为经济/物质发展而屏蔽删除公民的政治和社会权利）。

文化洗脑：在文化上麻醉迷幻洗脑对象，建立民族虚骄，以图抵制普世价值和社会进步。例如“中国领先世界五千年，只是在最近三百年落后”，以虚假的“民族自尊心”构筑抵御普世价值和防范民众学习西方的心理和价值观高墙。

追求中国民主自由人权的进步人士，必须坚持不懈地从上述四个方面打击中共的洗脑努力。所有追求中共政治和社会进步的精英人士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上述问题及其解决的必要性，这方面就不再赘述。只是强调一点：事实洗脑、逻辑洗脑、价值观洗脑、文化洗脑是一个协同的体系，因此对它们的反制、削弱、打击也需要以协同的、有机的、综合整体的方式来进行，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机会来进行，例如从中国历史地理、艺术史的角度，从外国博物馆介绍的角度来冲击洗脑，以近现代经济研究、苏联东欧转型与中国改开的对比研究的普及，以台湾韩国的成功转型来冲击洗脑。一个有效的反洗脑角度是近几年兴起的宏观历史和人类学研究普及，例如被普遍关注和广泛阅读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简史》《未来简史》《西方将主宰多久》等书籍的普及讨论，以及类似领域的讲座报告会及其视频传播，都能够在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官员中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青年教师/青年干部中产生深远的反洗脑（特别是价值观洗脑、文化洗脑，当然也必然直接冲击、削弱、摧毁逻辑洗脑和事实洗脑）效果。

三、削弱、熔蚀、凿毁奴才掌控体系

中共极权统治的一个关键要件，是以组织部考核“培养”、纪委监督监察惩罚、组织内部时时洗脑并且以各种方式（时常是荒诞的方式）来考验和强化忠诚，达到发现、培养、考核、奖惩强化一大批对中共（在毛共和习共时期登峰造极到对毛酋和习酋）的忠诚

的党奴才这样的体系。毛酋曾经有过这样的直接承认：“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关键”。中共深知一大批听话、忠诚、随时准备随着组织的命令而扑向猎物的鹰犬，以及千千万万可以随心所欲地拧紧在党机器上的“螺丝钉”，是对于党极权的生死成败极为关键的命根子。所有的抵御自由世界的压力、镇压敢于反抗的民众，长程、全面无死角的洗脑、对外的统战，这一切都完全依赖一个俯首帖耳的奴才创造培育和掌控体系。

这个体系无比强大，但是也有它自己的弱点。

1.中共内部派系斗争带来的阻断部分人上升通道、对部分人“不成比例”的奖惩所造成的奴才队伍怨懣；

2.统治集团（尤其是现在的习皇帝）的高度不安全感带来的频繁清洗、打击、敲打所造成的各级奴才的人人自危和抵触；

3.统治集团倒行逆施造成的经济倒退、政权掌控财金资源的枯竭而引致的奴才激励的降低——奴才躺平现象的普遍化；

4.中共政权的害民政策、措施、行为给民众造成的损失，通过官员/维稳人员亲朋而传导给官员、维稳人员的不满情绪；

5.信息时代信息流通不可避免地带来的体制内人士因为知晓增加而带来的独立思考 and 不同程度的觉醒而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抵制行为。

追求中国民主自由的人士必须清楚地认知上述情形，积极主动地撬动这些情形所带来的对官员和维稳人员的可供启蒙和联合、团结的机会。在此需要特别讨论的是：一方面如果高层出现反体制人士，一如戈尔巴乔夫和一定程度上八十年代的胡赵，对于中共体制的冲击固然会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对于所谓“高层改革派”寄予太多的希望——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自从1989六四镇压之后，中共高层似乎已经不再有当年那种形成“改革派”一个有一定力量的派系的生态了；所以尽管我们不应放弃希望，但是绝对不能够把希望寄托在所谓高层改革派身上。相反，各层级的官员和维稳

人员中（尤其是中共组织部、纪委、网信办、国安、公安等部门），由于以上讨论的五个原因，是实实在在存在着众多的躺平、敷衍、不满甚至部分抵制乃至反抗的官员和维稳人员的。寻找、关注、联络、联合这样的官员和维稳人员，让这样的人士在民间反抗的时候提供一些援助、帮助、信息、给一些监控松动的机会，是现实的应该努力的着力点。

为了达成争取中共官员和维稳人员对反抗运动的减少妨害甚至暗中相助，民主自由人士和反抗民众的组织应该：

紧密跟进中共官员和维稳力量人员的亲友、乡亲、邻里遭受不公待遇的机会；

紧密跟进中共官员和维稳力量人员所在机构遭大幅经费裁减人员裁减的机会；

紧密跟进中共官员和维稳力量人员与其有感情联系和忠诚关系的上司遭到整肃、这些官员/人员产生不满或者恐惧的机会；

紧密中共官员和维稳力量人员有可能在镇压和监控过程中接触到足量的可以动摇洗脑效果的真实信息的机会。

抓住类似上述的机会，对中共官员和维稳力量人员进行因势利导的启发、说服、晓以利害或情感或晓以大义，争取这些中共官员和维稳力量人员放弃对中共或者对所效命机构的忠诚/服从，争取他们为自由民主活动运动、为民众反抗运动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些会是民主运动、反抗运动的实实在在的进展的条件。

后 记

此次征文活动的举办和本作品集的出版，凝聚了许多人的奉献、劳作与心血，在此书即将完成之际特此向他们致谢。

首先，最需要感谢的，当然是所有参与此次征文活动的作者。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不少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中思考与写作，并且出于安全需要而选择了匿名。

其次，要特别感谢两个评审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此按姓氏笔画为序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如下——

专家学者评委会：马建、王天成、宋永毅、苏晓康、胡平、慕容雪村、裴毅然、蔡楚、蔡霞。

公民社会评委会：王清鹏、古懿、刘士辉、孙立勇、伊利夏提、向莉、李向阳、苏雨桐、吴祚来、罗胜春。

再次，感谢楚山孤、魏水平参与文集校对，何杨提供了颁奖会和研讨会现场照片。

最后，感谢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对整个征文活动和公民抗争研讨会所提供的帮助，以及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了有着特殊意义的场所举办颁奖会和研讨会。

本书由“中国行动”（<https://chinaaction.org>）策划、由位于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感谢博登书屋同意此书出版后的销售所得，除去销售平台费用，将由“中国行动”全部用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宣传推广。

此书为“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征集文稿的作品集

收录了11篇获奖作品的全文，并摘选了未获奖作品21篇部分内容。

从作者的精心写作可以看出，全球有志于民主的华人，对于如何开展非暴力抗争，并以**最小代价将中国从专制转型为民主**有很高的热情和深入的研究思考。

在中国民主化的历史上，这些经验总结和思考是宝贵的，既可以借鉴来指导将来的非暴力抗争，也为历史上国人进行**和平抗争**的努力留下了记录。

白纸行动证明，即便在当今这样严酷的独裁暴政之下，民众以非暴力方式从事抗争仍然是现实的，是可行的。

ISBN 979-8-210-94867-0



9 798210 948670